

(01/28)

（作者附言：本文长篇，开始部分枯燥叙述较多，后半部分会精彩。请读者耐心。本文的参考文献出处有 2 千多条，全部删掉以简洁文章）

柬埔寨，亦称高棉，是东南亚南端的一个热带农业小国，领土 18 万平方公里，西部东部和北部分别与泰国、越南及寮国（老挝）接壤。柬埔寨有着两千年历史，佛教（Buddhist）是柬埔寨国教，来自印度文明的传入，街上来往的和尚披著鲜黄耀眼的袈裟，民众的问候礼节是僧人般的双手合十，每家安放吉祥神龛。

十六世纪末期，柬埔寨的邻国越南（Vietnam）和泰国（古称 Siam）逐渐强盛起来。柬埔寨则轮流成为泰国或越南的属国，也导致泰国与越南之间的长期敌对。1847 年泰国再次控制了柬埔寨，泰国人废黜了传统柬王，另挑一位名叫诺罗墩（Norodom）的高棉人，扶植为柬埔寨的傀儡国王，即今日的柬埔寨国王诺罗墩·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的祖先。1863 年柬埔寨确认法国对柬埔寨的宗主权和保护义务。法国远征军开进柬埔寨，从此柬埔寨享有了百年安宁。此时越南皇帝也寻求法国保护。1892 年法国征服寮国，把越柬寮三国合并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法国允许越柬寮三国各自保留其王朝政体及官制。二十世纪中叶，法国试着把民主制度逐步引入印度支那殖民地，在越柬寮三国的君主制中加进一些宪政雏形，消减了君主权力，使得政府开始建立并具有职能，民间获得出版自由。

柬埔寨生产力低下。法国人不干涉柬埔寨的宗教与民族文化，只把法式文化引入柬埔寨，培育了柬埔寨人对法国的感情和对宗主国的认同。法国人还在柬埔寨建设了公路铁路桥梁和发电厂、自来水厂、造纸厂等。此时，金边只有为数不多的法国开办的学校。代表柬埔寨最高教育水准的是金边的西索瓦高中（Sisowath High School），它由柬埔寨皇家和法国殖民当局所共建。日后柬埔寨的许多风云人物都出于西索瓦高中，包括朗诺（Lon Nol）、施里马达（Sirik Matak）、宋双（Son Sann）、乔氏姐妹（Khieu Ponnary, Khieu Thirith）、英萨利（Ieng Sary）、宋成（Son Sen）、乔森潘（Khieu Samphan）、胡宁（Hu Nim）、康克由（Kang Khek Ieu）等人。

当诺罗墩家族的第三代国王去世后，继任国王莫尼旺（Monivong）与他的 60 位妻妾嫔妃的性活动，间接地对二十世纪的柬埔寨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莫尼旺的一个女儿哥沙曼生了个王子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其二，莫尼旺的一个儿子拉塔里生了个王子施里马达（Sirik Matak）；其三，莫尼旺在 60 岁时纳了个 17 岁的皇家舞蹈团女演员为应招妃，日后此妃的一个小表弟沙洛沙（Saloth Sar）间接地借助这个关系从乡村来到金边生活。

从十九世纪起，人类在整体上面临了社会的大转型，即从王朝专制社会向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型。现代的人在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要求，推动社会对权力建立起监督、制衡的机制，从而发育出现代的民主政治。民主与自由导致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富有活力和智能性、又具备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修复功能的复杂系统。在二十世纪里，“众生平等，生而自由”成为不言

而喻的普世公理，而公平、公正、人权、民主等等都由此获得天然的合理，普世价值观由此产生，成为全球的共同追求并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共产主义”开始渗入东南亚的时期，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从柬埔寨的磅通省乡下来到了金边。这个其貌不扬，嘴巴半开，说话慢声细气的人，如今被介绍道：“请仔细看看这个人(照片)。你可能对沙洛沙这个名字感到陌生，那么提起他的化名就有如巨钟一样轰响……”

沙洛沙，高棉人，日后成为“红高棉”的一号兄弟（化名波布，即波尔布特）。他身世极度神秘，其毕生唯有两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两次采访相隔 20 年之久，而两次记者们提出的第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竟然完全相同：你是谁？

今日，靠着访问他的同胞兄弟沙洛生（Saloth Suong）、沙洛内布（Saloth Nep）和姐姐沙洛荣（Saloth Roeung），以及 CNN 记者瑞得勒（John Readler）深入沙洛沙的出生村庄收集到的信息，世人才对他的身世有了虽然不多但较清晰的了解。

他的亲人分别证明他是 1925 年 1 月 25 日出生在磅通省泼瑞斯博村（Prek Sbou）。他父亲家庭有孩子 5 男 3 女。据沙洛沙的亲人们所讲，童年的沙洛沙“小时候胆小而温顺，看到家里杀鸡也会躲得远远的”。1931 年他 6 岁时被父母送往金边，靠一个曾是老国王莫尼旺的“应招妃子”之一的表姐接应。沙洛沙被送到莲花寺庙学习巴利文和佛经，兼当杂工。那个寺庙阴森肃穆，迄今接待了无数对沙洛沙身世好奇的访客。从现有资料来看，少年时的沙洛沙从心理到行为都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在金边，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出生于 1922 年 10 月 31 日，他个子矮矮，比例匀称，精力充足，性情乖张，反复无常。1941 年 5 月初西哈努克登基为新国王。在四十多个王子中，为什么是西哈努克？原因很简单：法国殖民当局“相信一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是比较容易被操纵的”。有了时间和王位，西哈努克的性欲爆发，到处寻花问柳，乐此不疲。他甚至不放过老国王莫尼旺的妃子、还有他的表妹（哥沙曼太后妹妹的女儿）和他的姨妈。他曾在 24 小时内分别与两个女子举行婚礼，他不挑食，大龄妇人和少女，他都不嫌，但睡过后就连名字也遗忘。他很快就有了 8 男 6 女共 14 个孩子。这一系列泛滥的性活动，直到他娶了莫尼克（Monique）之后才停止。莫尼克，1936 年出生，法越混血女子，她谨慎稳重，对政治没有兴趣。

二战后，民主与专制这两种潮流发生了直面碰撞，形成在世界范围内两大政治军事阵营的对抗格局。美国主导世界进入了“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环境。1946 年美国作出榜样，把从日军占领下收复的美属菲律宾给予独立并施以援助。英国受到国际格局变化的压力，终于雍容大度地放弃海外殖民权，用自己对文明的理解，结束了殖民时代。美国倡导国际新秩序，组建了联合国组织（UN）。而法国仍坚持殖民主义，1945 年 10 月法国远征军重返印度支那。

在英属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的鼓舞下，印度支那地区要求结束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在兴起。到了 1947 年底，柬埔寨的东部“亲越共”游击队与西部亲泰国游击队，联合组成“伊沙拉阵线”（IUF），武装反抗法国殖民当局。

柬埔寨的亲法势力由皇室势力（代表人物是西哈努克）及保皇派（代表人物是施里马达

和朗诺)组成。保皇势力追随皇室立场,但不亲法。保皇势力在乡村拥有支持者:出于长达千年的君主观念和王朝传统,柬埔寨人民普遍认为一个没有国王的社会是不正常的。

1947年10月柬埔寨举行政党竞选。由于民主党拥有知识阶层资源,金边学生走上社会为民主党助选,其中包括沙洛沙。他厌恶学习,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进入金边技校学习木工。22岁的沙洛沙精力充沛,话语不多,肯干。就在这一年(1947),在与“金边学生联合会”的助选学生相互串联时,他结识了一个17岁的西索瓦高中学生英萨利(Ieng Sary),两人从此结下终生不解之缘。

英萨利,1930年出生于越南南部三角洲的交趾支那地区,华裔血统。他高身材、长脸型、额头宽,一幅华人相貌而不是身短肤黝凸额的高棉人相貌。1943年他全家移居金边,改换了高棉名字“英萨利”。英萨利头脑清晰,心机敏捷,出言慎重,喜怒不露,也是个天然的学生领袖,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些追随者。

从党派的私利出发,民主党政府把法国提供的奖学金的一部分名额,直接给了支持民主党的金边学生们,目的是为民主党培育后备力量。其中一个名额给了为民主党积极助选的沙洛沙。1949年底,沙洛沙奔赴巴黎的一所无线电技术学校。在法国,沙洛沙的学习记录是:起初尚能出席课程,不久便开始缺勤,再后干脆不去上课,他没有通过考试,当然奖学金也就停发了。

此时,苏俄的“共产国际”在法国设立据点,输出共产主义。1950年夏,英萨利也得到奖学金去了巴黎学习建筑学,他在法国一直呆到1956年。那时,赴法学习的柬埔寨青年有数千名之多。英萨利有着策划才干和组织能力,他聚拢了一些思想激进的柬埔寨学生,在巴黎的莱特利尔路(Rue Letellier)15号,那是一家咖啡馆楼上的小旅店的一个房间。他们谈论社会新思潮和柬埔寨的独立问题,这些年轻人对很能迷惑人的马克思理论难免会感到新奇。英萨利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有沙洛沙、乔氏姐妹乔彭娜莉(Khieu Ponnary)和乔提丽特(Khieu Thirith)、宋成(Son Sen)、秀木(Thiounn Mom)和秀蒲拉西(Thiounn Prasit),侯荣(Hou Youn,中国译为胡荣)、乔森潘(Khieu Samphan)、胡宁(Hu Nim,中国译为符宁)等人。这些人在日后都成为柬埔寨共产主义者。沙洛沙是其中唯一的学业失败者,而侯荣是柬埔寨留法学生明星。

法国共产党把许多的印度支那青年引入了共产主义组织。英萨利、沙洛沙等十几个柬埔寨留学生不久后成了法共党员。在法共的影响下,英萨利“小组”所接触到的共产主义实践样板是斯大林主义。1952年英萨利与乔提丽特相爱了。几个月后,他们挑选了法国巴士底(Bastille)革命纪念日的那一天,在巴黎的一个舞厅里结婚。是年,英萨利22岁,乔提丽特20岁。按法国人的习惯,婚后乔提丽特随了夫姓,叫做英提丽特(Ieng Thirith)。

在柬埔寨,1950年3月22日,越共南方局副书记黎德寿在越柬边界的一个小镇召见柬埔寨的几支“亲越共”游击队领导人暹亨、山玉明、杜萨木(3人都是越共党员),讨论筹建柬埔寨共产党组织。11月,越共下令在柬埔寨和寮国分别组建共产党,指定暹亨为柬共总书记,指定苏发努冯为寮共总书记,还规定柬共寮共必须接受越共的指令和协调。

越共为达成建立河内共产主义政权之目的,借民族独立之名,开场了法越战争。得力于中共的大力帮助,到了1951年越共武装的实力膨胀已超过了驻印度支那的法军总数。法越

战争情势开始转变。1954年3月，法军在北越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失利，法国国内要求法国撤出印度支那的呼声铺天盖地，巴黎只得同意结束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和平协议”签署，法国撤出印度支那。按照日内瓦协议，到1954年10月底，柬埔寨各派游击队也须自行解散，包括总数3千多人的“亲越共”游击队，其中2千人由山玉明带领去北越，受训练并成为共产党干部，组成“柬共河内帮”；剩下的1千人留在柬埔寨，组成“柬共本土帮”，越共指定暹亨为“柬共本土帮”总书记，杜萨木为副书记。“柬共本土帮”在未来几年内没有活动，形同冬眠。越共似乎忘记了柬共，因为他们正在兴奋地忙于自己国家（北越）的“社会主义”建设。

沙洛沙在1953年8月回到金边。有资料说是他的亲兄、越共分子沙洛查（Saloth Chhay）引领他与柬共接上了头，并教给他“革命”技巧。他在磅占省乡村从事了共产主义的秘密活动。温威自述文件提到：1954年4月他作为学生旅行到磅占省三特村（Santey Village），偶然与形迹诡秘的沙洛沙等人同住一个木屋。

1954-1955年，西哈努克打败了柬埔寨民主党，完成了专权复辟。他精力充沛，到各地视察，即兴拜访平民，只为愉悦地检阅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他高兴地收下农民的诉状，并且必定责骂官员。这期间，西哈努克自任首相10次，还换来换去地任免首相和内阁40多次。他的春风得意，使他的乖张、轻佻、傲慢、反复无常和异想天开，逐渐加深。西哈努克的最重要的支撑者是坚定反对“社会主义”的施里马达、朗诺等人。朗诺担任军队总参谋长，他发挥了军事才能，依靠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援助，在其后几年里把弱小而缺乏训练的皇家军队，改造为柬埔寨国防军，扩展至2万多人。朗诺从此掌管军队，长期担任国防部长。朗诺，少言寡语，沉静威严，体恤下属，深孚众望。施里马达担任警察首脑，负责全国治安。

1955-1965是柬埔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金边有了宽阔的柏油大街、高大的楼宇和体育场，银行、货栈、商店、餐馆林立。汽车穿梭于街道。许多新建的中学小学出现在城市与乡村，还把“西索瓦高中”扩建为柬埔寨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金边大学”。60年代初，柬埔寨繁荣达到鼎盛，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金边，羡慕地说“希望未来的新加坡建设得象金边一样美丽壮观。”

在苏联，赫鲁晓夫当权为苏共总书记。他出身于乌克兰的煤矿工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工学院。他是在30年代斯大林恐怖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他目睹了恐怖清洗的全过程并深为反感。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触动斯大林主义。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党内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谴责斯大林搞“独裁暴政”、残酷清洗同党，也使数百万无辜的俄国平民丧生等等。他的报告，击垮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展示了人性的初步复苏是怎样启动了苏联共产党的改良过程。这一天，理应是共产主义运动最暴虐阶段的终结。但赫鲁晓夫的报告，无意中触发了另一个共产党领袖的一连串的思考、谋略和行动，成为一个更加暴虐的“激进革命”诞生的起始点。未来的事实将展示这个“激进革命”是怎样出现于国家政策上，开启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链式反应”，使得某些文明悠久的民族比其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于死亡。

(02/28)

50年代中期，一伙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回到金边：1956年初，英萨利结束了巴黎留学，携妻子英提丽特和妻姐乔彭娜莉回到金边，秀蒲拉西、侯荣、宋成、胡宁、乔森潘等人也先后回到金边。由于他们在巴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隶属法共的支部，这些人的组织关系回到柬埔寨后都自动转为柬共成员，归属杜萨木领导的城市部分。他们被称为“留法帮”，其灵魂人物是英萨利。留法帮的政治倾向是反君主专制和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

留法帮与柬共“本土帮”有着不同。“本土帮”是由越共扶植的，其利益依附于越共的利益。留法帮与越共没有渊源关系，其利益在于他们能否在柬埔寨政治领域里有所分羹。此时，由于柬共“冬眠”，“本土帮”许多党员退出了政治，而留法帮积极活动，发展地下组织和宣传共产主义。

英萨利很快联络上已经回国的沙洛沙。出于至今仍无法了解的原因，英萨利撮合妻姐乔彭娜莉嫁给了沙洛沙。这一年（1956）乔彭娜莉37岁，沙洛沙31岁。从此沙洛沙和英萨利成为连襟兄弟。乔氏姐妹作为姻亲纽带，把沙洛沙和英萨利捆系在一起。沙洛沙积极活动，把一些年轻学生拉入柬共，其中包括温威（Vorn Vet）和谢杰（Siet Chhe），这两人后来都成了沙洛沙的重要亲信。杜萨木似乎颇赏识沙洛沙，招纳沙洛沙来到金边的柬共城市部分。沙洛沙的身份是一个中学的法语教员。

30多年之后，那中学的两位前教员在采访镜头前回忆道：“那时候他名叫沙洛沙。他待人温和，彬彬有礼，对学生耐心，人缘不错。”英萨利也在采访镜头前回忆：“（沙洛沙）他白天教书，安静专心，到了晚上就变成另一个人，走街串巷到下层社会寻找贫苦人家，宣传共产主义。那时我们都这样做。”这十几个活跃的“留法帮”，在仅有百余人的柬共城市部分，可谓是一股新兴力量。“留法帮”的见多识广、年轻激进和朝气蓬勃，也令“本土帮”老党员们刮目相看。

在1957年，北越的战争政策导致了河内需要利用柬埔寨，于是记起了留在柬埔寨本土的柬共。柯袍自述文件说：“在日内瓦会议后，我放弃斗争回了乡村。在1957年，党的总书记暹亨联络了我，指示我重返斗争。在那时，柬共党与越南共产党有着联系。”但此时柬埔寨的社会状态是，共产主义事业在柬埔寨没有希望，因为几乎柬埔寨城乡的每个人都支持西哈努克的君主统治，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革命。

然而，出现了意外问题。柬共内部发生了“迷雾笼罩”的事情。柯袍自述文件说：在1959年暹亨与杜萨木发生了争执，原因是两人争夺党内领导地位。不清楚的是，在暹亨与杜萨木之间，河内究竟属意谁。但是争执的后果是严重的：**暹亨退党，并解散了党的农村部分。这使柬共在农村的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60年8月15日，西哈努克的警察查封了全国所有的左派报纸，逮捕了18位报社主编，包括被警察揪到大街上拍照裸体的乔森潘。西哈努克谩骂左派是“红色叛国者”。这惹起柬共成员的普遍恼怒，也促使“留法帮”的激进主张在党内得到日益关注。

杜萨木继续运作柬共在金边的活动，越共指定杜萨木为柬共总书记。1960年9月21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个废弃车厢里，以杜萨木为首的21个柬共分子秘密开会，自称“柬共第

二次代表会议”。“留法帮”出席者有沙洛沙、英萨利。

该党现在只剩下大约百名愿意继续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是东南亚的最弱小的共产党组织。其中以“留法帮”为主的青年人约占四分之一。这就使党不得不给予重视。在“留法帮”的推举和杜萨木的支持下，沙洛沙进入柬共中央委员会。但杜萨木并未对沙洛沙作出充分的估计。该党的政治路线是：利用西哈努克的假冒“中立”来为北越的战争政策服务。柬共在此时重新组合的原因，在于北越的战争时间表的需要。但西哈努克仍然不知道在金边还有一个共产党组织。因此侯荣、胡宁、乔森潘被西哈努克当作“温和左派”点缀。乔森潘尽管不久前被西哈努克的警察侮辱和逮捕，但那并未阻止他欣然接受西哈努克的拉拢。

1962年7月20日，金边发生了一件几乎无人注意到的事，但它却是柬埔寨未来的死结之一：一个工人在傍晚的回家途中不可思议地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柬共总书记杜萨木。

现在已知杜萨木是遇害了。这是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的神秘遇害事件。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杜萨木失踪的原因和过程。西哈努克至今坚称毫不知情，说当时他的政府并不知道柬共的存在，更不知道一个普通工人就是柬共总书记。若政府知悉杜萨木的身份，应该彻底破获柬共组织、而不会偷偷摸摸地仅仅暗杀一个杜萨木。确实，在杜萨木遇害的前后，柬共没有任何成员受到当局的调查或逮捕。看来，指控西哈努克政府暗杀杜萨木，是一种不合理的推测。而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有些历史学家怀疑是内部作案——正在扩张势力的沙洛沙及其同伙秘密消灭了杜萨木。但这些怀疑也因缺乏证据而悬疑。今日柬埔寨官方的记载只是说“1962年7月20日杜萨木神秘消失。”

杜萨木的离奇失踪在柬共内部引起了惊恐。从1962年7月到1963年2月，党员都躲藏了，但没有谁被捕或失踪，危险似乎并不存在。在这7个月里，党组织没有任何活动，形同瘫痪。直到1963年2月20日，部分柬共成员在一个隐秘地点碰面，发起人不详。柬共老党员占万（Chan Ven）说“当时这个秘密聚会的参加者不超过20人。”后来，沙洛沙、英萨利把这次聚会称作“柬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聚会中，索平提议沙洛沙代理总书记，沙洛沙表示愿意。这是英萨利的布局。由于严重的挫折和恐怖感，总书记的位子现在成了柬共成员互相推诿的“烫手山芋”，大家便顺水推舟，乐于让沙洛沙担当总书记。

沙洛沙的出头，并不是北越的安排。档案文件“柬共与越共的关系”说：“越南人平静地长时间观察柬共的变化，并不介入它，他们不知道……由沙洛沙领导了柬共的事实，以及英萨利的正在出现。”于是柬共的领导权落到连襟兄弟沙洛沙、英萨利的手中，而沙洛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萨利的政治谋略。英萨利对沙洛沙的真实评估是：“他（沙洛沙）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没有政治。”自从沙洛沙当上总书记后不久，柬共的斗争方向就由“联合西哈努克以支援北越”，隐蔽地变成“颠覆西哈努克政权”。这表明：沙洛沙英萨利悄悄地与越南共产党拉开了政治距离。

1963年，西哈努克发动了一个“反左”运动。他宣称在柬埔寨发现了一些左翼势力正在阴谋推翻政府。他命令警察部门予以肃清。虽然西哈努克还不了解共产党在柬埔寨的真实存在，更不知道沙洛沙这个人，但“反左”运动惊吓了沙洛沙。他的反应是躲避。1963年5月，沙洛沙、英萨利、尼沙兰、高米斯、索平、周杰特等人组成的“党中央”离开金边，转移到柬埔寨东部的森林里，处在越共势力的庇护下。

“党中央”在靠近柬越边界的磅占省东端的克柔科玛县（Kroch Chhmar）安家，代号“办公室 100”。这儿的森林茂密，有越共庇护所和兵站，很是安全。此时越南战争紧锣密鼓，基地忙碌，人员日夜往来，难免冷淡了“党中央”。沙洛沙、英萨利那些人，没有“革命”经验和能力，更没有实力，仰食越共，也无怨言可发。

1963-1965 年期间，“党中央”隐藏在丛林里，没有任何活动。其间沙洛沙染上了森林疟疾，他的学生谢杰一直在服侍他。一年后沙洛沙的疟疾病才告痊愈。周杰特妻子音南（Im Nan）为沙洛沙煮饭烧菜。而乔彭娜莉显现出一种可怕的疾病倾向：精神抑郁症（Depression）。这是从她的祖先遗传来的疾病。她常常发呆，无端地焦虑悲伤，不能为党做工作。抑郁症患者常常有自杀倾向。

1964 年 8 月发生了“东京湾事件”（Tonkin Gulf，亦称北部湾事件），挑起了北越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导致整个印度支那局势的骤然紧张。西哈努克的反应是，一方面匆忙去北京做了一个秘密交易，中共官方也提到西哈努克在北京“获得了可观的援助和政治支持的保证”，另一方面他加紧打击国内的一切反政府或者批评政府的活动，以防止越南态势的突变引起柬埔寨的动荡。

金边的警察部门察觉到有些人在进行共产主义的地下活动。西哈努克命令调查，几个月后他得到了证据。1965 年初，西哈努克在一座水坝的剪彩仪式上，首次宣布在柬埔寨确实有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他讥讽地称它是“红胭脂高棉”（Rouge Khmer，红高棉），意思是土产的红粉色并不正统。他决定肃清共产党。留在金边的农谢、宋成感到了危险，便逃往东部丛林的“办公室 100”。农谢出逃的过程不详。宋成是带着妻子云雅特，搭乘一辆从中国来的长途运货车逃往东部。这辆中国货车是由在金边大学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们联络的。

那是一群以“文化交流”名义的带有特殊定向任务的中国进修者。在 1964 年的中国，“阶级斗争”氛围浓厚，尤其在青年人之中，“革命理想”狂热得无以复加。那些中国进修者都是中共挑选的激进青年。这些中国进修者在金边大学里散布“革命”思潮，影响了一个 22 岁的高棉人。

他名叫康克由（Kang Khék Ieu），1942 年出生于磅通省斯滕区（Steung in Kampong Thom province）的一个贫穷农夫家庭，有着华裔血统。他是 7 口家庭里唯一男孩。他身材中等，纤弱，温和。与胡宁、宋成一样，他在小学就以天资聪慧引人称奇，但他的家庭无力支付他的中学费用。他在全国数学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当地的一个企业家慷慨赞助了一笔钱，使他能够进入著名的金边西索瓦高中。他的母亲金赫（Kim Siev）回忆道：“他永远都沉浸在书本里。”1959 年康克由取得全国会考第二名。1961 年他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磅通省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日后，他的同事评价道：“他讲课的精确程度是人所共知的，好象把大脑里的课本抄到黑板上。”

这样一位可能成为数学家或者优秀教师的青年，1964 年被委派到金边大学教育学院进修，在那里他接触了正在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们，从此他的人生方向被改变。在中国被疯狂灌输了革命观念的中国青年，把那些东西传染给康克由。他在教育学院的同学奈本安（Nek Bun An）指出：“康克由之所以被共产主义吸引，是受了一群学习柬文的中国进修者的影响。”

另一件需要提到的事情，就在沙洛沙刚刚逃离金边，还远未“巨钟一样轰响”时，他未来的对手已悄然出现：1964年，一个13岁的怯生生的瘦男孩，从他的家乡磅占省来到金边，在寺庙里做杂工以求初步的文字教育，因为他的家庭无钱供他上学校。这男孩于1951年4月4日出生在一个贫困农家，他的名字是洪森（Hun Sen）。

原本，中共并不知道柬共的存在。1963年中共通过胡宁、侯荣的秘密渠道了解到在柬埔寨还有一个规模很小、听命于河内的柬埔寨本土共产党组织。

从西哈努克的角度看，他讨厌越共在柬埔寨的活动，但他惹不起强悍的越共，也期待着那份尚未拿到手的“中国援助”。关键点是他判断北越会在“越南战争”中最终获胜。于是，西哈努克展开表演，大吵大叫美国侵略了柬埔寨边界，于1964年9月18日驱逐了美国大使。1965年5月3日西哈努克宣布柬埔寨与美国断绝邦交。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回应道：“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柬埔寨的决定已经离题。事实是，柬埔寨为越共游击队提供了许多掩蔽所。”同年11月25日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来到北京，秘密签署了一个协议，这就是起始于柬埔寨磅逊港的“西哈努克小路”交易，也是一份“使柬埔寨国家在法律上彻底丧失中立地位的文件”。在北京，周恩来向范文同抱怨道：“当时你们（北越）在柬埔寨有军事基地，我们不知道，可朗诺知道，要求我们为通过柬埔寨（磅逊港）运输的物资付道路费，我们只好给。”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在北京谈话，也涉及这个道路费，他们都对西哈努克抱以轻蔑：

阮文灵：中国除了给我们武器外，还给我们大米和食品。因此我们的战士能吃的好，身体更强壮。

毛泽东：大概你们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还要感谢西哈努克（提供运输线）。

范文同：我们很了解这个西哈努克。

毛泽东：他就是为了要些买路钱嘛。我们花费些买路钱，值得，值得。

范文同：我们计算过，买路钱比美国援助（柬埔寨）的数字还大。

阮文灵：在过去，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军事装备）2,000万美元，现在中国每年的买路钱超过这个数字。西哈努克帮助我们，他是名利双收的。

范文同：对西哈努克最大好处是我们替他保卫了柬埔寨东部与南越接壤的边界区。

本来，几个大国在越战漩涡中展开角斗，情势险恶，而柬埔寨一旦偏离了中立地位，柬埔寨命运就不由自主了。对此，国际上的研究者们指出：“西哈努克的虚伪是令人很难为情的。”

范文同，华裔，1906年出生在越南广义省（Quang Ngai），30年代被法国殖民当局囚禁在昆仑岛监狱多年。与越共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范文同也因坐牢而在越共内部奠定了资格和地位。北越当时依赖范文同的外交技巧来推进它的建国事业，使他在越共领导层中迅速攀升。在越南战争的全程，他任北越政府总理，全力推进越战，对日后红高棉的兴起他也至

关重要。

1965年3月北越召柬共领导人赴河内“学习”。当年6月沙洛沙和几个同伙沿着“胡志明小道”跋涉去了河内，直到下一年3月才返回柬埔寨。柬埔寨历史文献记载“1965年6月沙洛沙、高米斯和其他柬共领导者离开柬埔寨去河内，持续停留了9个月。”研究者说：“在1965年沙洛沙被召到北越。他沿着胡志明小道北上，花2个月到达河内，在那里他被分派了柬埔寨的民族主义任务。”英提丽特在日后（1981年）披露英萨利也参加了这次的河内之行。

现有资料说，在河内期间沙洛沙等人与胡志明见面三次、与黎笋谈话十几次。谈话内容大致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告诉他（沙洛沙），柬埔寨的革命时机，只有在推迟（柬埔寨的）武装斗争、辅助越共打败美国，那时才会成熟。”这是因为北越担忧：易变的西哈努克如果受到共产党的颠覆压力而无法忍受时，可能会象泰国那样，转向美国甚至邀请美军进驻柬埔寨，如此则北越对南越的战争就将面临被挫败的前景。

在河内，沙洛沙等人与柬共的创始人山玉明也有多次会面。此期间，在印尼爆发了“印尼政变”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血腥“清共”运动，各国共产党为之色变，柬共“党中央”也受到极大惊骇。直到1978年农谢在讲述柬共历史时，还反复4次提到“敌人对印尼共党的毁灭”，“我们从印尼共党的血泊中学会了秘密操作”，“自从1965过去了十三年而印尼共党还未能重建”等等，表现出持续的恐惧。

插曲：印尼政变

中共对印尼“输出革命”而投下了巨大本钱，试图拨转印尼的国家政治方向：拉拢印尼总统苏加诺，向印尼提供经济援助，大力扶助印尼共产党（PKI），操纵华人配合印尼共党的“革命运动”等等。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我们有条件通过这些华侨让东南亚改变政治颜色。”到了60年代中期，苏加诺加速倒向共产阵营，印尼共党的势力加速蔓延。印尼社会弥漫着一种吊诡气氛，印尼共党的蓄谋倍受疑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党首先动手，期望一举夺权：翁东等人率领7辆卡车满载身穿总统卫队服装的武装士兵从哈林（Harlem）空军基地出发，深夜来到首都雅加达，对印尼“军事委员会”7名最高级成员的寓所实施突袭。印尼陆军司令等多名将军被绑架杀害，仅国防部长纳苏蒂安（A. H. Nasution）只身翻墙逃匿，他的小女儿及家人被当场枪杀。与此同时，印尼共党占领了国家电台和其它要害部门，暂时控制了雅加达，史称“9.30政变”。10月1日上午，印尼陆军战略预备队（预备役组织）长官苏哈托（Suharto）少将，得知7名军队最高将领遭到绑架杀害和国家面临危难时，愤然出头要求召集陆军参谋部会议。苏哈托在军队系统中军阶低，而且手中无兵，但他认定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党策划的。”参加会议的陆军将领一致众怒，决定奋起反击印尼共党的阴谋，他们公推苏哈托展开反击，当场赋予他陆军指挥权。于是苏哈托迅速调动陆军开进首都，当天傍晚就控制了雅加达的局势。10月2日晨，苏哈托指挥陆军部队攻占哈林空军基地，逮捕了翁东等政变者们。10月3日凌晨，沉默两天之久的苏加诺见到印尼共党的政变大势已去，尴尬露面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貌似中立地号召“避免武装冲突，寻求政治解决”。他不得不承认苏哈托行动的正当性，同意苏哈托负责恢复印尼的治安和秩序。至此，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印尼军方一举挫败共党，挽救了国家命运，苏哈托从此当政。给印尼引来祸水的苏加诺下台。

在挫败了印尼共党的政变后，印尼民众的愤恨集体爆发，自发清剿印尼共党。印尼伊斯兰组织尤为激烈地捕杀共党。印尼共党组织顿时土崩瓦解。10月8日，雅加达50万民众焚烧了印尼共党总部，从这天起印尼共党永远消失了。世界史上空前血腥的“清共”运动随之拉开序幕。据印尼方面的粗略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期，约50万人被杀，其中有30万共党分子，其余是“革命分子”。包括党主席艾地在内的印尼共党领导人全部被杀。

(03/28)

1964年4月柬埔寨人口普查总计5,740,115人，其中柬埔寨华人约40万，大多数是华侨。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也报告在60年代柬埔寨华人有42万人，是侨居柬埔寨最大的外族。

从六十年代初，中共开始对柬埔寨实施渗透。金边5个主要华校逐渐出现“爱国华人”势力，中共地下党也活跃起来。端华学校首先出现了类似于印尼雅加达“新华学校”那样的诡异现象。一位金边华人叙述道：“柬埔寨华人一向安分守己，勤劳刻苦，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中共以援助柬埔寨的方式，向柬埔寨的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安插人，培植亲共华人来壮大队伍，收罗一些有政治培养价值的华侨青年到中国大陆学习医疗、文化、体育等技术（准备再派回柬埔寨），在金边及各市镇开办华文学校，利用华人学生的无知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爱，收买人心，使广大的华侨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认为‘爱国’就是把热情投注于盲目相信中共的所作所为。”

中共一方面与西哈努克维持着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向柬埔寨“输出革命”。在越共盘踞柬埔寨东部领土对南越发动游击战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希望中共能够节制越共。但西哈努克不懂的是，中共不可能为了柬埔寨而去节制越共。西哈努克更不懂得，真正威胁的对手并不是越共，而是藏在森林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汉子沙洛沙。

在北越期间，经河内推荐和联系，沙洛沙还秘密来到北京考察了3个月。沙洛沙是在1965年10月间去的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此时的1965年10月下旬，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关系的西哈努克访问了北京。西哈努克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沙洛沙同在北京。

一份资料引述一位涉入柬埔寨事务的中国使馆官员的话是：“1965年，当沙洛沙在北京时，得到康生的接待。当时康生负责与外国共产党的联系。沙洛沙可能是在他到中国的探访中，与康生建立起友情。后来当1975年康生逝世时，沙洛沙还亲自到中国驻金边的领事馆吊唁哀悼。”

康生（Kang Sheng, 1898-1975），长期主管中共党内情治系统，深得毛泽东的器重。他曾在苏联数年，专门研究苏俄的秘密清洗方法。1937年他回到中共总部延安，在1942年的中共“整风运动”中为毛泽东清洗政敌。

在中国期间，沙洛沙受到了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和技巧训练。与北越的“推迟柬埔寨斗

争”的策略正好相反，中共鼓动沙洛沙对西哈努克政府开展武装斗争。未经证实的中国资料说，北京给沙洛沙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验。根据沙洛沙返回柬埔寨之后所作出的几类活动例如到僻远山区鼓动农民等等，表明沙洛沙等人采用了中共的“革命”模式，这种模式与北越模式、苏俄模式、印尼共党模式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另外，沙洛沙还被诱导了一种“独立”观点，据沙洛沙所说那就是“柬共应该自主地施实自己的路线，首先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兴趣”。北越的档案也提到：“根据情报来源，他（沙洛沙）在 1965 年访问了北京，从中共领导人那里获得了对他的革命计划的支持。”事实上，中共的这种支持潜藏着诱拐意图，而当时的北越对北京的意图还一无所知。

1966 年 2 月，沙洛沙从中国返回河内。他和同伴们在河内一直逗留到 1966 年 8 月才返回柬埔寨。柬共意外得到了中共的关注，可称是时来运转的第一步。回到柬埔寨后，沙洛沙有了异动：1966 年 9 月他把柬共名称由效仿北越的“柬埔寨劳动党”改为效仿中共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党中央”不再傍着越共基地，而迁往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山区，发展山民入伙；“办公室 100”至此取消。拉塔基里省是越共控制区，也是西哈努克政府的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的偏远地区。

沙洛沙也寻求苏联的扶植。1966 年沙洛沙“向苏联驻金边的使馆，表示他期望从莫斯科得到支持。”一位低级别的苏联外交官与沙洛沙会面后，认为“沙洛沙未能提供有关柬共的严肃信息，其要求又没有实际上的意义，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当时，苏联战略方向是与美国争霸而不是在柬埔寨浪费精力。因此苏联拒绝支持柬共的武装斗争，也在情理之中。

1967 年沙洛沙首次使用了一个日后“如巨钟一样轰响”的诡谲化名：波布（Pol Pot），中文译为波尔布特、波博、波尔博。只有“党中央”圈内人知道“波布”就是沙洛沙，柬共一般成员都不知道“波布”是谁，他们仅仅知道党的领导人是个不露面的“1 号兄弟”。在柬共内部，没有党务会议、没有党纲党章、也没有选举活动，基层党员大都是不识字的贫民，各级干部由上级秘密指定，全党行动只听一位神秘的“1 号兄弟”从神秘渠道发布的指令。

这个时期，北越避免触怒柬埔寨的政府和民意，不允许柬共进行武装斗争。但是，“西哈努克支持北越的政策正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具有维护民族主义代表性的朗诺将军及施里马达亲王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强壮。”

从 1967 年开始，柬共“党中央”开始筹建武装队。他们最初的武器来源的整个过程非常隐秘，河内迟至 1968 年才根据越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发现了中共偷运武器给柬共的活动。一份 1968 年 2 月 19 日的驻金边的苏联使馆情报文件《中国人在柬埔寨的颠覆活动》指出：“在柬埔寨北部和西北部的几个省，中国人利用当地的亲毛和亲河内的势力，攻击柬埔寨政府的经济形势，鼓动所谓的‘红高棉’开展行动并为他们走私武器和创建武装叛乱小组。”

柬埔寨政府部长委员会副主席吴空山（Ung Khon San）公开了柬埔寨当局侦知的情况，证明北京参与了柬共的武装叛乱活动。他声明：“叛乱者武装着中国武器，有自动步枪、榴弹发射筒。这些武器被发现是通过伪装的货运给中国（援柬）专家的，那些专家正在马德望省的纺织厂里工作。”柬埔寨华人李真文说：“柬埔寨虽然落后，却安定舒适。但好景不长，一旦柬埔寨与中国建交后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援柬）技术人员成了间谍，中国使馆是运作中心，还支配着华人学校。”

数年来，西哈努克的错误政策，使柬埔寨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局面逐渐走入呆滞，社会的稳定性逐渐流失。于是西哈努克强行改造柬埔寨市场经济，又对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使国家经济陷入了萎缩，中小商家和民营企业不断倒闭，失业增加，物价上涨。而他对国内民主派和左派的镇压，又让社会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

此时期，朗诺出任首相兼国防部长。朗诺具有军队系统的坚定支持，也赢得社会的有产阶层、特别是华裔工商阶层的支持。只是他笃信佛教到了可笑的程度：凡大事，包括政府决策，他都要请资深的高僧问卜后，再做决定。朗诺是坚定的保皇派，同时他的民族主义印记也是众所周知。可以说，他既爱皇室，也爱高棉民族。

不过，共产党不喜欢朗诺，对他抱有忧虑和警惕。1967年4月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议论柬埔寨事情：

周恩来：西哈努克为了掌权把各种势力都纳入麾下，在这一点上与苏加诺相似。我曾与西哈努克就统治策略问题谈过几次，劝他少树敌。

范文同：你觉得朗诺这个人怎么样？

周恩来：他不值得信任。

范文同：他在谈到中国时，说的都是好话。

周恩来：朗诺访问过中国。如果我们在他身上花钱，也许能在什么时候能够利用他。

周恩来的精明是：他在柬埔寨情势尚朦胧状态下，就知道无法象玩弄西哈努克那样轻易地玩弄朗诺。

此时期，西哈努克的对外政策也走进死胡同。一方面他继续否认在柬埔寨领土上驻扎有北越军队。另一方面他也对越共相当恼火，1966年6月12日他催促越共在本年底结束越南战争，越共对此嗤之以鼻。在柬埔寨受到两面挤压的情况下，西哈努克悄悄委托菲律宾总统马科斯（Marcos）向美国官员表达了恢复与美国邦交的提议。1966年10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证实他收到了西哈努克的口信。但是，越南战争的进程和几个大国的角斗并不是西哈努克所能应付的。而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

插曲：在中国，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随即，一场在毛泽东号召下的大规模的群众“革命造反”运动在中国猛烈爆发，整个中国迅速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社会大动乱，形成历史上的一次奇特的浩大灾难。亿万中国群众热烈欢呼着，汹涌澎湃地投入到这场摧毁自己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大动乱中去。这种奇异现象，形成了“文革”运动最核心的矛盾落差，中国进入了其历史上最具特色的时代。

在中国进行“文革”的1966-1967年，中国同建交和半建交的30多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严重纠纷。在东南亚，中国人输出“文革”，引起了东南亚诸国掀起排华浪潮。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人员散发柬文版《毛主席语录》和有关“文革”的宣传品，强迫行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甚至攻击西哈努克是反动阶级的代表者，煽动华人对柬埔寨政府“造反有理”。这引起金边人的愤怒，他们不接受中国式的“革命”。

而金边的华校活动就更是“红卫兵”式样的了，校园里出现了毛泽东像章和“小红书”等“文革”流行物品。不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什么人从哪里搞来的。华校学生们集会，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中国的“革命歌曲”，在大街上向市民宣讲共产主义“革命”，逼迫路人接受他们的政治口号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西哈努克的画像面部被打上了大“×”（表示打倒），并被扔到街上踩踏或焚烧。随后，柬共份子包查通过他操纵的“高棉学生协会”，把华校行为蔓延到高棉学校和外省学校，在那里也发现有“（柬文版）毛泽东的小红书正被散发，学生的不安定正在增长，地下共产党的传单在散发”。

一旦“革命”威胁到西哈努克的权威，他就不容忍了。金边当局开始了调查。正此时，1967年4月2日在马德望省沙劳勿县（Samlaut）爆发了当地农民反抗政府的暴乱，迅速席卷柬埔寨西北部。这个暴乱提示了西哈努克的内外政策的失误，动摇了他的坚固统治，迫使他柬埔寨的“革命动乱”采取了坚决镇压。

据柬埔寨官方记载，暴乱的诱因是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征购农民的大米，以及农民的田产受到过度征税。农民聚众攻击了税收所，混乱中几名税务员被打死。因为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很薄弱，几天之后还未能调集力量进行镇压，于是暴乱急剧地向四周地区扩散，遍及马德望全省。三巴特等柬共分子乘机加入暴乱，并使用了中国援柬“专家”秘密提供的枪支，扩大了事态。

此刻在柬埔寨，到处流传着有关共产主义暴动的种种传言。金边有万名民众聚集在王宫前指责西哈努克的亲共政策。在干拉省、磅湛省爆发了民众大规模示威要求制止共产主义暴动。西哈努克意识到动乱是共产主义在柬埔寨蔓延的结果。他也怀疑有红色势力参与了暴动。他对此恼怒非常，公开叱责共产主义思潮，命令朗诺调集军队镇压暴动。柬埔寨掀起了围攻共产主义的高潮，侯荣胡宁知道将牵连到自己，在这个敏感时刻赶忙表态：“我们国家正受到威胁。是北越人在马德望开辟了暴动。过去柬埔寨只是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现在还要与共产主义作战。”4月11日，在北京，周恩来与范文同讨论到柬埔寨的暴乱。范文同承认河内并不了解柬埔寨的暴乱情况。

西哈努克催促朗诺施实镇压，朗诺表现手软。虽然他空运了部队到马德望，但镇压并不严厉，直到4月底还不能控制马德望的混乱局面。暴乱向西南蔓延到菩萨省（Pursat）、磅清扬省（Kompong Chhnang）、实居省（Kampong Spue）和其它一些地区。在金边，4月24日西哈努克强烈抨击共产主义，点名指控乔森潘、侯荣和胡宁对柬埔寨的动乱负有责任。乔森潘、侯荣大惧，立即潜逃。稍后胡宁也潜逃了。他们去了“柬共”在柬埔寨北部山地的活动区。

4月，朗诺在一次车祸中受伤，赴法国医治。西哈努克亲自指挥镇压行动。到了5月底暴乱就基本被扑灭。平息暴乱的详细情况一直被隐瞒。6月，清查展开，一些农民被逮捕和处决，许多人逃入丛林以躲避清查。在柬埔寨各省也发生了混乱。6月份在磅通省巴莱（Balaing）中学的一个教员康克由，聚众烧毁了一辆公共汽车。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区的学校，已是柬共秘密分子。当地警察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动，逮捕了他。清查行动在

柬埔寨各地展开。据高棉学生的叙述，在磅通省，“西哈努克命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分子的教师和学生，他们被带到斯昆（Skoun）附近的森林里，在特定的地点被杀死。我看见他们被押在那里，他们正在互相告发，指认他们不喜欢的人是共产党。”

8月，西哈努克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驱逐了中国援柬“专家”，取缔了金边的“柬中友好协会”，查封了中共“新华社”派驻金边的机构，查封了高棉学生会、华文报刊和端华学校等五所华校，有效地压制了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活动。西哈努克还气愤地说“柬埔寨的亲中国的左派们的职业，就是颠覆！”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遣外交大臣去北京，要求中国停止在柬埔寨宣传中国的“文革”。周恩来则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权利”。这导致西哈努克9月份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两国关系在随后的中国“文革”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事实上，西哈努克已认识到柬埔寨的暴乱是中国输出“文革”的结果，也了解到越共并没参与柬埔寨的暴乱活动。由此，他加快转向美国。

(04/28)

柬埔寨的共产主义动乱被平息。柬埔寨并未掀起排华浪潮，没有发生针对华人的报复行为。这应该归结于柬埔寨的民风善良、佛教信念和华人先辈在柬埔寨留下的信誉，还有西哈努克长期亲华政策的庇护。但是，同一时期居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里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输出“文革”引发了侨居国人民和当地政府的激烈反应，使华人遭遇了灾难。

学者霍尔（Hall）分析东南亚各国厌憎中国的原因是：中国输出共产主义和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一千万华人对当地国的潜在威胁，是紧密关联而不可分割的。观察东南亚各国动乱，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华人未必都是共产党，但共产党却全是华人。因此，“东南亚的每个国家都不安地意识到在它们国家里，存在着一支潜伏的中共‘第5纵队’。”

在马来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人对亲共华人的警惕和对立，终致引发排华浪潮。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1967年，冲突首先在学生中开始。华人学生强迫缅甸学生佩带毛泽东像章，缅甸学生则把毛像章丢在地上。双方由争执演变为群体械斗。于是，缅甸人由激愤而爆发了排华浪潮，从首都仰光又迅速扩展至整个国度。几乎缅甸全国的80万华人均被拖入这一灾难性的事件中。

1967年4月在印尼发生了大规模的民间反华骚乱，印尼断绝了与中国的邦交。在斯里兰卡也有中国势力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斯里兰卡政府明令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像章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

在中国，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下令逮捕激进的“文革派”王力等人。随后，中国的驻外使馆全部停止了“输出文革”。周恩来的外交权保住了，但他精疲力尽，有苦难言。他在与北越会谈时告诉黎笋：“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为你们提供援助，同志们。”

对于柬共，中国一方面暗中联络，一方面诱劝越共允许柬共建立武装。1968年6月19日周恩来与北越负责柬共事务的范雄谈到柬共问题，周恩来说：“因为关系太复杂，我们不想与柬共有任何关系。最近，柬共抱怨说武装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但越南同志不给他们武器。这样会引起误解。如果你们不给武器，柬埔寨的革命者会怎么看待你们？”

越共允许了柬共筹建少量的自卫性武装。1968年三巴特的小组在马德望省的巴南镇（Banán）开始了柬共的首次武装斗争。1968年3月在柬埔寨北部出现了柯袍的武装小组。1968年4月索平在东部的占卡乡（Chamkar Andaung）也开展了有限的武装活动，索平与越共游击队保持着接触，并得到越共的帮助。西南部的塔莫也开始组织武装小组。柯袍的活动代表了此时期的柬共“武装斗争”内容：一个当地证人看见柯袍他们有十几个男女和2支枪，聚在博斯泡可（Bos Pauk）森林里，1968年4月的一晚他们发动“武装起义”，在村庄里杀死7个平民百姓。

在1968-1970年，柬共的武装斗争在各地的袭击基本上是失败的和损失严重的，武装斗争没有给柬共带来任何微小的夺权希望。柬埔寨的农村，并不适于共产党革命：那里的土地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的种植需要，大片丛林资源尚未开垦，农村里的贫富分化程度也普遍很低。这使柬共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发展很缓慢，到1969年底柬共只壮大到1,500人，实力远不足以骚扰政府。因此，柬共出头的希望，还要靠北越打赢越战后出兵柬埔寨，就像1945年东欧诸国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建立共产党政权那样。

胡宁、侯荣乔和乔森潘的下落不明。1968年初西哈努克政府开始搜捕柬共份子。到了8月，温威领导的柬共地下网络瘫痪了。柬共地下党直到1969年底没有任何活动。1967-1969年的柬共斗争给国际共运留下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印象。

西哈努克政府的警察部门也对华人社区展开调查。1969年，端华学校的地下党负责人“老董”潜逃橘井省，在那里参与指导“柬埔寨华人革命运动”。这个“华运”的骨干成员是柬埔寨华人“革命学生”，其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仿照了中共。一份证词说，“当时‘华运’在所谓的‘柬埔寨的延安’即橘井省成东县，建立了华校、诊所、油印报社等。”“华运”要求华人华侨支援柬共“革命”和加入越共队伍“奔赴前线”去打仗。

研究者史蒂夫·赫德（Steve Heder）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华运”诊所的医生来历：“那些人是柬埔寨华校青年。他们在金边的‘中华医院’（中国‘援柬’医院）里学习了简单的医药知识。这些华人医生在1969年被派遣到柬埔寨东北部（红高棉活动区）。”事实上，这些华人的“医疗培训”是由金边“中华医院”的院务主任苏灼（柬埔寨华侨，中共地下党）及其妻洪乙华医生安排的。“华运”的建立提示中共正在通过柬埔寨华人接触和扶助着柬共。但这时周恩来仍对河内领导人说“我们不想与柬共有任何关系。我们告诉过范文同和胡志明，我们与柬埔寨同志没有联系。”

自1967-1968年西哈努克“外部亲共、内部反共”以来，柬埔寨民意对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越战的行为，越来越反感。同时西哈努克的垄断式“社会主义”经济也走到尽头。赚钱的机会全部被政府分配给西哈努克控制的企业，外国的投资快速消失，柬埔寨经济出现严重的停滞和倒退。研究者指出：“（西哈努克）他设法秘密地在越战冲突中分别与敌对的双方合作。他允许共产党的武器、物资和战士穿越柬埔寨领土供应给越共，但他忽略了在柬埔寨东部的越共基地变得越来越可怕和永不离去。显然，他秘密地告知了美国人那些越共基地的

具体地点，以便美军准确地轰炸了越共，然后他又抗议了美军的轰炸行动。”

1968年8月13日柬埔寨国民议会再次推举朗诺出任首相兼国防部长，推举施里马达王子出任副首相。在整个1968-1969年，柬埔寨社会在酝酿着动荡，柬埔寨各阶层的厌烦与愤懑情绪在不断积累。社会的紧张状况也给共产党在农村的蔓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西哈努克在内政外交政策上的忽左忽右，削弱了他的统治并使他逐步失去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1970年1月7日西哈努克携妻子莫尼克，由宾努夫妇陪伴，到法国去度假。

1970年1月底，施里马达亲自赴河内与北越领导人磋商，劝说北越人离开柬埔寨领土。北越领导人平静地出示了一份1967年西哈努克私自与河内签署的密约原件。那份密约允许北越和越共付费在柬埔寨东部丛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使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战争，有效期长达15年。这个密约消息被施里马达带回金边公诸于众，引起全国震惊。3月12日朗诺代表政府宣布撤销西哈努克与越共私签的密约，并通牒越共撤出柬埔寨领土。3月15日越共拒绝了柬埔寨方面的通牒，朗诺命令政府军准备驱逐越共。

3月13-17日西哈努克正在访莫斯科，并准备去北京。法国媒体披露了他的行踪。这消息在金边再次激起民众的愤怒情绪，他们认为西哈努克给柬埔寨招来了战祸，现在还在与苏联中国做交易。金边的气氛骤然紧张，朗诺施行了适当的警戒，金边的外事区、政府大楼、广播电台、议会、机场等地出现了执勤军人和装甲车。3月18日柬埔寨的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召开特别联席会议，研究如何应付眼前的国家危机。在辩论中，议员们纷纷指控西哈努克私允越共使用柬埔寨领土，违背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柬埔寨中立地位，并认定西哈努克的行为触犯了柬埔寨法律。当天下午，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投票一致决定罢免西哈努克的元首职位，居然没有一票反对或弃权。3月19日国家议会宣布柬埔寨处于紧急状态，并决定组成新政府，授予朗诺首相以全部的政府权力。在新政府的组成中，施里马达留任副首相，议会领袖郑横（Cheng Heng）出任国家元首，资深议员英丹（In Tam）、隆波烈（Long Boret）、韩通哈（Hang Thunhak）都担任重要角色。新政府获得柬埔寨大多数中层社会、知识阶层、军队集团、僧侣界、公务员和市民的支持，尤其是青年学生们显然欢迎这种变化。但是在封闭而保守的农村，西哈努克的影响依然存在，原因很简单：依据两千年之久的高棉传统思维，农民们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竟然可以没有国王。

罢免西哈努克，是一个符合宪政程序和国家法律的事件，在国际上被称为“朗诺政变”。现在，西哈努克不再是柬埔寨的统治者（元首）了，此后他的江山再也未能回到他手里。威严少语的朗诺和直爽奔放的施里马达，既爱国王也爱高棉祖国，他们在国家危机时刻被迫选择了祖国。后来朗诺在一次与美国军事专家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讨论防卫计划时，朗诺忽然动情落泪，说：“柬埔寨从来不能保护她自己。”

迄今没有证据表明“朗诺政变”有外国势力的插手。当时有些人从朗诺和施里马达的亲美立场来揣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扮演了间接角色。尽管那种揣测已被日后事实所否定，但西哈努克还是以此指控美国，用来掩盖他发动柬埔寨内战的责任。在“朗诺政变”初始，周恩来并不相信是美国插手，他反倒怀疑法国。3月21日他对范文同议论：“我认为朗诺政变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支持。法国不再相信西哈努克。法国担心西哈努克倒向我们会影响到法国的利益。法国可能向苏联解释朗诺不是亲美的，而是亲法的。”美国国务院档案展示：三年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还探问“朗诺政变”一事，周问：“你能不能查出些证据，证明朗诺政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的？请你仔细调查他们一下。”

基辛格：确实不是他们做的。我已经查过了。我何必跟你撒谎？今天的情况和当时没有差别，中央情报局确实没有介入。

周恩来：那么，是法国人搞的？

基辛格：有可能是法国搞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搞的，甚至可能是西贡当局造成的。但是，至少不是美国搞的，我们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与西哈努克关系正常化。

新的金边政府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包括共产阵营国家。只有中国和北越不肯承认。金边政府不想触怒中国和苏联。3月20日金边政府发布特别命令以保护中国和苏联驻金边的大使馆。

“朗诺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正前往北京。苏联国家主席柯西金在莫斯科机场送别西哈努克时，告知柬埔寨国家议会刚刚罢免了他的消息。据各种资料所述的当时情况是：西哈努克目瞪口呆，失去了反应能力。柯西金安慰西哈努克说，苏联不能干涉柬埔寨内政，但如果他有个人需要，苏联会提供支持。3月20日在北京西哈努克宣称柬埔寨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对他的罢免是“绝对不合法的”，但是他无法说明，柬埔寨两个最高权力机构决议罢免一个国家元首究竟怎样不合法。接下来，西哈努克对朗诺和施里马达表达了刻骨仇恨，他直接骂道：“朗诺是个叛徒、卖国贼”；“施里马达是个阴险毒辣、不守信义、嫉妒成性的恶棍”；他甚至说“（1967年镇压）马德望（动乱）的屠杀也是朗诺和施里马达干的”。据说西哈努克还绘声绘色地幻想，设若他早些时候回了金边，他将“受到假卫队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官方的汽车把我带离金边300公里之外处决我，然后把我埋在森林里”；“当时我得知美国人准备暗杀我，我不愿让这一企图得逞”。

难怪后来在周恩来劝说基辛格与西哈努克会面时，基辛格道：“我对西哈努克的认识不如你那么深刻。据我了解，与他谈话会让人经神崩溃”，引得周恩来连声大笑不止。

“朗诺政变”后，朗诺、施里马达尚不打算废除柬埔寨的君主立宪制，只是让西哈努克交出权力。他们几次向滞留北京的西哈努克发出谈判呼吁。但那些呼吁没有被西哈努克回应。金边政府的失策在于：一直空等西哈努克的回答，而没有当机立断在皇室中选一个新国王，以安抚在心理上“需要国王”的农民们。直到7月金边政府才彻底失望。

朗诺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执政后很快显示出与西哈努克的不同。其一是决定驱逐北越人；其二是“大赦”，把西哈努克逮捕关押的反对派全部释放，包括柬共分子。那些获释的柬共又重新加入了共产主义活动。柯袍说：“在1970年朗诺释放了一些红高棉分子。我联系了这些人并把他们加入到我在森林里的队伍，于是我有了30~40人。”柬共分子包查、康克由、曼奈、谢杰、柬共中央重要人物农苏恩也都在这时被释放。

对于柬埔寨局势，中共有什么反应？此时，中国的“世界革命”的设想越来越远离现实。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我们中国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泽东要求看到实效而不是只有空话。中国“文革”的内斗逼迫着每一个人，尤其对于焦虑自保的周恩来，压力沉重。因此毛的不满，对周氏肯定会产生强烈的不安，迫使他寻机再

立“新功”。因此，柬埔寨 1970 年“政变”事件立即触发了周氏的极大兴趣，让他精明地看到了一个好机会：柬埔寨有可能成为“输出革命”的场地。周恩来借此机会使出全部才干，做出了精彩表演、也是唯一成功的“输出革命”杰作。他挖空心思，计谋连环，扶持红高棉登上柬埔寨政治舞台。最奇妙的是许多当事人或受害者（例如西哈努克）至今不能钻出迷圈，这使世界上任何“阴谋”都相形见绌。

(05/28)

迄今，中国官方文章还在津津乐道当年周恩来对西哈努克、红高棉和北越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背对背”手段。综合那些资料和西哈努克回忆录所记述的大体情况如下：

对于 1970 年 3 月 18 日的“朗诺政变”，西哈努克既恨又悔，他在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失声痛哭。周恩来获悉柬埔寨事变后，当机立断决定仍以对待外国元首的规格，迎接被废黜的西哈努克。19 日上午周恩来异乎寻常地请求 41 位外国驻华人员到机场充当他的迎接道具。当时在北京，许多驻华人员此刻尚不知道西哈努克已不是“柬埔寨元首”了。但仍有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警惕周恩来的异动而拒绝参加迎接西哈努克。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拥抱了西哈努克。周恩来巧言道：“您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据说西哈努克“十分激动”。《人民日报》当日发表消息，还破天荒地刊登了去机场迎接西哈努克的外国人员名单。

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乘汽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安排西哈努克住入 5 号楼。然后，周迫不及待地对西哈努克问道：“我们已知道柬埔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昨晚我和毛主席进行了讨论。我想问你，你打算怎么办？是否准备同敌人进行斗争？”这种问话含义是很明确的，全看西哈努克是否还有价值，也决定中国是否承认朗诺政权。据说西哈努克表示“要报仇雪恨”，誓言“我准备战斗到底”。周当时没有表态。当天晚些时候，毛泽东批准了周氏写下的关于留住西哈努克在北京进行颠覆金边政府的书面策划。随即，周恩来命人迅速组建“柬埔寨事务办公室”（“柬办”），专职对柬埔寨事务的处理。就是这个“柬办”与其后聚集到北京的柬共秘密份子，合伙堵塞了西哈努克的信息通道，使西哈努克对柬埔寨局势、对金边政府的动态和对法国美国的调解努力都一无所知。

周恩来开始施实他的连环计划。他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两次长谈，把西哈努克的私恨引向美国。周首先告诉西哈努克，是美国策动了朗诺政变。据参加谈话的中方工作人员回忆，谈话的主要内容有：一，周表示，西哈努克应该与共产党合作，要求他与北越、寮共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以讨论“联合抗美”的措施；二，关于在柬埔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周表示：西哈努克在北京，很难指挥柬埔寨国内的军政事务，因此西哈努克应该与红高棉合作，发动内战，推翻朗诺政权；三，周提出在北京成立西哈努克与红高棉联合的流亡政府，中国为柬埔寨内战提供全部的武器和金钱。

西哈努克落难之际，报仇心切，慌不择路，忽然间碰上了周恩来这种热情的侠义帮助，自然是感激涕零。他无法知道的是，周恩来要扶助的真实目标并不是他而是丛林幽灵“红高棉”，为此周恩来正在一步步地把红高棉塞给他。西哈努克更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已召唤范文同和沙洛沙速来北京，商议如何利用西哈努克名义去插手柬埔寨事务。沙洛沙，红高棉的“总书记”，不过他现在改名换姓叫“波布”（Pol Pot，中国译“波尔布特”）。此时，北越急于消除柬埔寨事变对越共在柬埔寨的生存所形成的威胁。共产党的见缝插针、不择手段、行动

快速，根本不是西哈努克能够想象的。

3月21日上午，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商谈如何推翻朗诺政权，下午他就与刚来到北京的范文同密语：“……他（朗诺）会恪守中立原则。所以，我们可以承认朗诺政权。法国会劝告朗诺不要进攻（在柬埔寨东部的）北越和南方越共的部队。过去两天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这一点：朗诺政府保证继续实行中立政策，尊重柬埔寨过去签订的协议，他还特别下令保护中国和苏联的驻金边使馆。对朗诺来说，他不想触犯中国和苏联。”

在提到西哈努克时，周恩来表示：“我们现在暂时支持西哈努克，看他如何行动。在我们真正支持他之前，我们还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反美联合阵线。但他很可能因为形势而改变立场。如果西哈努克同意建立联合阵线，柬埔寨共产党力量就会加强。”周恩来此时还假装不认识波布，向范文同打听：“你们提到了红高棉与西哈努克合作的可能性。我感到西哈努克希望我们在这个合作问题上帮他的忙。所以，在回答西哈努克之前，我们非常希望听听高棉同志（波布）的意见。”

范文同：我们说得很清楚，接触应该在（红高棉与西哈努克）双方同时进行，便于更好地合作。

周恩来：（波布）他怎么回答？

范文同：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他没有谈他希望我们做什么，也许他会问你。那也好，这样中国和北越都可以帮助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双方合作。

直到此时，即使在柬埔寨国内，红高棉还是一个藏在森林里的团伙，在柬埔寨也很少人听说过它。红高棉没有实力，毫无政治影响，完全没有前景。现在，周恩来要把红高棉塞到柬埔寨的政治博弈之中。但是以波布的智力，还难以明白只因柬埔寨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而周恩来正需要一个棋子，便把一个绝好机遇送进他的怀里。在范文同返回河内后，波布留在北京，周恩来与他多次密谈，让他终于弄懂了周的用心：捏合西哈努克与红高棉的权宜结盟，以西哈努克为名义，中国扶植红高棉在柬埔寨战火中，达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周恩来很重视“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近代世界公认的政治学上的选择准则，即一种政治组织或政治行为凭什么获得民众认同或者国际接受。

事实证明：红高棉只有顶着西哈努克的名义，才会被柬埔寨农民所接受。西哈努克也知道：“我对他们（红高棉）非常有用。因为没有我，他们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进行革命。”研究者指出：“很清楚，红高棉很快地接受了这种‘结盟’，真实的原因是红高棉理解到这‘权宜婚姻’的价值，西哈努克的名字使他们的非法活动看起来有些合法性了。”

在周恩来对柬埔寨施展策划的期间，波布始终没有露面。西哈努克不知道波布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个人就住在离他不远之处（中共外联部专用的西苑宾馆）。西哈努克在明处，波布在暗处，但波布却了解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一切活动和筹组流亡政府的整个过程。周恩来算计西哈努克，利用红高棉，策动北越攻击柬埔寨……他做这一切很是心安理得，世上无人可比。

西哈努克说：“我被废黜后，（北越）范文同总理特意来北京会见我，我衷心感谢！金边发生政变，朗诺推翻我，也是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阴谋。我们应加速合作，进行反美战争。中国答应给我们军事援助，提供武器，希望北越也帮助我们。”范文同当即表示愿意与西哈努克合作，联合军事力量共同打击朗诺政权。不久，在柬埔寨的越共给红高棉发放了步枪和军火，派了许多顾问和军事教员给红高棉办训练班。这些训练班一直持续办到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签署之时。许多红高棉人员在越共训练班里学习了游击战手段和建立共产党基层政权的方法，其中一个19岁青年名叫洪森。洪森是在1970年4月14日离开金边投奔了红高棉，他似乎是在远远地跟踪着波布，尽管此时他还不知道波布这个人。

北越以帮助西哈努克复辟为借口，与金边政府开战，以便保住越共在柬埔寨的继续存在。而周恩来的目标与北越目标完全不同。3月22日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你的讲话对柬埔寨人有巨大力量，我相信柬埔寨人在听你的声音后，将做出极大的回应。只要你有决心斗到底，我们（中国）一定支持你。”次日（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他的流亡政府“柬埔寨民族阵线”（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他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发动内战，号召柬埔寨民众参加红高棉的叛乱，他说：“在国内外所有的高棉人，僧侣，军人，农民，全国的男人和女人，为柬埔寨的独立、社会主义、佛教、民族和反帝（反美国）理想，到丛林去进行武装战斗。”丛林里有什么？西哈努克指点道：丛林里“有‘民族解放军’（红高棉），向你们提供武器弹药。”

他的号召通过中国针对柬埔寨广播的柬语电台24小时不停的反复播放，同时越共部队在柬埔寨农村地区免费发放了成千上万台中国制造的简易半导体收音机（只能收听中国对柬埔寨广播频道），让柬埔寨农民收听那个广播。柬埔寨农民很高兴把越共作为西哈努克的雇佣兵来接待。在金边，几千名中学生和教员响应西哈努克号召，投奔了丛林里的红高棉。在金边和其他城市，更多的市民看好的是施里马达的新角色。但在乡村，成千上万的农民拒绝拥护朗诺政府，并试图帮助西哈努克恢复权力。红高棉最初队伍扩张即由此而来。

柬埔寨人简单质朴，他们无法理解，是那个坐在遥远北京的“彬彬有礼”周恩来，在幕后点燃了柬埔寨内战，他隔岸观火，而内战罪责是西哈努克的。3月26-28日在柬埔寨磅占省发生了支持西哈努克的万人示威，当地政府办公室被示威者纵火，在混乱中有阴谋份子刺杀了两个劝说民众安静下来的政府职员。在暹粒省和茶胶省也有类似的农民示威和骚乱。

此时，一件奇怪事情发生了：已经消失三年、被普遍认为已遇害的乔森潘、侯荣、胡宁，忽然从柬埔寨人迹罕至、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荒山野林里，分别给西哈努克、北京当局和河内当局发送了一份同样的电报，声明他们三人支持西哈努克的内战号召。消息传到金边，人人惊讶不已。有金边青年说：“当1967年乔森潘潜逃，人们都以为他死了。4年之后他突然成了柬共要员。他，是个恶毒的生还者。”这表明的迹象是：柬共分子将参与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一个环绕西哈努克的无形圈套正在逐步形成。西哈努克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人在北京，身不由己”，只能表示接受柬共分子加入他的“流亡政府”。

4月6日，经过讨论，联合国认定在柬埔寨实行有效治理的政府是朗诺政权，而不是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研究者们指出西哈努克发动内战之所以非法，因为它是：1）遵命于一个外国（中国）的战争意愿、并由这个外国供给枪炮和金钱；2）允许另一个外国（北越）以此为借口而武装占领柬埔寨大半领土；3）并结合了柬埔寨国内的叛乱组织（红高棉）；4）而这四者（北京、北越、西哈努克、红高棉）联手在柬埔寨以武装颠覆一个符合宪政的

政府。事实上西哈努克把自己的“只爱权位、不爱民族”的立场，清楚地向全世界展示。历史学家的评价是：“在柬埔寨历史性的那一刻，西哈努克选择了他自己的所爱，而绝不顾忌高棉民族会为此付出的百万条生命。”

可是红高棉认为西哈努克只是个政治垃圾。红高棉不承认西哈努克的作用，认为是红高棉收留了无路可去的西哈努克。波布透露：“当时我与周恩来商议，西哈努克已被推翻，我们可以收留他参加我们的‘联合阵线’。”由此可见，波布弄懂了周恩来是为谁撮合了“联合阵线”以及谁才是“流亡政府”的真正主人。后来农谢也公开讲话：“我们为何允许西哈努克加入我们的阵线？朗诺政变后，只有我们红高棉才是柬埔寨局势的主人。我们有一支武装。我们甚至允许西哈努克成为阵线的主席。因为我们才是主人，西哈努克的那个主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政变已经使他一无所有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秘密地与金边政府谈判，企图继续使用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小路”给越共运输战争物资。在当时柬埔寨的政治局势和反北越的民意下，那已不可能了，因此遭到金边政府的拒绝。5月份，中共宣布与金边断交。

朗诺政变强烈震撼了北越。从3月29日开始，越共部队借口替西哈努克去推翻朗诺政权的名义，在柬埔寨各省驱逐政府军。据北越官方文件记载，在1970年4-5月，北越投入重要兵力回应红高棉请求越共占领柬埔寨的呼吁，该请求是波布的代理人农谢发出的。北越外交部副部长阮冠成（Nguyen Co Thach）证实：“农谢要求（北越）帮助，要求我们10天占领柬埔寨的5个省。”越共部队占领了橘井省，在橘井市建立了新的越共指挥中心，大量的战争物资和装备也转移到那里。随即越共向柬埔寨纵深进军。平民安金说道：“朗诺政变时，我正好在暹粒省城。越共声称帮助柬埔寨人民反抗朗诺而进军暹粒省。”一份柬埔寨国家议会的有关共产主义渗入柬埔寨的调查报告说，越共在柬埔寨有6万部队。

金边政府军仅有27,000名部队。在这种情况下，3月30日朗诺声称如果柬埔寨状况恶化，金边政府将要求美国的帮助。4月9日在越共部队的攻击下，驻守柴桢省“鸚鵡喙”地区的柬军撤出该地区。4月14日朗诺呼吁国际帮助击退越共部队的入侵。4月23日南越政府经湄公河水路运送武器给金边政府。4月24-25日，由周恩来导演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南部的广州市召开。这个被称为“三国四方”的会议，其“印度支那人民”代表仅是四人而已：西哈努克、苏发努冯（寮共）、阮友寿（越共南方阵线）和范文同（北越）。周氏许诺：“7亿中国人民做你们三国四方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周恩来还“邀请”西哈努克主持会议，据说“这一崇高荣誉使西哈努克十分感动”。但与会者都知道柬埔寨的真正代表是一个躲在帷幕后面偷听会议的红高棉分子波布，唯独瞒了西哈努克。在周恩来的策划下，西哈努克被完全置于中共、越共和柬共三者联手的密不透风的帷帐里。会后，越共部队加紧攻占柬埔寨领土。到1970年6月，越共部队占领了柬埔寨的1/3国土，红高棉也跟在越共部队之后在柬埔寨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建立了多处的“解放区”。此时，红高棉尚没有对抗柬政府军的作战能力。很清楚，“没有越共部队替红高棉打天下，柬埔寨的革命将是遥遥无期的。”

波布是在“三国四方”会议之后，于1970年6月途经河内回到柬埔寨东北部。7月，波布把“党中央”迁移到克多恩的根据地、磅通省山图克（Phnom Santuk）地区，称为“大本营”。在波布途经河内时，在北越的安排下，柬共“河内派”首领高莫尼与波布商量派遣2,000名“柬共河内派”干部回到柬埔寨参加“革命”斗争。这是波布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从法统上讲，“河

内派”是柬共的正源，“本土帮”是柬共遗留在柬的分支。那些“河内派”干部 16 年来在北越接受关于越语、政治和军事的训练，北越教给他们很多工作技巧和经验。他们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或技术专家，也自然是亲越派。从 1970 年 11 月起，“河内派”干部组成多个支队起程，沿“胡志明小道”徒步跋涉。越共南方局首领阮文灵召见波布和农谢，把“河内派”干部的组织关系移交给红高棉。首批“河内派”约千人于 1971 年 2 月抵达柬埔寨西北部的橘井市，其中包括北越培训的广播专家彭索万（Pen Sovan）。但是“河内派”干部并未得到红高棉“党中央”的信任和重用，他们被故意分散到各个远离的区域，让他们彼此之间失去联络。

在北京，5 月 5 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柬埔寨流亡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在北京组成。西哈努克为主席，宾努为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武装力量总司令。现在，红高棉原各地小组，都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流亡政府”在国内的官方部队了。但它是个“组织糟糕而且装备也糟糕的、一个不足 5,000 人的队伍”，而且它的真正主人既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总司令”乔森潘，而是神秘的波布。国际评论说“由柬埔寨以前的政客、和尚和教员等社会垃圾组成的一支游击队，他们现在有了叛乱的公开借口。”在“流亡政府”里，乔森潘挂名国防部长，侯荣是内政部长，胡宁是新闻部长。这三人加入“流亡政府”，造成了一个用来隐瞒柬共掌握实权的假象。此时，还有柬共分子秀木（Thiunn Mom）、秀蒲拉西（Thiunn Prasit）兄弟俩。这俩人是在法国的柬埔寨人圈子里的柬共份子。1970 年 4 月份经由中共驻法外交人员的联络，秀木伪装“爱国人士”，赶到北京要求加入“流亡政府”，而西哈努克对他一无所知。经周恩来的安排，秀木在“流亡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并立即秘密地变成了柬共中央委员。中共以援助“流亡政府”的名义，与秀木合伙把中国的财力物力输送给红高棉，而西哈努克根本不知道这些“财政”情况。日后，秀木揭发道：“中共分配给红高棉的金钱是有限额的”。

柬共份子柯特崇（Keat Chhon）也变成“流亡政府”的工业部长。老资格的柬共中央委员高米斯以“流亡政府”联络员身份来到北京，他的工作是协调红高棉与中国和北越的行动。在河内，柬共创始人山玉明代表柬共“河内派”奔走于河内和北京两地。随后，柬共份子秀蒲拉西也在 1970 年 7 月 8 日到达北京，摇身一变成了“流亡政府”的通讯部长。他自述受“党的委托”把持了“流亡政府”的信息管道，他说：“因为他们（西哈努克宾努等人）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他们无法知道我们党内部的联系和我的背景。我堵住西哈努克他们的进程，把持完整的权力，并且阻止他们与帝国主义者（美国法国）的政治谈判。”后来西哈努克忍无可忍，控诉秀蒲拉西“是一个敌人”。稍后，秀蒲拉西的姐姐秀春（Thiunn Choeun）也成了“流亡政府”的卫生部长。整个红高棉都动起来了。“流亡政府”被柬共分子所把持，西哈努克则成了一只耳目闭塞的笼中鸟，他不知道越共和红高棉在柬埔寨国内打着他“西哈努克”旗号在做些什么。其实土产的红高棉并没有如此的设计才干和施实能力。国际研究家的评估是：“周恩来，一个中国人，一个心怀叵测的政治经纪人，为了插手柬埔寨内政事务，匆忙地在西哈努克与红高棉之间撮合了一个‘权宜婚姻’。”

(06/28)

西哈努克与红高棉的“权宜婚姻”，让红高棉从地下走到台上，从非法叛乱走向“合法”内战，打着西哈努克旗号招募红高棉队伍。很多西哈努克的支持者加入红高棉，西哈努克反而在国内没有一兵一卒，他的政治资源被移花接木变成了红高棉的资源。西哈努克不久也就明白了这一切，但他无可奈何，他对西方记者发牢骚说：“他们（红高棉）把我置于他们一边，

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资源）。”柯袍也说：“1970年7月我带了一支60人的队伍去了暹粒省农村”，而4个月前柯袍的队伍“仅有20个人”。可见，红高棉队伍有了可观的膨胀。甚至，留在金边的西哈努克的子女们也有3人投奔红高棉，要为“西哈努克复辟”出力。柬共本是北越豢养的，但北越并不在意中共扶助红高棉，因为北越认定的唯一敌人是美国。而中共却暗中瞄定了两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和北越。

周恩来防范北越。1970年9月24日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转告范文同，“周总理想尽快知道：如果柬埔寨爆发战争，北越将支持西哈努克（红高棉）还是朗诺？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西哈努克（红高棉），北越将怎样看待？”范文同答：“我们不承认朗诺，我们承认西哈努克。我认为说服苏联和其它共产党国家来共同支持西哈努克，现在正是时候。”显然，周恩来在提防可能出现的某种危机，他对北越并无诚意。当然他更不同意联合苏联——他知道中国人永远斗不过俄国人，他对黎笋、范文同说：“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联合阵线，苏联就将会很快控制住这个阵线。”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立场上，周恩来没有理由选择红高棉，也没有理由敌视朗诺政权。那么周恩来究竟为什么要以超常的积极性，给柬埔寨布下圈套，要扶助红高棉和颠覆金边政府呢？也许，他的表面理由是“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但如果理解了周氏支撑自己的韬略，也就可以理解：他长期经营“输出革命”而无一成功，拉拢北越的前景也越来越黯淡，此时他的心结就是千方百计不能让自己在毛泽东的价值视野里贬值。

一份重要文件清楚地表明，借柬埔寨事变之机策划向柬埔寨“输出革命”，以便吸引毛泽东注意力的，正是周恩来。在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970年3月20日）周恩来亲笔写密件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现在两越（北越和南方越共）最不争气，一切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是坚决要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在这份清晰证据面前，周恩来对柬埔寨的历史责任难以逃脱。在对外行事方式上，毛泽东是藐视公理，诡谋阳发，大开大阖；而周恩来则是表面君子，内里蛊毒，阴损大师。两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毛的注意力果然被柬埔寨事情所吸引。当年5月1日劳动节，当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会见了西哈努克，兴致勃勃谈话两个小时。毛泽东不出现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预定的放焰火活动就不能开始，提前五小时就奉命集合在广场、准备给毛泽东表演歌舞“献忠心”的十五万北京群众在夜风中瑟瑟发抖等待着，莫名其妙发生了什么事，全国人民也守在收音机前等待着。

后来西哈努克竟然赞颂毛泽东无视群众的行为是给西哈努克的一个“礼遇”，他说：“毛主席同一个小国元首（西哈努克指自己）的谈话让中国人民多等了几个小时。”在休息厅的谈话中，毛泽东极力主张西哈努克与红高棉联合，他担心西哈努克变卦，因而一再劝说，甚至拉西哈努克加入共产党。在稍后，5月中旬毛泽东再次对西哈努克说：“你好像有共产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很机警，没上当，推辞道：“毛主席，我真的不行，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但是毛不死心，西哈努克不得不说：“我肯定不行。我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请原谅。”最后毛只好说：“不要紧。我还是喜欢你。”

当年5月21日上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集体会见西哈努克，然后一同前往天安门城楼听取“毛泽东关于柬埔寨事情的声明”。已有50万北京群众为这个集会从凌晨起就

奉命等待在那里。上午 10 时，林彪拉着长声开始胡乱讲话：“现在我讲讲关于越南问题……两个越南……半个越南……”，之后停顿，话筒咯咯作响，然后正常，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5 月 20 日声明”。在这个声明里，毛泽东以“世界领袖”的口气，支持西哈努克，号召世界人民起来“打败美帝、苏修及其一切走狗”。西哈努克则乖巧作戏，用事先背诵的简单中文，几次怪腔怪调呼喊“毛主席万岁”，以此讨欢。

此后一周内，中国各地奉命举行了拥护毛泽东“5 月 20 日声明”的集会游行，高达 4 亿人次。据当时在“柬办”工作并参与起草“5 月 20 日声明”的工作人员称“这一切都是周恩来的部署”。“柬办”负责人也证明，对于柬埔寨的事情“周总理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点滴不漏。‘柬办’工作全部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周总理统筹办理。”

周氏对柬埔寨内战“事无巨细”的关心，扶助红高棉、包养西哈努克，那么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什么状态呢？“在四川省，干部们走进一户农家，那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房子缺了一面墙，用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吃饭的破碗和一个空空的柜子”；“在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小村庄，10 户人家有 4 户没有门板，3 户没有桌子，68 个村民中的 40 人没有过冬的棉裤。”

金边政府对越共的抵抗，对于美国来说，是个铲除“胡志明小道”的好机会。如果美国接管柬埔寨东部地区，越共将无法再进行对南越的游击战。如果“朗诺政变”提早发生，则越战的历史可能全部改写。但“朗诺政变”来得太迟了，尼克松（注：当时的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都急于从越战中抽身，美国人民也不愿意对越南战争继续投入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越南问题。为了逼迫北越进行和谈，在无意保护柬埔寨安全的政策下，尼克松把弱小的柬埔寨拖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5 月 21 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越共基地都迁移到边界 21 英里之外，但美军受限于“不得超越 21 英里”的规定而不能扫荡那些地方。6 月 9 日金边政府请求韩国派部队到柬埔寨抗击越共——韩军在越战中令越共胆寒。但韩国拒绝卷入柬埔寨战争，韩国出兵南越只是报答美国在朝鲜战争时的救命之恩。6 月 17 日周恩来把柬埔寨战争归咎于美国，他说：“现在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了，不是北越，不是西哈努克，也不是中国把它扩大的。是美国扩大的。好哇，那就让战争扩大吧。”法国政府则承认朗诺政权，同时愿意接纳西哈努克流亡法国。下台的戴高乐也把自己的回忆录送给崇拜者西哈努克。事实上戴高乐未能从他对越战的搅局之中取利，反而丢失了法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他把一个恢复法国荣光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标记法国尴尬的展览。

在北京，西哈努克的实际工作仅仅是：攻击美国和享受中国赐予。他不断辱骂美国和朗诺等人，他说：“尼克松总统花费 341 万美元援助柬埔寨（金边政府）的屠杀，是美国取得外国帮忙的最好投资”；“朗诺和施里马达，允许尼克松用高棉人的死尸代替美国人的生命”等等。历史研究者们一致指出：“西哈努克的不诚实令人难堪”。

这年（1970）7 月，周恩来把北京“友谊宾馆”交给“流亡政府”使用，每年向西哈努克及其“流亡政府”提供生活费 500 万元人民币（当时等于 5 万名市民的年最低生活费），还免费提供服务员和汽车队。周氏又把原法国公馆（东交民巷 15 号院）改成“元首府”，让西哈努克一家住入。

周恩来安排西哈努克游遍中国各大城市和各名胜地，所到之处都有“群众欢迎”和盛大招待，极大地满足了西哈努克的虚荣心和享受欲，引开了他对柬埔寨国内事务的注意力，实乃中国古代惯用的“乐不思蜀”计策的翻版。中共官方还提到，“当1972年西哈努克5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向宾努讨教，宾努说至少要请50位和尚念经。于是，周决定找50个和尚为西哈努克念经。但‘文革’已把中国全部寺庙都毁了，和尚都被赶出寺院，到农村劳动。最后寻找到5个还能念经的人，临时剃光头发来代表50位和尚。周还安排专场文艺晚会，指名专人为西哈努克跳柬埔寨舞蹈。”

这时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闻影片不断介绍西哈努克游玩各地的活动。当时在整个中国的广播和电影里只有“文革”的宣传。因此，频频出现在广播和新闻影片里的西哈努克，居然成了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明星”，被唤做“嘻哈先生”。不久，在中国各地流传开“西哈努克要求娶两个中国女青年演员做小老婆”的传言。日后，柬埔寨日报以“中国制造的西哈努克”为题，刊载了在红高棉文档中发现的3张西哈努克流亡北京时的照片：一张是西哈努克身着短袖衫和白裤，喜笑颜开，正在与一群中国女青年跳舞，扭腰摆臀，蠕动在一起；另一张是在大批中共官员的簇拥下，西哈努克由两个中国女童陪伴，在一个盛大的群众欢迎广场上边走边鼓掌；最后一张是西哈努克出席一个盛宴，10人一桌，共有几十桌，西哈努克在首桌，正起身鞠躬答谢。这些照片公布后，柬埔寨人都很奇怪西哈努克既知道祖国陷入战祸的巨大苦难，居然还有如此好的兴致？

但西哈努克也有尴尬难受的一面，他对红高棉在柬埔寨的活动一无所知。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以为乔森潘是红高棉最高首领。在北京，有意大利记者直接问西哈努克，“你是柬埔寨国王，又是佛教人物，你也要充当中国的傀儡吗？”

1971年夏天，中国国内态势越趋紧张，因为毛泽东与林彪之间产生了分歧，在“国家主席”的设置上互不相让。周恩来除了主持日常政务之外，他也正在加紧向美国政府释放“和解”信号，同时他还须“事无巨细”地操控柬埔寨事务。繁琐忙碌和精力消耗迟早会拖垮他。此时周恩来秘密要求红高棉“党中央”派人驻在北京以全面接管柬埔寨事务。英萨利愿意前往北京。9月中旬，英萨利夫妇以“柬埔寨革命组织”（红高棉的化名）的特别代表身份到达北京，操控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英萨利在北京化名“豪”。

途经河内时，9月7日越共中央第二号人物黎德寿会见了英萨利。严肃沉稳的黎德寿提醒英萨利，他说：“我现在想告诉你和柬埔寨同志们，注意历史的教训。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苏联和中国都保持国际团结。目前，中国认为它有两个敌人是苏联和美国。如果我们卷入中苏争执，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站到中苏任何一边都将是有害无益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英萨利没有理会黎德寿的劝告。

在北京，英萨利指挥秀木等柬共分子组成帮伙，监控西哈努克，封锁消息，切断对外渠道，把持“流亡政府”的全部事务。在西哈努克出席的对外宣传柬埔寨事态的公共场合上，英萨利和乔森潘公开蔑视和羞辱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很害怕这个来历不明的英萨利。1973年6月西哈努克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爆发了他对英萨利的憎恶，他说：“在这里有个红高棉特别代表（英萨利）。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在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的最可怕敌人！但这对我又有什么重要呢？即使他们（红高棉）有朝一日要暗杀我，

那也随他们的便。我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说他们是我的敌人，就像那个寸步不离我左右的讨厌家伙（英萨利）。但是无论怎样我都没有其它的选择余地。”西哈努克天性不愚，在无奈中他以个人之力所能做的唯一，就是利用一切机会甜蜜阿谀，甚至屡次作词作曲奉承中共，例如他自制一首歌《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自弹自唱：“啊！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祖国。它的全力支持使我完全相信，对未来的悲观失望一扫而光。”这很投合毛泽东的心理：中国特别看重外国人的赞扬。

但周恩来不受迷惑，1973年2月他与基辛格再次谈起西哈努克时，周说：“在北京，他（西哈努克）把中国称为他的第二祖国。虽然他写了这样的诗，我们却对他不抱幻想。我还劝过他不要使用‘第二祖国’这种太过分的字眼，但是他坚持要用‘祖国’来称呼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防备他哪天翻脸否认这些事情。但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诗歌，与我们没有关系。当然，他现在说我个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但是这些都不算数。”几年后，在西哈努克被迫返回金边前夕，他老调重弹又写下诗歌《我亲爱的第二祖国》：“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做我的第二祖国！”但谁也没有料到，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追捧居然在日后成为救他性命的意外因素之一。

(07/28)

柬埔寨的战争，可分为外战内战两部分。外战是从1970到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定签署，这三年是越共军队打着“帮助西哈努克复辟”的名义入侵柬埔寨，为红高棉建立“解放区”和招募训练部队。内战是从1973年到1975年越共军队撤出柬埔寨后，红高棉与金边政府之间的战乱。

1970年5月，2万名美国-南越联军进入柬埔寨边界21公里范围内作战。5月15日，美军在丛林中发现一个越共放弃的巨大而复杂的基地，据分析这是北越军队第7部门的供应仓库和越共的一个指挥部，它有182个存储区，存有大量衣服、食物、医药、武器和弹药，有18个营房和训练所，还有一个小农场。此地曾驻2,400人，现已通过丛林向西逃往柬埔寨内地。美-越联军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6月30日联军撤回了南越。

金边政府面对越共6万虎狼之师对柬埔寨内地的进攻，不得不投入柬军做出效果有限的抵抗。结果是，从1970年5月至8月，二分之一的柬埔寨农村地区被越共部队占据。

9月7日朗诺投入1万名柬军，发动了“真腊1号”战役，目标是打通被越共截断的、连接斯昆市（Skoun）和磅占省城的国家7号公路及其两侧地带。柬军12个步兵营在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下从金边出发。战役开始后，9月25日柬军收复塘考镇（Tang Kauk）。12月15日柬军击退了越共历时3天对图塘镇（Prey Totung）的围攻。12月底柬军夺回对国家公路的控制。

“真腊1号”战役实现了预定的军事目标，但未能重创越共，柬军也有相当大程度的伤亡和削弱。对柬埔寨来说，真正致命的伤害还不算是越共的侵略，而是：12月22日美国国会认定尼克松政府参与柬埔寨战争是不合法的，决议禁止美国使用资金、派遣部队或顾问团支援金边政府的防卫。这宣告了在柬埔寨战争中美国不能给予金边以任何的直接帮助。美国国会限制美国政府的战争权力，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吓不倒尼克松总统。

在中国国内的林彪覆灭之前，周恩来扶助红高棉的热情是急不可待的。“在（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成立当年（1970年），中国一次就援助3万人的武器装备给红高棉，经越共转交”。当时红高棉仅有不足5,000人。1972年法国学者萨基·索恩（Serge Thion）赴红高棉“解放区”采访，发现红高棉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中国造AK步枪。红高棉的身份标志是：每人脖子上都围着一条红白方格或者兰白方格的围巾。这些围巾也是中国为红高棉特制的，否则连印染作坊也没有的红高棉从哪里能一下子搞到几万条方格围巾？

周恩来还决定与北越合作进一步扩建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路段，使车辆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五天，方便了中共把武器和资金来源不断运送给红高棉。几年里中国对红高棉的援助金额多达数亿美元。按照战争规模和兵员个数计算，中国对红高棉的援助规模大大超过了对北越的援助。中共从1970年起给了红高棉足够装备十几万人的武器和4亿美元的金钱（红高棉在内战时期的人数约为3万），其中仅金钱援助就相当于中国4千万农户的年收入。到1970年底，在柬埔寨有17个省出现了战乱，越共占据了柬埔寨60%的农村地区 and 全国50%的人口。越共让红高棉接管了那些“解放区”。此时，武器军火、金钱物资、地盘、培训、合法性等等都奉送到红高棉手里了，红高棉的“打天下”何其容易，它的唯一问题是扩充人力。然而，在一个不信奉共产主义的佛教国度里怎能招募民众入伙？

朗诺送去了机会。1970年10月5日柬埔寨国家议会和国民大会同意了朗诺的提议，改变柬埔寨君主体制为共和体制。10月9日柬埔寨国家议会主席郑横宣告“高棉共和国”成立。延续超过一千年的高棉君主体制到此结束。郑横为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为总理，施里马达为副总理，实际的政府机构并没有变化。高棉的共和政体使所有的高贵皇室身份和世袭贵族爵位都无效了。此举对朗诺政权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后果：

其一，相对于现代文明世界来说，柬埔寨等同于化外角落，王室概念仍然盛行，改制激发起高棉农民对君主国体的怀念反应，形成对“共和体制”的不满。对高棉农民讲民主自由还太早，他们崇拜的是传统的君主制，并把具体偶像寄于西哈努克身上。资料记载：“西哈努克在北京3月份发出内战呼吁，在柬埔寨直到10月9日（柬埔寨改为共和体制的日子）以后才有了极其明显的回应。共和国的概念在大多数村民中并不流行。‘柬埔寨竟然没有一位君主，是个严重缺陷’的看法，在乡村蔓延着。”因此大批农民加入了西哈努克所号召的内战，使红高棉操控的“柬埔寨民族阵线”的人数由起初的大约3千人剧增到3万人。

有资料说“在1970-72年有西哈努克的追随者3万多人，被越共给予了武装和训练。”研究者们认为，除此之外的任何解释都无法说明红高棉能够得到扩充——它在1973年达到了4万人，超过了柬军的总数。这些“追随西哈努克”的农民不知道他们的“救国”实际上是为共产党打仗，不知道那是坐在北京温馨灯光下的中国“周总理”导演的，更不知道他们的西哈努克只是个坐困愁城的傀儡。而且，红高棉使用模糊的“解放区”概念和一个神秘蒙面的“革命组织”（Angkar Padevat，简称“安卡”）的称呼，让那些农民无从辨认“救国”与“共产党革命”的区别。“安卡”即柬语的“组织”，红高棉把自己称为“安卡”是为了掩藏起他们的政治面目，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即使，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为了发展也都要公开党的政治旗帜和纲领。但红高棉还是坚持着“面目模糊”的神秘帮会特点。

在柬埔寨，最初在越共的指导下，红高棉也使用正统共产党的吸引方式和控制手段来招募队伍。一位证人说：“1970年在暹粒省及周边地区，形成朗诺、越共和红高棉3派力量并

存的局面。12月，红高棉来到暹粒省乡村，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吸引青年农民入伙。有的村一夜之间就有几十个青年报名。为了扩大力量，红高棉用各种方法，召集村民讲课，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例如讲解谁是敌人、目前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况等等。一段时间以后，进行理论测验，及格者可以参加革命甚至入党（红高棉）。我的几个中学同学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青年男女，每晚必须去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红高棉控制了这些青年，又使用他们去控制“解放区”（柬红区）的普通人民，同时秘密地清除那些“投奔丛林”的西哈努克的效忠者，尤其注意消灭有文化知识的城市人。

以这种温和的“吸引”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不同于中共在中国施实的“阶级斗争”方式。这是因为越南共产党是一群民族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者，党的斗争对象与中共有着根本的不同。越南共产党从不在同胞之间制造集体仇杀。越共中央自从50年代初期否定了“极左”代表人物长征（Truong Chinh）所推行的中共式“血腥土改”后，就一直禁止在民众中搞“阶级斗争”。越共的战略是动员全体同胞共同抵抗外敌（法国或美国）。所以在寮国，当中共“工作组”教唆当地村民搞中国式的“土改”时，引起越共的强烈不满，星夜赶到，出面制止。可见，红高棉在越共的庇护下，在武器、金钱、地盘和人力皆有充足来源的情况下，其起家方式当然是没有必要模仿中共的“阶级斗争”方式。

除了“政治吸引”，红高棉还使用更有效的“金钱利诱”招募手段，使历史上任何的“叛乱招募”活动都自惭不如：参加红高棉“革命”居然有丰厚薪水，超出了种田的收益，不必劳动，安全又威风，令人羡慕。证人说：“我的一些初中同学，当了红高棉干部。他们对村民表示，虽然他们是干部但不领薪。我弟弟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红高棉就让他抄写黑板报。一天中午，他偶然从一本红高棉手册中，发现那些干部的薪水都相当高，因而对红高棉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农谢也证实：“我们党的干部和我们军队的男女不公开领取工资的原因，是他们为党服务并且从党内领取。这样，我们避免了造成一个与人民分离的统治阶层。”如此，红高棉便能容易地招募到社会上不愿辛苦种田的人。此时，中国农民尚以原始农耕方式“学大寨”，而中共当局却给红高棉人员发薪水。世人如果理解了红高棉没有中共那样艰难挫折的“打天下”经历，也就会理解为什么柬共领袖是个不懂政治的波布，而不是毛泽东那样的枭雄阳谋家。

其二，柬埔寨的国体改制产生了金边内部的分裂。在共和政体中，皇室身份和贵族爵位失效，引起皇室和贵族的不满。施里马达王子批评道：“共和制不能得到高棉人民的支持。柬埔寨的共和政体不能幸存，也不会持续很久。”确实，在柬埔寨此时的内忧外患情势下，施行君主宪政制可能是最好选择。

时间进入1971年。柬埔寨境内的战事趋于激烈。1月22日金边的波成东机场遭到越共的严重攻击，空军飞机大部分被毁坏，柬军的空中力量从此再也没能恢复。2月8日朗诺突然中风，部分肢体瘫痪，赴美国夏威夷（Hawaii）的医院去治疗。施里马达代理国防部长和总理。3月2日越共部队破坏了磅逊城外的石油精炼厂，使金边出现燃油短缺。3月30日越共再次切断金边交通磅逊港之间的4号公路。4月4日越共重创了前来打通4号公路的柬军。4月12日朗诺返回金边。在越南，4月末，北越“人民军”再次入侵南越，发动“攻势”，南越政府军招架不住，幸赖仅余11万的驻越美军的支援，才稳住战况，击退了北越。西贡方面以此为由阻挠美国的撤军并破坏美越之间的谈判。但尼克松总统未因南越情势危急而停止撤军。

1971年8月20日朗诺发动“真腊2号”战役，主要目标是清扫连接金边与磅通省的6号公路沿线，打破越共对磅通省的包围，收回富庶的“鱼米之地”以解困金边。“真腊2号”战役投入柬军精锐部队16,000人。9月20日越共攻击了金边燃油存储区，进一步加剧了柬军的能源紧缺。10月27日越共集中优势兵力，在塘考镇和卢隆镇（Rumlong）之间突破了“真腊2号”兵团阵列的中心地带。10月29日在磅通省城至卢隆镇附近，“真腊2号”兵团与越共主力激战数日，柬军兵团担当不住越共的猛烈攻击，遭受了最严重的军事损失。12月1日柬军兵团终于全线崩溃，“真腊2号”战役至此结束，柬方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真腊2号”战役失败后，柬军再没有能力抵挡越共了。到1972年，越共占据区已达柬埔寨的70%领土和60%人口。柬埔寨东北部几个省城也陷落于越共之手，其它省城虽未陷落，但各省城守军的控制区日益缩小，渐成孤立的“据点”，军需亦无法在当地征集，须由金边补给。而大量百姓避难逃入各省城，更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在与越共进行战斗的3年里，柬军失去了对“面”的掌握，而渐至“线”的被动状态，各“据点”的柬军还需抽出兵力镇守“线”的交通，难免被越共逐次损耗。柬军的后勤补给也只得依赖南越政府沿湄公河的运输和美国的空中运输。由于柬军控制区不断缩小，兵员补充也发生了困难，只好征用城市平民甚至十三、四岁的少年，投入死亡战场。这时，金边媒体刊登的一张稚气未脱战士的照片《少年与狗》震惊人心，引起很多金边人的惋惜和感慨。更重要的是新兵的训练极为缺乏。

朗诺中风之后，行为趋于乖僻。正在柬埔寨的美军顾问黑格（Alexander Haig）发现扰乱朗诺领导技巧的，竟然是柬埔寨的命运玄术：朗诺总是向和尚问卜、商量军机大计，因为那些和尚声称自己可由精神隧道回到古老的吴哥王朝。1972年3月10日朗诺独断自任总统、军队总司令和政府总理。遭到排挤的施里马达、英丹、郑横、隆波烈站到了一起，他们与朗诺的分歧日益加深。

1972年3月20日越共在柬埔寨东部攻击了坡翁（Prey Veng）和奈良两镇，并严重破坏了湄公河岸的码头和柬军基地。4月25日越共完全控制了从湄公河到南越边界的柬埔寨东部领土。5月份，越共对金边发动数次袭击。6月25日柬军在奈良镇东南的1号公路附近遭到越共伏击，600名柬军仅有13名逃回。10月7日越共严重破坏了金边周围的大桥。10月22日基辛格访问金边商讨形势，为美国-北越即将确定的“巴黎和平协议”而试图一揽子解决柬埔寨战争。12月7-27日越共在磅通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有6,000人的越共混合部队进攻磅通省城的3,000名柬埔寨守军。美军的空中轰炸阻止了越共的攻击，使柬军得以从暹粒地区调动装甲部队驰往磅通省城防守。

事实上，朗诺的战争政策从初始就可能是错误的。由于美国从南越撤兵已是定局，越南战争进入最后的谈判阶段，因此美国支持柬埔寨战争只是对北越讨价还价的手段之一。印度支那局势的重大转折即将到来。对此，朗诺似乎不懂得：柬埔寨生存所能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弱小防卫力量，而是政治智慧。尽管西哈努克、红高棉、越共、中共，纠合结盟，敌对金边，但四家的各自目标很不相同。越共的真正敌人是南越政府，而旨在夺取柬埔寨政权的红高棉才是金边政府的真正敌人。越共的最终目标在于赢得越南战争而非柬埔寨战争，越共的战斗能力也是柬军远非可比的，所以朗诺投入精锐部队两次发动“真腊”战役并非上策。如果楔入四家之间的缝隙就有可能分化敌方的“结盟”。所以金边的选择应该是弱国策略，与越共进行秘密谈判，取得互不开火的默契，亦即造成周恩来一直担心的那种变化。这就有可能投合河内与金边的共同需要：越共对金边的战斗目的是躲避美军，如果金边放过越共，单挑红高棉；而越共也放过金边，能够重新投入越南战场。红高棉只凭自己的有限之力，将被柬军击败。

如此，柬埔寨的内战局面就被改变，周恩来的计谋就会落空。但金边、河内的相同失误是，两个并非死敌的双方拼杀了 3 年，柬军元气耗散，越共也伤亡万人，只是给中国插手柬埔寨而创造了机会，同时也为美国创造了体面撤军的机会。

(08/28)

红高棉是怎样战斗的呢？西哈努克注意到：越共破坏了朗诺政府的战争能力，其目标是波成东机场、磅逊炼油厂、金边向外连接各省城的桥梁；而对比之下，红高棉缺乏有效的攻击力，他们主要依靠中国的肩扛式火箭筒（40mm 榴弹筒），“他们不懂得攻击军事目标，相反，他们袭击那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居民区、贸易市场和学校。许多无辜的孩子和百姓被炸死，被恐怖地伤害了——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但他们确实建立了一支歹毒的军队。”来自柬埔寨国内的情况调查，也表明红高棉的行动大都是恐怖袭击。例如，当 1970 年柬埔寨内战时，柯袍成了红高棉北部的军事司令。他们攻击政府公所，攻击平民，甚至秘密袭击越共。证人庞（Pon）说：红高棉武装队在 1971 年来到了巴拉（Baray），他们“把手榴弹扔进了一些亲越共的村庄平民的房子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杀绝多个亲越共的家庭。”当地政府（在柯袍活动区）发现了 62 个坟坑，内有 180 具被杀的平民死尸。而国际报告则指出：“尽管弱小而缺乏战争经验的柬埔寨政府军被东南亚最强悍的北越军队所打败，但西哈努克在北京定期宣称是他的‘军队’在打败柬埔寨政府军。”

一张这时期的波布照片显示他头顶“毛式绿帽”（中国的软盖军帽），依旧嘴巴半开。不过与内战之前不同的是，他颈上搭了一条方格围巾，手腕上出现一块手表，手中树棍也换成了正规手杖。1971 年 7 月，波布在金山图克（Phnom Santuk）召开有 60 个“高级兄弟”参加的神秘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一个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暗中清除“柬共河内派”人员，以及在红高棉队伍中清洗西哈努克的忠诚者。到 1973 年底，所有响应西哈努克号召而参加“救国”的人都被悄悄干掉了，其中包括西哈努克的一个儿子。9 月 30 日“柬共第 3 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红高棉认定越共是最有害的敌人之一，而波布变成了永久性的柬共总书记和“柬共军委”主席。9 月份之后，“柬共河内派”人员被排斥或者撤换职位，同时开始陆续失踪，以后的资料揭示了他们都被红高棉有计划地秘密谋杀了。到 1974 年“柬共河内派”的绝大部分人都被清除了。北越的调查文件也指出：“在解放区他们（红高棉）禁止柬埔寨人接触越共人员，甚至袭击一些迷路的、购粮的、运送弹药和给养的越共小队。”

最早详细披露的红高棉“解放区”社会形态，是由一个学校教员易萨林（Ith Sarin）在 1973 年发表。易萨林因为不接受共和国体制，1971 年投奔“解放区”成为柬共候补党员。但是 9 个月后他抛弃“解放区”回到金边。他揭示了隐藏在“解放区”背后的共产党存在的秘密，那就是“安卡”。他描述了“安卡”对 6 个地区的 5 种层次的控制：“安卡”强迫人民去仇恨朗诺政府和美国，甚至去仇恨他们的“盟友”越共；“安卡”紧紧地监视着西哈努克的效忠者，并要求人们互相监视；而且内部纪律越来越严厉。易萨林的体验是：大多数人民不喜欢“安卡”和它强加于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如果柬埔寨不能返回君主体制，人民将支持柬埔寨改换为共和体制。

在政府控制的城市里，柬埔寨人生活如何？有证人说：“1970 年，柬埔寨陷入战争。（越共分子渗透到城市里）金边市区的许多公共场所，随时会发生恐怖爆炸，郊区外的炮弹也随时会打进金边。金边与各省城都成了孤岛，交通被切断，出门只能靠飞机。在战火中，物价飞涨，一碗面条从原来的 5 瑞尔（柬埔寨的货币单位）涨到 150 瑞尔。一两黄金由原来的 2

千多瑞尔涨到 20 万瑞尔。农村人民的生活也不好过，许多地方在打仗。美国的轰炸机在日夜轰炸 1 号、4 号等重要公路附近的红高棉和越共控制区。各省有条件的人民都逃往金边，金边有条件的人逃往国外。”金边的人口在短时间内激增，金边快要被挤爆了。那时到金边的旅行者也说：金边的汽车司机，无论是政府汽车还是私家汽车，开车之前都要用一根前端捆有镜子的木棍围绕汽车查看底盘，因为潜入金边的共党分子常把磁铁炸弹吸附在汽车底盘下，进行恐怖爆炸。1972 年 2 月 5 日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说在柬埔寨有 20 万人因内战的破坏而无家可归。根据柬埔寨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此时柬埔寨的人口总数有 700 万。

一份著述总结了红高棉行为的非法性在于：

1. 叛乱：从 1969 年开始在柬埔寨东北部拉塔基里省，叛乱合法政府（西哈努克政府）。

2. 叛国：红高棉是一个受雇于外国的柬埔寨秘密组织，它从 1970 年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地收到金钱和武器，以便攻击他们自己国家的合法政府（朗诺政府）。红高棉要求越共占据了自己祖国的很多领土，并协调军事行动。

3. 伤害人民：红高棉使用同胞平民作为肉盾掩护。红高棉游击队躲藏在农民的村庄里，也经常躲藏在寺庙内，进行袭击活动，从而招致平民生命损失和寺庙破坏。红高棉还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直接杀死平民。

4. 破坏社会：红高棉强迫平民集体生活和做苦役劳动，他们焚烧人民的家园，驱逐城镇人口，并在驱逐过程中任意杀害人民。

从 1972 年的上半年起，红高棉对“解放区”区的统治政策有了令人惊讶的急剧变化，从初期的越共模式的吸引动员转变为中共模式的胁迫强制：他们推行“农村合作化”，强行占据村民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控制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使人民离开红高棉就无法存活。更甚于的是，红高棉随意杀害民众，而不论被杀害者的阶级地位、是否革命对象。人民可以吃多少食物、怎样生活、是否可以走出村庄或者去看病、以及怎样被惩罚和怎样被管理，都取决于红高棉干部。证人庞（Pon）说：“在湄公河的北面地区，红高棉不准许人民穿颜色丰富的衣服，在其他的生活方面他们也加以控制。他们说有些人民没有遵守‘安卡’的规定，他们就开枪射杀那些人。”另一些证人说：“1972 年起，红高棉开始‘改造’解放区。那时，人走到哪里，都必须有红高棉干部开出的证明信，不然会被抓起来，寸步难行。红高棉要求每个村派一些村民上山砍伐野生竹子。在山上（由红高棉监管）的日子，没有牙膏，没有肥皂，没有多余的替换衣物，连枕头都没有。每个人都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低弱而生病，个个菜色，骨瘦如柴。除了寒冷，还有蚊子，竹林中的蚊子多得奇，一不小心就会患疟疾和出血热。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活著下山。砍伐的是野生竹子，要从竹子的中段开始砍，留下竹根。这样，我们就必须爬上竹子，双脚用力蹬著，全身悬在竹子上，一手紧紧拉住竹子，一手挥刀拚命往下砍。足足半年，我们从一大早开始干活，直到天黑，每天干 12 个小时的活。晚上还要被红高棉集中起来开会，总结白天的劳动。被点了二、三次名的人，要十分当心被处死。我亲眼见到，有人在熟睡中被叫醒带出去（杀掉），再也没回来。我常想，只是为了些小事就置人于死，这种做法太偏激太无情了”；“青年生产队的平民，不被允许与家人团聚。儿童都被‘安卡’集中到一起参加生产，大好的学习机会被剥夺。”

一个红高棉战士描述了北部的“解放区”统治方式：“在磅通，由很严厉的红高棉干部管制，

他们很可怕，发生许多处决，佛像和宝塔也被破坏……，女人和孩子、年轻的男女都被分开到不同的劳动营，实行定量的公共食堂，劳动营的食物没有肉和菜，仅仅是大米汤，还禁止孩子们尊重父母，禁止和尚祈祷，禁止丈夫与妻子同居。”1972年底，在暹粒省吴哥地区的“解放区”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数千农民抛弃家园向西逃过泰国边界，经泰国媒体采访，世界才首次了解到红高棉的模糊面目。1973年西南大区、东北大区和西北大区的“解放区”也开始实行与北部大区同样的严厉统治。唯有东部的索平控制的“解放区”并不那么严厉和残忍，索平表现出某种独立性，甚至他的东区部队的穿戴也不是红高棉的统一黑衣，而是越共式的绿衣。

很明显，在统治形态上，红高棉严厉的“新政策”与越南共产党的政策不相容，而与中国的激进政策类似。为什么红高棉的政策会出现大转变？那种“新政策”的来源是什么？从时间和背景来看，可能与下列事实有关。

英萨利抵达北京后，这个长年生活在小国寡民之中、刚钻出丛林的英萨利，突然置身一个热闹炫目的数亿人民轰轰烈烈搞“文革”的如火如荼场面之中，难免产生惊讶和崇尚。他在中国的四年里，中共给予他以“兄弟党魁”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中共给予西哈努克的待遇，还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招见谈话。他对中国对毛泽东产生感激崇拜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据国宾馆服务员（兼眼线）李某回忆道：“英萨利是个有学问的人，随身行李主要是书，其中有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不知看过几十遍，那部分书页要比其他部分旧得多。”从中共报导的英萨利在中国的行踪来看，除了他监视西哈努克夫妇随同西哈努克游玩了中国各大城市和各名胜之地，英萨利还独自地频繁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活动，而他在中国更多的活动尚未被报道。据现存可查阅的70年代的中国新闻记录，以及中国各地宾馆、学校等为炫耀自身而公布的接待“名人”记录，可以发现英萨利在1971-75年的行踪遍及全中国。他考察过中国的兵营、人民公社、“五七公社”、大寨、西北的农垦兵团，东北的石油基地大庆，华北的“劳改”集中营。他还热心于“文革”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例如他亲自到沈阳“聋哑人学校”参观所谓的“用毛泽东思想治愈聋哑”的奇迹。推测当时中国“文革”的内容和种种怪异的做法，他可能都有兴趣去考察了解，而西哈努克从未去参观过那些东西。可见，在中国，英萨利受到了“文革”的熏陶，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而西哈努克对此缺乏兴趣。实际上，英萨利的考察是一个学习“毛氏革命”的过程，而西哈努克的游玩是无害的个人享乐。未来的事实证明，英萨利多次表明了他在红高棉“社会革命”政策的制定方面对中国做法的模仿和对“文革”经验的依赖。

自从英萨利来到北京以后，红高棉与中共之间的黑箱合作全部由英萨利掌握。“流亡政府”的财政部长秀木透露：“（中国）分配给英萨利的金钱是无限额的。换句话说，中共领导人给红高棉提供了空白支票（指无限额的财力动用）。”1972年，原本负责协调红高棉、中国、北越三方行动的高米斯被英萨利排挤去河内长驻，不能再接近英萨利的秘密事情。1972年中，柬共创建者、原柬共中央主席、“柬共河内派”总首领山玉明（Son Ngoc Minh）来到北京讨论柬埔寨局势，当晚他在北京突然神秘死亡，终年52岁（1920-1972）。据北越人的说法，山玉明是被英萨利下毒而暴死，并断定这事与红高棉消灭“柬共河内派”的阴谋计划有关。另有资料指出，山玉明在北京品尝了“阴谋的水果”而被毒杀。这“毒水果”究竟从何而来？其中有没有北京的暗中襄助？为什么山玉明未能得到北京医院的救治？巧合的是，10年前在柬共内部也出过一件党首领杜萨木神秘遇害的事情。

面对柬埔寨的战乱变局，柬埔寨华人是怎样反应呢？大部分的普通华人出于认同事态而

拥护了朗诺政府。外省的华人大都不愿接受共产党统治而逃入金边及就近的省城，而“革命华人”则敌视金边政府。中共地下党暗中实施了“华人投奔柬埔寨解放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行动。一份“华运”的资料指出：“1970年4月中旬，在中国驻柬大使馆的直接指示下，柬埔寨‘华运’的大部份干部成员，分别从西南部的贡布省和东北部的磅占、橘井两省进入（红高棉的）解放区。贡布省解放区的‘华运’有数百名成员，成立了‘华运革命纵队’，随着越共部队辗转于战场……开展武装游击的革命活动。”

那份资料还指出：“1970年下半年设立‘华运特别委员会’九人作为‘华运组织’最高领导机关，分别负责领导柬埔寨全国各省市华侨的革命活动。”一位华人女士证实：“朗诺政变后，（革命的）华人不敢居住在金边，纷纷往外省迁。当时，我的丈夫在外省的‘解放区’参加了‘华运’，我带着4个孩子住在金边。于是我带孩子们去找我丈夫。当时，一路上都有神秘的华人带路，一站一站地接转，白天不行动，到了晚上赶路。我和孩子们从没去过其他地方，一路上什么都不懂，全由不认识的华人安排。”另一位华人说：“朗诺政变时，我正在（金边）课堂教书，校外很乱，有学生（向越共）抗议示威。华校学生没有参与示威。政变后华校停课了，我带着老婆及3个年幼孩子往东北方向去。当时，许多人以为西北马德望省是产米区，到那里不愁米吃，但我却看到东北方向有越共，我是去投靠那里寻求保护而去的。我们一家来到橘井地方，看到那里聚集有很多华人，还有华文学校。我们很快安顿下来，孩子也到华校上课了。”

有金边华侨作证说：“越共为了躲避美军而占据了柬埔寨三分之二的国土，这些地方被红高棉接管，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三分之二的柬埔寨被（共产党）解放’。这时中共鼓动华校教师学生和华侨青年去‘柬红区’参加‘革命’，还说‘只有柬埔寨解放了，你们华人才能真正获得解放’等谎言。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许多华校的学生和教师都抱着一颗所谓‘爱国’心响应中共号召，抛下父母妻儿，放弃都市生活，跑进‘柬红区’。然而，这些被欺骗的华人青年都成了共产党的利用品。不少华人学生都是不告而别地离开父母和家庭。家长痛苦至极，也不知去何处寻找儿女的音讯，更想不到是中共地下党造成了他们家庭的失散。”

朗诺政府的基本班子，长期掌管过柬埔寨情报部门，深知在华人群众中藏有共产党颠覆势力。因此朗诺政府查封了鼓动“革命”的华文报纸，暂时关闭金边的所有华校，不过并没有为难那些“革命”华人，也未肃清中共地下组织，且在政局稳定后就及时解禁了华校。而中共地下党暗中串联和动员金边5所华校的师生弃学出走，到“解放区”去参加“华运”组织，据估计约有六百名华校学生离家参加了“华运”组织。“华运”在中共操纵下正待蓬勃展开。但是，红高棉只同意“华运”在华侨聚居的地方，搞医疗所和中文学校，并不许可“华运组织”设立政治机构，也不允许“华运组织”配备武装。在柬埔寨西南部的红高棉虽然允许“华运组织”成立领导机构，也可以配备一些必要的武装，以配合红高棉“革命”，但必须由红高棉指派的张东海负责“华运”事务。

张东海，柬籍华人，中文流利，多年前已是柬共党员，深得红高棉信任，不属中共地下党系统。事实上，红高棉对于中共地下党操纵的“华运”很有反感，始终视“华运”为异己，只是当前还不便对“华运”动手而已。时隔不久，1971年7月张东海奉“柬共决定”，命令“华运”停止一切活动并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1971年11月，张东海向“华运”传达红高棉的命令：“华运”交出领导权，必须于半个月内将“华运”的全体人员移交给柬共，转为柬共领导的“新华运”（新的华人革命运动组织）成员，由张东海担任负责人。但“华运”领导人自以为“华运”组织的后台很坚硬，遂表示“华运”历来归属中共地下党领导并要求等待中共的裁定和指示。这

被张东海断然拒绝。1971年12月12日红高棉部队突然包围“华运”组织总部，逮捕了“华运”领导人及总部成员40余人，大部分杀掉。随后，红高棉在柬埔寨各“解放区”抓捕“华运”成员。凡有过革命活动的“华运”人员皆被防范、限制或捕捉，只要捉到便不放生，必用毒刑致死。原“华运”成员人人惊恐，悲愤交加，极盼中共施以援手或者帮助他们逃往中国大陆，但均遭中共拒绝。大约在此时，“老董”也消失了，他原本是中共地下党安置在华校的负责人，后担任了“华运组织”的指导者。

1972年3月18日张东海与原“华运”组织头目在交谈中实言相告：“华运组织在柬埔寨搞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柬共是不认同的。在柬埔寨境内绝不允许什么外国侨民搞自己的什么革命。”至此“华运”头目才清醒过来，弄懂了红高棉不允许中共操纵的“华运”继续存在。同年10月“华运”自行宣告解散。“华运”覆灭，红高棉的“新华运”取代了中共地下党的“华运”。后来，“新华运”被改编为“华人大队”。1972年11月，原“华运”4名头目气愤难平，串联偷跑，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个月抵达北越，要去北京请示中共当局评理。北越人把他们用专机送往北京。他们投入“祖国的怀抱”，但结果是未能料想的：中共有关部门传达的裁决是“中共已与柬共达成协议，将‘华运组织’全部移交给柬共处置。中共方面不再过问。”“华运”代表们悲伤但还幻想另一要求：“是否可以让‘华运’成员回到中国大陆来定居？”孰料当局回答也绝情：“祖国（中国）的大门，不会为你们而开。”

一个当年的“华运”成员的证词是：“我们这些天真的华人青年都抱着共产党理念到‘柬红区’去为柬埔寨革命奉献自己，不但身无分文（个人带去的钱物全部充公），也没有个人权利自由，面对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恋爱、工作都要绝对服从‘华运组织’的安排。而我们吃尽苦头，丧失宝贵的青春年华得到的结果是中共把‘华运’交给红高棉处置，中共与‘华运组织’不再有任何关系。当时‘华运’领导者们没接到中共的通知，只好恳求红高棉准许‘华运’人员自行集中到东北山区，（脱离政治）去过自力更生的农场生活。1972年底，在东北部的‘华运’头目逃往‘胡志明小道’，由越共联络班护送到中国北京向中共请示，中共才证实已经把这批响应‘祖国’号召献身柬埔寨革命的华人出卖给红高棉。……红高棉勒令‘华运’解散，连我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证。真是‘树倒猢猻散’，我们谁也顾不了谁。就这样，支持柬埔寨革命的华人落到了无处可归、各自逃命的境地。”

(09/28)

幸好，朗诺只反共，不排华。1971年朗诺政府授权守法的华人团体建立新的“高棉人-中国人联盟会”，声称“在高棉人和华人之间维持友好关系。”

留在金边的那些“革命”华人还在暗中进行颠覆活动。华人文清的证词：“1970年朗诺政变后，我在金边参加反朗诺政府的斗争，为‘解放区’传送情报和搞侦察活动，并通过教课来宣传‘爱国’思想，争取华人学生参加反朗诺政府的地下组织。记得为了送一份情报到‘解放区’，我和几个学生骑自行车，从金边出发到西北方向的地点送情报，一路上不知道何因，被朗诺政府的侦探盯上，为了不让情报落入侦探手中，我毅然把藏在钢笔内的文件吞入肚里。还有一次，我为了画一张敌人的驻军及武器分布情况的图，为完成任务不惜危险，穿上（朗诺士兵）军服，与敌人据点的守军打交道，请他们吃喝，以达到准确获取有关情报的目的。”

尽管“革命华人”竭力支持红高棉的革命运动，但红高棉并不买账。红高棉的政策是把华

人整体划入“资产阶级”而加以隔离和防范，从而使华人面临着比高棉人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压力。而且，红高棉每进入一个城镇，总是抢劫和彻底破坏当地市场，这对于赖以小商业为生的华人是灾难。研究员威莫特（Willmott）说：这种破坏几乎消灭了乡镇商业贸易，“所有的华人都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资产阶级”。在贡布、波萝勉、柴桢、磅占等省的“解放区”，还屡次发生过红高棉逮捕、枪杀从城市投奔“解放区”的华人的事件。

1974年4月28日在“华运”的中心地区橘井（华运称之为“柬埔寨的延安”）发生了针对“华运”的排华事件：大批红高棉武装人员开进橘井市，把机关枪架在街上，对准华人住宅，限令全部华人立即离开家园到农村劳动，并拘捕了嫌疑“煽动华人回中国”的百多名“华运”人员，这些人受到毒刑折磨，后被杀掉。红高棉一举打掉了这个“柬埔寨的延安”，随后橘井地区的全部华校都被红高棉取缔，华人的“革命热情”遭到沉重打击。那位“寻求共产党保护而一家来到橘井地区”的华人作证说：“1974年华校全都被红高棉关闭了，我们只好离开（橘井）往南迁。”

随着越共在柬埔寨的节节胜利和朗诺政府控制力的衰减，红高棉“解放区”迅速扩大。红高棉把帮会的黑话方式也应用到地名。他们废除各省（khet）名称，把各省编为数字代号的“分区”，分别划入五个大区。例如“1号地区”是西北大区的一个分区，基本上就是原来的马德望省。西北大区有七个分区，代号从1号到7号，似乎还有些排列顺序。但其它大区的分区代号是被任意标记的，没有序列性。例如磅通省被编为43号分区和41号分区，相邻的磅占省被编为21号分区，暹粒省被编为106号分区，橘井省为505号分区。各分区的红高棉武装队的代号就是该分区的编号。这种数字代号除了使人感到神秘和困惑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的实用意义，它只是红高棉神秘特色的伸延。

1971年初，红高棉“党中央”组建金边以西的“特别大区”，包括实居省和半个磅清扬省，温威（波布的亲信）担任“特别大区”的柬共首领和红高棉军事司令，他的总部代号是“305”。同年7月，红高棉“党中央”将紧邻金边的干拉省南部（25号分区）也划归“特别大区”。这“25号分区”处于湄公河流域，是一个稻农菜农商人市民密集、农副渔业繁盛的地区，那里还住有大量的华裔和越南裔。60年代这个地区选举了乔森藩为议员。该地区的红高棉第25部队是特别大区的主力部队，由罗恩（Roeun）统领。不久，15号分区（干拉省北部）也划归了“特别大区”，原金边的柬共工运负责人程安（华裔）作为温威的得力助手，任“特别大区”的柬共副首领。这时期，程安以其远见，收罗了数百个工业技术员和熟练工人，这批人后来组成了红高棉政权的工业系统基础。

在东部，索平是柬共首领和红高棉军事司令。农苏恩（现在化名Chey）协助索平。索平的得力助手卓乌克（Chhouk）是24号分区（柴桢省）柬共首领。28岁的查克雷（Chan Chakrei，原佛教和尚）统领东区主力部队（红高棉第1部队）。谢杰（波布的亲信）担任东区22号分区（波萝勉省）柬共首领，统领红高棉第22部队。有研究指出，谢杰可能被波布安插在东部负责监视索平和那里的干部。在西北部，三巴特是西部的柬共首领兼红高棉军事司令。他的主要助手克平是4号分区（马德望省北部）的柬共首领，统领红高棉第4部队。三巴特的另一助手柯金霍（Ke Kim Huot）是7号分区（菩萨省）的柬共首领，统领红高棉第7部队。

在西南部，塔莫是西南大区的柬共首领兼红高棉军事司令，西南部的红高棉主力由第13部队和第11部队构成。塔莫的特点是把西南部“解放区”变为他的家庭统治，那里的要职

几乎都被塔莫的家人和姻亲所担任。塔莫的一个女婿密穆特（Meah Mut）是 13 号分区（茶胶省）的柬共首领，统领红高棉第 13 部队；另一个女婿苏麦特（Sou Met）是 33 号分区（贡布省）的红高棉第 33 部队的领导人。塔莫的几个儿子和其他女婿也分别是西南部各分区的柬共首领或部队统领。不过，塔莫家族势力在向西南部 37 号分区（国公省 Koh Kong）延伸时遇到挫折，被当地柬共首领少康（Sau Kang）等人所抵制。

在北部，红高棉的发展最为显著，实力也最大。克多恩手下的人才如云，主要有都恩、柯袍、斯仁、苏华斯（Suas Va Si）、包查、提欧（克多恩的昔日教师）等人。侯荣、胡宁也在克多恩的总部帮办。1972 年初，柯袍成为北部的红高棉军事司令。柯袍说他在北部组建和扩张了 3 种军事力量：小区级武装，每区 120 人；分区级武装，每区 1~2 个营，每营 300~500 人；大区级武装，13 个营，每营 360~500 人。北部的红高棉部队总数约 2 万人，是红高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甚至利用中国的援助组建了一支装甲部队。东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红高棉部队大约各有 1 万人。如此，1972 年底红高棉部队总数已近 5 万人。较之在 1970 年朗诺政变前，红高棉武装已剧烈膨胀了几十倍。

然而，在红高棉各大区之间逐渐有了不合，加深了红高棉内部的宗派。1971 年索平收罗了一些北部干部到东区工作，引发了北部大区与东部大区的争执。1973 年，索平的东区红高棉第 126 连队指挥员韩桑林（Heng Samrin）率 20 名战士行经西南大区的茶胶省，被塔莫部队扣押。索平出面与塔莫交涉才放回，索平对此相当不满。在北部，柯袍逐渐与他的恩师克多恩发生对立，成见加深，柯袍变成克多恩的对手。

1972 年 2 月，红高棉在磅通省“解放区”建立了一个秘密单位“M-13”，由宋成领导。宋成，身材修长，一天到晚戴着个黑色宽边眼镜，化名“乔”（Khieu）。1973 年宋成改任红高棉部队总参谋长，仍兼管 M-13。M-13 是个专门清洗内部敌人的防卫机构，类似于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和中共延安时代的“锄奸部”。它的具体操作者是前中学数学教员、在 1964 年被中国进修生感染了共产主义观念的康克由，他化名杜赫（Duch，如今是大名鼎鼎）。杜赫，身材清瘦，面相温和，毫不显得凶恶暴戾，但他对敌斗争极为坚定。他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曾经与他共同闹事的中学教员曼奈（Mam Nay）。曼奈身材奇高，冷酷残忍，喜好酷刑审讯。曼奈的副手是原小学教员庞（Pon，又名唐新 Tang Sin），他是个以毒辣折磨令人害怕的拷问员。第一份向世人披露杜赫的报告，是法国人弗兰索斯·比索（Francois Bizot），他于 1970 年被红高棉游击队逮捕，杜赫指责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探，关押了两个月才释放了他。比索的印象是“杜赫把所有不同观点的人，都视为叛徒和说谎者。”M-13 的清洗对象，主要是那些西哈努克的忠诚者、“柬共河内派”干部、与朗诺政权有关系的人、以及“不愿再追随党”的红高棉分子，另外还有不少是被告发的普通村民。这些人总是被通知去学习或调动，然后在半路上被逮捕，然后就永远消失了，而这一切完全不经任何程序。这种逮捕和处决，其后被红高棉“党中央”推广全国，成为规范性用法，因此柬埔寨人听到“学习或调动”，便知自己的死期已到。

M-13 的构造是由木棍和竹篱笆围起来的土监狱，有 4 间平房用于审讯拷打，有多个 4 米宽、5 米长、2 米深的露天大土坑作为牢房。土坑底部的四壁排列有固定脚镣的铁环，用来锁铐囚犯的双脚，使囚犯不能移动身体也无法站起来。当囚犯被押送到 M-13 时，他们被扔进大土坑里，等候已设定的罪名分类。

一个在 1973 年 6 月幸存的农民囚犯韩应（Ham In）在刚被送到 M-13 时，一些囚犯低

声告诉他：“你必须承认那些（假设的罪名），否则你会被打死。”他记得当时有十多个“柬共河内派”干部也被押送到这个监狱。杜赫总是重复说：“所有被带到这里的人都必须招供。”M-13 不需要侦破什么，只需要招供认罪。为了取得招供，通常的用刑是：把大头针钉入受害者的指甲；捆绑受害者并刀割其身体多处，让受害者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血不停地流进一个大盆；或者用木锤子反复猛击受害者的胸部和后背，打碎每根肋骨，直到受害者昏迷或当场死亡。杜赫喜欢用中国发明的“再教育”一词代替处决命令。简单的处决是以枪击毙，其它的处决是斧子劈砍或刀割喉咙，让血汩汩流进已准备好的土坑里——行刑者担心到处流淌的血会玷污自己的鞋子。有时 200 个囚犯被同时处决，把尸体扔进一个大土坑（集体坟坑）。在这种坑里到处都能看见人头和尸骨。在 M-13 从建立到它日后迁到金边扩建为 S-21 监狱的 4 年时间里，估计有 2 万人死于 M-13。

1971 年 9 月 13 日，中国政局发生巨变：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毛泽东决裂，深夜出走蒙古国，不幸飞机坠毁，林彪覆灭。毛泽东大病一场，几个月后才走出沮丧的阴影，振作起来。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基辛格抵达北京，达成了联合对抗苏联的默契，还达成了关于越战的交易：中国配合美国，解决越战问题；作为回报，美国表示“知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注：指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和解”达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反苏阵线以得到西方庇护的目的，也加强了美国在冷战上的优势。毛泽东的大胆决策和周恩来的积极努力，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令人畏惧的苏联威胁。后来毛泽东对基辛格透露他的“联美”用意：“我说要搞一条横线（联合），就是纬度，有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欧，一起整那个王八蛋（苏联）。”而尼克松“联华”的用意是利用中苏矛盾、中越矛盾来结束越南战争。

时间进入 1973 年。这年 1 月 27 日“巴黎停战协定”正式签署，越南战争的转折到来。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角色将终止于同年 3 月 29 日。美国在进行撤军事宜，北越则把更多的武器军火和战士抢运进南越领土内的越共游击区，作为继续战争的准备。韩国、澳洲、新西兰等国的派遣部队陆续撤出了南越。同时，尼克松政府对不同意停战条件的南越政府施加压力，使南越最终同意了“停战协定”。此时，北越仍然周旋于中苏争拗之间，以便继续取得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北越早对中共的“背弃”产生强烈不满，将有关中共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文件或记载送交苏联留档。2000 年俄国解密了那些文件中的 77 件文本，包括中越、中寮（寮共）和中柬（红高棉）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诸于世。中共乐此不疲地送祸越、柬、寮、泰、马、缅诸国的一系列事实，大白天下，无可掩饰。

“巴黎停战协定”签署后，美军撤出越南，越共部队撤出柬埔寨和寮国。北越最终获胜的最大障碍消失了。“巴黎停战协定”规定：外国军队撤出南越，而越共武装却不必撤出南越，因为北越否认打着“南方阵线”招牌的 30 万“人民军”是外国军队。急于达成协定的尼克松、基辛格以自欺为荣，对北越做出了让步。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放弃了它保卫自由的伟大使命，它为保卫南越所付出它的 5 万多个美国人的生命，并没有留下历史成绩——侵略未必会失败，反侵略却付出了惨重代价。

几天后的 1973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在北京转述毛泽东的评论是：“美国军队离开南越的协定是个好事。在美国人撤出后，处理（南越）阮文绍政权就很容易了。美国为什么这么做？美国派了那么多军队到印度支那，花了那么多的钱，但是越南问题没有解决。最后达成了协

议，美军将撤出南越，可是协议没规定北越的部队也撤出。阮文绍强烈反对美国这么做。当然美国右派也不赞成这个协议。”

在“巴黎停战协定”生效后的两年里（1973-1975年），北越又向南越渗透了10万兵员、700辆坦克和1,500门火炮，并上万次地违反停火协定，伤亡了南越10万名军民。但在1973年1月那时，世界上许多人都天真地相信那个在共产党看来如同废纸的“巴黎停战协定”将把和平带给东南亚。美国的反战派和西方“左派”们也自视为世界和平的“大救星”，狂欢庆祝。“巴黎停战协定”的谈判代表基辛格和黎德寿（一个自欺欺人的外交家和一个严肃沉稳的政治骗子）因此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喜滋滋跑去领奖，黎德寿冷峻拒绝获奖。

根据巴黎协议的第20条款，越共也撤离了柬埔寨。但越共保留了他们在柬埔寨“胡志明小道”区域的基地和设施。当时美国苏联都不了解越共与红高棉并不是一回事，美、苏还以为柬共仅是越共的傀儡，越共撤出柬埔寨，柬共也会自行解散。但事实远非如此。1973年1月29日北越、南越、寮国都实现了停火，金边政府也单方面停火，不停火的是红高棉，原因仍是中国的幕后策动。朗诺邀请红高棉谈判，并宣布特赦红高棉全部人员，以便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和平。

但是周恩来不愿看到东南亚出现和平，相反他谋划挑起更多的战斗。在停火前夕，1月24日周恩来对西哈努克道：“据北越告诉我们的大使说，停战不包括在柬埔寨和寮国的战斗。听说停战协议提示，印度支那3个国家自己解决自己的战争问题。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不能干预这3个国家的事情。”于是，2月7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继续进行柬埔寨内战。事实上，负责柬埔寨事务的越共领导人范雄提前在1973年1月24-26日与波布多次讨论过执行停火协定，但波布清楚地表示要继续进行柬埔寨内战。

从2月开始，红高棉加强了对金边政府的攻击，并不理会河内所坚持的要红高棉与金边政府展开谈判的建议。这差不多表明了红高棉开始背叛北越，而乔森潘却声称“河内抛弃了我们”，此话被西哈努克所记录。河内的官方文件说：“北越人（从柬埔寨）的撤出放开了柬共对越共的依赖，红高棉激进份子们开始施实中国式的‘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重组了村庄的集体生活。这是北越人撤出后的一个显著转变。这是个危险的预示，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柬共偏离跟随越共的路线，并将更多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秀蒲拉西也证实：“在1973年，北越人的最大问题是，他们需要买柬埔寨大米。但是我们（解放区）废除了钱币，农民无法使用钱币，如果农民生活在没有商品贸易的集体合作社里，农民就不能把大米卖给北越人。”

1973年北越人撤出柬埔寨后，“柬共河内派”干部纷纷遭到红高棉的秘密捕杀，最后仅有极少数“河内派”干部逃回了北越。此时，在红高棉广播电台工作的“河内派”干部彭索万不辞而别，突然潜逃，才保全了性命。据说彭索万在逃离之前，秘密地调查了当年柬共总书记杜萨木是如何消失的，所有的嫌疑都明确地指向了波布和英萨利。而且在调查中，彭索万发现红高棉与原“柬共”是两种不同的共产党组织。

(10/28)

1973年，在柬埔寨，内战双方的实力是，柬军征兵后有3万多人，拥有火炮和装甲部

队，盘踞在金边和各省城“守点”，新兵严重缺乏训练。柬军兵力不足而无法歼灭红高棉武装，而且军火和给养都依靠美军空运和南越的水运供应。红高棉方面已有5~6万人的武装，拥有中国给予的轻型火炮和车辆，占据了广大农村地区，其武器军火和金钱依靠中共的提供。但此时红高棉仍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主要从事破坏性袭击，例如：他们把一枚手榴弹偷偷扔进金边一所学校的师生正在开会的会议室里爆炸。红高棉的恐怖袭击对金边政府还暂时不能构成危害。但此刻真正的威胁露头了：1973年6月美国国会以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为限制手段，禁止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使用任何的军事力量。

柬埔寨的持续战斗分别引起了美国苏联的注意。苏联人要通过河内弄清红高棉这股势力的情况。1973春天，黎笋告诉苏联大使：“柬埔寨的事情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他们的组织位于北京，与我们相比，甚至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都与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红高棉与西哈努克及其内部成员有争斗。”而美国方面，基辛格经过调查得知是一股被称作“红高棉”的团伙在继续着柬埔寨战争，而北京是“红高棉”的后台。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愿抛弃金边政府，他们知道那会引起很多人民的死亡。他们计划是以西哈努克重返柬埔寨成立联合政府为代价，平息柬埔寨内战。

此时的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政治丑闻而陷入困境，他力图遮蔽真相转移视线，并向美国人民作出更多欺骗。但是美国社会的巨大愤怒和压力，促使美国司法部于1973年3月正式展开调查。尼克松无力再关心印度支那，委托基辛格负责处理柬埔寨事务。1973年2月16日基辛格到北京去见周恩来，他诚恳地说：“我们对（柬埔寨）那个地区没有任何企图，美国没有必要在那里建立基地。外国武装必须撤出柬埔寨和寮国。柬埔寨情况很复杂，我们认为柬埔寨应该举行政治协商。只要能够停火，我们就可以协调出一个让西哈努克成为重要角色的政治局面。但是（柬埔寨）军事叛乱活动一定要终止，否则我们的空军将继续在那里活动，而柬埔寨交战双方将永无宁日。”

周恩来否认中国是红高棉的后台，他兜圈子道：“法国和柬埔寨（内战）双方还维持着关系，苏联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复杂。不仅西哈努克拒绝和谈，还有（红高棉）抵抗力量拒绝和谈。”

基辛格：“我和黎德寿谈过此事，他说河内支持柬埔寨（内战双方）和谈。当然，你和（柬埔寨叛乱者）他们直接接触，应该知道得更多。我们准备与你们合作，找出能让西哈努克维护尊严的方法。”

周恩来：“你已经说明你的意思了，我们也了解了。但是就现在阶段而言，这也许是行不通的。”

在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第二天，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会见基辛格，谈到了美中联合反苏的问题，毛泽东不兜圈子，直接说：“俄国人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他们抢了外蒙古，抢了一半的新疆和满州，……他们还抢走（日本领土）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一个插曲是，毛泽东开玩笑表示要馈赠一些中国女人给基辛格，毛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量少得可怜。你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女人。（笑）……你要我们的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我们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只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也太多了。（大笑）”把女人作为礼物，基辛格揣测是毛泽东性生活郁闷的表现。其实，从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来说，

异想天开总非偶然。

周恩来可能觉得基辛格容易对付，于是加剧扶助红高棉的军事叛乱活动。这使基辛格为柬埔寨和平的努力落空。1973年3月24日，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拒绝了一个由金边政府提议的“和平协商”会议。奇怪的是，这个拒绝声明不是从北京发出，而是由蹲在柬埔寨丛林里的“内政部长”侯荣在致电金边政府总理韩通哈的一封信里所宣布的；而这封信并没有送达金边，却送往北京电台去广播，西哈努克是听了广播后才知道金边政府发出“和平协商”这件事。而北京又借用了西哈努克的名义，声明“美国必须为柬埔寨的战争负起政治责任。”

西哈努克很想了解“柬埔寨抵抗力量”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在柬埔寨干些什么勾当。1973年3月，在西哈努克的一再要求下，北京安排西哈努克到柬埔寨的“解放区”旅行一趟，名为“视察”。中共派遣“新华社”几名记者（眼线）参加了这次“视察”，拍摄了记录片和一些照片。西哈努克在英萨利的陪同下启程，第一站到达河内。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见了西哈努克，提供了十几辆吉普汽车和保卫人员，护送西哈努克夫妇进入柬埔寨。那时印度支那全面停火，“胡志明小道”很安全。西哈努克一行顺利进入柬埔寨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北越的保卫人员即撤回。在那里，红高棉交通员沿途引路，把西哈努克带到森林见到了“新闻部长”胡宁。然后又见到了“总司令”乔森潘和“内政部长”侯荣。纪录片显示，装束着一条方格围巾（红高棉的标志）的西哈努克钻出布蓬吉普车，已等候在路边的乔森潘目光灼灼如贼。西哈努克与乔森潘拥抱。然后他们在525号桩碑那里拍照留念。此时乔森潘侃侃而谈，再次信誓旦旦说他们是为西哈努克而战斗，保证将来柬埔寨的一切权力都归于西哈努克。然后，乔森潘引导西哈努克一行向西行进，抵达暹粒省吴哥附近的“解放区”。柯袍说：“1973年4月西哈努克来了，党中央命令我在吴哥接待他。”事实上，根据西哈努克回忆录记载，“他（西哈努克）是红高棉在那特定时期的俘虏。当他被红高棉频繁拥抱时，他注意到一些红高棉战士在邪恶地折磨着一条狗。”

中国文章还煞有其事地描述：“在吴哥附近的荔枝山（Phnom Kulen），西哈努克第一次在国内主持了内阁会议。会场设在森林中的一间简易棚子里。棚子一边挂着柬埔寨地图，乔森潘等人同西哈努克围坐在一张桌前，讨论着国家大计。3月23日西哈努克夫妇到荔枝山下，参加了在树林中举行的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指战员和各界群众列队鼓掌欢迎西哈努克夫妇。然后西哈努克夫妇、英萨利、乔森潘、侯荣夫妇、胡宁、宋成、波布、乔彭娜莉等人走上主席台就座。西哈努克庄严地发表了讲话。”

事实不是那样。当时环绕西哈努克的只有乔森潘、侯荣和胡宁，他们同西哈努克说话时总是一味闪烁。而且这三人似乎悠闲得很，根本没有繁忙的党军政事务去处理。还有一个瓢脸柯袍总在他们身旁转悠。西哈努克并不知道柯袍就是恶毒的红高棉北部大区的“军事司令”。英萨利露面少，似乎是不屑陪同。乔彭娜莉此时病得已近痴呆，不能出门。宋成晚了几天才到场。波布、农谢等人都顶着个“毛式绿帽”悠闲在旁看着这出戏。西哈努克茫然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他也接触不到真正的柬埔寨民众。

此前，西哈努克一直以为“总司令”乔森潘是红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他无法想象，实际上乔森潘远离核心圈，“他只是个普通的柬共成员”。在《（1号兄弟）传记》里，有一段录影显示：“隆重欢迎西哈努克大会”的会场只是一片森林空地，大约二百名游击队排成方阵，还算严肃。方阵之前有老少丑俊不等的红高棉干部在列队欢迎。西哈努克颈缠方格围巾，双手合十，频频鞠躬，一幅既讨好又不失贵族风格的作派。西哈努克身后几步远处跟随着乔森

潘、侯荣、胡宁等十几个人，一律不三不四，方格围巾和“毛式绿帽”——他们没有戴帽子的习惯，不是把帽子包在头上而是浮顶着，状若扁饼。他们边走边装腔作势地挥手鼓掌，冒充红高棉领导人，他们一定排练过，但装得不像。在欢迎队列的右侧，有 13 个类似闲杂人员的中年男女，他们中有个人，身材粗壮，咀巴半开，肩搭方格围巾，那就是波布。他距西哈努克十步之遥，眯眼注视着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波布面前木然走过，他第一次与他的生死对手近距离地面对面了，但他毫无觉察——他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谋夺国家的红高棉总舵把，更无从知道那人曾在北京隔着幕帘听取过他和周恩来的密谋。

在这个欢迎会之后，波布、农谢、克多恩几人以红高棉地方干部的身份，随从西哈努克夫妇游览当地的庙群。那一天，中共记者为西哈努克他们拍了一些照片，其中几张发表在当年（1973）6 月出版的中国《人民画报》增刊上。“沙洛沙”这个名字唯一出现在这期画报的第 20 页，一张黑白照片显示：在寺庙脚下横排 22 人合影，西哈努克夫妇居中，被乔森潘、侯荣和胡宁左右簇拥。戏演得相当好，西哈努克没有注意到沙洛沙这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地方干部”，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化名是波布。中国《人民画报》在这张照片下说明道：“西哈努克、乔森潘、侯荣、胡宁、英萨利、宋成、沙洛沙、贵敦（注：克多恩）、农谢在荔枝山大菩萨庙前合影”。另一张彩色照片显示：在一个小瀑布前，乔森潘、西哈努克、侯荣、胡宁和英萨利一字排开，摆出笔挺姿势，郑重其事地合影，他们的身后不远处散漫着 5 个随从之类的人，其中有波布和倒背着手的农谢。

通过这次“视察”，西哈努克虽然未了解到“解放区”和柬埔寨内战的真实情况，但他弄清了“解放区”绝不是他的地盘，也没有谁在为他“战斗”。进一步，他察觉到“抵抗力量”是一个形迹诡秘的团伙，有人深藏不露地操纵着这个团伙；乔森潘侯荣胡宁都只是幕布前的演戏者；而北京显然知道这一切，也知道柬埔寨正在发生什么。西哈努克相信那些人就是柬埔寨的“共产党秘密份子”，他感觉到：在柬埔寨本土活动的“抵抗力量”、在北京被操控的“流亡政府”以及中共当局，是三方勾连串通，单单瞒了他，而他成了一个渺小无力的局外人。这次“视察”肯定对西哈努克产生了负面影响，到了 6 月，他在北京寓所里向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爆发出他的恼火和厌恶，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红高棉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天真到那种地步！我十分清楚，等到他们不再需要我时，他们就会把我像吐樱桃核那样吐掉！”他也谈到自己的未来，“我已决定，一旦卖国贼（朗诺、施里马达等人）被彻底打垮，我就退休。我丝毫没有继续掌权的愿望。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都是恶报，这意味着我在无用的努力中浪费年华！”

中国文章也提到，在“视察”中，西哈努克根本不相信现在这个组织诡秘的“抵抗力量”，会是乔森潘、侯荣、胡宁这三个夸夸其谈者所创建和控制的。西哈努克长期治理国家，有着政治经验和组织技能，深懂公开社会也懂地下社会，他熟悉乔森潘三人，他无法相信只会巧言聒噪的乔森潘具有非凡能力，还有迅速勾搭上中国的神奇才干。据说，西哈努克试探乔森潘，“你们既然有如此的能力和才干，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时你们并没有过这种表现？”乔森潘狡辩道：“如果我们那时为您努力工作的话，那将有助于您变得更强大。这样，革命岂不断送。”这个解释使西哈努克对如此“策略”恍然大悟。设若这些“对话”是真实的，那么它也只表明乔森潘惯于“鬼话人说”，而西哈努克用“人话鬼说”应对之，这并不是引人入胜的智力交锋，只是可悲的掩耳盗铃。

1973 年 4 月 11 日西哈努克回到北京。4 月 12 日周恩来为他举行了接风宴会，邓小平借此宴会亮相，宣告了他被重新起用。有中国人说“（文革中）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邓小平

复出的消息，我们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国家肯定有毛病，因为到处墙上的‘打到刘邓司令部’的黑色大字标语还历历在目。”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起用邓小平来接管国家政务，以此制衡周氏，使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具有了浓厚的戏剧性。由此可推测毛泽东以前没有彻底结束邓小平，并不是疏忽。而李德生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丢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头衔，被撵出北京。同年5月毛泽东把年仅38岁的上海市“工人造反”头目王洪文直接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跃周恩来之上，作为对接班者的筛选和对周恩来的牵制。同时，毛泽东把在“文革”中受益的地方干部华国锋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社会改造的一部分，粗通文字的大寨农民陈永贵也被毛泽东指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头上包着一方白肚手巾（中国北方农民装束）频频在国事场合以国家领导人露面，参加政治局会议无论谁讲什么，他都赶忙热烈鼓掌，既无知又神气活现，在很长时期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笑柄。

(11/28)周氏出局

1974年，红高棉有些领导人陆续地半公开了身份，例如农谢、宋成。但波布继续保持诡秘并不断换用新化名，他的身世、地位、经历、姓名、年龄和故乡，仍然秘而不宣。普通的柬共干部对党的领袖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人民了。所以国际上习惯用“逃犯党”来形容柬共特征，当然国际上还毫无所知红高棉与柬共在微妙之处并不是一回事。

而在美国，发生了国会与尼克松的对抗。长期以来，尼克松对于国会的掣肘不予理会，自行其事，深为国会所恼。1973年5月10日美国众议院决定阻止美国空军帮助金边政府反击红高棉的叛乱，这是国会首次阻碍一个具体的美军行动。基辛格再次寻求政治解决来挽救柬埔寨和平。5月27日基辛格向周恩来提出新的柬埔寨和平方案：1、军事就地停火；2、朗诺出国流亡，给西哈努克让出政府首脑位置；3、金边政府公务员继续留用。基辛格还打算亲自与西哈努克直接面谈。

此时西哈努克已经知道红高棉并非善类，因此他极为赞同基辛格方案，期待与美国谈判。6月3-4日欧洲媒体广泛报导了西哈努克试图通过第三国与美国接触，美国国务院证实了这个事实。但是西哈努克的愿望遭到周恩来和英萨利的联手阻碍而无法实现。农谢谈到了这个情况，他公开说：“敌人——美国、法国、苏联，都试图拉拢西哈努克谈判，西哈努克也想脱离我们。特别是在1973年北越与美国达成和平协定后，他也想与美国谈判，但是我们让他明白了：他只能继续斗争到最后。”

6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美军从同年8月15日起停止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军事行动。尼克松只好签署命令美军在印度支那的全部行动截止于8月15日。基辛格的柬埔寨和平计划艰难地承受着共产党人和美国国会的两面阻挠。但基辛格不放弃努力，他直到1974年底还尝试透过法国与西哈努克搭线商谈，以挽救柬埔寨和平。可是中国竭力阻挠，甚至拒绝发给法国使者前往北京的签证。基辛格是外交行家，经常对付国际无赖，但他还没有见识过周恩来这样的极致。事实上，此际周恩来的自然寿命和政治生命，因癌症和毛泽东发动的“批孔批儒”（实为批周）政治运动，已经来日无多了。

美国政府受限不能使用军事力量帮助金边政府，这个情况被红高棉认为是有机可乘。波布、宋成发动了1973年的“全国总攻”，主要形式是机动作战。红高棉攻势如下：

从 1973 年 6 月开始，索平部队攻击金边以东的 1 号公路、湄公河的上游和下游区域，塔莫部队攻击金边以南的 3 号公路和 4 号公路区域，三巴特部队攻击 5 号公路和 6 号公路之间地区、巴塞特（Baset）地区和安隆勘（Anglong Kan）地区，克多恩-柯袍部队集中了 3 个旅进攻磅占地区。6 月 29 日温威的“特别大区”部队围攻实居省城。7 月 4 日塔莫部队再次切断 4 号公路的交通。8 月 12 日克多恩-柯袍的部队占领了金边北面的城镇斯昆（Skoun）。7 月 17 日美国国防部承认既往从 1969 年 3 月起持续 14 个月，美军对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区域的越共基地进行了约 3,500 次空中轰炸。美军在柬埔寨的轰炸，引起国会对尼克松政府的愤怒抨击。8 月 15 日美军按期停止了在柬埔寨的轰炸。8 月 16 日柯袍部队攻击柬埔寨第 3 大城市磅占城，守城柬军击退红高棉，保卫了磅占城。

8 月 26 日塔莫和三巴特的部队分别切断了 4 号公路和 5 号公路的交通。9 月 11 日北部柬军在磅占城附近激战 7 天，重创克多恩-柯袍的部队。9 月 18 日南部柬军击败塔莫部队，夺回 4 号公路。10 月 4 日磅占城战役以柬军胜利而结束，克多恩-柯袍的部队溃败。10 月 13 日南部柬军在 3 个星期的战斗中粉碎了塔莫部队的围攻，重新控制了由金边到磅逊港的交通，恢复了由海运而来的供应。

至此，红高棉的“全国总攻”以严重损失而失败，此后一年之内它无力再发动较大战斗，以致波布等人不得不向北越求援。柬共-越共历史关系档案也提到“红高棉在 1973 年的军事行动有可观的伤亡损失”。红高棉打不赢战场，就使出恐怖手段，10 月 31 日他们混进金边把手榴弹扔进菜市场的人群，炸死 8 个市民。11 月 6 日红高棉在金边西南 35 公里处杀死了约 700 名逃难的平民。高棉的“全国总攻”失败，也引发了克多恩与柯袍的决裂。克多恩接管了柯袍的军事指挥权，而柯袍不断指责和贬低克多恩，他说：“我们被打败后，克多恩让敌人重获公路控制权。党中央在 1974 年 7 月让我从当前的位置辞职，让克多恩去指挥我的部队。”

在金边，朗诺和施里马达等人的分歧继续扩大。朗诺甚至软禁施里马达。在美国的干预下，朗诺与施里马达等人达成了合作。1973 年 3 月 22 日施里马达再次批评柬埔寨的共和政体“最终不能幸存，因为它没有被人民所支持”。1973 年 5 月 6 日英丹出任金边政府总理。12 月 26 日隆波烈再次出任总理。

红高棉损失严重，不得不寻求外国的支援。北越文件说“由于 1973 年的可观的军事伤亡，红高棉显然没有力量攻击金边。1974 年初波布等人隐瞒了对河内的敌视，开始再度赞扬越共与红高棉的战斗友谊和团结。波布原本寄希望于中国的军事援助，然而中国对他的全部请求都充耳不闻。”北越外交部副部长也披露：1974 年初波布为了拿下金边而四处寻找军事援助，“但是中国没有提供援助。然后波布走近了北越。”波布为取得河内的支援，不得不对北越变得友好。1974 年苏联驻河内使馆的一份报告也提到柬共-北越关系的显著改善。1974 年 3 月份波布给黎笋写信，发誓“我们的所有胜利，都与越南共产党兄弟的帮助是无法分开的。”农谢也向北越说情。在遭到重大的军事失败后，波布没有引咎失去权力，柬共党内也没有要求他下台的尝试。奇怪的是，“河内此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柬共的最高层人事，以使柬共向河内倾斜。也许河内正在全力准备对南越发动最终的战争，而农谢主动地欺骗了河内。结果，在 1974 年初河内盲目地同意给红高棉提供军事援助。”事实上，波布正在加紧切断柬共与河内的关系，也“决裂了柬埔寨人与越南人的传统团结”。

范文同把柬共和北越之间的关系演变，告诉了苏联大使。在 1973 年 4 月 14 日的一次

会话时苏联大使提醒范文同，“在越南与柬埔寨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中国的阴谋”，范文同答道：“我们知道存在一些中国计划，要制造印度支那人民之间的不合。然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制那些计划。”为挫败“中国计划”，苏联表达了对柬共的接触愿望：“我们需要通过他们更好地了解柬埔寨的现实状况。”同年6月，苏联大使请河内转递一份苏共中央的信件给柬共中央。

但是，河内暗中阻挠了苏联对柬共的接触。北越人一直在告诉苏联方面，乔森潘是“柬共最高领导人”。苏联方面并不清楚乔森潘在柬共的实际层次。而北越方面知道波布是红高棉的实际首领。苏联官员若干次试着在河内与乔森潘、或者在北京与英萨利单独接触，但由于河内或北京的阻挠都没有成功。1974年5月28日北越外交部根据苏联大使的请求，派人向途经河内的乔森潘提起了苏联的接触建议。显然，乔森潘什么也不能决定，因此莫斯科和柬共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发生突破。这些文件使人惊讶地了解到，北越人出于独立意识和防范心理阻止了莫斯科接触柬共。北越人不愿苏联人插手柬共，因为中共的插手已使河内后悔莫及。莫斯科试图接触柬共，是苏联实现在东南亚与中国竞争战略的一部分，但莫斯科没有估计到河内、柬共年北京之间的三角关系是多么复杂。事实上，这是北越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又一个重大错误。如果北越把苏联引入到与中国竞争柬共的政治角逐中，苏联凭借实力和政治智慧很可能在角逐中击败中国，其后果可能是波布下台（亦即红高棉下台）、柬共摆脱中共的影响而不致越出正统共产党模式的常轨。若如此，则不仅北越受益，更使柬埔寨受益。实际上在那几年里柬埔寨有几次机会可以躲过日后的“浩劫”，但最终没能躲开。

为什么在1974年初，中国对波布的求援会充耳不闻？原因是1973年底到1974年3月，周氏遭到“批周”清算，被迫暂停了日常工作。中国外事部门和负有“输出革命”任务的系统都属周氏统管，没有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和运作，那个系统对波布的请求就无法自行其是地做出反应。

从1974年初，毛泽东接管了红高棉事务。在北京，西哈努克和英萨利这两人是毛泽东最有兴致、谈话最多次的外国人。这可能表明毛泽东对柬埔寨怀有特殊的关心和兴趣。1974年3月中旬，周恩来血尿加剧，癌症扩散，体质恶化，施实手术已是唯一的治疗方案，医疗组在焦急等待着医疗指示和手术许可。

这个月底（1974年3月），红高棉派遣乔森潘来到北京，会合英萨利向中共求援。4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英萨利、乔森潘、西哈努克。病倒的周恩来没有参加。毛泽东允诺全力支援红高棉，还对柬埔寨局势指示道：“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需要10万军队。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5月26日中共以国家名义宣布对红高棉给予无限制的军事援助。中共文件承认：这时每月的“中国供应红高棉的物资由几十辆卡车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卡车”，包括重型火炮。一般来说，红高棉那种轻步兵武装，在战时平均每人每天需5公斤弹药补给。红高棉总数约5万人，其中有战斗活动需要补给的数目大约1万人（1975年红高棉几个大区合力围攻金边的兵力也只是2万人）。因此，原先几十辆卡车的补给量即可满足红高棉战斗的需要，而现在1,500辆卡车的补给量超过了10万战斗人员的需要。由此可知中国确实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10万军队”设想在支援红高棉。把这样庞大数量的战争物资源源运到一个小国里，意味着那里将会发生怎样的战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见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红高棉占领金边后的政体建设问题。以前，周恩来与红高棉或西哈努克的会谈，总是着眼于谋取政权的细节上，而毛泽东的兴趣却落在

红高棉夺国后的体制上。这是毛、周两人在对待柬埔寨事务上的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日后的事实证明毛的这种兴趣并不是偶然的无心的，而是有着特定目的和深远用意的。

在会见中，英萨利说“柬埔寨革命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它具有自己的特点。（对于毛泽东思想）过去我们只是看毛主席的书，现在正要通过亲身经验来体会。”可见，英萨利在透露：红高棉的“革命”将具有特别之处，而特别之处来源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泽东对此很高兴，会见中还向西哈努克说，“我还是劝你（西哈努克）读一些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近几年来西哈努克博得毛泽东的好感。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表示他要保护西哈努克。毛用手指着西哈努克，向英萨利和乔森潘问：“你们对他（西哈努克），是要打倒，还是要团结？”在座的中方官员以为毛氏在风趣，都笑了起来。但毛泽东似乎是在认真地预设某些事情。乔森潘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西哈努克则含有深意地强调：“毛主席指的是（柬埔寨）将来的事。”在座者于是又都笑了。但毛泽东抬手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要他们直说自己是代表柬埔寨共产党的，不要躲躲闪闪，而西哈努克是代表另一派（君主派）的。西哈努克表示：“解放以后，我们（君主派和共产党）之间也不会吵架。因为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巩固革命成果”；“国内权力我已经转交（共产党）。我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内战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掌权是完全正常的。”毛泽东赞许道：“这样好嘛。”西哈努克强调：“我只是国家元首（名义），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毛泽东爽朗道：“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毛泽东念念不忘林彪，还告诫柬埔寨人“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

此次会见表明：在红高棉事务的处理上，周恩来被排挤出局了。会见后，毛泽东命中方部门款待英萨利乔森潘等一伙人在中国四处游玩。西哈努克则成了甩货，在北京住所里冷清度日。例如，中国四川省官方记载：“1974年4月1日，以柬埔寨王国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为团长，特别顾问英萨利为副团长的柬埔寨政府代表团一行17人，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访问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市革委会党政军负责人以及2,000多名群众到机场迎接，并举行欢迎宴会。”直到5月下旬，乔森潘途经河内返回柬埔寨，在河内他收到了北越转达的苏联接触建议并带给红高棉“党中央”。迄今不知道波布对苏联建议有什么反应。

有趣的是，在北京，真正具有华人血统的柬埔寨人在极力回避自己的华裔血统，而没有华裔血统的柬埔寨人则生硬攀附华裔关系：例如英萨利对自己的华裔血统从来闭口不提；而西哈努克则反复提醒中国人，他有着“华人血统”，他夸夸其谈“我的曾祖母之中的一个（注：西哈努克曾祖父莫尼旺国王有60位妻妾嫔妃，她们都算是西哈努克的‘曾祖母’）是华裔高棉人（Chinese Cambodian），我的皇后妻子的家族（注：莫尼克亲戚）也有血统与华人连接。”

在柬埔寨，1974年2月红高棉使用中国提供的榴弹炮轰击金边城郊，杀死200多个平民，毁坏房屋使1万多名平民无家可归。3月3日北部的柯袍部队攻击位于金边西北38公里处的欧东镇。3月6日柬军在金边和各省城紧急征兵，使柬军扩充至4万多人，但新兵严重缺乏训练和武器弹药。3月18日柯袍部队攻下欧东镇并杀害了全部的守军战士。若干守军战士在欧东陷落时亲手杀死自己的家庭成员，然后自杀，以避免被红高棉俘获。

资料记载，此时的红高棉显示出本能的残忍凶恶，柯袍和塔莫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柯袍部队倾巢出动时，后方空虚，“解放区”的几千个农民乘机逃往磅通城郊区的柬军控制区。逃出来的农民诉说红高棉随意处决乡民是很普遍的事，“我们被强迫为红高棉工作，很艰苦，但不给任何报酬”。而在“解放区”，红高棉对群居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拆散”，甚至为此向占族（Chams，穆斯林）渔民开火。柯袍部队在占领了欧东后，就破坏该城，杀死所有的教员和公务员，一个农民说：“4万（欧东镇的）居民被驱赶向各个方向，红高棉在到处烧民房。”无法忍受红高棉政策的柬埔寨乡民不断逃离“解放区”，以致金边的人口膨胀到200万人以上。美国不得不向金边空运大米等民用生活物资。1974年4月1日由朗诺、施里马达、隆波烈和费南德将军（Sosthene Fernandez）四人，组成柬埔寨最高行政委员会。4月10日柬军在贡布省击溃了红高棉四千名部队对贡布城的围攻。战争逼近金边，局势动荡，金边学生也骚乱闹事。6月29日柬军收复欧东镇。6月30日，美国对柬埔寨的物资空运因期限而正式结束，从此柬军的补给只能靠南越政府通过湄公河的水运，而中国则大量增加了供给红高棉的军火和金钱。据红高棉的文件说，中国充足供给红高棉的装备有大量的机关枪，有20MM、60MM、80MM迫击炮和火箭炮，还有105MM榴弹炮和120MM加农炮。这些火炮是中国仿制的苏联武器，其中威力最大的是120MM加农炮，使得红高棉能在十公里外轰击金边居民区，而柬军却没有反击的弹药。中国还供给红高棉军服，那是一种不分男女的黑色衣裤，后来红高棉即以“黑衣兵”闻名于世。红高棉的生活物资也由中共全包供应——从轮胎底的胶鞋到无字盒装的香烟。波布就是在这个时候（1974年6月底）决定对金边政府发起“大决战”。

8月6日红高棉的炮弹打进金边市。从金边实地拍摄的记录片所见，大批柬埔寨人民流离失所，背着孩子，赶着牛车逃难，神色仓皇惊恐；受伤的平民或肢体残缺，或胸腔翻开，或肠肚横流，血迹斑斑，伤口用肮脏的布条缠裹或纸团填塞；孩子被火焰灼伤而半死不活；周围全是不停的嚎哭和痛苦呻吟；城外野地里许多倒毙的死尸横七竖八。种种苦难情景，令人不忍目睹，感觉恐怖、悲伤和恶心。

在柬埔寨，1974年8月26日暹粒城柬军出击，赶走柯袍部队重获吴哥窟（Angkor Wat）。10月9日朗诺再次呼吁红高棉对话。红高棉置之不理并围攻金边北郊两个星期。11月30日联合国大会呼吁柬埔寨冲突的各方在国际调解下展开谈判。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令”，再次限制美国政府对金边政府的帮助。

(12/28)金边危机

1975年1月，红高棉再次“总攻”金边。除了中国，北越也给予红高棉以重要支援，后来波布感谢北越“在1975的旱季期间的最后攻击时，当我们面临了可观的障碍时所给予的特殊帮助。”据说红高棉参加“总攻”部队在8万人左右。红高棉的一份军事文件表明，1975年底红高棉整编后还剩有72,248人的部队，另有数量不少的红高棉“解放区”地方武装。由此估计在1975年初红高棉武装总计应该不少于12万人。在装备方面，红高棉从中国获得大量火炮，还有装甲车、轻型坦克、大批车辆以及充足的燃油，在兵力、装备、补给和战力上具备了大规模作战的条件。但红高棉仍然缺欠正规作战的能力。围攻金边的主力是克多恩的部队。索平的部队、塔莫的第13部队、温威的第25部队也参加了围攻。柬军在金边的兵力约3万人，守卫金边不成问题，但柬军补给困难，持续战力被削弱。红高棉首先攻打

奈良镇，但未能攻克。奈良镇位于距金边 40 公里的湄公河边，是连接金边和西贡的水运要地。1 月 26 日最后一支南越政府的弹药运输船队冒着红高棉的猛烈火力，经湄公河抵达金边。随后湄公河的水运被红高棉切断了，这是因为中国提供给红高棉一种阴险武器——漂浮在水面之下的磁性水雷，让红高棉能够在湄公河里大量布雷，封锁河道。1 月 29 日红高棉的“阴险水雷”炸毁了 2 条韩国的燃料油轮，泄漏的燃油沿河道燃烧 5 公里之远。

此后，金边的补给（包括食物、燃料和弹药）只能依赖空运。红高棉对金边不断发射炮弹，导致许多平民的死亡。柬军在金边周围构建了许多防守工事，尽管他们缺乏弹药，但是他们藐视红高棉的进攻，决心战斗到底。虽然，至 1973 年那时，85% 的柬埔寨领土都已在红高棉的手里，而柬军几乎失去了攻击能力。然而，在美国的空运协助下，这个军队还顽强地与红色高棉继续作战了两年多。一位美国观察员，他通常蔑视金边政府，但他被柬军战士的决心所感动。如果柬军有充足的补给，他们不难粉碎红高棉的“总攻”。但是现在，柬军战士只配发 20 粒子弹，车辆只有 1~2 加仑的燃油，全部飞机也因油料的缺乏而无法起飞。

在南越，这时也发生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大变局，起因是 1975 年 1 月 7 日越共再度发动军事袭击，复燃战火。1975 年 1 月 29 日，美国白宫内阁会议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减少对南越和柬埔寨政府的物资援助，其结果是，南越将在今年的春末沦陷，金边也将在今年 4 月份沦陷；金边的战士们如此窘迫，他们正在限量使用手榴弹抵御火力强大的敌人。福特总统为此恳求国会批准向南越提供 3 亿美元、向柬埔寨提供 2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白宫内阁会议强调：必须理解这些援助只是用于补充弹药、燃油等必要的物资；而如果美国抛弃对这两个小国的承诺，将严重打击美国的国际公信力。但国会不为所动。福特总统还为柬埔寨呼吁道：“到目前为止，美国总是在任何朋友的整个最困难时期里，坚定地站在朋友一边。现在，美国难道会在这个亚洲小国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关头中抛弃它吗？”而国会的简短答案是：正要如此。

国会并非无理。国会的考量是：美国若仍陷于印度支那的泥潭之中，将持续引起美国的国力衰退和人民反战，其远期后果是：当美国国力衰退至某一程度时，便无法再支援西欧盟国；一旦美国国力落后于苏联阵营时，美国将失去海外基地而退回本土；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抵抗阵线就会土崩瓦解。

2 月 2 日红高棉攻击金边近郊，杀死 18 个平民。2 月 6 日红高棉的火箭弹打进金边市边缘的一所小学校，炸死 18 个小学生和 4 个教员。2 月 17 日柬军试图打破红高棉对湄公河的封锁，未成功。2 月 21 日在金边市和马德望城分别爆发了高棉学生抗议中国插手柬埔寨内战的示威和骚乱。这时刻，西哈努克秘密地试图通过河内与法国搭线，未果。2 月 23 日美国防长施勒辛格（Schlesinger）警告：如果柬埔寨因得不到补给而陷落，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灾难。2 月 25 日福特总统和内阁成员向国会解释：金边只有不到一个月的限量弹药供应，除非得到及时的补充，否则柬埔寨将无法幸存。柯袍也证实：“敌人连食物也缺乏。结果是我们轻易地赢了他们。”

攻克金边有望，1975 年 2 月 24-25 日红高棉“党中央”在“大本营”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波布宣布了接管金边政权后准备实行的令人震惊的“政策”，并命令高度保密。有限披露的消息仅仅是“这些不可思议的政策引起了很活跃的争论”。因而，柬共中央委员会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波布的“不可思议的政策”未被认同和接受。

2月26日红高棉再攻欧东镇。2月27日美国从西贡调集大米、煤油、药品等17,500吨，向金边空运，以减轻金边市民的生活负担。逃难的平民大量涌入金边，其中华人的比例相当高，金边人口膨胀到250万。金边市民不愿继续忍受战争苦难，迫切盼望安定的日子，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很幼稚，他们认为如果政府不能消灭红高棉，那么就应该投降，结束战争，共同迎接柬埔寨的和平未来。

3月5日金边的波成东机场已处于红高棉的火炮覆盖范围。3月6日柬军撤离奈良镇的滩头阵地，这是他们在湄公河的最后据点。3月11日朗诺辞去柬军总司令职务，3月12日沙索萨康（Sak Sutsakhan）将军继任柬军总司令。同日，在华盛顿，白宫内阁会议最后一次讨论南越和柬埔寨的局势。会议认为，金边政府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军事状况，如果美国不能立即给予援助，金边将在一个月后彻底没有了弹药；难民仍在继续涌入金边，美国必须给金边紧急空运大米、燃油和弹药；现在柬埔寨的幸存唯一地取决于美国的空运；但金边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还是惊人地稳定；只要共产党认为自己能打赢就从来不肯谈判，只有军事均势才会带来谈判机会；如果共产党接管柬埔寨，将发生针对人民的清算。福特总统无奈地宣布：“自从我成为总统，我已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在风雨飘摇中把美国的道义信念，诚实地坚持下去。

3月13日，美国国会投票决定全部终结对柬埔寨和南越的一切帮助。南越和柬埔寨陷落于共产党之手已无可避免。这消息即刻传遍全球，几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黎笋、范文同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英萨利，也都知道了。对此早有预料的东南亚诸国，仍然普遍感到震惊。此后，美国政府通知驻金边的使馆准备撤离柬埔寨，并通知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南越等盟国撤离它们在柬埔寨的人员。

时隔两天，1975年3月15日，英萨利突然结束他在北京的“政治留学”，匆忙离开北京，返回柬埔寨的红高棉“大本营”。据中共“新华社”报道，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委派他在此时期最器重和最信任的纪登奎，率五个中共部长送行英萨利乘专机经河内返回柬埔寨“大本营”。中共《人民日报》不寻常地以大字字体在第一版刊登“新华社1975年3月15日讯：柬埔寨王国政府特别顾问英萨利，今天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到机场欢送柬埔寨战友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外贸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经贸部副部长石林、总后勤部副部长孙洪珍等人。”这些送行的“部长”们代表着中共从政治、外事、军事、物资和金钱上对红高棉的全方位支援。在这三天之内，从美国、北京和英萨利回国的一系列急剧的相继变化来看，柬埔寨将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

十分关心柬埔寨“革命”的毛泽东，把英萨利当作一个有特殊价值的“战友”并透露着显著的关注。3月18日英萨利抵达红高棉“大本营”。

3月17日美国大使馆开始撤退在柬埔寨的国际人员，法国使馆的大部分职员也离开金边去了曼谷。3月19日金边的学生们示威，要求朗诺下台，希望以此满足红高棉的停火条件，反映了金边人民对停止战争的渴望与幻想。在红高棉方面，宣布了朗诺、施里马达、山玉成、英丹、隆波烈、郑横和费南德将军等人在内的“死亡名单”。此时朗诺情知越柬寮三国的陷落已无可避免，4月1日朗诺辞职，终于离开柬埔寨，流亡海外。国家议会主席苏韩魁（Saukham Khoy）担任临时总统。同日，红高棉攻占了奈良镇。事实上，红高棉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决战，它的“总攻”的全部战绩，只是经过反复争夺，占领了欧东、奈良两个城镇。金边、全部的省城和其它城镇依然在柬军手里。但柬军的弹药极为短缺，全部军火都

仅仅存在于士兵们的枪膛里，但他们表示即使肉搏也仍能击退红高棉的进攻。红高棉的最大优势是对手的弹尽粮绝。虽然金边政府还在艰难地支撑战争，但此时南越遭到北越入侵，危在旦夕，也导致柬埔寨战局走向终点。

1975年3月初，北越撕毁“巴黎和平协定”，出动百万军队大举入侵南越共和国。1975年3月3日北越“人民军”第2师攻陷南越的6个县，并截断交通。3月17日北越“人民军”第320师占领了南越的邦美蜀（Buon Me Thuot）。同日，在未做周详准备情况下，南越总统阮文绍突然向全国宣布撤退行动，这使政府军毫无准备的时间，造成混乱，战局急速恶化。3月22日北越“人民军”攻陷广义省（Quang Ngai），截断了政府军的退路，并驱赶百万南越难民拥塞道路，迫使政府军改道涌向岘港（Da Nang）。3月27日岘港军区司令擅自逃亡，指挥系统自行瓦解，岘港10万守军怨气大涨，于3月30日未做抵抗便向北越“人民军”投降。南越第二军区也放弃了中部地区后撤，使西贡以北无险可守。南越岌岌可危。至4月7日，南越的大部分省份及省城，皆未经战斗而先后放弃。在这种态势下，共产党席卷印度支那已成定局。无论金边守军的抵抗多么顽强，也毫无意义了。“高棉共和国”势难保全。

1975年4月4日，波布在红高棉“大本营”召集高度保密的会议，柬共高层干部重聚，再次讨论波布提出来的在夺取金边后将实行的“新政策”。英萨利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说明这个人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包括胡宁在内的绝大部分柬共中央委员都不再反对“新政策”，只剩“内政部长”侯荣、东北大区柬共首领尼沙兰、东部24号分区（柴楨省）柬共首领卓乌克三人还坚持反对“新政策”。但他们已不能阻止“新政策”的通过。侯荣与胡宁同是柬共中央的纯华人，他们都持有中共观念，并排斥苏式的正统共产党理念，但两人之间有细微差别：侯荣持有类似周恩来式的保守立场，胡宁持有毛泽东式的激进立场。凡是中国“文革”的做法胡宁都赞成，而侯荣不这样。乔森潘地位低卑，不能参加会议而对“新政策”一无所知。柯袍远在西北部暹粒地区，未能前来参加“新政策”会议。

1975年4月4-10日美国驻金边的使馆人员开始撤退。4月7日红高棉部队出现在波成东机场北面7公里处。4月8日金边政府总理隆波烈提出了一个包括将政权转让给西哈努克以换取柬埔寨和平的计划，这也算是最后努力，但又以失败告终。4月12日美国使馆用直升飞机撤离了最后一些外国人，临时总统苏韩魁也跟随着撤离了。隆波烈总理、韩通哈副总理、沙索萨康将军和国家议会主席等7人组成“柬埔寨最高委员会”，来维持国家运转。4月15日红高棉开始试探地攻击金边的防卫主阵地和波成东空军基地，还攻击了金边东面、西面和北面的几个镇，但未成功。

金边郊区的战斗趋于激烈。马利临（Sarot Marilin）的证言是：“1975年4月15日下午，一些难民和朗诺战士（柬军）走过我们的房子，说‘他们（红高棉）来了’。从茶胶省逃来的一位中年女士告诉我母亲，‘在解放区，人们被强迫日夜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一旦他们发现政府职员、稍富裕的人或是战士，就全部杀死。如果他们问你，你不要告诉你的真实身份！你就说是工人或三轮车夫。’于是，我母亲嘱咐我们装聋作哑。傍晚，柬军轰击红高棉阵地。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战斗凶猛。红高棉的枪弹象下雨一样落在房子四周，他们的一枚B-40火箭弹打中房子后面的灌木丛，震耳欲聋；另外一枚火箭弹打中邻居的房顶，火焰吞没了那所房子。天空象白天一样明亮，红高棉猛烈射击，子弹打在房前。我们用桌子和椅子挡子弹，躺在后面。红高棉又朝我们房子开火。可怕的尖叫。我流血了，衣服都湿了，我母亲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母亲忽然叫道‘他们进来了！’我姐姐惊恐地离开了胸膛中弹的她丈夫。两个红高棉冲进来，一个用枪指向我，我惊骇地高举双手。他对我叫喊道‘你是（朗

诺的)战士吗?’我回答‘不是!我是个学生。’我母亲脆弱地喊‘快跑,儿子,快跑...’我急速跑出去。外面有一些穿黑衣的红高棉,带着枪,叼着香烟。我看见一个红高棉用枪指着母亲叫‘你想要你的命还是你的包裹?’母亲扔下包裹哭着哀求。红高棉丢下我母亲,闯入我们的房子。天亮后,我们逃到一个树木茂密的地方。几千个难民匆匆在路上逃难,一些人拖着他们亲人的死尸,要寻找一处理葬。在大约上午9点,我们继续前进,我姐一直在哭泣,她已经没有更多的眼泪了。红高棉看见了我,忽然追上来,也许他们认为我是朗诺战士。我穿过稠密的人群逃走,一个女人把我拉进她的房子,我这样才逃离了死亡。许多朗诺战士和百姓的死尸乱躺在道路上,还有一些被红高棉用刀子剖开肚子的活人扔在路边,惨嚎等死。一个战乱不堪的国家。”

(13/28)金边陷落

4月16日金边政府做出最后的考虑:放弃金边,把政府迁移到西北部马德望省。柬军将领表示尽管缺乏弹药,但军队将以徒手肉搏来保卫金边。尚在金边的美国大使约翰·迪安(John G. Dean),为金边政府的重要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包括施里马达、朗农、隆波烈、韩通哈等几百人,调集飞机安排最后的安全撤离。金边政府的大部分重要官员之中的196人已被撤离到了曼谷。但施里马达、隆波烈、朗农和内阁多数成员,决定留在柬埔寨。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被红高棉列入了死亡名单,他们还是拒绝了撤离,他们选择与柬埔寨百姓共享命运。迪安大使为他们安排的撤离行动不得不拖延等待了几个小时,期望他们改变主意。这时,一封施里马达的亲笔信送到了迪安的办公室。

施里马达以漂亮的法文写道:“亲爱的阁下:我真心感谢你提出的为我的自由而撤离的建议。但是我不能如此懦弱地离开柬埔寨。对于你的伟大国家,我从来不曾片刻相信它会轻易地抛弃一个已经选择了自由的民族。你们拒绝了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再为自己国家做任何事情了。你们撤离这里,我真诚希望你们的国家在蓝天下幸福快乐。但我将在我深爱的祖国里死去。尽管死亡是可怕的,但我们所有的人既有出生,就必有死亡。我的错误仅仅是深信了你们国家。阁下,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的诚挚敬意。施里马达(签名)”

迄今已经五十年了,这封信中的“爱国主义”的震撼力,仍然强烈得令人不忍读。施里马达、隆波烈、韩通哈等人绝不向恶暴示弱,他们从容不迫、高贵地面对了恐怖和死亡。柬埔寨的千年历史造就了这样几个民族勇士,使高棉民族获得了世人的普遍崇敬,柬埔寨人有理由以他们为自豪。迪安大使把施里马达的亲笔信转交白宫存档,此信已成历史文献。后来迪安和基辛格各自把此信收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基辛格的回忆录在关于柬埔寨的章节上,特别令人心碎地写道:“使我们感到惊讶和耻辱的是,他们(金边内阁成员)大多数都拒绝了撤离。”一天之后,红高棉进入金边,包括施里马达、隆波烈、韩通哈、朗农等人全部被红高棉杀死,以身殉国。基辛格说:总理隆波烈是他的好朋友,总理被红高棉残暴枪杀,每忆及此基辛格总深感痛苦。施里马达被红高棉捆绑和枪击胃部,然后被扔在一间小屋子里让他在创伤的折磨下死去。他被洞穿的胃部不断冒出血水和胃酸,强烈腐蚀着腹腔,内脏尽皆溃烂,他历时3天之久的极度痛苦而身亡。这个情况被在金边的南越特工获知,又被美国驻西贡大使馆收集并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基辛格从该报告中注意到,施里马达被射穿胃部,没有医疗和护理,遭受3天的痛苦而死去。基辛格写道:“施里马达在3天极度痛苦后死亡,他对自己民族的遗赠是,提示了红高棉后来对至少百万同胞的可怕的种族屠杀。”西索瓦?施里马达王子,这个刚毅正直、壮志难酬的政治家,是高棉民族历史上不多见的真正贵族。

而在北京避难的西哈努克王子，显然不是。

1975年4月16日下午2:30的白宫内阁会议认为：美国拒绝帮助南越，但苏联和中国在帮助北越，造成了局势的失衡；而在援助问题上抨击声调最高的（美国国内）批评者们，正是以前大力鼓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那些人。南越和柬埔寨的陷落，最终结果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怀疑和对美国的寻衅，这将对全球诸国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金边，尽管许多柬埔寨政府领导人被标记在红高棉的死亡名单上，但他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决定留下来。基辛格宣读了施里马达写给迪安大使的那封信，与会者皆默然无语。然后，福特总统感谢基辛格等人在一个艰难时期为南越和柬埔寨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然后他无奈地说：“历史将证明我们判断的准确性。”

从柬埔寨传来的情况显示，金边还算稳定。但在波成东机场的北面，红高棉正在推进。4月16日红高棉攻击金边郊区的塔克毛镇（Ta Khmao），许多民房起火燃烧。战斗区的人民纷纷逃进金边。当天晚上，金边政府领导者和将领们进行了彻夜讨论，接近天亮时，他们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1975年4月17日黎明前夕，一个让柬埔寨永久铭记的历史时刻到来。经过一夜的讨论，隆波烈等人感到南越局势的快速恶化使金边政府完全没有外援可以指望，尽管金边和各省城不会很快被攻破，但坚持战斗也只能使人民继续遭受战争苦难，使国家更深地糜烂而无补于大局。人民百姓也担心金边争夺战会伤害到自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避免金边毁于战火观点趋于一致，遂集体决定放弃战斗。清晨7时左右，金边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战斗，允许红高棉接管政权。就这样，艰难走向自由之路的“高棉共和国”，灭亡了。

金边和平易手。许多资料证实：“4月17日早晨，金边政府命令其所有的部队停止开火，不到2个小时，红高棉进入了金边”；“4月17日早上，广播里宣布，政府军队停止战斗，白色标志的升旗将是他们停止战斗的信号。逃进金边的那些难民，又慌忙离开金边。在早上9时后，红高棉在一个市场（Chba Those Ampeou）附近沿着街道试探着进入了金边。”柬埔寨各省城也在早晨接到了金边的停火命令。红高棉陆续开进各省城，至此柬埔寨全国沦陷。只有马德望城的守军拒不投降，有三分之一的马德望城守军整队携枪开往西部的柬埔寨边境森林，他们宁肯在丛林里自生自灭也不愿投降。后来这些逃亡者加入了在柬埔寨边境活动的“自由高棉”队伍。马德望城剩下的三千名守军开城迎接红高棉，在几天之内这三千官兵被红高棉全部坑杀，无一人幸免。此时，柬埔寨的总人口约700万；也有资料估计为740万人。

显然，金边的陷落原因，主要是插手柬埔寨的外部势力变化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加大力度地插手柬埔寨内战，另一方面美国全面抛弃了柬埔寨，这种失衡极大地削弱了金边政府的抵抗能力。有著述说，金边政府的部队“尽管勇敢战斗，但很快就缺乏供应和支持，并且金边领导人也表现出能力缺乏。于是红高棉开进了不抵抗的金边。”基辛格惋惜地说，“在红高棉摧毁柬埔寨之前，使用西哈努克是挽救国家和平的最后手段”。而西哈努克本人对金边陷落的分析是“纯粹因为美国的放弃”，在这里，西哈努克尽可能地掩盖了最重要的原因。红高棉的成功并不是柬埔寨民意选择的结果，从而悲惨地结束了高棉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命运的努力。

4月17日上午，克多恩部队首先进城接管金边。柯袍部队也在当天下午接管了暹粒省城。“当那些怪怪的红高棉战士在4月17日上午，沿着金边的莫尼旺（Monivong）大街走

动时，市民欢心鼓舞，拥抱他们。至少，安定的前景似乎到来：同胞残杀结束了，刀枪入库，习惯于礼貌和微笑的高棉民族将重新握手言欢。”市民们兴高采烈的原因是，人民迫切需要国家在五年血腥内战之后重返和平与重建家园。现存的记录红高棉进城片段的影像，显示了金边市民对和平到来的快乐和对新政权的好奇与兴奋，他们聚集在街道两旁，向攀附在慢慢开动的卡车上的红高棉，挥手致意。有些市民还以为是“西哈努克的军队”来到了。前政府的警察们尽职尽责地在大街上维持秩序，疏导车辆，等待红高棉接收金边。从记录片上看，红高棉战士表情冷漠，许多人赤裸上身，一些人机械地晃动着各式各样的上衣、围巾或肮脏裤子，表示他们的胜利。许多红高棉东张西望，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金边。这些红高棉的装束都是农民式的黑衣衫和各式各样的长裤或肥大裤衩，颈部方格围巾，顶着“毛式绿帽”，手持武器，游击队的乌合特征很明显。一些“革命”华人，聚集在街上热烈欢迎着红高棉。这些华人与金边市民大有不同：他们的喜悦不是来自对和平的盼望，而是源于对金边政府垮台的幸灾乐祸以及“分羹”期望。他们说：“在金边解放前夕，上级（中共地下党）要求我们在金边的华人全部留下来，参加国家重建。1975年4月17日，人民武装力量战胜了朗诺政权，全国获得解放。金边人民欢欣喜悦，走上街头，列队欢迎这些来自丛林中的黑衣英雄们”。

至此，中共损耗国家利益，二十年来不停地对许多外国制造颠覆和动乱，撞来撞去，一直失败，直到1975年才在东南亚一隅的小国柬埔寨取得了唯一成功，红高棉也终于时来运转。

“解放”只是非常短暂地欺骗了可怜的高棉民族。它并不是“改朝换代”的结局，而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革命”的开端。幸存的柬埔寨民众回忆道：谁也没料到，简直无法想像，“红高棉的胜利日正是‘零年’（红高棉废止公元，把夺取政权的这年定制为‘零年’）的第一天，柬埔寨瞬间进入疯狂的黑暗时空。”因为，就在这一天，人类史上最怪异吊诡的事情，令人费解地突然在金边发生了：

红高棉进城大约四小时后，显然有命令下达，红高棉在金边到处朝天开枪作为信号，开始以“枪杆子”驱赶全体市民离开家，立即出城，徒步走到遥远未知的乡村去。第二天，红高棉继续驱赶市民。此时金边至少有250万市民。驱赶不允许有例外和延缓，连医院里重伤病的住院病人也被强迫立即出城，而红高棉又不准提供任何运输病人的工具。红高棉也不允许与外国女人结婚的柬埔寨男子随同外国妻子离开柬埔寨。证人们都说，红高棉不允许被驱赶离家的市民锁自己的家门，也不准市民返回家，红高棉声称“安卡会照顾市民的家，直到三天后市民回来”。事实是，市民的财产在他们走出家门后便归属红高棉了；而让市民三天后回家的诺言，没有被遵守。一些返回自己家取旅行生活物品的市民，就地遭到枪杀。仅有很少的有钱人预感到动乱降临而随身带上一些金条、珠宝等值钱物品。几天后，红高棉又声明朗诺时期的钱币不再合法，宣布立即废除一切货币，柬埔寨从此禁止货币使用和商品流通。由此，柬埔寨人民的所有东西，包括财产、自由、权利和人身安全，无不被红高棉所劫掠，无论穷人富人在瞬间都变为一无所有。有些很看重金钱的商人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杀。自称“民族解放军”的红高棉不可思议地突然变脸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

外国人当时在金边抓拍的一些录像片段展示的实况是：红高棉战士在街上挥动步枪，胡乱射击，市民惊慌奔走。一段由在场的西方记者录像（当时红高棉还不知道世上有了磁带录影机）、全球广泛播放的录影是：一个约20岁的红高棉张狂地举着手枪在街上来回横行，恐吓市民，他还用手枪指住边道上的一个穿校服的少年学生，伸手搜身，那学生惊恐万状，高举双手全身颤抖。这一刻，这名红高棉也许没料到自己作为共产党恶棍的大街形象，被永

久定格在历史的场面之中。另一张著名的照片是：一个惊恐地圆睁双眼的平民年青女子，紧抱着满身血污的婴孩，徒劳地试图唤回孩子的生命。照片的说明是：“柬埔寨 1975 年，婴孩把鲜血留在了母亲的胸上，红色恐怖凝结于母亲的眼睛。”

现今，“柬埔寨文档中心”有超过十万份红高棉政权下幸存者的证词存档，叙述了从金边陷落当天开始的驱赶市民的真实历史事件。本文仅简短地摘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证词如下。

欧萨乌克（Oeun Sam Ouch）说：1975 年 4 月 17 日穿黑衣的红高棉进入了金边，他们用裤子当做旗帜，摇动方格围巾，在街上挥舞步枪。他们命令每个市民都离开金边，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安卡命令所有的人离开金边 3 天，你们不必带许多东西，因为安卡会照顾你们。”我们看见红高棉咕嘟喝白酒，醉得乱走，大吵大笑，他们不知道怎样开车，驾着市民的摩托车乱闯。他们还有的抓着一瓶白酒，边走边挥舞手枪。他们威胁人民：“任何人，不愿离开家，我们就杀死你们！”面对枪口，金边人民被迫离家，按红高棉指定的方向出城。我们一家沿着 1 号公路向城外走，公路上挤满了精疲力尽的市民。许多家庭的人互相在手腕系上绳子以免在滚滚人流中失散。但仍然有几千人与家庭失散了，特别是失散了父母的孩子们，蹲在路边徒劳地哭叫。

莫尼威萨寇（Mony Visal Khouy）说：1975 年 4 月 17 日给柬埔寨人民以许多和平与幸福的希望。我和父母象金边人民一样，祝贺和欢迎进入金边的红高棉，街上到处是喝彩声。但欢乐不长，红高棉开始驱赶人民。红高棉用枪逼着我家和邻居们立刻离开金边。不愿离开的任何人或家庭，红高棉立刻就开枪杀死他们。我的父亲带了一辆摩托车装载衣服、水壶和一小袋大米。在拥挤的街上，孩子们哭叫，人们相互打听自己家庭的亲戚。在出城道路上，被枪杀的朗诺战士死尸一片片躺在地上。那时我母亲怀孕 7 个月，我 6 岁，弟弟 3 岁。红高棉没收了我们家的摩托车。他们吼叫着用枪在我们后面逼我们前行。我的母亲把这些情况反复讲给我，让我记住无辜死去的可怜人民，并且对此永远愤恨。

马利临（Marilyn）说：红高棉控制了金边。每个市民都被驱赶出城。在一路上，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悲惨事件。一些人被杀。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哭泣着自杀而死。因为没有医药，许多严重伤病者躺在路边慢慢地死去。另外有一组人被（红高棉）捆绑正要送往未知的地方，当时一旁有些市民对抓人的红高棉抱怨，这些市民当场遭到枪杀。一些家庭把自己锁在汽车里投河自杀。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安卡”的一辆吉普车穿过村庄，乘车者之一是我母亲的一个昔日同学，母亲认出了那人，她告诉我们：“他是周春（Chhuon Chhoeun）。这个人过去经常鼓动我参加他在森林里的革命。”我们沿着道路继续步行，我们用衣服换了食物。10 天后我们走到了坡瑞隆镇（Prek Luong）。早上，红高棉命令我们都上船，这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哭泣的女人，抱着头抵在船帮上，昨晚她的丈夫被（红高棉）带走杀死，她的孩子也被带走了。船开了，我们最后一次悲伤地向金边方向挥手永别。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将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沿着路途我们看到饥饿和死尸，那么我们将在‘解放区’看见什么？”

(14/28)撤空金边

苏否慧（Sophorn Huy）说：我们住在金边的桑卡街（Sangkat）6 号，位于“中华医院”后面。1975 年 4 月 17 日早上，我父亲看见了很不平常的事情：一队队穿黑衣衫的人，颈

系方格围巾，穿着轮胎底的鞋，带各种枪支，沿着大街走。他们都板着一个令人害怕的脸，这些人是红高棉战士。所有的金边市民都震惊了，他们从门和窗户偷看外面。此前，人民担心战争会伤害自己，他们认为朗诺军队既然打不赢红高棉，就应该承认失败。一个红高棉头目，通过对讲机指挥隔着很远的战士们。几个战士用枪指着我们的房子，叫喊我们“走！赶快离开！每个人都走！”他们挨家挨户命令市民离开家，不准多带物品。我父亲恳求红高棉给他一点时间，去接回在昂东（Ang Duong）医院刚做过眼科手术的弟弟。但是那红高棉说，“你不用等你的弟弟。你不久会在路上遇见他。”邻居们都被逼迫，背着抱着一些东西，或放在自行车上，准备离开家。一个红高棉战士不停地踹一辆摩托车，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发动它。外面有叫喊声音在指挥着战士们：“命令他们（市民）都从房子里出来！一个也不准留下！”当我们走出家大约 100 米时，看见一位红高棉头目命令战士们：“他们离开以后，不准许他们再进他们的家。”当我们到达莫尼旺大街时，沿街有大量人群。一辆坦克和许多汽车，载着哇哇吆喝的红高棉战士们。红高棉命令市民人群向北方走。街上还有从医院被赶出来的一些病人，包括没有手臂和没有腿的截肢病人，以及正在输液的病人。一些市民推着板车，老人坐在车上，或者丈夫们推着他们刚生下孩子的妻子。许多市民来回奔走，焦急地询问别人是否知道他们失散的家庭，或他们的配偶在哪儿。一些走失了父母的孩子，满街都是他们的尖叫。那些不肯走开而守在路口等待失散的丈夫或妻子的市民，被红高棉当场用枪扫射，惨不忍睹。城外的公路上尘土蔽日，市民们来回地找柴煮米，找水。公路两侧布满屎尿和垃圾。疾病在传播。在比昂塔倍（Beoung Trabek）附近，大约离公路 100 米处有许多死尸，还有穿着（柬军）军衣仍在流血的新鲜死尸。红高棉强迫市民们过桥沿着道路走到郊区塔克毛，这里有红高棉的一个检查站，截留并杀死他们所怀疑的任何人。他们检查每个人的脸、腿和手臂，查问“你做什么工作，你以前在哪儿生活？你是朗诺军人吗？”那时间，人们都极其害怕。在红高棉检查过后，我父亲的一个姐姐开始感到懊悔，她想走回金边去。红高棉战士抓住她，捆绑她的双手，推着她走向西边的一条岔路。然后我们听见几声枪响。片刻后，我父亲走去看，她已被杀死。我们全家永远记住红高棉的没有人性的行为。

《柬埔寨零年》（Cambodia: Year Zero）一书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病人被驱赶的情景是：“我永远无法忘记，一个既没有手也没有脚的残废病人，象条蠕虫一样沿着大街地面在挣扎扭动。一个 10 岁的女孩哭泣着正用布带子缠裹她父亲受伤的颈部。另一个病人的脚悬吊在他的小腿上，因为他的脚和腿之间仅仅由皮肤连接着。”

柯木特（Ke Munthit）在撤空期间的经历，指证了红高棉的“野蛮行为”。在金边的大街上他吃惊地看见了许多年轻战士，黑衣、赤脚、围一条方格围巾，向空中射击，恐吓人民。一个行人低声告诉他：“这是红高棉”。柯木特父母恐慌地召唤家人在一起。很幸运，一位红高棉的头目原先（在西哈努克时期）是他们邻居的亲戚，刚好负责撤空这个小区。这个红高棉是善良人，他甚至让他的两个卫兵帮助柯木特的父亲等齐了所有的家庭成员，因此一家人侥幸没有失散。当柯木特一家走出金边城时，他们看见一群背着小口袋的华人，正在恳求红高棉。那些红高棉战士们生气地吼叫“想要回到金边，是吗？”他们命令这些华人放下小口袋，举手向前走，然后从后面开枪射击，那群华人全部倒下死去。父亲低声说“红高棉恐吓人民服从他们的命令。”直到这时，柯木特仍然企盼几天后红高棉将允许人民返回金边。他见证了人们惊恐地拥挤着前行，失散家庭的人们在尖叫和呼喊。病倒和受伤的人躺在公路沿边，失去了一切希望，被他们的家人忍痛遗弃。在一个小布篷下躺着一个刚生下婴儿的女人，红高棉战士不允许她休息，强迫她继续走。她丈夫把她放在一辆自行车上，在灼热的太阳下推着她，她佝偻身体抱着血染布包的婴儿。沿着公路散布着一些柬军士兵的尸体，有些死尸被红高棉的坦克故意碾得扁平。一个失散了丈夫的女人，抓着柯木特家的小汽车的车门，希望

用黄金和钻石换取搭车。但已经有 11 个人在车里拥塞着，她没能搭上车。两天后柯木特发现这个女人死在一条河沿上。当时许多市民只带了 3 天的食物，一些有远见的家庭把钱币塞进大米口袋里。但是红高棉废除了钱币，市民的钱币立刻失去了价值，他们失望得发疯。4 天后美国飞机并没有来轰炸，父亲意识到人民被欺骗了。人们面临同一个命运和问题：“是活下去还是死亡？”8 天后，柯木特一家到达一个小村庄落脚，他们被划定为“新人”（注：阶级成分。“新人”是被驱赶的城市居民。农村原住民被称为“旧人”），他们十几个人生活在一间仅仅 4 米宽 6 米长的小屋里，而且房顶漏雨。

撤空行动也发生在全国各地城镇。苏康乌（Sokhany Vuth）说：“1975 年 4 月 17 日的早上，我母亲正在磅占城的市场，听到朗诺军队升起白旗、红高棉进入金边的消息时，她很高兴（和平来临），然后她继续卖她的货。不久，到处在叫喊‘我们红高棉胜利了！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小时内离开你们的家，安卡要清理城市。你们仅仅离开 3 天，然后再回来，不要带很多东西。’那些人都穿黑衣，用枪对着市民，强迫人民离开家园。那时我的祖母病了，祖父让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我母亲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我们出发了。钱币废除了，即使想买任何东西，也没的卖，仅仅存在原始交换，例如某人有食盐，可交换大米，或者交换黄金。大米在那时是非常珍贵的。红高棉对任何停下不走的人都举起枪，如果人们继续不走，红高棉就开枪杀人。无论是病人还是走不动的人，都歪歪倒倒地挣扎着前行，或者由家人拖着走，因为人们不愿被杀死。实在无法被拖走的人或者婴儿，只好被家人放弃，躺在路边，象只动物一样死去。我们走了很远，太疲倦了，但不敢停止，因为红高棉跟在我们后面。”

读者能理解吗？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何等的恐惧、绝望、心碎时，人们才会丢弃自己的婴儿、妈妈、爸爸和亲人？悲伤的丢弃者与被弃者都在哭泣，但毫无办法。

此时的柬埔寨充满恐怖和混乱，到处都有暴尸在路边和田野，叫喊声和痛哭声混成一片，有如地狱突然降临人间。苏康乌（Sokhany Vuth）说：“4 月 17 日，红高棉驱赶全部的家庭和人民，进入一个没有墙的大监狱的悲惨日子。”

此前，周恩来按照共产党建政的常规，让中国的印币厂为红高棉政权设计和印制了 7 张一套的新纸币。在 7 张纸币中有 3 张是红高棉战斗图案，有 3 张是农村集中营劳动图案。这是在 1975 年中国政治形势下的毛主义的主题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这套纸币的纸质和设计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纸币（第二套人民币）一样。此时，红高棉未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也搞不到印刷机或者币纸，谈何印制货币？所以中国必需为红高棉准备新纸币，而周恩来是很愿意做这种事情的。这些新纸币在中国印制后，于 1975 年 3 月份启运给红高棉。在金边陷落后的几天内，红高棉在这个国家里取消了货币。于是这些没有发行史的新纸币被堆积在金边的几个仓库里，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绝对不寻常的货币”。

对于红高棉的胜利，柬埔寨华人都认为那是靠中国的扶植和华人的效力，很多“革命”华人还直接做过伤害柬埔寨的事情。没有中国，何来红高棉政权？因此不但那些“革命”华人有理由坐等“论功行赏”，即使安分守己的普通华人也有错觉，认为现在红高棉掌权了，华人定会受宠，地位会更威风。整个华人群体都喜滋滋，等待胜利果实自动落到他们头上。华人谁都没有想到应该躲避红高棉。但事实恰好相反，现在他们也急速跌入深渊，连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因为大撤空而被完全拆散了。

华人金某的叙述是：“刚刚接受了人民欢迎的红高棉黑衣兵，拿著阴森森的枪，挨家挨

户地逼迫人民离开家。他们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你们离开金边 3 天就可以回来，什么东西也不用带’。也有市民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遇上这样的市民，红高棉会野蛮地一枪打过去，让你死亡。金边市民在他们的枪口下，带着简单的物品离开家。漫漫长路是不归路，许多人许多家庭就这样一去就再没能回来。有些人走 5 号公路，有些人走 7 号、4 号公路。走 1 号公路往东去的人最多，因为那里可以逃往越南。金边市民都被赶出城，人们携带的钱因红高棉作废钱币而像撒冥纸一样丢弃满地。城市人在餐风露宿中吃不饱、缺乏饮用水（只好喝路边污水）、没有药品等情况下，许多人开始生病，死亡的人一天天增多。这庞大的人口被黑衣兵从各条公路往乡下驱赶，人们茫茫然，不知落脚地在那里？有不少病重的或子女不在一起的老弱残病者，被遗弃在路边。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城镇的居民，也在逼迫下离开家园，他们的命运也和金边人民一样，都在枪口的威迫下，走上没有明天的路。柬埔寨所有城镇都没有了光亮和人烟，都是可怕的黑暗和寂静，确实是地狱中的鬼城（ghost town）。许多不愿离开家的市民，都死在黑衣兵的枪下，他们死不瞑目，更是阴魂不散。”

“革命”华人青年文清（他曾给“解放区”送情报）的证词：“当时进入金边的红高棉，并不象（中共地下党）所宣传的‘人民子弟兵’那样爱护百姓，反而把金边人民当敌人。许多红高棉进入平民家里看到好的东西，就把东西抢走。有些百姓言词不慎，稍有冲撞，就立刻被红高棉开枪打死。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脑子里立刻打了一个问号，究竟是什么‘人民子弟兵’到处抢掠杀人？这些黑衣兵，以美国飞机将轰炸金边为借口，把金边市民全部赶出家门。以我自己当时所看到他们对待百姓的态度，感到情况不妙。我和父母一起跟着市民人群步行 50 多公里，艰难地走到了干拉省某县。”

华人谢姨说：“我家住在金边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一带。我与兄弟姐妹及父母共 11 人一起，和所有市民一样被红高棉逼迫离开家。当时我 15 岁。我们 9 个兄弟姐妹用了 7 辆自行车，载着出门所用的一些衣服和大米。半途，来到金边铁桥头，我与大姐离开家人，待回到铁桥头原地点，父母和家人已被驱往干拉省方向，我和大姐则被驱赶往另一个方向。我和大姐与父母家人被分离，从此再也没能见到他们。”

华人俞大姐说：“1975 年 4 月 17 日，我们在黑衣兵的枪口下被赶出家门。前途茫茫，我们跟着长长的人群队伍，究竟往哪里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脚越走越沉，脚板越来越肿。更可怕的是路边的死人、病人越来越多。人死了，家人只好在路边挖个浅坑埋掉。为什么才几天功夫，我们的生命就变得这么贱？”

华人小英（现居巴黎）说：“红高棉驱赶金边市民时，我是 10 岁女孩。我们都以为几天后就能回金边。妈妈为我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我的小篮子里。哥哥用小摩托车把我载到金边城外的农村亲戚家，说过几天来接我，就匆匆走了。谁知从此我与我们的家庭永别了。公路上从早到晚都是被赶出来的金边人民，他们向远方步行，东倒西歪。我不知道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我日夜哭喊着找妈妈。我病了，高烧，烧到昏迷了好几天。没有医药，我清楚记得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你不能死，要找到妈妈。我就爬着去抓我的小篮子，感觉如同抓住了妈妈的手。就这样，我熬过了那场病。但我妈妈一家 8 口人都没能活过红高棉（政权）时期。”

华人黄英说：“红高棉进入金边后，手中的枪胡乱扫射，到处喊叫‘为保护人民不受美国飞机轰炸，大家暂时离家三天’。不少老人不愿意离家因此被红高棉开枪杀死。红高棉对商店是先驱赶店主，然后破坏那些店里的东西，还洗劫财物，于是引起市民的怀疑。大部份市

民离家出走只带了最轻便的行李、钱币和几天的食物。很快，红高棉宣布废除货币，市民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亲眼目睹一位原住在戴高乐大街（Charles de Gaulle Ave）的商人，身上带的都是纸币，当他听到货币被废除后，气得呕血身亡。当时最可怜的是老人，在混乱中与儿女失散，他们大声哭喊，到处苦苦向人哀求和乞讨。在不知目的地的路上，哀求声、喊叫声、哭泣声……掺杂在一起。一对与儿女失散的老夫妇爬进公路边一栋废弃的小屋，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等死，眼泪不停地流。我询问他们，心酸不已，但无力帮助他们俩，只好离开。三天后，市民们没有被准许回金边。我们再三被红高棉欺骗。最终，我们哀求在一个村庄暂停下来。父亲因日晒雨淋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没有医生和药物，他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父亲临死前留下遗言：‘没想到，人民的军队害人民。儿女们，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等着看这暗无天日的社会末日的到来。’我们听父亲的话，照顾着母亲，一起坚强活下去。1个月后，母亲因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也离开了人间。母亲的遗言也是要儿女坚强活下去。”

遗言，一个人临终的最大愿望，竟然只是要求儿女苟活下去，设法活过那个刚刚诞生的红高棉政权。读者试想：人到了怎样的地步，才会留下这样的心酸又无奈的遗言？

克多恩部队是最早进入金边的红高棉，两个小时塔莫部队和温威部队从西面和南面也开进金边。克多恩在柬共内部的地位高于其他入城的红高棉首领，但下令撤空金边的总指挥是温威，而不是克多恩。红高棉干部事先都对大撤空政策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甚至连“红高棉面具”乔森潘也对撤空金边大吃一惊，他写道：“1979年4月17日上午9时左右，前线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占领了首都金边，我为此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我奉命赶往金边时，震惊地发现所有通往金边的道路上都挤满了被驱赶出来的市民。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孕妇和病人。拥有200多万人口的首都金边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城。这是为什么？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柯袍也说：“干部们有一些关于撤空城市的争论，认为我们只需驱逐旧政府职员，应该留下普通居民，然后用新政权的力量控制城市。然而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我们那样做，只是‘换一匹马’而已（没有实质改变）。”

这种涉及到几百万人的全国所有城市大撤空，事先毫无物质准备，也没有组织准备，以“枪杆子”来逼迫，根本不考虑大迁移中的民众生死存亡，展示了红高棉决策者在能力上的缺乏和不承担任何后果。研究者本·柯尔南（Ben Kiernan）做出的估计是：死于金边大撤空的平民人数至少有2万人。中共派驻金边的援柬人员也提到：“在大撤空时，由于缺医少药，加上粮荒，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中国人作为（援柬）专家，又在首都金边，每天还都吃不饱，中国使馆只好从国内调来压缩饼干，分给各个中国专家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乔森潘刻意轻松地说：撤空金边因饥饿和疾病仅仅导致两、三千人死亡。

国际社会至今对当时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目的和决策过程，不甚了解。确实，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真实原因一直被迷雾笼罩。一些研究者采用了乔森潘的辩护，宣称是金边缺乏足够的粮食。可是乔森潘的借口并不正当：金边并没有粮荒、更没有饿死过居民。而且法国学者庞考德（Ponchaud）收集的证据说明，当时大量的足够供应金边6个月的粮食堆积在海港城市磅逊，那里距离金边仅200公里，而不论磅逊还是金边本身的运粮能力都是足够的。因粮食缺乏而撤空的理论，意味移动人民去乡下“寻食”，而不是移动现成的粮食供给人民，这显然荒谬。因此，撤空金边与缺乏粮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另一些基本分析是：红高棉认为城市生活是寄生状态，因而要在整个国家里彻底取消城市。后来，1977年10月2日波布在北京公开披露：（1975年4月）柬埔寨撤空城市数百万市民的决定是“在（红

高棉)赢得胜利以前,在1975年2月做出的。因为城市那里有各种敌人的间谍组织,而我们的保卫革命政体的力量并不足够。”1978年7月农谢也称:“(当时)有内外勾连的阴谋,但是我们在解放金边后,立即撤空了城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苏联情报局(KGB)和越南共产党的代理人,都随着市民被驱赶到农村,而不能实现他们的阴谋了。他们的意图是暗杀我们的领导人,然后向全世界宣布。”据此看来,红高棉撤空城市的动机可能是安全原因,这或许表达了波布等人对于城市有着令人费解的恐惧感。

(15/28)荒谬执政

在撤空城市的同时,红高棉迫不及待地在全国展开一场大屠杀,最初的杀戮对象是与前政府有关的人。红高棉中层干部朱占(Cho Chhan)说:在“整个国家被解放之后,(1975年)安卡提出了一个政策,要消灭所有的(前政府)人员,从将军一直到副职官员,以及职工、警察、士兵和公务员。”一个已被揭露出来的事实是,300多名前军官被告之“西哈努克要接见他们”,结果他们被带到马德望的丛林,用机关枪集体屠杀;他们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也被杀死,显然这是为了不留下其亲属对红高棉的仇恨。大屠杀在事实上是内战的延长,也纯属红色恐怖行为。前政府“最高委员会”的成员都被处决,英丹和沙索萨康将军逃走。皇室也是红高棉的屠杀对象,记录表明,至少有21名皇室成员遭到红高棉的屠杀。例如在4月17日金边陷落的当天下午,在瓦卡特(Vat Katt)红高棉枪杀了一位皇室王子,在马德望城另一对王子夫妇被枪杀在一个小山坡。还有一些王子或公主被抓走后杀害,凡被抓者无一幸存。在全国,至少有4万名军人、警察和公务员被集体处决,估计还有10万名他们的家属和孩子也被杀死。只有西北部马德望和暹粒省的少数军人,见势不妙,逃往泰国边界的森林,侥幸逃过了死亡。

几天之后,红高棉大屠杀扩展到平民层次。全国大规模处决普通的教员、医生、护士、技术员、公司职员、小商人,业务员,连受过教育或略有文化的劳工都不放过。处决模式是用卡车将此类人员集体运至某个森林地点,用木棍打死或枪杀,就地扔在乱葬坑里。证人马利临说:“安卡公开号召职员和学生们自我报告,将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安排重要工作。于是,一些自称是三轮车夫的人向‘安卡’报告他们是职员或教员,其结果可想而知。但我的家人(知识者)都保持了沉默。”柬埔寨霎时间成了一个血淋淋的国度,然而这只是红高棉在夺取政权后的初步大屠杀。

证人马迪生(Mardi Seng)说: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员。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撤空了所有的城镇居民。公路上人群拥挤。我们饥饿又疲倦。我们想在道路旁的一幢小房子里短暂歇息。那是一幢白色小房子,窗户被打破,有4、5个家庭散坐在院子里歇息,都不进到房子里去。我们走进房子里,看到有一家人5口都被枪杀死在那里,血糊满了他们的脸和身体。我们非常恐惧,赶忙逃出房子。当我们朝另一幢小房子走去时,我们看见一个小男孩(大约10岁),他套着一件可能是捡来的朗诺士兵的绿色衬衫,很明显那件衬衫对小男孩来说是过于肥大。一个年轻的红高棉走向小男孩,抓住男孩的脖子,把手枪顶在男孩头上,没问一句话就开枪射杀了那男孩。周围的人民目睹这种残暴,没有人敢说话。4月20日,红高棉的一个头目要求人群中的教员、技术员、工人、受过文化教育的男人和女人,自报身份,加入新政府以重建柬埔寨。因为被驱赶之苦和对国家的热爱,有几千人响应了红高棉的号召、坦率地自报身份,我的父亲也响应了。但是就在当天,1975年4月20日,这几千人被红高棉集中起来全部杀死,其中包括我的父亲。

另一证人说：所有的上过学、受过教育的人，银行职员，教师，医生们，都被红高棉处决了。幸存者只是妥善隐蔽了身份的人，他们假称自己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者三轮车夫。金边华人许先生原是“端华”学校的教员，他假称自己是一个作坊的搬运工，才逃过了死亡的命运。1975年5月5日美国国务院报告，除了金边的200多万居民被强制撤空，在磅清扬城和暹粒城也发生了同样的大撤空，而且“根据可靠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能被发现的前政府和军队的各级人员和普通公务员，都遭到了杀害”。随后，由法国使馆从金边撤出的外国人，也都证实在金边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大撤空和到处杀人的恐怖现象。对同胞的杀戮，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共产党的本质。金边华人江先生总结了他所能认识到的规律是：“世界各国无论什么政党上台，都忙着偷偷修改对人民的承诺，唯独共产党一上台就忙着杀人。”

红高棉仅仅在金边留下了水厂、电厂、广播电台、波成东机场和几个工厂，以及寥寥千名工人。这些工厂都是用来服务于红高棉政权机构的。此时，不仅在金边，全国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没有了居民，成了一个黑沉沉的死寂地方。金边的各条街路被红高棉用铁刺网封闭。居民家的冰箱、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等物具被红高棉乱糟糟地堆在街上，下水道里塞满了废除的纸币……。一个被暂留金边的证人说：“我被留置在金边一个月。红高棉指派给我的劳动，是进到每个居民房子里收集大米，从各种各样的药店收集药品。”另一个23岁技工劳邦泰（Lao Bun Thai）被暂留金边为红高棉工作，他说：“我亲眼看见，金边大教堂图书馆的大量书籍，都被堆在草坪上焚烧。法国人开办的远东图书馆，在5月5日的上午也遭到焚烧。”中共派往金边的一个中国联络员的描述是：“号称东方‘小巴黎’的金边已是一座鬼城，昔日繁华的街区空无一人，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个街道还要寂静。一座座楼房空荡荡，杂草丛生，有的地方陈旧的血迹还可见。扔在院落中或马路旁打开的（居民的）皮箱，积满雨水。在红高棉通讯社附近，被红高棉炸毁的金边最大教堂，瓦砾成堆。朗诺时期的钱币被风一吹，在空中飞扬。穿着黑衣衫的红高棉兵，懒洋洋坐在十字路口的椅子或沙发上，枪放在一旁，用刺刀当作螺丝刀，摆弄着（从居民家搜来的）照相机。挂着中文招牌或贴着中文对联的住宅，房在人空。我所在（中国）使馆工作的一位老同学，陪我进入一座别墅看了看，大理石地面上血迹斑斑，它的主人是福建籍陈姓华人。一天，一位华裔翻译指着通讯社院内一片长得油亮的香蕉林，悄悄告诉我：金边刚解放时，红高棉要求柬埔寨通讯社的职工们在某日某时到这里报到，安排工作；信以为真的人来到这里，被统统打死，就埋在这片香蕉林下。而不相信红高棉的人躲过了这一劫，被驱赶到农村去了。”

1975年4月22日乔森潘通过金边广播电台，宣布柬埔寨新政权的建立。此时乔森潘被提升为红高棉“候补中央委员”。大撤空、废除货币、加上大屠杀，还不算是完整的红高棉“新政策”内容。

当红高棉把全部的外国人和外国记者都驱逐之后，一切有关柬埔寨的信息都被切断。柬埔寨被严密的黑幕所覆盖，从此与世隔绝。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柬埔寨，任何人也不被准许离开柬埔寨，所有人民都被困在黑幕之内，与外界失掉了一切联系。柬埔寨政权易手后，有86个国家按照常规想接触那个还打着“西哈努克流亡政府”招牌的柬埔寨“新政权”，但是红高棉一概不睬，只允许7个共产党国家派少数外交人员驻在空无一人的金边，有中国、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此时北越已占领了南越）、寮国（寮共政权）。但这些外交人员不被允许走出各自的使馆，也不得使用电讯联络，各使馆由红高棉黑衣兵把守，不许出入，形同软禁。据《零年》一书的资料说，那些外交人员的生活很苦闷：他们不能离开使馆，每天3次有一辆吉普车送米饭给他们；没有服务员，他们不得不自己做清洁

工作：每两个星期，中国的一架小飞机载这些外交人员集体去北京休假两天。一份红高棉内部文件显示，英萨利多次强调必须对这些使馆的监视。红高棉仅仅对中国和北朝鲜的使馆人员，特殊准许上街放风，但必需红高棉的人陪同。如此，国际社会对柬埔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柬埔寨被西方媒体称为“国际政治空间的黑洞”。红高棉的金边电台（全国唯一的电台）宣布柬埔寨两千多年的古老历史完全作废，历史轮轴仅仅从安卡接管金边的那一天开始转动，公元 1975 年就是柬埔寨的“零年”。同时，全国的寺庙都被关闭，商品被禁止流通。急速发生在柬埔寨的天翻地覆的“社会重构”，使红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常轨。基辛格经过观察说：“甚至红高棉的后台——中国当局，也失去了对柬埔寨状况的控制。”

在实施了上述怪异措施之后，1975 年 4 月 24 日波布等人进入空空荡荡的金边。红高棉执掌了政权，但继续隐瞒着共产党面目，它的组织仍然不公开。尤其是波布，绝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相貌。人民只知道神秘的“安卡”在控制一切，不知道“安卡”在哪里，哪些人是“安卡”。红高棉的中下层干部也不知道最上面的“高级兄弟”都是些什么人。国际社会更不清楚柬埔寨“新政权”落入什么人手里。1975 年 9 月，红高棉“党中央”秘密确定了“高级兄弟圈子”由波布、农谢、英萨利、索平、宋成、塔莫、温威共 7 人组成。但直到 1976 年底“党中央”电贺越南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落款仍是含混的“柬埔寨革命组织”。反而泰国比较明白些，1975 年 4 月 18 日曼谷政府的一份报告说柬埔寨“新政权”领导人排名依次是波布、英萨利、宋成、农谢、索平、温威。

诚然世上所有的共产党，普遍因其帮会性质而行为诡秘，但始终严密隐藏其政治旗帜和组织、个人的身份面目的现象，至今还是红高棉所独具的奇观。“党中央”已经夺取政权，仍继续扮演“蒙面逃犯”形象。毛泽东帝王作派，颇不屑这种鬼祟，所以他当面“抬手指著英萨利乔森潘，要他们直说自己是共产党，不要躲躲闪闪”。但事后农谢辩驳道：“柬埔寨共产党以前不合法。我们开发出秘密策略，第一，保卫我们自己；第二，动员更多的力量。解放（夺取金边政权）后，秘密工作仍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只要有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存在，秘密工作就仍是我们的基本工作。秘密工作使我们是状态的主人，使敌人不能发现什么而我们能赢得胜利。这是我们从印尼共产党的血迹中学到的经验。”

对红高棉的胜利，毛泽东大概是世界上最为心花怒放的人。他有理由兴高采烈。毛泽东发贺电给“柬埔寨革命组织”：中国人民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并共同前进。也只有中国当局在 1975 年 5 月初，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十万人的盛大集会，热烈庆贺“柬埔寨革命组织”夺取金边政权的伟大胜利。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的名义元首却未被中国当局邀请出席这个集会。中国人民被瞒得严实，他们只是被当局含糊告知“柬埔寨革命”成功了。中国人至此还没听说过“红高棉”这个名称。1976 年中国的新闻电影厂制作了一部高调赞扬柬埔寨“新政权”的纪录影片“柬埔寨革命”。那影片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在一个热带小国里的“革命者”个个都颈搭方格围巾。在该影片中多次出现过一个中等高、粗身板、嘴巴半开、颈搭方格围巾的无名中年人的镜头，视察稻田。这人是波布。没有一个中国民众能认出这个人。

在柬埔寨城市被撤空的同一时刻，越南战局也走向终结。南越政府斗志消弥，民怨沸腾，南越总统阮文绍仓皇下台。美国总统福特抢在西贡沦陷前夕派出大量飞机和船只，救出 20 多万南越难民。1975 年 4 月 30 日北越“人民军”分五路占领了西贡市（1976 年 7 月 2 日把西贡市改名“胡志明市”）。至此，越南战争结束。北越，兵燹南北十四年，终以军事侵略吞并了南越共和国，也开启了南越民众逃亡的日子。少语寡言的黎笋，他拥有主导越南共产党所需的钢铁意志、专注和管理技巧，在赢得越战的过程中，他始终是北越行动的设计师和总

指挥。

北越人忙于建立共产党政权和清洗前政府人员。他们没有象红高棉那样杀戮前政府的公务员和士兵。令人惊讶的是，越共当局在此时的百忙中，派出不少军人到动乱中的柬埔寨，接回越南侨民。当时，在柬埔寨约有 25 万越侨，大部分越侨都被越共接收而返回了越南。因为种种原因来不及返越而遗留在柬埔寨的越侨还有 2-3 万人。对于越共当局对越侨的不分阶级的人道关怀，一个柬埔寨华侨说：“（红高棉）把城市居民驱逐出家门，把财产掠夺一空，令人发指。当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到柬埔寨接收自己的侨民时，唯独我们华人没有‘中国政府’来接收。内心的失望和悲哀使我们深感作为中国人的耻辱。我们这些当年投奔‘革命’的华人，对‘解放’柬埔寨、回家团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有资料估计 1975 年金边沦陷时的柬埔寨华人总数约 55 万。

许多华人趁着越共接收越侨的机会，鱼目混珠，逃往越南。华人安金说：“当时越南刚刚解放，越共政府在 5 月份多次来到柬埔寨境内接越侨，有些华人也装扮成越侨跟着走。当时许多逃往越南的华人在过境时，冒充越侨，都临时取一个越南名，什么阮文牛、阮文马阮文龟阮文龙……，连越南边防队都感到可笑，奇怪这些人为什么尽用动物名。但不管怎样，这些（去了越南）华人总算逃过了浩劫。”

证人谢女说：“我们被驱赶到了（柬埔寨东部的）某县。听说越共军人来接越侨回越南，我和大姐就一起去让越军问话，但因不懂越南语而被拒绝了。”在柬埔寨西部北部和西南部，红高棉忙着秘密坑杀越侨。一个被驱赶到马德望省的金边居民说：“红高棉把（马德望地方的）要回越南的越侨集中起来，用卡车接走，说是送去越南，在半路上载到森林里统统杀掉。”茶胶省的华人的证词也说：“那时，红高棉的村干部来登记，问我是不是越侨？要不要去越南？本来，去越南是逃生的好机会，但一想到同来的不少人因为愿意去越南而被红高棉杀死的惨景，我立即答：我不是越侨也不去越南。”

北越的一位部长指出：1975 年是红高棉与越南人之间关系的分水岭。在红高棉接管金边政权后，波布拒绝与河内发展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波布在金边声称：“我们赢得了全部的、决定性的、干净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或参与。”他不承认越共对红高棉的一切帮助。农谢甚至说：“越共破坏我们的革命。他们拒绝转运来自中国的武器弹药。我们不得不从敌人那里缴获弹药，我们没有从越南共产党那里收到任何东西。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党尽最大努力在 1975 年 4 月 17 日解放了金边，这是在西贡解放之前的两个星期！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指出越共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在整个柬埔寨革命时期，我们与苏联和越共之间有复杂的斗争，但是我们克服了困难并赢得胜利。”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高棉在空荡荡的金边召开红高棉各区域和各部队的主要干部大会。这是红高棉干部与“高级兄弟”们的第一次见面，让他们终于目睹了神秘的“1 号兄弟”波布。当时拍摄的胶片，纪录了波布等人入场的情景。这胶片可能是由中共摄影员为红高棉拍摄的，因为红高棉当时没有自己的摄影员，红高棉的首席摄影师尼恩（Nhem En）才 15 岁，他在这次大会几个月后被送往中国北京学习摄影技术，而红高棉绝不会允许旧政体的摄影员拍摄。

“干部大会”在一处有大玻璃窗的会堂里举行，上千人在街上排成单行鱼贯进入会堂。这些人的装束一律是“毛式绿帽”，黑衣衫，“人造革”腰带，轮胎底的中国胶鞋。波布、农谢、

宋成、克多恩、温威、索平、三巴特、塔莫等十几人，颈搭方格围巾，手放在胸前鼓掌，走进会堂。全场干部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喧哗，很多人好奇地踮脚伸脖见识他们的领导人。波布等人依次走上主席台，戴黑框眼镜的宋成高出众人一头，他原本走在第三位置，因不停地回身向干部们挥手致意而落在后面，以第五位置走上主席台。这些领导人排列在主席台上，波布在中间，依旧嘴巴半张。温威站在农谢旁边兴奋鼓掌，笑容灿烂，风头十足。农谢则面目冷峻，还两次侧脸斜视温威。这些“高级兄弟”因为吸引了台下众多的目光和掌声而十分风光。主席台上自然是没有乔森潘。但英萨利也未出现在主席台上，现在已知：此刻他正在北京商议关于迫使西哈努克回国的阴谋。

这次大会首次向红高棉干部公布了“党中央”关于重构社会的各种政策。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注：迄今尚未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的回忆所拼凑，诸如韩桑林（此时是东部大区的团级指挥员）等人。政策的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禁止商品，废除文化教育，废除医疗系统，禁止交通和邮电，关闭寺院，把僧侣赶到农村劳动，处决所有的前政府人员，在全国建立农耕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把越侨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消灭市场和剥夺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把人民划分为不同阶级等级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农谢在讲话中还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要随时清除（杀掉）反对者和不满者，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16/28)红色乌托邦

在柬埔寨，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在未知理由下被强制实施。除了消灭城市和取消货币，红高棉还关闭了所有的寺庙、学校和医院，废止了公共交通和邮政电讯系统，使“暗藏的敌人”不能相互通信。收听广播和了解信息的权利被取缔，任何人不准拥有收音机，金边广播电台成为专门向外国播送虚假消息的工具。国家宪政制度被彻底改变，公民社会不允许存在，市场和一切经济活动都被废止，法律、宗教、教育、医疗、文化、艺术被禁止，新闻通讯被禁止，书籍也被禁止，各种社会团体皆被取缔，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私有财产被充公，社会分工、职业选择都被取消，劳动报酬制度被废除，所有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都被剥夺，温饱 and 生存权被废除，自由迁移被废除，家庭被拆散，自主婚姻和爱情关系都被禁止，等等。“火车只供红高棉军队使用，其他红高棉干部乘坐也必须有‘上级’证明。”

柬埔寨人的土地、财产和资源全部归红高棉政体的“合作社”所有，连种田农民（旧人）也变成一无所有。所谓的“合作社”是集中几个村庄里的民众（包括“新人”），按照性别和年龄分别编入不同的“劳动营”（例如男子营、妇女营、青年营、老年营等等），每营几百人至千人，在红高棉的监管下，集体进行劳动和生活，不允许有家庭生活。6 岁以上的孩子必须交给红高棉带走、圈在“少年营”里劳动和生活，不准与父母在一起。这样，柬埔寨每个家庭都被拆散，有的家庭成员被故意分散在几个不同的县或省，从此不能相聚，再也不知亲人的生死或遭遇。那些“劳动营”都故意建在离开村庄很远的荒山野林里，通常彼此相距几十公里，夫妻、母子之间的见面，须向红高棉干部乞求并得到批准，人民私自到对方的“劳动营”去见面，会被红高棉狠狠毒打或就地处死。“劳动营”的住所只是仓促自建的大草棚，只有草顶，四周很少有草扎墙壁。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被禁锢在“劳动营”里，他们通常凌晨 5 点钟就被迫干活，夜里 10 点钟才准许收工。人民在一整天的繁重劳动中不被允许有休息，一天只有两次进餐，那时就是短暂的休息。在夜里收工后，人民还要被集中开会，接受红高棉重复的宣

传灌输，内容是千篇一律的拙劣的“革命道理”，或者是“到 1977 年人民便可以每 10 天吃一次甜汤，到 1980 年人民每 3 天就可吃一次甜汤”的美好空想，等等。

“安卡”配发给人民一套黑色衣裤、一条水布。水布是一块 1 米宽、2 米长的布。其他服装一律禁绝，女子穿花色衣服更不被允许。配发的黑衣裤偶有撕破损毁，不但不补发，而且会被指为“故意破坏”而遭到毒打或惩罚不准吃饭。毛巾、肥皂、牙膏、手纸、水杯、笔、盆等日用品，一概不供给。只有被称为“旧人”的原“解放区”农民还留有一些这样的日用品，但只消耗而没有补充来源。人民被划分为不同等级，“旧人”管制着“新人”，前者可以虐待甚至打杀后者，但两者在被红高棉奴役上并没有不同。人民在“集体食堂”里进食，食物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由红高棉决定，每个民众都在挨饿，营养极度不良，生存状态被控制在半死不活的程度。民众被发现捉吃田野里的青蛙、蜥蜴、甲虫或野菜等物充饥，会遭受毒打或处死。集体劳动则是开荒、伐树、挖土、挑担、种田等繁重的农活，没有任何报酬。日复一日的长时间劳累使人民精疲力竭，许多人在劳动中一跤跌倒在地，爬不起来，就死去了。这个社会消灭了医药，最好的药品是一些无效的草根树皮和丸粒状的兔子粪便。在“卫生站”里，无论什么病都给予兔粪治疗，几个村庄共设一个简单的“卫生站”。病倒的人民因为不能劳动而不给予食物。年青女子被红高棉随意配婚给士兵或指定与什么人结婚。对繁重劳动而力所不及的人、有任何不满或口出怨言的人，都会被极其草率地杀死。有记者披露：“（多年后）记者访问一个当年的红高棉成员，他说当时为了节省子弹，他们把要杀掉的民众按在土地上，然后抡起锄头，把人的头颅活生生地锄掉。”

而红高棉，颈搭方格围巾，既不受苦，也不劳动，分为早晚两班，挟枪监视民众劳动，他们辱骂殴打人民或者动手杀人。红高棉的家庭都团聚在一起，基本上丰衣足食，还经常分配有中国供给的各种日用品，包括香烟。随着钱币和商品的废除，他们也没有了薪水。

一位女证人说：“1975 年底，我们几百个平民家庭的上千人被红高棉带往原始森林地带，去开山辟林。这是暹罗省南叻县（**South Superstar County**）的一座荒山，站在山顶远眺，周遭看不见一个村落。派给我们的工作是挑土筑堤、挖水沟、开垦荒地。我们每天从早上 6 时干活到半夜 11 时，算起来一天劳动至少 14 个小时，可是给我们吃的却是加了蕃薯叶的稀粥，让我们睡在森林的泥地上。我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水布，用它当手巾洗脸，当裙子又作被子。凡在森林中住过的人，都领教过疟蚊（**Anopheles**）的厉害，当时很多人民因患疟疾（**Malaria**）而死去。1975 年下半年我结婚后，才被准许自己搭一个临时小茅棚作新房。这茅棚用几根短竹子，支在泥地上搭成‘人’字型，长 2 米宽 1.5 米的低矮棚子，棚顶盖一些茅草。每次进出茅棚，需四肢着地爬行。下雨就更惨了，铺在泥地上的茅草被雨水漫入，无处可睡，我们劳累了一整天却只能坐等天亮。我丈夫因太疲倦，就在泥地上平行放两把锄头，把锄头薄面插入地面，使一端略微高于地面，然后他整个人就躺在这两把平行的锄杆上，熬过了一夜又一夜。”

最恐怖的是红高棉随意杀人。在红高棉执政时期里，野蛮杀人的活动一天也不曾停止过。在对象上，杀人活动可分为三个受害群体，第一类是与前政府有关连的人，第二类是柬埔寨的知识群体、经济群体和普通人民，第三类是红高棉内部人员。在时间上，杀人活动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些将在后文详述。

至此，柬埔寨的“社会革命”把原有的正常社会结构完全废除，成为地球上唯一的奇怪社会。毛泽东很欣赏红高棉的“社会革命”，他要在北京会见波布，庆功。从 1975 年 6 月 16

日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恳请毛主席在接见（波尔）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便可知在6月16日之前北京当局已在准备迎接波布了。1975年6月20日，波布秘密抵达北京，汇合已在北京的英萨利，包括两个柬埔寨华人译员，主译员是原金边华校“民生中学”的吴植俊。在北京的西哈努克对波布来到北京是毫无所知。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与波布、英萨利会面，他们三人长时间热烈握手，都很兴奋。照片显示，衰老的毛泽东表情舒畅，满面春风，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构成手势，正在说着什么；英萨利笑容可掬，他两手捧着毛泽东的右手。这弹冠相庆，分明是心花怒放的场面，有着令人惊异的视觉效果。如此情景在毛泽东会见各类外国人——包括会见毛的老朋友斯诺——的所有场合里从不曾出现过；波布则嘴巴半开，笑看毛氏和英萨利的亲热。这实在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照片。毛泽东与波布、英萨利的会见记录被中共秘藏至今。但幸运的是，这个会谈的一些片断被河内通过某些渠道搜集整理，并复制给苏联存档。尽管该会谈的存档内容极为有限，但它涉及了毛氏“理想社会”和红高棉的“社会重构”，从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前苏联的解密档案（现存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文件记录表明，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向波布讲述了典型的毛氏理论：“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毛说：“在民主革命转变到（极权）社会主义道路的期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从现在起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甚至一万年也仍然存在。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也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否则（不这样认识）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立之中存在的统一观。如果仅仅提及两方面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我相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进展）道路将是曲折的。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代，苏联变修了。但是苏联将来会回到列宁路线。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未来的中国可能变修，但是它终将回到马克思列宁的路线上来。我们国家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个人所得不相等，在表面平等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所以将长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在共产主义实现后也有前进和倒退之间的斗争，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地阐明它。”

那么，波布怎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独获“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极大青睐和当面传授？还有，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一句，显得突兀，不知所指。难道在中国存在对红高棉“社会革命”的异议吗？并且需要毛泽东亲自反驳吗？

文件继续披露道：“毛泽东还提醒道：你们不要完全照抄中国的经验，而应该有你们自己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指南，但不要把它当做教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布30本印成柬文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布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这样，毛泽东用他独创的“中国的现在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概念，向波布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国家需要“社会重构”的理由，实际上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需要“继续革命”。至于毛泽东“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的教导，表达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看法，是在告诫波布不要拘泥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可以打着“共产主义”招牌，构造另类“新型社会”。

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决策者”，中国对红高棉政权的慷慨“犒赏”，展示了毛泽东对红高棉的特殊关爱：1975年4月下旬，红高棉接管金边还不到一个星期，第一批海运的粮食供应是来自中国的援助；同年9月中旬，中国赠给红高棉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2,000万美元现钞。在全球，中国不曾有过真正朋友，现在它终于有了唯一朋友红高棉，而红高棉的唯一朋友是中国。

在结束了会见毛泽东之后，波布去了上海参观访问，7月中旬波布回到金边。英萨利则留在北京。

此时，邓小平统管国内政务。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与“柬埔寨代表团”商谈对红高棉的援助事宜，包括输送金钱和派出人力。这“柬埔寨代表团”其实就两个人英萨利和乔森潘。在北京，邓小平与英萨利签署了一份中国经济援助红高棉的协定，双方还煞有介事地以“政府”名义发表了“联合公报”。乔森潘是奉命来监督西哈努克回国的。对西哈努克来说，他现在成了要被吐掉的“樱桃核”，只待发落。对于回国，西哈努克极不情愿，但这由不得他了。西哈努克未曾料到：共产党叛乱未成功时他还可以作个傀儡，背著内战“黑锅”，一旦共产党夺得政权他就会变成阶下囚。英萨利在落实了西哈努克“回国”的安排之后，返回了金边。

如果说扶助红高棉，是周恩来毕生的最大过错，那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恩来，对空前荒谬的红高棉“社会革命”持何种立场？

周恩来没能参加在中南海会见波布、英萨利。此时（1975年6月间）他因病瘦得皮包骨了。几年来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良知等代价，让柬埔寨受到伤害，也让中国人民付出高昂代价，成全了红高棉，他有大恩于红高棉。自从毛泽东接管了对红高棉的指导之后，红高棉的“革命”急剧转向“社会重构”的方向。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即将回国的西哈努克夫妇、宾努夫妇、英提丽特和乔森潘等人。

因为长期从事的职业上的关系，周恩来熟悉各式各样的共产党团伙，可是他对红高棉一定会感到陌生和惊讶。他费尽心机扶植了红高棉政权，但结果却不是他的作品。因为红高棉的“革命”突然越出了他设计的共产党建政常轨。周氏当然对此深为不满。于是，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的会中表明了他对红高棉“社会重构”的态度。多种资料都提到：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乔森潘和英提丽特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当场对乔森潘和英提丽特批评道：“我对你们提点意见：不要试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如果想通过短短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国家拖进灾难。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在场的西哈努克也证实：“生病的周恩来忠告乔森潘，说不要企图快速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周恩来告诉红高棉领导人‘别学我们的大跃进的坏例子，要走慢一点，这是领导柬埔寨人走向繁荣和幸福的最好途径。’这个几乎是父亲般的忠告，乔森潘和英提丽特的反应是：那两人用礼节性的微笑表示了他们的不信服。当我们回到金边，乔森潘和宋成特意来告诉我，柬埔寨革命正在向全世界证明：共产主义确实能够一步到位完成。他们还说‘我们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国家，而且没有浪费中间（过渡）阶段的时间’。”乔森潘宋成两人宣布柬埔寨快速地完全地实现了“共产主义”，这显然代表了红高棉“党中央”的认知，也反驳了周恩来的指责。但实际上，红高棉很难弄懂他们所构建的柬埔寨“共

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共产阵营所认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蓝图。

周恩来对红高棉“社会重构”的批评，是周氏在对外事务表态上含有人性光辉的话，至少他在过去十几年里从未表达过此种光辉。而毛泽东夸奖红高棉“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此时的毛和周，对于柬埔寨发生的“天翻地覆”，一个兴高采烈，一个失落指责，两人都明白现在柬埔寨的社会重构究竟是谁的杰作。虽然周恩来的话明确包含了对红高棉“社会革命”的否定，但他没有机会挽回过错了，这件事情永远无法被改变。

毛泽东挫败了周恩来，但新的对垒及时出现了。这次是邓小平。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悔改”，遂决心扳倒邓小平，在全国发起批判邓小平的政治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他为一个荒谬事业，躬亲一生。周恩来的死亡，象林彪的死亡一样，立即给中国政局造成重大冲击，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17/28)继续革命

1975年7月波布从北京回到金边后，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在全国推进“继续革命”。在这次会议上，波布还宣称：“在全世界，自从美国诞生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军队能最终打败美国，获得全部胜利。没有人能做到这个。”他的意思是：地球上只有他做到了。

其实，波布能做到的是最无能的到处杀人：在市民被驱逐到农村后，“红高棉查问每个‘新人’的职业和身份。安卡消灭了许多人，包括朗诺政府的士兵、警察和公务员，没有谁被留下不杀。”然后，红高棉开始屠杀自己民族的精华：凡红高棉认为是知识者或有产者都被杀死，其中包括教员、医生、护士、学者、作家、演员、音乐家、艺术家、工程师、法律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金融业人员、工厂主、小商人、作坊主、餐馆业主、旅店业主、投资者，还有应该算作工人阶级的普通店员、公司职员、推销员、技术员、各类匠人等等，只要发现便杀掉，一个不留。例如，柬埔寨原有6,000多名注册的正规医生，屠杀后只剩下46名，他们之所以逃过杀害是因为他们被押解到金边，在监管下为红高棉领导干部看病。甚至连戴眼镜的平民，也被红高棉认定是读书人而普遍遭到杀害，“杀眼镜人”成为红高棉乱杀人的著名实例。

从事政治的人更在必杀之列，波布之兄、曾教给波布“革命活动”技巧的越共份子沙洛查（Saloth Chhay）也被红高棉杀死。当时，红高棉与沙洛查双方都不知道神秘的柬埔寨主宰者就是沙洛查的弟弟。一些小知识分子，多数是被驱赶到陌生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员，靠着隐瞒职业和经历才躲过了屠杀。事实上，红高棉领导人也都是知识者或教员，例如波布、英萨利、农谢、宋成、克多恩、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侯荣、胡宁、乔森潘、乔氏姐妹、秀木兄弟等人。有证人说：“没有转变期，一夜之间所有公民都变成了苦役奴隶。这是20世纪最激进的社会改造。受过教育者、富裕者、公务员或不愿合作的劳动者都被处决了。我亲眼见许多人自杀，人们在走投无路下的仅有选择是：自杀或者被红高棉杀掉。许多人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红高棉的恐怖还仅是刚刚开始。”

在国家机构的组织方面，红高棉组建了一个类似中央政府的招牌机构“870办公室”，乔

森潘是“870 办公室”的挂名首脑，实际的领导人是都恩和苏华斯（Suas Va Si）。橘井省、磅占省组合为新设立的“中部大区”，辖两个编号为 105 和 505 的分区，柯袍是中部大区首领，斯仁（Sreng，又名 Cho Chhan）是副首领。磅通省、暹粒省和西北部的奥多棉芷省（Oudar Meanchey）重组为北部大区，辖三个编号为 41，42 和 43 的分区。原西南部的磅清扬省、国公省和部分实居省被组合为新设立的“西部大区”，辖五个编号为 31，32，37，15 和 11 的分区，周杰特任西部大区首领，他的妻子音南（Im Nan）是西部大区的 32 号分区（原实居省部分）首领。这样，全国共有了 7 个大区：北部（代号 303）、东北（代号 108）、西北（代号 560）、东部（代号 203）、西部（代号 401）、西南（代号 405）和中部大区（代号 105）。全国总数有 32 个分区，每个分区辖有几个区域（基本上是原来的县），每个区域辖有几个小区（基本上是原来的乡镇），每个小区辖有几个村庄。

东部大区包括菠萝勉省、柴楨省、部分磅占省和部分干拉省，是柬埔寨最富庶的大区。它毗邻南越，历史上长期受越南民族的影响，与其他大区的民风不同。东部大区辖五个编号为 20，21，22，23 和 24 的分区。索平（化名 So Phim，Sor Yan，So Vanna）是越盟培养的柬共分子，他只接受他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党中央的极端政策，例如集体食堂等，索平在东区推动得较慢，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对人民的稍微宽容。东区与其它大区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全国的红高棉部队都是黑衣衫，唯东区的红高棉部队是草绿衣服。在东区某些地方，索平甚至允许人民穿自己的家常衣服来代替统一的黑衣裤。索平性情直率，与温威、三巴特、周杰特等人的私交甚好。温威透露，索平与他私下谈话，“他（索平）向我报告东区的情况很好。合作社已被建立，但粮食收成（没有上交党中央）而是分配给人民了。东区有一个自定的生活水准，是根据（那些）不愿集体吃相同食物的人民需求所设立的，因为那里的人民认为那样（集体食堂）就表示他们缺乏生活物质。”

西北大区出产稻米，曾是柬埔寨的最大“粮仓”。该大区辖有七个编号为 1，2，3，4，5，6 和 7 的分区。西北大区柬共首领三巴特也是由越盟培养的。他在西北部有威望。西北部对待当地人民（旧人）较少发生大规模处决事件，而且允许新婚夫妇短期住在一起。那里的主要产米地区是 3 号分区（马德望省），通常都会有充足的大米供应当地人民。但是西北大区对待“新人”是特别恶毒和严厉的，“新人”被故意分派到没有人烟的山地，被强迫在饥饿情况下去开发原始森林，在那些分区因疾病和饥饿而死去的人数是柬埔寨各分区中最高的。

中部大区以大规模的处决而著名。许多最恶毒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中部大区。柯袍让斯仁负责中部大区的清洗，他们制作了一本程序，要求各分区“按照程序表”来决定哪类人被先后打死。但塔莫的西南大区（辖四个编号为 13，33，35 和 25 的分区）后来居上，杀人如麻的名声超过中部大区而夺冠全国。

波布模仿中共也成立了“中央军委”，他自任主席。总参谋长宋成负责把红高棉武装整编为“中央军委”领导的国防军，统编为 9 个步兵师、4 个步兵团、1 个坦克营、1 个炮营和总参谋部，共计 72,248 人。国防军的主要部队是：

- 170 师，由原东区第 1 部队改编，师长查克雷，政委莱本；
- 290 师，由原东区其它部队组合，师长密塔尔（Meah Tal，又名 Sam Huoy）；
- 801 师，由原特别大区第 25 部队改编，师长罗恩（Rooun）；

- 164 师，由原西南区第 13 部队改编，合并了海军，师长密穆特（塔莫女婿）；
- 502 师，由原西南区第 33 部队改编，合并了空军，师长苏麦特（塔莫女婿）；
- 703 师，由原国公省第 11 部队改编，师长萨姆平（Sam Pin）；
- 310 师和 450 师，由原北区部队改编，师长是欧恩（Oeun）和苏昂（Suong）。

在红高棉各大区里还建有地方部队，每个分区和小区也都有武装队，每个村庄里还有几十名成员的“自卫队”。这样，红高棉兵员总数有 20~25 万人。在东部，韩桑林是东区地方部队第四师指挥官，洪森是东区 21 号分区（磅占省）的乡镇干部。1975 年 4 月洪森因病住进分区卫生院，1976 年 1 月 5 日他与该卫生院的一位女子萨姆蘅（Sam Hieng，又名文拉妮）结婚。在红高棉部队的整编中，有不少士兵被裁减，他们没有得到“革命”胜利后的好处，而是被分派去种田，这使他们非常不满。

西哈努克在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一件有关直升飞机的事，“在 1975 年 4 月红高棉胜利后，红高棉获得几架前政府放弃的美制直升飞机，他们决定试飞。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他们能自己驾驶汽车，也能弄明白直升飞机。一个红高棉发动了一架直升飞机的引擎，飞离地面，可是他不知道如何着陆，只好不停地飞。最后这架直升飞机的燃料耗尽而坠毁，那假冒的‘飞行员’摔死了。事故之后，一位在内战期间投奔红高棉的前飞行员，被命令试飞直升飞机。此人顺利升空后，愉快地驾机径自飞往泰国着陆，然后他去了法国避难。”

在红高棉的人事安排上，1 号人物是躲在幕后的波布。英萨利掌管外交，宋成掌管军事，温威掌管经济，克多恩掌管商业，农苏恩掌管农业。他们都是红高棉党中央“高级兄弟”成员。胡宁掌管宣传部，程安掌管工业部，“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工业部长柯特崇现在只是波布的越语译员，痴呆的乔彭娜莉挂名“全国妇女协会主席”，英提丽特掌管社会部，云雅特掌管文化教育部，这些人都是红高棉中央委员。秀蒲拉西担任柬埔寨驻联合国大使，秀木只是工业部属下的科技组头目。而老资格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高米斯被怀疑亲越共，他不仅没有官职，且被软禁在家。

1975 年 9 月英萨利返回金边。他的公开角色是红高棉政体对外的惟一发声筒和联系渠道，实际上这个政体的重大决策都由他的见解和影响所决定，而且他掌管着红高棉的党组织系统，在党内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英萨利比任何人都深藏不露。现存的红高棉大量文件中，“农谢的名字和（批示）签字到处都是”，显示农谢很忙碌，出了许多主意并作为执行者。但英萨利的名字很少出现，他的签字更是罕有。英萨利也有一些讲话、以及他参加的会议记录，表明他完全了解红高棉的“社会革命”，但迄今未能发现英萨利直接参与或指导的证据。而且，英萨利从未显露过权力欲望，但高层干部都知道英萨利是红高棉的第 2 号人物。而英萨利回避“2 号兄弟”之名，取了个普通化名为“万”（Van）。宋成自认是红高棉第 3 号人物，波布以“87 号兄弟”为代号发布指令，宋成自己就取名为“89 号兄弟”，而有意空位“88 号兄弟”，暗示了还有个在他上面的重要人物存在。这个“88 号兄弟”名号，英萨利不采用，在红高棉中央圈里就无人敢占用。英萨利待人温和，谈吐沉着，连柯袍那样的村痞，也只愿与英萨利谈自己的真实见解。

1975年9月9日西哈努克夫妇在乔森潘和英提丽特的监督下抵达金边。此时，国际上还误认为红高棉政权就是原先的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因此红高棉需要把西哈努克弄回金边来当招牌，以便“移花接木”蒙蔽国际社会。此前，西哈努克察觉到红高棉不怀好意，便要求去平壤与金日成告别。1975年6月西哈努克到了平壤便打算长期流亡北朝鲜，7月18日他在平壤声明拒绝一切要他返回柬埔寨的建议。经中共与英萨利的商议，派乔森潘于8月中旬迫到平壤对西哈努克再次进行胁迫和利诱，还承诺让西哈努克终身做柬埔寨元首，保证西哈努克全家的安全。中共也派人赴平壤对西哈努克施加压力。为维持共产党之间的黑箱关系，平壤此时也同意交出西哈努克。西哈努克终究逃不出，他无奈地在乔森潘陪同下返回北京。8月26日西哈努克、乔森潘、英提丽特等人共同到医院向周恩来告别。后来，西哈努克承认道：“我返回柬埔寨的决定并不表示我认同红色高棉，但是我必须牺牲我自己，为了中国（脸面）和周恩来总理的名誉，因为周恩来那么多地帮助了柬埔寨和我自己。”

在西哈努克被迫回国的最后时刻，8月27日晚，在北京，毛泽东会见了西哈努克夫妇和乔森潘等人。毛泽东亲自为西哈努克说情，他让乔森潘向红高棉“党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不要虐待西哈努克夫妇。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如果那样做，西哈努克就没命了。”对此，乔森潘作了口头保证。毛泽东又劝西哈努克为红高棉服务，毛伸出手指说：红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有四点一致，因此西哈努克不应当与红高棉分道扬镳，而应该在柬埔寨和在国际上表示对红高棉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

8月底，西哈努克夫妇带着最小儿子西哈莫尼返回金边。西哈努克一家回到金边后即遭到软禁，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红高棉还逼迫西哈努克发出信件召回他在海外的儿女们返国。早在1970年他的那些儿女们被朗诺政府放行，目前分别生活在法国或美国。现在，西哈努克不知道红高棉为什么要求他召回儿女，不免骇然。但他又不得不服从，他只能在信中隐晦地表达某些暗示。他的信件被红高棉审查后寄出，他的几个儿女感到不妙而拒绝返国，另有几个儿女听信他的话而返国，但红高棉没有告知西哈努克。那些返国的儿女没有被允许见面西哈努克，就被红高棉押送“劳动营”，从此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遭到杀害。红高棉总共杀害了西哈努克的5个亲生儿女（帕花公主、纳拉迪波王子、拉威旺王子、苏佳塔公主、苏里亚公主），14个嫡亲孙子孙女，4个表兄妹，1个内兄和1个叔叔，共计25人。日后，西哈努克多次悲愤控诉：“在红高棉这个极端毛派主义政权的执政期间，我失去了如此多的亲人！”然而，这并不包括更多被红高棉杀害的皇室成员，其中有几名还是“民族阵线”委员。红高棉确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意见，留下西哈努克夫妇的性命。当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时，西哈努克请求吊唁周氏，被红高棉断然拒绝。后来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西哈努克只求发一封唁电，也同样遭到红高棉的拒绝。据说，在金边，西哈努克一家被软禁在金边的一个“三间房屋小院落”里，由红高棉兵看守，每天早上有一个黑衣兵骑自行车送来一天的米饭或蔬菜。在回忆录里，西哈努克把这种生活称作“拘押”；仅仅乔森潘来过几次对西哈努克宣示一些事情；西哈努克只模糊知道有个“安卡”掌管着国家的一切。

柬埔寨的“社会重构”情况被严密封锁，连越南人也不了解。红高棉“党中央”自然也不希望北京知道。但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在柬埔寨发生了什么，这可能是北京另有渠道了解柬埔寨情况。于是很快发生了候荣被杀事件。

柬共是由越共缔造，继而由中共扶植的，这就在柬共内部形成“亲越共”和“亲中共”的宗派，加上红高棉“留法帮”，基本上有三个宗派。在柬埔寨内战时期，这三派同心协力；在夺

取政权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没有人料到，第一个受害者是巴黎“英萨利小组”的重要成员、红高棉政权的内政部长侯荣。从 1975 年 6 月起，侯荣就再没露面。当 7 月份波布从北京返回金边后，侯荣一家人就失踪了。8 月底侯荣的尸体浮现在金边的一个小湖里。这是一桩神秘谋杀案，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侯荣的被杀，红高棉方面没有任何表示，在它的文件里也没有任何记载，似乎侯荣此人不曾存在过。侯荣是什么人？他是“亲中共帮”首领，可以看作是中共在柬共内部招募的代理人，他背后的势力不是红高棉“党中央”可以轻易触动的。显然，只有波布的指令和北京的认可，才会使侯荣被杀。迄今没有任何一个红高棉领导人提到过侯荣被杀的内情，只有他的亲密战友胡宁在日后透露：侯荣因为反对“党中央”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的政策而被处死。后来在 1977 年，胡宁以及所有的“亲中共帮”成员，也全部被“党中央”处死了。历史证明了：对任何共产党独裁者来说，他自己可以是某外国共产党的“儿皇帝”，却绝不容忍存在于自己党内而听命于外国共产党的“宗派”。

红高棉的经济政策追求是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完全停止了。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给红高棉以大量的物资援助，包括车辆、小型拖拉机、燃油、农具、药品以及日用品，还派遣多达 15,000 名军事经济技术人员去帮助红高棉。红高棉普通干部大都是些不识字的底层人，所以中国援柬人员不是单纯从事技术性指导和培训，而是直接为红高棉做劳务。例如中国飞行员替红高棉驾驶飞机和运转机场，在金边的电话局、电厂、水厂、水泥厂、枪炮修理厂、以及柬埔寨各地的铁路、水坝建设等地，都有中国人在工作。在中国人的要求下，红高棉很有限地召回一些被驱赶到农村的工人。那些在 60 年代中期曾在金边大学进修柬文的中国工人，也被中共派回柬埔寨，为红高棉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清楚红高棉正在做什么。

1975 年 10 月的一份红高棉文件表明“党中央”命令在金边秘密建立一个大型的清洗中心，代号 S-21。杜赫（原名康克由）是这个机构的领导者。他从 1973 年起不断积累了清洗经验，也积累了冷漠残忍。起初，杜赫考虑在金边郊区塔克毛（Ta Khmao）监狱旧址上筹建 S-21。最后他选择了金边南部的一所名为堆尸陵（柬语 Toul Sleng，一种有毒的野果）的中学。这个中学有四排的 3 层教学楼，被改造成 20 个集体大牢房和许多被砖块隔开的 2 尺宽 8 尺长的小牢房，使整个 S-21 能同时监禁 1,500 个囚犯。从外面看去，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铁刺网，让人有浓厚的阴森不详之感。S-21 于 1976 年 5 月启用，杜赫负责 S-21 的各方面的具体操作，他挑选了 57 个监狱警卫、20 个看守员和一些拷问员。杜赫外貌清瘦和善，从不趾高气扬，一张照片是他的通讯员搂着他、两人笑咪咪的合影。但他对工作对下属都很严格。S-21 的守卫辛辉（Him Huy）评论道：“他很坚强，头脑也很敏锐，他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最为具有价值的是，出于数学教员的认真习惯，杜赫为 S-21 的运作保留下完整的记录。

S-21 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内部清洗，其动机源于“党中央”夸张了自己在“敌人”眼中的地位：一份红高棉文件声称包括台湾、韩国和印尼和“东南亚联盟”组织（SEATO）的主要目标是要联手毁灭红高棉政权。喜欢无中生有的农谢也谈到：“在（1975 年）金边解放 6 个月后，美国计划从我们手中夺权。那计划涉及美国、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形成了一种内外搏斗。但是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美梦”。在 S-21 建立的最初期，有 7 名皇室亲王和公主在 S-21 里被杀害。S-21 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仅极少数人知道，那是一些“高级兄弟”、S-21 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地区的被委予机密职责的红高棉防卫首领。每当波布、农谢、宋成、塔莫发

布指示时，有时点名那些被 S-21 拷问的“反革命分子”，然而他们总是避免提到 S-21 的名字。英萨利似乎谨慎地避免参与清洗，迄今没有发现他参与 S-21 工作的直接证据或指示。S-21 的隔绝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营地、把附近的地区清场、限量所有文件、烧毁所有废弃纸张、转移囚犯时蒙起他们的眼睛、禁止拷问员文件员以及其它员工之间的任何接触。最残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杀死所有囚犯来维持的，没有任何人被释放过。S-21 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个工厂里为众所周知，该厂一个工人后来在 1989 年受访时指证它是个“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的地方。”杜赫并不是红高棉中央委员，但他在红高棉政权里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在 1970 年 3 月“朗诺政变”之前，杜赫经常回家乡看望他的亲人们，据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说，杜赫回乡时从不提及政治，她们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 年 4 月红高棉获得胜利后，他恢复了回家乡。他的姐姐说：“我们不知道他在红高棉政体里有什么职位。他回家时从不谈论他的工作，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在 S-21 建立之后，在柬埔寨各地区的红高棉仿照 S-21 建造了 196 个清洗机构。

(18/28)社会状况

本文把红高棉政体下的社会状况的主要特征，以简略的实例和证词（存于金边文档中心）表述。需要说明的是，柬埔寨民众质朴木纳，表达能力差，他们的叙述枯燥简单而真实。读者如果能稍微体会那些事情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便可领会其中的骇人之处。

1、红高棉以“合作社”为名，强迫所有的人民生活在劳动集中营里。个人的生产资料、运输工具、生活器具，包括土地、农具、种子、存粮、自行车、牛车、家畜、所有的煮饭器具等等，都成了“合作社”财产，支配权属于“安卡”。人民的“集体进食”从 1976 年 1 月成为全国的统一方式。人们被“安卡”发配到生存艰难的地方去从事奴隶劳动，他们还被强迫接受奴隶生活。“每个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可言。实行合作化以后，人们不可以离开村庄，全部财产都被剥夺了。私藏粮食要被处死。随着经济的恶化，集体食堂的饭锅里只有糠皮。农具和耕畜是少见的和宝贵的，弄坏一把锄头或者一头水牛跌伤了一条腿，都会使当事者成为不可辩解的‘反革命罪’，遭受疯狂的鞭打或处决。”

2、私有财产权被红高棉彻底剥夺。废除货币，即是对社会财产的最深度掠夺。红高棉的内部文件解释废除货币的理由是：“如果我们使用钱币，钱币将落入个人手中……如果钱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可以用钱币买通人民的情绪。然后我们的纯洁的柬埔寨社会将堕落为越南共产党社会那样肮脏。”柬埔寨城市居民被逐出城市，他们所有的房产和财产被红高棉没收；乡村人民在既往历史上从未被集体化过，但从 1976 年初，柬埔寨每个乡民都被要求交出生产工具和私有财产（包括厨房用具），归公使用。

3、家庭的拆散。在柬埔寨，作为集体化过程的一部分，家庭都被分开。丈夫和妻子被分开，孩子们也和他们的父母分开。所有家庭成员被根据年龄和性别，分派到不同的“劳动营”去，在不同地点或区域里被强迫劳动和集体生活。被分开的男人、女人、孩子在各自“劳动营”的住房都是集体性的。家庭功能和伦理，以及家庭对老人的赡养、对孩子的监护抚养都消失了。红高棉认为夫妻在一起生活是不必要的，夫妇被长期隔离，新婚者也不能长期在一起生活。孩子到六岁时必须让红高棉领走，而不能被他们的自然父母所教育。“安卡”成为所有孩子的代理父母和统治者。社会对父母的尊重被替换为对“安卡”的崇拜。

柬埔寨的一位证人说：“在（菩萨省）这里，我们一家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劳动地点和生活。我和丈夫被分派在两个不同的‘劳动队’挖水渠，两个小叔被分到‘青年劳动队’，公婆两个老人在村里种田，一家人没被允许过团聚一次。”

4、市场、商品和社会服务系统（包括商业、邮局、公共运输等）被废除。在柬埔寨，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被红高棉“党中央”简单地决定，人民的生存和生计，包括食物、衣服、日用品、住处、健康等等，完全依赖“安卡”的配给。这样，全体人民变成为被“安卡”役使的、没有报酬的奴隶劳动者。而货币和市场废除的主要结果是让政权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财富。但不可避免的是，如此的社会体系成为整个国家逐渐蔓延经济危机和最终衰竭的起源。

5、所有的法律和规则都被废除。法院系统、政府管理或民政部门都被关闭。柬埔寨仅剩下一条规则：安卡即法律。至少，新宪法应当依照人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被通过，但事实上红高棉“党中央”的几个人就决定了“新宪法”。乔森潘对此的解释很无理，他说：柬埔寨新宪法在制定之前就已经实现了，也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搞人民投票了。

6、柬埔寨人表达意愿的所有方式都被禁止，包括说话、集会和出版。如果三个人聚在一起说话，会遭到逮捕或者处决。讲话是“安卡”独有的特权。民众仅仅向亲密朋友或亲戚低语他们的抱怨，但这需要冒着被杀死的危险。有证人说：“让我最担心的是晚上说的梦话。那个时候，由红高棉训练的十几岁的红色儿童，在夜间到处巡视，他们悄悄地在民众的集体屋下（注：柬埔寨很普遍的高脚屋）偷听。”

证人龚先生说：“我和我哥哥被编在同一个劳动营里。一天，有红高棉上级干部来视察，让大家给政府提建议。大家都沉默着。我哥哥年轻，鼓起勇气站出来很小心地说：建议政府给人们稍微多一点点的米，那样人们有力气了，干活就会更快更多，国家建设就加速了。干部们看着我哥哥，也没做出什么表示。当天深夜，我哥哥就被红高棉唤去‘学习’，被押到村外砍死了。我吓得在很长时间里不敢说任何一句话，像个哑巴。”

7、信息传播系统被禁止。所有的报纸被取缔，收音机被禁止，人民的知情权被剥夺。红高棉干部偶尔集合当地民众收听电池收音机里的政治广播、革命歌曲和口号。全国众只有一份“党中央”的杂志《桐树》（*Tung Padevat*），由红高棉宣传部长胡宁主编，模仿了中共的《红旗》杂志。人民被要求必须相信撒谎的红高棉政权。

8、废除全部的教育系统和健康系统。在柬埔寨全国，从小学到高等教育都被摧毁，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被严厉禁止。红高棉敌视文化教育，他们处死了几万个教师，幸存的教育工作者都是靠隐瞒自己的身份而暂时幸存。阅读文字是不许可的，书写文字更会招来杀身之祸。红高棉以新型的“政治教育”替代了文化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是给儿童们灌输“革命”价值观。

谋杀医生是红高棉政权的既定政策，任何的正规医生只要被发现存在就会被处死。柬埔寨原有 6,000 多名正规医生，杀剩仅 46 名。全部医院被关闭，仅保留了供红高棉干部使用的卫生院。全国唯一的医院在金边，医疗者是中国派遣的“援柬”医生，使用西药治疗。红高棉“党中央”和高级干部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普通民众只有无效的治疗。许多民众见证“人民能够得到的药物普遍是黑色粒状的兔子粪。”

人民患病的大多数结局只能是死亡。一个红高棉干部证实道：“农村医疗完全是空白，农民尤其是从金边与各城镇被驱赶到农村的人民，因极其苦难的原始劳动，又吃不饱，身体虚弱病倒，但没有医疗，反而被‘安卡’指为怠工份子，被处死。”另一位证人说：“红高棉政体那时，药物缺乏，人们把一种树枝拿来煮，再把煮汁和米糠混在一起，晒干成药丸。一百多种病，都用这同一种药丸治疗。”

在暹粒省“劳动营”的一位女子说：“运气好时，每个人民每天可分到一饭匙大米，小半汤匙盐巴。这就是一天的食粮。有时分不到米，就只有饿著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摘些苦奈草来吃。苦奈草是一种非常苦的植物，实在难以下咽。在劳动营，我被分配去挑土。必须游过一个池塘，到对岸去挑土。一次，在上岸时，因为脚上沾著泥浆滑倒了，整个人重重地跌在地上，我正怀孕，因此流产。我独自躺在瓜棚下的泥地，鲜血伴著腹痛不停地从体内流出，没有医生，没有药物，连一粒米都没有。阵痛之间，我无助地望着蔚蓝天空，心底泛起无限凄楚和绝望：刚刚逃出鬼门关，眼看着又要走上黄泉路，这世上还有哪一国的人民比我们更苦啊！阵痛和出血相互交替折磨着我，挺过了一天一夜，当胎盘终于自行脱落时，我连哼的力气都没有了。流产后的两天内，没有食物，我只吃了两个皮色青青的小芭蕉，是我丈夫从蕉园偷来的。第三天患了痢疾，病魔接连不断的侵袭，令我招架不住。我突然不省人事，众人闻讯把我团团围住，两小时后，在众人的救助下我总算醒过来。妇女们拾些树枝树叶，放在我四周烧，给我取暖。树枝烧著不停地冒烟，熏得眼睛睁不开，大家也一个劲地流泪。就这样我直挺挺的在泥地上连续躺了几天，有人见状就劝我丈夫放弃。他们对我丈夫说：现在这种情形，生不如死，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丈夫听了既生气又难过。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悲惨的遭遇，让人看不到生的希望，有些人就对生存失去了信心。但丈夫仍然四处打听偏方，采来草根，煮成汁给我服用。半个月后，我才开始逐渐恢复。”

祸不单行。当这位年轻女子刚有恢复后，“一天我伸手往背包中取衣服，手刚伸入背包，就觉得左手食指被狠狠地刺了一下，忙缩回手。我丈夫取下背包，拎到草棚外，倒出里面的东西，看见一条如拇指般粗细的毒蛇，原来我被毒蛇咬了。我丈夫赶忙用水布把我的前臂扎得紧紧的，以防毒。当时，痛得我欲哭无泪。那是一没医生、二无解毒药物的危急时刻。丈夫就大着胆子向干部们乞求，请求去村里找土医生（略懂草药的村民）治疗。等了两天，请求才获批准。在这两天中，我的伤口一刻不停地跳痛，受伤的手臂越来越粗肿，颜色越来越黑。肿胀从手部一直扩展到肩膀，感觉整个手臂皮肤快要裂开了。因为过度肿胀，皮肤看上去就像一张薄薄的透明纸，一戳即破。整个手臂沉重得无法提起。这是在痛苦、焦虑、恐惧和期待中度过的两天，漫长得像是过了两年。去村里要走 20 公里，这对健康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又病又饥的我，被丈夫牵着手，在森林中穿行了 15 个小时才到达村子。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天的惨状，天还没亮，我们就上了路。其实根本没有路，只是在森林中，踩着别人隐约留下的脚印走。天上下着大雨，我丈夫牵着我的手，在雨中一步一滑地慢慢前行。我们浑身湿透，不住地发抖。更糟糕的是，一路上我不停地呕吐。由于腹中没有东西，连黄绿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身体太虚弱了，走了约 1 公里，实在走不动，就地坐下歇一歇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深夜才到村里的大姨家。大姨慌忙找来村里的土医生帮我解毒。我在大姨家治疗了几天，渐渐好转。我对丈夫充满感激之情，正是他的固执，才使我再次躲过了死亡。”

另一证人说：“我村劳动营的一名妇女因过度难过、担心和想念在远方的女儿，疯癫了。红高棉说疯人不能到处乱走，就把她捆绑起来，让她孤独蹲在树下日晒雨淋，还每天分别在上午和下午殴打她。在另一个劳动营的她女儿苦苦哀求允许她回来看望娘亲。女儿看到母亲

的情况后，因为受不了这种打击，最终与她的母亲落得同一命运。这时红高棉说，她们母女不能留在村里，应带走‘治疗’（处死），从此便再没有人见到她俩。”

9、在柬埔寨，所有的宗教都被定义为“反动”和被禁止，包括佛教、印度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红高棉认定柬埔寨全部约 40,000 个佛教和尚都是社会寄生虫，许多和尚被处决，其余的被驱赶到劳动营里强迫劳动。佛祖或菩萨的大小塑象都被捣毁或倾倒入湖。柬埔寨的最神圣的宝塔寺院有半数遭到彻底破坏，其余的成为存储仓库、猪圈、兵营、也经常被用作监狱。基督教牧师和伊斯兰教阿訇都被处死，基督教徒（Christian）和伊斯兰教徒（Muslim）遭到普遍的迫害。金边著名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被炸平，伊斯兰教清真寺也全部被拆毁。红高棉强迫穆斯林去吃伊斯兰教最忌讳的猪肉，许多拒绝吃猪肉的穆斯林被当场打死。凡是被发现念佛、祈祷或用另外方法表示任何宗教情结的人会被就地处死。柬埔寨人民只能崇拜“安卡”，在“安卡”的教义里只有同志或敌人这两种人。所有的宗教节日和仪式被废除，国际通用的公历也被废除。一个由红高棉自造的“革命新日历”取代了公历，把 10 天划分为一星期，把 1975 年指定为“革命新日历”的开始“零年”。每年的 4 月 17 日（金边沦陷日）是胜利日，允许人民停止劳动 3 天以受到政治教育。其它全部的世界公认的节日都被废除。

10、在柬埔寨，在新的奴隶群体中又创造了贱奴等级系统。占全国人口 40% 的被驱赶出来的城市居民“新人”在整个国家里被置于最底层的地位，其生存条件被严重地剥夺。红高棉广泛地宣称“新人”是“留着无用，杀掉不可惜”的物件。

一些证词摘录如下：

（一）红高棉政体把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红高棉人员是一等人，农村地方上的“旧人”是二等人，少数民族是三等人，“新人”是第四等人。“新人”在事实上是社会囚徒，他们被强迫做比乡民更多的额外劳动，但只准许吃更少的食物作为惩罚。“新人”被强迫在最偏远和最艰难生存的地方，做最苦的劳动，例如在原始森林，荒山或沼泽地，而且没有医药供给他们。他们时常无缘无故地被处死。

（二）被驱赶到菩萨省的一个“新人”说：“红高棉命令我们到小鹰山去挖水渠。那里到处是石地，10 个人一天挖不到 1 公尺，如果将锄头挖坏了，就会被狠狠地毒打。小鹰山没有水，我们只好砍下树皮含在口里解渴。为了解决水的问题，红高棉让我们分别做一个盛水的小竹筒，规定每人一天只能喝一小竹筒的水。红高棉监工每天抽水来分给人们。没分到水的人，就只好用衣服、手表，尤其是笔，去换取一小竹筒的水来喝，因为红高棉很喜欢那些东西。”

（三）“在可怕的（1975 年）4 月 17 日，把我们赶出家。我们的家庭，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兄弟和姐妹，以及我们的孩子，都被分开了。他们强迫我们日夜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和睡眠。他们惩罚我们，在我们的背后锁铐我们的双手，用锋利坚硬的棕榈树叶猛砍我们的脖子，活生生拔掉我们的指甲，用饥饿折磨我们。还有许多其它的惩罚，多得无法详细描述，这些红高棉的野蛮行为全都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之外。”

现存金边“文档中心”的一个统计表明：在 200 个被驱逐到农村的城市家庭之中，在熬过了红高棉政体之后仅仅幸存约 50 个家庭。但这些幸存家庭，在红高棉政体期间也没有一家

不曾被杀掉过家庭亲人。

11、杀害威胁被普遍使用。人们在红高棉枪口的威胁下劳动。任何异议者都会被“再教育”。“再教育”（re-education）一词是中国“文革”的发明。红高棉把这个词汇引进了柬埔寨。一位红高棉干部解释“再教育”说：“这个词意味着，人们不是被重新教育，而是被直接打死。”

有女证人说：“1977年，我肚子疼痛，呕血。姐见我病了，就偷偷捉水坑里的鱼给我吃，她还偷给村民缝补衣服换鸡蛋来给我吃。后来红高棉村干部发现了，因此捉她去‘再教育’。当时，姐才20岁。隔天在集体饭堂时，我看见有人穿着姐的衣服，我大吃一惊，眼泪控制不住，我心里明白，姐被杀了。村干部问我：‘你为什么流泪？是否想念姐姐？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别想念了，姐姐被拿去思想改造，她与你永别了！’听到这一番话，我连忙摇头：‘不，我的眼睛痛……，如果哪一天你们叫我去改造，我也不敢不去。’这样，我才逃过鬼门关”。“每天凌晨3时，我们就起来工作，到了中午红高棉只给我们每人吃一碗粥和一点盐。如果我们抱怨，就会被拖出去杀掉。每天都有人被红高棉拖出去杀死。日子久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那时，我经常偷偷在筑堤坝的工地捉老鼠吃。一天，竟然挖出一只人脚，我丢下锄头，拔腿就跑。可是，想起丢了锄头会挨打，我又跑回去拾锄头，碰见一个过去的男同学，他看我很可怜，就恳求村干部要和我结婚，以便把我带去他的村子，但最后还是没有被允许。”

12、红高棉在各地自造的土监狱遍布柬埔寨，用以集体关押和折磨民众。没有人能以公民权利避免毫无理由的逮捕和监禁。一旦被监禁，极少有人能得到释放，直至死亡。在监狱里，人们被锁铐被虐待，被野蛮地施加故意的痛苦或精神折磨，通常在狱内遭受酷刑而死。红高棉的某些处死方式特别令人厌恶，例如活剖开膛导致受害者惨叫数天而死，或者用塑胶袋套住人的头部把人活活窒息，等等。

证词摘录：

（一）“我父亲原在一个供应商的装运公司工作。他希望在内战后为柬埔寨的重建奉献精力。不幸，他的爱国心没有受到红高棉的接纳，而被处死。在我父亲被处死后，我们偶然发现了当年的一个红高棉干部，他曾经参与了对我父亲的审讯。他说：我父亲被关在一个寺庙的地下室，与另外3个男人一起被锁铐，连续几天不给食物。我父亲的脸是青肿的，背部和前胸的肋骨被打断。在处决时，一路上他被踢着和倒拖着来到了处决地点，严重的殴打使他失去了讲话的能力。据那干部说，我父亲在人间的最后呻吟是在叫着妻子儿子和女儿的名字。最后，我父亲的头颅被铁棒猛击3次而死亡。”

（二）红高棉干部的证词：“在各地，红高棉以开会的名义召集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送往劳改营。强迫被劳改的人每天干活。案情较重的人被用手铐脚镣锁住，严刑拷打，如不招供会被处死。有不少人都屈打成招。那些施刑的拷问员，不问别的，只是追问你是何年何日参加美国中情局（CIA），或是参加苏联克格勃（KGB）也行，你的介绍人（上线）是谁，等等。许多人熬不过严刑拷打，被活活折磨致死。当时，我们的同事不见了，只听说同事调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就一直不见人，全然不知道是被杀害了。”

13、大量消灭人口。处决是红高棉的国家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这是世人对红高棉政权最为不理解之处。在柬埔寨，有地区性的集体杀人，也有经常性的村庄杀人，红高棉任意决定什么人应该被处死，没有明确的杀与不杀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通过杀人要达到的目的。

被杀者（大多数是全家）在晚上被带走，不经问话就被处死。流行的处死方法是用斧子劈、锄头砍入后脑或木棒打断颈项致死，这样可以节省子弹并使处决过程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塑料袋套头”是红高棉创造的恐怖处死法，受害者的头部被塑料袋紧紧扎住，人被窒息而面部黑紫，眼球爆裂、舌头突出，极其骇人。尸体被扔进集体坟坑。也有些人被击打后丧失了意识，尚未死亡，但他们不能逃过“活埋”致死。谋杀不仅包括前政府的职员，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产者、工商业者、店主、商贩、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严重疾患者、残疾人、无法承担繁重劳动的人、体弱生病不能劳动的人、被认为的懒惰者、日常生活中流露对现实不满者、稍有不同意见者或不愿服从红高棉的人。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的某些地区，还发展到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屠杀“新人”的空前严重的程度。

(19/28)社会状况 2

（一）朗温（Loung Ung）一家人被从金边赶到农村，她的父亲是个工人。一天，两个红高棉来告诉她父亲，一辆坏在村外的牛车需要他前去修理。父亲知道这是末日。他从此再没有回来。朗温的母亲也被毒打。朗温记得，村庄里的一个饥饿者捕杀了一条迷路的狗来吃，此人被红高棉处死，狗肉却被红高棉享用了。当时朗温仅7岁，有一天母亲要赶走朗温和她的姐姐，母亲说：“你们走吧，不要聚在一起，各走各的，再也不要回来！”这时朗温心中充满对母亲的怨恨。她恐惧地望着旷野。很久以后，朗温才懂得，当母亲觉察出红高棉要杀害其全家人的时候，只有赶在红高棉动手之前，让年幼的儿女们分头逃命。这是个让天下所有母亲都心碎但别无选择的决定。后来，母亲和一个女儿被红高棉杀掉，另一个女儿被饿死，然而逃往不同方向的另外女儿和两个儿子却最终活了下来。

（二）“他们（红高棉）随意杀死任何人。我记得在一个晚上的集体晚饭时，一个红高棉突然吼道：‘老头，我们要砍掉你的头！’这老人的一家现在仅剩两个亲属。我不知道他们要杀死这老人的原因，我吓得张着嘴无法说话。我看到一支步枪指著老人的头部。老人问他们是否能把他的唯一财物打火机留给他的外甥，但是红高棉不允许。他们反绑老人的手，拖着他离开大约500公尺，开枪杀死了他。我听见两声射击。在红高棉走回来之后，我仍然处在震惊中，我从来没有当面看到一个老人被杀掉。在后来的几年里，虽然我不断看见了许多年轻或年老的尸体，以及人民的各种苦难，但是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可怜老人在我的眼前被杀死。”

（三）“红高棉政权杀人，第一批杀公务员、军人、教员、医生、技术员、和尚等，第二批杀本地人民和华人，只要是曾经开店铺的，家里田地稍多的，房子比较大的，都杀掉。第三批杀表现不好的人（即红高棉认为‘懒惰’或悲伤的人），有时一次就杀掉十几个家庭。晚上是最难熬的时候，人们都躺着发抖，因为总是在晚上红高棉叫人去‘开会’，从此就不见了”；“把人杀死，剥下衣服来，分给活着的人。人们是从衣服上看出迹象，经常发现亲人或邻居的衣服被另外一个人穿着，才知道亲人或邻居已经被杀了。我的孩子误吃了某物，指甲和嘴唇都发黑了，靠认识的一个乡村土医生偷偷给了一些草药才医好。就是这样一个治病救命的土医生也被杀掉了。当时有两姐妹，没找到亲人，暂时住在那土医生家，也被当作土医生的家人拉出去杀了。十几公尺方圆的大土坑，里面埋的都是被杀者，红高棉称为肥料。”

（四）“一天，红高棉村干部捉拿阿音的姨和姨夫一起去杀掉，并问阿音：‘你要否跟你的姨和姨丈一起去？’我到听如此，就用潮语（中国潮州方言）说：‘阿音，你千万不要去，’

他们是捉你的姨和姨夫去杀掉的。’但是她回答：‘即使捉我去杀，我也愿意一起去。’结果，阿音和他们一起走了，从此再没见到她。”“自从磅清扬的红高棉来管理我村后，千余人民先后被他们杀得只剩 50 余人。劳动营的 700 余名男人被迫长期下水割麻，每天从天不亮到下午 5 时，一直浸泡在水里，天天如此，不少人因此病倒而死亡”；“因为没得吃，大家都饿得皮包骨，双脚肿胀，直到死亡”；“有一次我到乌祖县的贡抱山区，远看那里遍布著许多白白的东西，我好奇，就走过去看，原来都是人头骷髅，吓得我拔腿就跑。”

（五）“人民因饥饿而偷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一旦被红高棉发现，没有谁可以逃过死亡。在我们村里一男子为了给产后的妻子补充营养偷了只鸭，最终被发现。村干部对他说‘晚上，你跟我们一起去森林。’他就明白了，他对妻子说：‘我这次一去不回。我们的孩子是养不活的，你要保重自己。’晚上红高棉带他到了合作社食堂，二话不说就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把他像畜生一样拖到森林里去。途中，他跪下苦苦地向他们哀求。但还是被他们杀死。”一个华人的孩子，因为饥饿在夜里偷偷进入食堂寻找食物吃，不慎把上衣遗落在食堂里。第二天他被查出，当天就被红高棉枪杀在田野里。

（六）“1977 年 12 月 22 日晚上，我的家庭和邻居们，被武装的红高棉带着，出发去暹粒省的某处劳动营。那里有几千人在挖一个巨大的运河工程，我看见那里的人们全都处在最糟状况，他们的身体只剩皮肤和骨头。我们被强迫白天和几乎整夜地劳动，许多人因为中暑、生病、疲劳和饥饿在我面前倒地死去。我们这一队人也开始在泥泞中陆续倒下，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埋葬，因为我们都极度精疲力尽，无法埋葬死人。死者的亲属显示出既悲伤又庆幸的感情：死了的亲人不必再受苦了。一天，红高棉集合了我们 79 人，告诉我们要去洞里萨湖（Tonle Sap lake）为政府捕鱼。我们在通向大湖的一条道路上，向南走了大约 6-7 英里。一个孩子途中死去，红高棉兵犹豫着允许了母亲就地埋葬了她的孩子。在晚上大约 7 时我们被命令转向一条森林小路继续前行。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约 50 个端着枪的红高棉，他们用枪瞄准我们，捆绑我们的双手，然后用刺刀和树棍打杀我们。我被刺倒，至少受到 15 下重击。一个男孩的头被打碎，一股血和脑浆喷在我的脸和身上。我醒来后好久才意识到我还活着，周围躺满了死人。这时是 1978 年 1 月 1 日的凌晨。我顽强地用肘和膝爬行离开了这个杀人场。我趴在水洼喝水，吃森林地上的野果，用了 17 天的时间，终于发现了森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留着无用，杀掉不可惜”是红高棉的重要的国策之一。这个国策被写进红高棉内部文件而成为证据。也是迄今幸存的柬埔寨人民的十万份回忆录所共同记载。大规模屠杀人民的最无理的理由，却又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令人匪夷所思。这甚至不象极权暴政那样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杀人行为。此外，无法承受繁重劳动的病弱者被指为“懒惰”，有任何不满的人被指为“反革命”，悲伤情绪也被指为抵触“安卡”，某些稍有知识的“新人”自制一些省力农具也被指为“资产阶级伎俩”，还有“偷吃食物”、“捉青蛙或昆虫吃”、“采集野菜”、“低声私语”、“夫妻私会”、“讲错话”等罪名，都是当时很流行的处决罪名。对于民众来说，清白无辜和逆来顺受并不能防备无故杀害。对于红高棉来说，杀人不再是为了巩固政权或打击敌人，而仅仅是一种随意的、打发无聊或寻求一时兴奋的行为。红高棉为了取乐，最常见的杀婴幼儿方式是把嗷嗷叫的孩子抛起来，用刺刀迎接落下的孩子，或者对着大树活摔孩子。孩子的死活和痛苦挣扎都无所谓，反正那是必须被消灭的生命。这样的恶毒行为就是当时整个柬埔寨到处存在的普遍状况，人命从来没有被如此作贱过。人民被“安卡”逼到了崩溃绝望状态，他们感到被人类世界抛弃了，永远无法回到正常生活，希望也随之灭绝。许多人急需帮助或安慰，但他们最终无法坚强而自杀了，他们只能极其痛苦地违背了自己的“不杀生、不自杀”的佛教信念。

14、除了屠杀，红高棉的故意导致人们死亡的劳累饥饿政策，许多人民死于过度工作和持续饥饿。红高棉认为民众每天三次进食是不必要的，改为每天两次进食（红高棉人员仍是每天三次进食）。民众的食物配给是非常微薄的，远远不能支持人体的需要。

饥饿的柬埔寨民众骨瘦如柴，面部浮肿，头颅胀大，还被强迫以每天 12-16 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在任何季节里都没有歇息而被迫连续劳动：在雨季期间种大米，在旱季期间挖河修筑灌溉工程。原本，柬埔寨一年可种三季庄稼，仅马德望一个省出产的粮食就可养活全国人民。而现在，饥饿成为柬埔寨的国家特征。集体食堂的食物大多数是草类和野菜。人们偷吃一点芭蕉、玉米棒等等，会被捕到监狱或者就地处死。民众收割的大米被“安卡”运到空荡荡的城市存储，这些大米的下落不被人知，从来不会再分配给民众食用。

劳动营里人们的证词摘录：

（一）“1 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锅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几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类来吃。因为吃下了外表象木薯但有植物的植物，结果我们所在的劳动营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们都不被准许住在村子里，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里，森林里有‘瘴气’，许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 20 人被分派去种菜，他们每天每人要挑 100 多担水，种出的菜要满足当时 1 乡 4 区的几千人吃，哪里会够？没有米，每天每人分 2 根芭蕉，还有芭蕉头或树干都被砍下来分配给人民吃。”

（二）“那时我是 16 岁少女，因为吃不饱，又瘦又小，看起来只有 10 岁左右，即使这么瘦小也没逃过厄运，红高棉把我编入青年队，那是一等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几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样，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龙的秧，完不成插秧，会被罚减饭食。其实集体饭食只是两罐（罐头盒）的大米，加一大篓野菜煮成一大锅稀粥，每餐只分给我们一大勺子。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如果插秧完不成规定数量，稀粥就减到半勺子，这不是只等饿死吗？不过，挖土筑堤比插秧更要命。没有插秧的日子，我们（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两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艰难。我个子瘦小，挑起泥土时，畚箕会触着地面，腿也发软，常常连人带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三）“陈雷是一名高大的华人青年，但在那个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食量大。在那种环境，别说吃多少，根本就没了吃。陈雷饿得患上浮肿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体食堂都被撵出来，红高棉说他没做工，不许吃饭。2 天后，陈雷饿得没办法，便拿起一把小斧头到食堂，向人们哭诉不准他吃饭的可怜情况，用小斧头一下一下往自己头上砸，鲜血往下流。人们都吓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惧，谁敢出声？这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偷偷摸到陈雷背后，抢下斧头，把他抱住，又跑上几个红高棉，把陈雷捆绑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树下，活活就给埋了。”

（四）一位在菩萨省嘎弄则村的证人说：“有一天，儿子病了，连续腹泻好几天，我接到消息后，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卫生站，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简陋卫生站里，孩子喝了几天老鼠屎一样的黑药粒，毫无起色。当孩子在我怀中断气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在红高棉年代，每天见到太多的死人，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不会哭也不会笑。直到有一天，丈夫从工地回来，我告诉他，孩子死了，我们夫妻俩才抱头痛哭。过不久，家婆也死了，接着丈夫和两个小叔也一个接一个地病死或饿死，7 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变呆

了，一天到晚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会说，只默默地低头劳动，身心的折磨和打击让我成了一个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都死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在这破烂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还得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下田。过了几天，两腿肿得举步艰难，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见，但队长还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间劳动，我没办法，只得拖着沉重的肿腿摸黑出门，没走几步便撞到大树，把头撞破了，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15、制造社会恐怖。目的是双重的：使人民经常处于恐慌和畏惧状态而成为驯服工具，也令人民不敢产生抱怨或逃跑的意愿。红高棉从来不屑使用、也没有能力使用思想洗脑方式，红高棉只使用很原始的恐怖方式：通过苦役、饥饿、残害和处死，使人民害怕并服从“安卡”。恐怖不仅仅针对“新人”而扩大到社会的所有群体，甚至包括受清洗机构威胁的红高棉干部。例如现在主管“科技部”的秀木（原西哈努克流亡政府财政部长）诉说：“当你听见安卡的名字时，让你心惊肉跳。”

有证人说：“时时有安卡的人在监视，讲错话随时会被叫去‘开会’，一去就不能再回来。所以，我们每天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死神随时会降临，但我们还是渴望多活一天。到天黑睡觉时，人躺着，可耳朵却格外注意动静，一有声音或脚步声，立时会全身绷直，恐怖到极点。每天早上醒来，在庆幸自己逃过了黑夜之余，今天又可以多活一天的狂喜，支撑着我熬过这一天。”

16、对女人的压迫。配偶被安卡以集体方式任意指定或者隔离。由于禁止爱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着强迫的性关系和各种各样的性暴力。无论在军事单位还是在地方村庄，都有许多的集体强奸案发生在对女人的监禁期间和处死之前。一份证词说：“有目击者，在离我村不远的地方，红高棉每天捉走 20 至 30 个村民去杀掉，被他们捉走的女子，都被他们先奸后杀。”不少见证者都看见过怀孕女人被绑在树干上，红高棉活活剖开肚子，胎儿蠕动着从她们的子宫里被用刀具挑扯出来，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无法言说的恐怖。他们还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怀孕女人的青黑色脸颊。

红高棉控制人们的性生活，严格禁止指定交配之外的任何性关系。安卡决定所有人的交配关系，包括寡妇被强迫“出嫁”，连红高棉女干部也不能例外。女人们被教导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安卡。许多年轻女子拒绝或者推迟被指定的交配关系而遭到毫不留情的处死。许多营养不良的女性因为性逼迫而死亡。“那些受伤的红高棉兵，他们认为自己对国家来说是功劳非凡，漂亮些的少女必须‘嫁’给他们。许多少女为了躲避他们，只好穿上母亲的旧衣服，扮成大年龄的妇人。但即便如此，她们仍然逃不过。”

展示红高棉的婚姻政策的一个实例是，一个 15 岁的红高棉女干部被安卡分配“嫁”给一个运送弹药的红高棉兵。她的前男友爬上房子向她大喊：“我永远等着你。”她说：在当时她的周围已经有 5 对被强迫“嫁娶”的夫妇，如果在分配结婚的两人之中，一方拒绝对方，那么拒绝者将被送去“再教育”，也就是被打死。即使如此，红高棉的政策仍然另有不可思议：限制最纯粹的性生理需求。这女干部说：“（指定交配的）夫妇被安卡分开，配偶两人一个月也许能见面一次，还需分别贿赂村干部和女方单位。”该女干部以自己为例说：她的“新婚”仅为 3 天，然后夫妇被分开，不让他们在一起分享婚后的新生活。不过，在柬埔寨东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稍微具有独立性的地区，还是短期允许被指定的“新婚”夫妇同住在一个自搭的小茅棚里。

17、政治童工的使用。红高棉专门建立了“少年劳动营”，达到 6 岁年龄的幼童就被红高棉从父母身边带走。幼童被饲养和教育成为反人性的工具“政治童工”。红高棉的政策设计故意打破孩子对父母的亲情。孩子并不被给予文化教育，而是被教给党的宣传，供红高棉从中选择未来的党员。在“少年劳动营”，孩子们没有玩耍和游戏，童年的所有快乐都被剥夺。许多 12 岁以上的少年是最残忍最不懂事的红高棉打手。这些对孩子的罪行是最不可原谅的。

西哈努克特别注意到红高棉对“政治童工”的使用，因为孩子们容易被灌输丑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写道：“这些少年兵被训练，比赛谁在杀害生命上更残忍”；“我在金边被拘禁的 3 年里，我看到负责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动物（狗、猫、猴子、壁虎）来开心取乐。”

一个证人说：“我们家庭有 12 口人。为了控制人民，红高棉拆散了全部家庭，以及隔离孩子们。人民的所有活动被控制，被严密监视。在 1976 年，我的 3 个兄弟和 3 个姐姐被强迫去青年劳动营。我 8 岁，被强迫与父母分开去了少年劳动营。我几次溜回家依偎父母。红高棉发现了我曾经偷偷摸摸地离开，不久后他们带我再回家去看看：尽管我们的家还在原地，但空无一人，我的父母都消失了，这使我再也不想溜回家了。在少年营，我每天被分派去砍灌木丛，晚上被强迫去田野里捉田鼠。睡眠不足，许多次我在田野睡着了，又被鞭子抽打唤醒。食物不足，营养缺乏，每个孩子只给一碗水样的米粥，能给盛满碗就是最大的幸福。”

红高棉对孩子们也很凶恶。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妈妈”的 10 岁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劳动营”。在那里，她心爱的、视同为妈妈的小篮子被红高棉故意踏烂，却并不为什么。她只好自己呜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个穿着硬轮胎靴的红高棉监工，一脚踢得那女孩飞起 1 公尺高，摔在 3-4 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里翻滚。“英”说：“那个女孩受了严重内伤，她呕血。不知道后来是不是活了下来。”

18、吃人。柬埔寨的历史记载显示高棉民族没有吃人的传统。而红高棉吃人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把它当作“革命”的壮举。

一位证人说：“（越侨）阿联被当场打死了，红高棉干部拿刀来剖腹，取阿联的肝炒吃。我听到如此，不由自主地吓得尿裤。大家看到村干部动手剖腹，立刻丢下汤匙，爬进屋内。我好奇，又从屋里探出头来偷窥。我目睹干部把阿联的肝倒进炒锅里去炒。炒锅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动，发出‘嘟嘟’响。干部问我们：‘同志们，谁要吃人肝？’大家缩成一团，不敢作声。他们大吃，还说‘好吃！’吃完，他们把阿联的尸体拖到他们开枪击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树下作肥料。”

红高棉干部苏克哈证明，当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尔（Snuol）区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红高棉干部捆绑并脱掉一个年轻女子的衣服，剃下她的两个乳房，油煎吃掉。这个干部名叫 Ski，是少年劳动营的一个监工。苏克哈还在 2000 年指证道：这名干部现在还活着，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读者会有何感受：那年轻女子胸前两个血淋淋的大窟窿，抽搐鬼叫惨不忍睹，红高棉干部却能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鲜乳房。

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一些人民也不得不偷吃人肉。“村里不时发生偷吃人肉现象，因为长期饥饿。每个人都浮肿，家家都有人死去，每个人都变得麻木，亲人死了也不会哭，

因为眼泪流干了。活着的人都半死不活，没有人会想自己还有明天。每天都有人死掉，埋葬的坑也不深，有几次人们发现刚埋下的死人，第二天会露出一条腿或一条手臂，却缺了一大块肉，是被人割去吃。极度的饥饿使人失去了理性。在那个时代，为了活命，又有什么办法呢？”

19、把家庭关系放大到社会统治，是红高棉的另一个特点。塔莫全家和姻亲都担任要职，英萨利的妻子、宋成的妻子都是国家部长。英萨利的一个女儿被指定为金边医院（Calmette Hospital）的领导人。英萨利还把一个侄女作为英语译员指定在金边广播电台工作，而此人的英语能力极为有限。柬埔寨国家的一些部委，例如外交部和工业部，都被有权力的红高棉家庭所控制。

综合红高棉“社会革命”的上述特征，可以说，柬埔寨在表面上好象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现代定义上，它并不是个国家。柬埔寨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意愿和生存权利可言，他们孤苦无助，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不允许有日历），他们仅仅苦熬著，竭尽全力把自己单薄枯瑟的生命带入下一天。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一片空白，不顾怎样殴打虐待、不顾劳苦艰辛、不论给不给食物、也不论自己算不算人类，只是挣扎着活到明天，如同僵尸在坟坑前的无效打坠……。这个“国家”确实可以被描述为：人命贱如泥土，黑暗不见天日，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一个骇人听闻的红色世界。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它，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或共产党诸国里，它也是独一无二。

(20/28)红色奴隶制

历史学家们已经谨慎地确定：从 1975-1979 年在红高棉统治下的 3 年 8 个月里，有 170 万~200 万人民死于大规模处决、强迫过度劳动、蓄意饥饿和虐待，约占柬埔寨总人口的 23%~27%，死者与幸存者的比例是 1：4，平均每个家庭失去 1~2 个成员。对只有 700 多万人口的小国柬埔寨而言，这是共产党在和平时制造出的“百万颗人头落地”，惊人规模的人口死亡，是世界之最，超过了人类史的任何残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红高棉完全没有人命的价值概念。有正直的网友说“（红高棉）他们本身完全没有对这些血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排斥，真是太难以理解了。”红高棉真的杀了如此多的人民？这被以下的四个根据证明了。

一、在柬埔寨四分之三的省份（另四分之一的省份尚未调查）所勘查发现了 19,440 个红高棉杀人的集体坟场，这些集体坟场被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以卫星定位标记，集体坟场的发掘得到了大量尸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一个小山沟，在清洗东部大区时期在此小山沟估计杀有四、五千人（经当时在场的 3 个红高棉兵分别指证）。

二、柬埔寨人口统计学数据

三、超过 1 万份红高棉各层级的内部文件的记载

四、超过 20 万份柬埔寨幸存者的证词

世界上还没有其它国度经历过柬埔寨这样巨大比例的生命损失。虽然杀戮人民是全球共

共产党的“专利”，但红高棉达到了巅峰程度，远远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残暴，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世界纪录。红高棉对待同胞人民的恶毒和残忍，已失去人间物种的特征与意识，展示了唯有共产主义能把人的恶劣性诱发到极致地步。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种族屠杀”（autogenocide）。学者程映虹指出：“与世界上其它大屠杀所不同的是，红高棉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宗教的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它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重构。”迄今还没有一种合理解释：是什么东西指导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共产党政权（红高棉）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用最残暴的手段——原始到不屑拼凑“罪名”——快速歼灭了自己民族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红高棉进行的“社会革命”（社会重构）是如此的奇特。柬埔寨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财产、文化、教育、知识、通讯、交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身自由、天然权利、甚至在基本生存上，都被剥夺干净。这根本不是什么“农业乌托邦”，而是一个政治制度突然进入混沌阶段的濒死社会，即使远古时代的奴隶社会也不能与它类比，因为远古的奴隶社会也允许奴隶们的适度生存。一些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资料在研究了红高棉政体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在这个政体下，连最低生存需要的山野村夫也无法活下来；“毫无疑问，这个政体是20世纪最灾难性的社会试验之一。它表现了令人惊讶的无能、麻木和残忍。”学者利奥·库珀（Leo Kuper）把红高棉政体定义为“奴隶制系统的新类型”。学者本·柯尔南（Ben Kiernan）认为它摧毁了柬埔寨人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家庭、土地和宗教三个要素，实际上它是一个“契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而越共最高领袖黎笋总书记观察了红高棉的“社会革命”形态，断定它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极权“社会主义”，而是人类史上首次出现的“红色奴隶制”（Slavery Communism），黎笋强调：“它是唯一的，从来没有过类似物。”甚至连最不习惯说真话的乔森潘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个“罪恶乌托邦”。

在那个充满艰难惊骇的历史时期，高棉人民受苦受难，却并不追随“共产党”，他们没有像中国人民那样一面受苦受虐一面帮凶作孽，欺压同胞。因此在命运结局上，高棉民族与中国民族，也会有不同。

这里，出现了一串难懂的事情：红高棉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重构”？为何摧毁柬埔寨的常态社会？为什么撤空城市？为什么要构建一个“红色奴隶制”乌托邦？他们的构建计划是如何产生的？红高棉“社会重构”政策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是柬埔寨而不是其它国度……？

除了本文，世界上没有人能讲清楚这个“红色奴隶制”的起源。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柬埔寨“红色乌托邦”在出世的前后时期内，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以及各个事情之间的关联。（此处删去4千字）……其中的秘密一定起源于北京。这个起源是20世纪政治史上最厚重的谜团之一，答案就隐藏在一系列被掩盖或者被忽略的细节之中。

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剥夺人权、没收民众财产、禁止商品流通、拆散家庭、取消社会分工，废除劳动报酬、全国“合作化”、土地充公、取缔宗教、闭锁国家、拆散一切正常的社会结构（包括交通、邮电、教育、医疗、文化等系统）、改变大众生活方式、实行“红色奴隶制”等一系列“社会重构”急速展开。柬埔寨的时空急速逆转，变成一个“黑洞”型的“红色乌托邦”。

正如当时的观察家们所说：“柬埔寨的战争没有结束，相反它只是开始，高棉人民变成

了新敌人。”乔森潘也不知红高棉的“革命”是如何突然变了方向，他写道：“我不是柬共中央的成员，没有参与过重大决策。我知道 1975 年在金边解放之前，新版钞票已经被（中国）印制了，也听说这些钞票已运到柬埔寨了。但是为什么突然取消了货币，以及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我就知道了。”

红高棉夺取金边，并没有中共那样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完全是靠着中共的外来支撑：从香烟、罐头、胶鞋、方格围巾（红高棉成员的标志，并不允许民众搭颈使用）、黑衣、钞票……到枪支、弹药、火炮、地雷、汽车、燃油，再到外汇、舆论、外交和海外“革命”华人资源，都充足供给。红高棉自然要把柬埔寨的“红色乌托邦”展示给毛泽东看。在 1975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波布、英萨利在北京会面时，毛很兴奋，说“我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的好。”

构建“红色乌托邦”，红高棉怀有怎样的政治信念？从他们的言行，可察知他们在柬埔寨实验，难说是起源于热爱共产主义，相反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妄臆。一般来说，专制权力对人的丑恶心理有巨大的诱惑力，波布等人也不会例外。以非凡的“成就感”而表达自己是“伟人”的欲望，是一切“暴发户”的普遍弱点，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能力来抵抗那种不切实际的欲望，这可以从波布、英萨利、农谢、乔森潘、宋成等人多次的自诩中得到确认：

1975-1976 年期间，红高棉“党中央”反复宣称柬埔寨“红色乌托邦”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就。1975 年 8 月的《桐树》杂志说：“我们敢于进行与世界上任何革命都完全不同的一个伟大斗争。”1975 年 10 月的红高棉文件宣称“从金边撤空全部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The expuls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Phnom Penh is a measure one will not find in any other country's revolution*）而“党中央”更多的宣称是：“我们没通过土地改革或社会转变的时期，我们从民主革命直接跳跃到共产主义，（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相比）差别不仅仅只是一步”；“全球的共产党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红高棉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安卡胜过了列宁并且正在超过毛泽东”。宋成也告诉西哈努克，“我们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将被确认。”显然，这些夸耀表明红高棉“党中央”认为自己干出了一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创新性伟业，名垂历史。

红高棉以“种族灭绝”手段在柬埔寨推行“红色乌托邦”，而共产党政权所常用的欺骗宣传、社会裹胁、恐吓挟持等稍微复杂些的方式和策略，在红高棉的“社会革命”里从未出现过。兽性杀戮方式是不需要政治智慧的。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红高棉在柬埔寨推行了一套妄想型的“社会革命”，导致了令人发指的社会灾难。长期以来，国际上研究“共产主义”的史学界对红高棉的“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有着不同认识，学者们争论着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种种原因，争论着红高棉政体究竟是农民造反、暴民政治、民粹主义、波拿巴主义、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事实上，这个面目可疑的红高棉“社会革命”，从头至尾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不符合任何已知的“主义”。这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人类史上也“从来没有类似物”。柬埔寨事实表明：“它系统地展现了如果在全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整个人类将要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这使全球得到了明确的警告，也就破坏了共产主义的蛊惑性。”

“红高棉”（*Khmer Rouge*）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共产党组织，其胚胎形成于 1950 年 10 月初英萨利在巴黎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953-1956 年这个“小组”以面目不清的芽孢形

态来到柬埔寨，钻入柬共“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之后，它寄生在柬共内部，吸取共产党的养育和斗争手段，逐渐积累了本钱。在 50 年代末，柬共因内讧而大受折损，使它乘隙在 1960 年钻入柬共中枢；1963 年柬共总书记杜萨木神秘遇害，它趁机篡取该党权柄，从而开始了自己在柬共母体里的成长，逐渐架空柬共。1970 年西哈努克为一己之私而发动柬埔寨内战，红高棉意外受惠于北京的阴谋策划，始登柬埔寨政治舞台。它接管了西哈努克的政治资源，借助于越共的军事力量和中共的倾力扶助，运势大展，又恰逢越南战争所造成的种种巧合机会，终在 1975 年夺取了金边政权。“柬共”是由越共扶植的柬埔寨本土的共产主义组织，“红高棉”是被沙洛沙、英萨利及其亲信把持的柬埔寨红色帮会。“红高棉”在柬共内部成长但与共产主义并没有政治亲缘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柬埔寨华人状况。

在柬埔寨，华人陷入了他们从不曾遇到的处境。柬埔寨华人为红高棉“革命”提供过支持，因此华人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功臣”，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应该坐享“分羹”、至少会有社会的较高地位。但红高棉并不这么认为，消灭华人是红高棉“党中央”的内定方针。表面理由是：柬埔寨华人几乎都从事过商业或服务经济活动，因此被红高棉断定属于“剥削阶层”。而实质理由是：红高棉一直认为华人是一群有异心、受外国共产党指使的特殊群体。因此华人们统统被红高棉标记为“要被消灭的阶层”。在红高棉执政期间，柬埔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被红高棉杀害，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印尼华人被杀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对红高棉革命“有功”的华人，连同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华人——都很自然地急切产生出“华人有难，祖国来救”的幻想。然而，他们无路可逃，性命难保。

红高棉对华人的暴虐很可能得到了中国当局应允。红高棉干部反复向华人宣称一个著名理由是：“毛泽东是你们的父亲吧，现在你们的父亲（授权）让我们随便怎样处置你们。”本文作者在访问了在红高棉统治时期生活于柬埔寨不同地区的几百名华人幸存者，他们之间互不相识，但他们都能证实：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他们都分别听到过红高棉干部宣布此说法，华人之间更是惊恐转述，很多高棉人也证明当时在柬埔寨确实存在着这个说法。很清楚，这是红高棉政体的组织系统的行为，而不是某些基层的自发创造，使得红高棉认为虐待华人华侨是不必顾忌的。

一位还盼望“论功行赏”的华人说：“大批华人青年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争取柬埔寨从美国手中独立而战斗。但是，在波布执政以后，实行极左路线，执行阶级斗争，大批华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苏联克格勃（KGB）的人、地主买办分子等等。上至‘华运’领导者，下至华人平民，都遭到残酷迫害。”一位原“端华”学校的林姓学生说，1975 年他的班主任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带领一些华人学生投奔丛林，参加了红高棉游击队，后来在红高棉胜利后执政时期那位班主任全家老少都被红高棉杀掉了。

“华人大队”也被撤销了编制。在一份 1976 年 1 月份的红高棉军事系统关于分派大米生产任务的文件中，这个“华人大队”已被代名为“中国同志”大队，转变为劳动单位，分派的大米生产任务是 5,000 担（柬埔寨 40 担=1 吨）。参照红高棉各师的人数和大米生产任务的比率，估计“华人大队”现存人数约 2,000 名。据当年的华校学生们说，“华人大队”成员多是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在 1976 年以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那些“华人大队”的同学和朋友，因此他们推测“华人大队”可能也遭到清洗，基本上没有幸存者在世。中国文章也提到“参加红高棉的华人，后来几乎都被红高棉打成台湾特务，予以消灭。”还有著述说：“在（柬埔寨）各地各部

门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和遇害。”

柬埔寨华人圈里著名的“爱国”侨领陈某，自认为对中共来说很有“价值”，应该居功享有“胜利果实”。1975年4月他全家十几口人也被红高棉驱赶出金边。在苦难的行程路上，他不断地用石灰块在路面、在路旁房子的墙上用中文大字写下他的名字，并画上他一家人被驱赶方向的标示箭头。一路同行的黎先生对此不解，陈侨领告诉他：“现在柬埔寨大乱，我们遭遇大难，周恩来一定会专门派人来寻找我，来救我的命。如果中国派来的人看到我的名字和方向标示，就会找到我，救我一家去中国大陆。”但黎先生判断这只是个无用的幻想，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下，最要紧的是设法保全自己性命。陈侨领不愿听，他说：“你们不懂。周恩来是一定会派人来救我的。”他固执地沿路无数次写下自己名字。但是，奇迹没有出现，不久后陈侨领及其全家老小皆被红高棉杀死了。

另一个华人侨领的遭遇是：“华人阿秀，她家是50年代柬埔寨著名的商家，在离开金边家园的时候，家人身上携带了许多黄金。后来，当阿秀家把黄金换光，因为没得吃，全家人饿死在一起。那天，我偷偷溜出来找阿秀，当我把门推开后，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一条条蛆在尸体上爬动，我拔腿就跑。”

高棉人马迪生（Mardi Seng）的证词是：在（合作社）集体饭堂角落里的那些“新人”是华人，他们总是扎堆坐在一起。几天以后，我注意到一些华人不见了。我问母亲这些人去哪里了，母亲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去以前常抓青蛙的一个土坑，想再抓几只青蛙，但那个土坑被填平，它已是一个坟场了，四周有可厌的气味，有15-20个华人在那个土坑里腐烂着，只因为他们是华人而已。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更多的华人在晚上消失了。每当晚上来临，都是最可怕的恐怖时刻。

(21/28)民主柬埔寨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许多因逃亡而得救的华人们说：“越南人（越共）对华人真的是很好，凡是逃到越南的华人，都得到了救助和医疗。”

前已述及，在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国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

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布在 1975 年访华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国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国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一份调查报告说：“在红高棉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几十万华侨被红高棉杀害，实际情形，中共使馆最清楚，中方没有在国内外透露一点风声。当时，中共人员遍布柬埔寨各部门，所有的华人求救都被封锁了，华人的求救纸条被中方转交给红高棉，这些求救者的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华人呼吁道：“中共唆使柬埔寨华人华侨盲目地追随，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装革命，最后反遭红高棉的大批屠杀，这些都可以说是柬埔寨华人自己的罪错。但是东南亚多次排华，中国当局吭过一声吗？有向华人援手吗？即使口头的声援也没有。华人华侨走投无路，大量被杀。他们效忠中国，但得到了怎样的对待？中国以对待海外排华的态度，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华人华侨效忠谁或者不效忠谁。”

而中国援柬人员的解释是，“红高棉靠倒在我们（中国）身上，成为中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尽管如此，红高棉对我们（中国）也是疑神疑鬼。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很多。我们支持红高棉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华，实际上红高棉排华远远超过了越南。中国对红高棉的排华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这样就导致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见到援柬的中国人，就大喊赶快救他们，或者怒而骂之。为了不引起红高棉更多猜疑，我们的援柬人员就尽量避免与华人华侨接触，这也导致华人华侨对中国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 60 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 60% 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 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有一种歌词对东南亚华人的描述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着红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着白色恐惧。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这是什么道理？”

红高棉的“种族灭绝”政策也针对了越南侨民。因种种原因滞留在柬埔寨的越侨估计还有 2 万多人。这些滞留的越侨仅仅熬过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被红高棉有组织地在全国各地追杀了。那些越侨基本上都属于劳工阶级，完全不属于“剥削阶级”，而红高棉杀害越侨的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越南人”。

一位证人说：“一天下午 5 时许，我和人们一起在茅屋前准备饭食，村里突然传来了红高棉村干部的喊叫‘捉住阿联！他是越南人。’我们听后，劝阿联立刻逃跑。但他没跑多远，就被几名红高棉开枪击中脚部，摔倒在地，被他们像死狗一样拖著回来，经过污泥山石，从几百公尺处被拖到离我们约 5 公尺的地方。阿联的脸和身体被拖得一块块皮肉都烂了，令人看了毛骨悚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瞪著眼睛，从炉里取出一根烧得火红的大木柴，狠狠地烙住阿联的脸和头，发出‘滋滋’的（烧肉）声音。不但如此，他们还用大木棍把阿联活活打死。”

另一份作证是：大个子的华人 Q 亲历了红高棉一次为时十多天的屠杀越侨的行动。当时他和另外几名青年被赦免处死，负责监视被屠杀者不让逃脱和清理现场。Q 说，这宗大屠杀，他是唯一的知情者。他希望有人根据他的口述把真相公之于世，他会带人找到那次大屠杀的现场。红高棉对越侨下手就是采用上述那种秘密屠杀、消尸灭迹的方式，数以万计的越侨消失了，越南（共产党）政府无从得知真相。后来，越南兵进入柬埔寨找不到 Q 这样的知情者或者目击者，也就无法知道秘密屠杀的地点。

一个高棉证人说：“塔歌（Ta Chea）当了小区领导人。他专门伤害和折磨华人、占人（Chams）和越南人，许多那些种族的人被他的命令所处决。他的最得力助手是我们村庄里最野蛮的赖痞，很喜欢残忍地打死别人。塔歌靠这个人带队去大量地杀人。”

尽管河内还不知道红高棉正在柬埔寨境内杀绝越侨，但是越南人从红高棉越来越频繁的边界挑衅中，察觉到红高棉的恶意。1975年5月，在柬埔寨东部，红高棉部队入侵了越南边界。在柬埔寨南部的海上，红高棉部队再次攻击越南领土富岛和土珠岛，而这两个岛屿的归属从来没有争议。同年11月在柬埔寨东部23号分区（柴桢省“鸚鵡喙”地区），红高棉部队越过边境袭击了几个越南村庄。1976年1月4日，红高棉使用加农炮攻击越南的塔岛（Tral）和富岛。1月22日在柬埔寨东部，红高棉声称边界对面的越军驻地是柬埔寨领土，狂妄地命令越军撤离。可是越军予以藐视，并轻易击溃了红高棉部队的进攻。2月份，红高棉又越过柬埔寨西部边界去袭击泰国人。

现存的有关红高棉部队发给波布、宋成等人的许多军事报告显示，驻东部的红高棉920师的指挥员之一的辰（Chhin）最为热衷挑起柬越边界事端，他向“党中央”要求更多的弹药以制造更大的战斗。这使得东部的边界冲突的规模由小到大，局势越来越严重。1976年2月6日中国与红高棉签订了一个针对越南的秘密协议：中国向红高棉提供武器，红高棉提供士兵，两家联手挑衅越南。2月22日红高棉“党中央”会议决定在东部边界地区加强对越南的攻击以及从中国获取更多武器弹药等问题，参加者有波布、农谢、英萨利、温威、宋成、都恩和乔森潘等人。5月18日越南副总理范雄来到金边，试图解决柬越边界冲突问题，无果而返。8月24日中国驻金边大使馆书面通知宋成，鼓励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中国武器援助的细目，这份文件后来被越南人缴获并公布。

红高棉向越南的挑衅政策，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鼓励。波布说：“中国可以帮我们吓跑敌人（越南）。能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的。”而那些曾在金边大学进修柬文的中国人，现在都被中共派往红高棉各重要部门去担任政治顾问，“他们在红高棉时代的柬越两国恶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6年3月在一份红高棉文件里，“党中央”断定：越南共产党企图与泰国及美国第七舰队合作，要联手灭亡红高棉。西哈努克曾经询问乔森潘如何解释红高棉对越南人的仇视。西哈努克写道：“乔森潘恬不知耻地告诉我，‘党要我们同胞发挥高水平的劳动效率、更勇猛的战斗热情，因此最好每天激励他们仇恨越南佬（Yuons）’。”

1976年2月中共派遣副总参谋长王尚荣（Wang Shang-rong）前往金边，主动增加了中国的军火武器援助。1976年中共中央“文革派”张春桥来到柬埔寨考察“红色乌托邦”。同年7-8月，红高棉的国家副主席索平、副总理宋成带着针对越南的军事任务去了北京，与中国当局密谋。

在 1975 年下半年，在中苏对立的格局中，越南倒向了苏联，红高棉倒向了中共。这个结果导致中共和越南的关系恶化，也导致红高棉与越南的关系恶化。河内承认“在 1975 年越南不准确地评估了柬埔寨的状况”是一个大错。但是，设若当年河内决策让苏联介入红高棉事务、与中共角逐，将不会出现今日的局面。可以说，河内胜算了越战，失算了柬埔寨。曾经长期负责扶植柬共的原越共南方局领导人范雄、阮文灵、黎德英等人，对红高棉的背叛行径尤为憎恨。这些人在越战胜利后都进入了越共中央最高层，这使河内对红高棉的立场更加强硬。

1976 年 1 月 5 日，红高棉宣布改变国号，居然给炼狱之国取名为“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 DK）。红高棉真是不加掩饰，连毛泽东也没敢采用“民主”一词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同日，红高棉甚为保密地对内公布了一份“新宪法”。由于当时红高棉政体的与世隔绝，这份“新宪法”不为世界所知。

1976 年 3 月 11 日红高棉“党中央”决定踢开西哈努克。几天后，被软禁的西哈努克接到了红高棉的命令。他写下了辞职书：“柬埔寨从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政权的魔爪下得到解放，柬埔寨革命以及真正民主都归功于柬埔寨革命组织（安卡）。我将完全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请允许我从今天起退休……”

由此可见，红高棉多次许诺柬埔寨的一切权力归于“终身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哄骗。此后，西哈努克控诉说红高棉对他的软禁待遇改为更严格的拘禁。他写道：“我在（回国）那时以后，就再没有见到过我的部属……也没有见到过随我一道回国的人，甚至没见过我的家人。我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 10 个孩子——我的孙子和孙女，全部都杳无音讯了。”此时他还不知道红高棉已经杀害了他亲生的 5 个儿女和 14 个孙子孙女，以及更多的皇室亲人。

首次的红高棉统治下的“人民议会”选举在 1976 年 3 月 20 日开场。现有的几万份证词可以证明，在那一天根本没有举行什么“选举”，包括“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在内的柬埔寨人没有谁见到了选票——也许是红高棉原本就懒得浪费纸张制作选票。虽然没有选举，却有了“选举结果”：红高棉宣布：98%的人民参加了投票，选出 250 位人民代表，组成“民主柬埔寨”的首届“人民议会”。没有谁知道这些“人民代表”是否真实存在。然后，这些“人民代表”煞有介事地选举了农谢为议会委员长，还成立了国家主席团来“代表民主柬埔寨”。4 月 22 日“人民议会”极为诡异地“选举”了一个名叫波布的“橡胶园农民工”担任“政府总理”。按照常规，人民有权知道政府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身份、履历、学历、相貌、品行、施政纲领等资料，然而柬埔寨全国人民没有谁听说过“波布”这个名字或者认识这个人，更不用说关于“波布”的其它资料以及这个人“安卡”的实际关系。人民只知道神秘的“安卡”是柬埔寨的统治者。

红高棉随后公布，政府由 9 个部和 6 个委员会组成。英萨利是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威是第二副总理主管国家经济，兼金边地区领导人。宋成是第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宁是宣传部长。周春是卫生部长。英提丽特是社会行动部长。塔池是公共事务部长。云雅特是文化教育部长。农苏恩是农业委员会主任。克多恩是商业部长。程安是工业部长。梅鹏（Mey Preng）是通讯部长。程安和梅鹏两人是温威的主要助手和亲信。冯（Phuong）是橡胶园部长。秀蒲拉西仍是驻联合国大使。波布的妻子乔彭娜莉是全国妇女部长，不过她的抑郁症病情严重，精神错乱，几次被送往中国治疗。在治疗无效后，乔彭娜莉被接回空荡荡的金边，

安置在一所别墅里，由专人伺候生活，波布不再与她见面，他们夫妇始终没有生孩子。“总理”波布执掌最高权力，他思维古怪，行动鬼祟，没有家庭生活，也没有后代。

直到此时，国际社会才确知掌权柬埔寨的是一个长期隐身的“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的政治面目模糊，唯中共对此知情。原西哈努克作为“元首”的柬埔寨名头及联合国的席位，都被悄悄地嫁接给“民主柬埔寨”所顶替。柬埔寨人民对红高棉“政府”成立的反应很麻木，他们说：“波布、英萨利、农谢、温威、宋成等人都是突然冒出来的‘国家领导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民众仅仅知道乔森潘和胡宁以前为西哈努克政府工作过。”

(22/28)清洗内部

在红高棉掌握柬埔寨政权之后，在红高棉内部还存有 3 个宗派：波布、英萨利、宋成、英提丽特等人为代表的“留法帮”加上投靠的农谢；原“柬共”老班底的克多恩、索平、三巴特、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等人为代表的“亲越帮”；原“柬-中友谊协会”班底的侯荣、胡宁、包查为代表的“亲中帮”。而温威、塔莫、柯袍等人算是“本土原生”，投靠了势力茁壮的“留法帮”。世界上的研究者们都基本同意这样分类。

“留法帮”占据红高棉“政府”的全部重要位置，掌控着军队、外交、内政和宣传。乔森潘因为具有“鬼话人说”的才干，又与乔氏姐妹有某种远亲关系，得以继续留任“红高棉话筒”角色。温威作为波布的亲信，掌管工商农业等 6 个部委和金边特区的政务。温威自己也有一个亲信小团体，主要有程安、梅鹏、克优。

在“亲越帮”之中，索平、三巴特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国家副主席，而克多恩和农苏恩的职权受温威的管辖。在“亲中帮”之中，侯荣已被“党中央”处死，胡宁、包查成为主要人物。

现在，“亲越帮”和“亲中帮”在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上受到了排挤，唯“留法帮”是红高棉政权的核心团伙。西哈努克也断定“柬埔寨只是波布和英萨利两个连襟家庭的国度。”因为乔彭娜莉精神失常，于是英提丽特便成为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女人。波布和英萨利两家成员的真实身份和一切活动都被当作国家机密。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有类型的“革命”运动都包含有秘密的主题，但是未见有类似红高棉那样的神秘偏执狂。

1976 年 3 月 30 日，红高棉“党中央”决定立即开展一个重大行动，即清洗内部以“消灭内敌”。清洗将由一个秘密机构来完整地执行，这机构就是杜赫主管的 S-21，它直接对“党中央”负责。这个强烈讯息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在内部并没有反对势力形成、也没有任何阴谋迹象出现的情况下，“党中央”急于部署内部清洗，并非源于事实的威胁，只能是源于假设。问题是，大清洗为什么会源于假设？

因为同时，“党中央”决定重新编纂柬共“党史”，最重要之处是改动党的创立年份：“把党的创立年份定在 1960 年；不要再用 1951 年……这样一了百了。”这个看似小事的提出，实质上包含著“柬共”历史不再被认可的重大含义，而且任何在 1960 年以前加入党的人都不再被认为是党员而必须重新登记。因此它引起了党内的深层冲突。克多恩、索平、三巴特、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周杰特等人都不同意这样改动。表面上这似乎是语义上的争执，其实背后的问题是：现在统治柬埔寨的这个“党”到底是波布的红高棉团伙还是正统的柬埔寨共

产党，以及这个“党”与越南共产党的关系。

从 1960-1975 年，柬共的创立一直都被认定是在 1951 年，亦即：在越南共产党的指示和扶植下组建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Khmer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KPRP）的创建年份。而 1960 年 9 月 30 日则是波布、英萨利两人进入柬共中枢的日子。

一个后来逃亡到越南的柬共干部作证：1976 年 9 月中旬，他们正在为党 25 周年纪念庆典作准备时，“我们接到党中央的紧急通知，让我们暂停所有的庆典准备工作。通知告诉党的创立日改为 1960 年 9 月 30 日，在这日期之前加入党的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再视为党员，而 1960 年 9 月 30 日之前任何党员在党内的这段日子将作废。如果他同意的话，党中央将保留他的党员资格。不然，他将被送去再教育。”

波布为什么要废除原先的柬共创立日期，而一定要改为他进入柬共中枢的 1960 年 9 月 30 日那一天？

波布的奇怪举动，表面上反映了柬共内部的派系争论，而实际上展示了红高棉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回顾“红高棉”的历史，在 26 年间它由一个在巴黎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国钻入柬共内部，长期寄生，逐步得势变成了柬埔寨的掌权者，现在它不再承认它的宿主柬共。改变柬共创立日的实际目的是要埋葬柬共，以红高棉“党史”取代柬共“党史”。以前，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红高棉”从来避免自称“柬埔寨共产党”，而总是自称“革命组织”（安卡），现在看来，那并非仅仅为了隐藏自己的共产党面目，从而提示了它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异形的政治组织。

准确地说，以 1960 年 9 月 30 日为创立日的“红高棉”，只是波布和英萨利的团伙“党”。这个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只是个“红色乌托邦”实验的操作员。

1976 年 4 月 2 日深夜，在金边发生了一个手榴弹爆炸事件和零星枪击。那地方是位于“高级兄弟”的守卫森严的住处附近。事后并未有任何人死伤，建筑物也没有受到损毁。这个爆炸事件的目的并不明确，后来的调查表明是一些驻金边郊区的红高棉第 170 师士兵们的私自泄愤行为。因为整编国防军，这些士兵们被分派到农村去种田，让他们觉得贬低了自己的“革命”身份。手榴弹爆炸事件并不含有进一步的阴谋，但“党中央”却看得非常严重。

170 师的前身是东区的主力部队，查克雷（Chan Chakrei，化名 Mean）是师长，莱本（Ly Phen）是师政委。查克雷现年 33 岁，佛教和尚出身，为人能干自信。但不知何故，波布不喜欢查克雷。1976 年 3 月波布把查克雷调离 170 师，让他到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把他置于宋成的监视之下。金边手榴弹爆炸事件发生时，170 师已被派驻金边郊区。引爆手榴弹的士兵们在一个星期内纷纷被捕，他们在酷刑折磨下被逼牵涉到上级。然后抓捕一再逐级扩大，刑讯得到的招供与杜赫的报告，一起迅速送达“党中央”。结果是 1976 年 5 月 19 日查克雷被捕。在 S-21 里，查克雷遭受了酷刑，他被指控为一个“叛徒集团”的领导者，到了 1976 年底，那份“叛徒集团”名单已集有 20 个高级军人和一大串同谋者。查克雷被捕后，谢杰顶替了查克雷的副总参谋长职位。谢杰春风得意，他开始出现在党中央会议名单里。

“S-21 的使命是一个清洗党内敌人的专门工具。它并不需要澄清真相。按照囚犯入狱人

数和被处决的囚犯人数来看，S-21 可称得上是这个国家最有效率的机构。”S-21 的审案方式一成不变：预设假定罪名，靠反复毒打来得到罪名的供认，再迫使囚犯牵连别人，编织出虚构的“内敌网络”，取得“党中央”的指示，然后处决囚犯。在拷问审讯期间，查克雷被逼承认自己和朗诺政体有联系，他甚至被迫编造曾谋划逮捕党中央的“高级兄弟”。不久，170 师的副师长莱维（Ly Vay）也被捕，他被迫模糊地招供“想扰乱金边的防卫”。查克雷也被迫招供 170 师的政委莱本（Ly Phen）和副师长罗斯蒲宏（Ros Phuong）、东部 24 号分区（柴楨省）的柬共首领卓乌克，都与金边手榴弹引爆事件有关。1976 年 6 月莱本被捕，7 月罗斯蒲宏被捕。

卓乌克是东部著名的革命者之一。他是索平的亲密助手。索平，圆脸矮胖，肤色较暗，他长期以来是柬共中央的高级人士，也是红高棉的军委成员和“国家副主席”。1976 年 5 月至 8 月索平到中国疗养。8 月份卓乌克被捕。从现存的卓乌克的招供文里得知，由于卓乌克和索平之间的密切关系，“党中央”对卓乌克的招供文特别感兴趣。可怜的卓乌克写道：“到了第 2 阶段，当用酷刑拷问我时，我只好同意说出高米斯也牵涉其中。组织还是不相信我，因为我无法提供有关我们叛国活动的详细资料，而我也懂其他人谁是叛徒。我不知道（叛徒）他们有多少人，也不懂他们怎样行事。然而组织有着先入为主的判定，不接受我的诉说，说这是党的最后决定。”

索平从中国返回柬埔寨之后，1976 年 8 月 21 日索平被召到金边。根据“党中央”传达的信息，在查克雷和卓乌克的招供文的压力下，尽管索平并不相信那些信息，但他还是表态谴责了卓乌克是“叛徒”。

一连串被迫编造的招供状，深化了波布的怀疑和假设。1976 年 10 月 9 日在中央会议上，波布指出：查克雷是越南人部署在我们内部的密探，“我们必须注意他说的东西，看他自己暴露是一个叛徒”，“我们必须完全沉默……我们必须监视他们的活动”。宋成也指出：“查克雷是美国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渗入我们内部的敌人。苏联和越南都与查克雷有联系，以便在内部策动军队，使我们的革命者在地位和等级的不满足上产生矛盾，来打败我们的政权”。宋成还要求各部队立刻开展清洗运动，于是红高棉的各师都开始了清洗，其中 170 师长科山、164 师长密穆特（Meah Mut）、502 师长苏麦特（Sou Met）、290 师长密塔尔（Meah Tal，又名 Sam Huoy）、801 师长罗恩（Roeun）、450 师长苏昂（Suong）、703 师长萨姆平（Sam Pin），310 师长欧恩（Oeun）都很积极，他们在军队中清洗和处决了数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士兵，少部分是军官。可是到了 1978 年，除了塔莫的两个女婿密穆特和苏麦特，上述那些积极清洗自己部队的各位师长也全部遭到清洗，被“党中央”下令处死了。

1976 年 7 月底，波布在波瑞高（Preah Keo）召开了“4 年计划”会议。计划有两个：加强对越南的武装攻击，以“大跃进”的速度开发国家。会后，大量的军事力量被调动到柬埔寨东部的柬越边界。

1976 年 8 月 21-23 日，大批红高棉干部来到金边，听取波布的“建立全方位社会主义的四年计划”。那是一份 110 页的冗长文件。波布要求每公顷田地生产 3 吨大米，还要在 15-20 年内同时完成柬埔寨的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但是，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柬埔寨一直是每公顷出产 1 吨大米，柬埔寨从来没有生产出那么多的大米。而且，红高棉正在把大米出口给中国以交换武器。波布似乎要建立一个以大米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且靠大米出口来支撑国家。他的“四年计划”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没有考虑

到国际市场的变迁、柬埔寨地质与水源的限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已经百孔千疮，严重短缺工具、牲畜和健康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农业机械了。最重要的是，经过了5年的内战和1年多的统治折磨，所有还活着的柬埔寨人民都已极度衰竭了。

“党中央”对西北大区寄予厚望，指望那里每年生产出全国大米总产量的30%。这项生产很大程度上要由约100万被驱赶到西北部的“新人”来承担，而那些“新人”正在西北地区被残忍地虐待着。据胡宁的引述说，西北大区领导人三巴特批评了“四年计划”的政策：“1976年党下达指示，要全国达到每公顷3吨大米的指标。而对于西北部，党下达了每公顷4吨的指标，要我们去完成。如果不解决农业机械的问题，我们怎样去完成指标？我们不能。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党中央的错。”胡宁还说索平也认同这个论点。

波布分派了不可能达到的产粮指标，他假设每个人民都有巨大的“革命热情”而能够种出大量的稻米，据说这些“热情”来自1975年4月红高棉夺取金边的胜利及其后进行“社会革命”所产生的动力。波布宣布：“我们抓住和转动了历史的轮轴”，“我们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速。”乔森潘跟风道：“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就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可是人民能办到。”但这些假设都是未经证实的空话。波布的“大跃进”不久就收获了灾难：又有几万柬埔寨人被饿死，十几万人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和缺乏医药而死亡，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崩溃。波布拒绝为这些灾难负责，相反他把“大跃进”的失败归结于“隐藏的敌人在内部破坏”。于是“党中央”命令各地清洗干部，并大批处决被怀疑故意偷懒和搞破坏的民众。同时“党中央”把大米指标的完成与否当做向地方干部问罪的根据，迫使各地红高棉把衰竭的人民再逼迫驱使到极限。

1976年，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女人”英提丽特来到西北部视察，她说为她所看到的情景感到悲伤，后来她对美国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表示：“那里的状况真的难以解释，在马德望省我看见干部让所有的人民都去种稻米。那里的人民都没有家，他们全都病得很重……许多人患有腹泻（diarrhoea）和疟疾病。”她理应把这些惨况归结于“党中央”的政策，然而她却断言：这说明“敌人的代理人已来到我们中间。”

1976年9月20日东北大区领导人尼沙兰突然被捕。尼沙兰，温和寡言，自有主见，他是1945年的反法老战士和资深的柬共中央委员，1956年他曾帮助波布在他任教的中学里安身。到了9月25日，高米斯也被逮捕。高米斯是以性格坚韧顽强而著称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他是1946年的反法战士，也是西哈努克时代的“人民党”的创建者。尼沙兰、高米斯在柬共中央委员会里享有广泛的人脉和尊敬，因此他们的被捕和波布的绝情，震惊了整个干部层。10月15日，留在金边的高莫尼也被捕了。高莫尼曾是柬埔寨东部最著名的共产党人物，当时他的反法游击队在实力和声望上超过了任何一支游击队。尼沙兰、高米斯、高莫尼都与索平有着多年的工作关系和诚挚友情。在他们被捕之后，他们的家属、朋友和有工作关系的干部也纷纷被捕。

一位涉及柬埔寨事务的中共外交官员证实，1975年中国的康生死于癌症，波布亲自到中国驻金边的领事馆哀悼。但是，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波布没有去中国领事馆哀悼。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国报刊都刊登了一条消息：柬埔寨举行全国哀悼，波布斥责了“邓小平的反革命司令部”并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9月18日波布首次承认柬埔寨是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所统治，该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兄弟关系”。毛泽东突如其来的死讯在红高棉之中引发了某些迷茫。一位红高棉干部说：“毛泽东去世后，红高棉陷入一

片担忧……我们担心发生在中国的混乱和困惑，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团结。”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柬埔寨华人对毛泽东去世的反应，事实上他们对世界对生命对感情，全都失去了知觉和反应。

(23/28)深挖内敌

在中国，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华派）逮捕了“文革派”（四人帮），随后中国各地清洗“文革派”的追随份子，余党顷刻“树倒猢猻散”。全国的军政系统和各地都表态支持“华派”。这个10月6日就是中国“文革”的消亡日子。中国开始回归常态。华国锋接管了中国最高权力。他不谙弄权，也没有过重大的迫害行为，自身实力并不强大。

波布不能理解中国人民对结束“文革”的欣喜，相反，北京的政变和“文革派”的被捕，可能加深了他对“内敌政变”的恐惧感。于是，在柬埔寨，针对“内敌”的第一波大清洗立即展开。1976年11月1日，出任“农业部长”刚6个月的农苏恩突然被逮捕。农苏恩是柬埔寨反法统一阵线（IUF）副主席、柬埔寨“人民党”的创建人，1962年他被西哈努克政府逮捕，坐牢8年仍不屈服，1970年被朗诺政府大赦而回到革命运动之中。1970-75年柬埔寨内战时期他在东区工作，与索平关系密切。农苏恩被捕标志着清洗行动来到了红高棉中枢。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东区的柬共干部和军人也遭到逮捕。但索平这时还没有被触动。

此期间，尼沙兰、高米斯在 S-21 里遭受了酷刑。尼沙兰的招供文有 31 页，是经 7 次审讯之后写成的。9月23日拷问员庞用书面报告说他已用藤鞭和电缆毒打了尼沙兰。隔日，杜赫在给尼沙兰的备忘录里批示：“你是一个让组织绝对相信的人，比起组织最近逮捕的其他囚犯，你是密切于组织和柬埔寨革命的人。组织清楚地知道，你不可隐瞒过去的事，你不可再像以往一样欺骗组织。组织对顽固（不招供）的人了如指掌。”于是酷刑再次施用。稍后，庞报告：“中午我提议（对尼沙兰）施用冷热两种（拷打）手法。下午我得到批准。尼沙兰选择了招供，他让我们提示他到底应该招认些什么。”

在 S-21 档案室里存有高米斯所写的材料共 96 页，都是高米斯在被捕后写给波布的信。这些信从没有离开过 S-21 去送交“党中央”。高米斯的档案里也存有拷问员的报告。即使处在残忍的逼迫下，高米斯仍然坚持自己的清白和对共产主义的热烈信仰。对于政治争辩的激烈交锋，他已有 30 年的经验，但他现在不得不与无知撒野的拷问员争辩。高米斯是 S-21 里第一个死硬对抗波布的高级干部，并且他顽强地拒绝波布对建党日期的改动，9月29日他写道：“我对建党日期的立场是坚持原来的 1951 年。有人想改变它，我是不会随行的。我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合法性来反抗。”但是，倔强的高米斯大概没有想过，以他的高级资格，为什么在“革命”胜利后他不仅没有官职，反被置于死地？这是否因为他模糊知道一些关于英萨利在北京的那几年里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他怀疑山玉明（柬埔寨共产党创始人）在北京是怎样被毒杀的？

尼沙兰、高米斯、农苏恩不久都被“党中央”下令秘密处决了。红高棉的摄影师尼恩（Nhem En）作证说：这些重要囚犯被割断颈部而死亡后，还必须拍摄尸体照片送“上面的兄弟”审阅。显然，是波布要看被杀同志的尸体照片。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兴趣去欣赏那些自己的多年战友的尸体？

波布从中国返回金边后，决定总动员实施内部清洗。1976年12月20日他半通不通地使用了一个医学形容，向红高棉干部们做了重要讲话：“现在，在党内存在着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必须浮现出来，我们才能检查症状。我们还不能精确定位它……我们既往没有成功地在党内寻找细菌。然而当革命进展时，它更强烈地渗透进党内、军队和人民之中的每个角落。我们能很快找到这些丑陋的细菌，因为党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如果我们再等待下去，细菌便会造成真正的损害……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粉碎了一些叛徒的秘密网络。在过去，那些叛徒是我们革命的同路人。但是现在，他们必须被扔到一旁。今天的1976年是阶级斗争的一年，许多细菌出现了，许多叛徒网络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与波布的许多其它讲话一样，这次讲话也是个混杂猜疑的妄想，它无法定义“革命”，无法解释为何“疾病”会浮现在党内，也无法提出证据来证明有“细菌”埋藏在党内。波布仅模糊地说是“根据我们10年来的观察，敌人根本没有消失，而是不断地钻进了党内。”而杜赫则把“敌人”的策略比作是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越南共产党的“象鼻虫”。农谢也跟风道：“我们不担心外来的军事挑衅。我们最担心的是藏在组织里面的敌人。”显而易见，波布发出了一条很像毛氏“文革”的发动指令。毛泽东是怎样说的？那是：“必须清洗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对于波布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挽救破产的国家和垂死的民族，而是更大规模地清洗同志。这表明红高棉“党中央”发生了某种隐晦的变化：在华国锋时代的中共放弃政治迫害运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时，波布做出了相反的大清洗行动，可能说明波布否定了中共的新政策和政治方向。

在柬埔寨各地的大清洗方式比中国“文革”清洗方式更为简单和原始：连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的过程也省略了。一旦有人被诬指，就立刻变成“有罪者”，就必须给自己编造罪名，还必须牵扯出一连串的亲友和上下级同事的“叛徒网络”，不然就会遭受酷刑。不符合“阴谋存在”的招供一律被斥责为抗拒，囚犯会被反复施以酷刑，甚至采取电击、水淹、锯脚、挖眼，以取得“招认”，然后被处决。由于虚构，招供的细节都是荒唐得不可能发生的——例如：

1) 曾在幼年时被老师体罚的哈金强（Hak Kim Chheang）招供：他在当天中午被一个碰巧看见他哭泣的中国密探招募了；

2) 在东区被捕的菲蒂（Phe Di）画了一张“密探证”，他声称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德威尼（John B. Devine）亲自来到金边签发的；

3) 还有一个囚犯说他是被美国人肯尼迪“Kennedy”（注：指1961-1964年的美国总统，这是该囚犯唯一听说过的美国人名字）在金边一个酒吧里招募为美国代理人。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没有兴趣到金边招募密探，肯尼迪总统更是如此。

几乎在每份招供文里，牵连到的“密探”或“叛徒”的名单会增至几百个名字，使人觉得那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大阴谋。本来，这些不合逻辑的编造，应该被轻而易举地揭穿——杜赫本人是一个靠严密逻辑和复杂证明来教课的数学教员。可是，所有招供文就没有一份被杜赫和审讯员们感觉是不切实际而拒绝，实际上那正是“党中央”所需要的。现在，可以知道，S-21作为最重要的保护“党中央”的设施，并非是为了鉴别真实的“内敌”，而仅仅为了不断地证实波布的猜疑、假定或某种计划，并显示为此而粉碎一些重要的柬共党员是合理的。杜赫受命执行清洗“内敌”工程。实际上杜赫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招供文几乎全是被逼捏造的。

更为猛烈的第二波清洗浪潮在 1977 年初来到红高棉党内。这次是针对北区的清洗。以前在 1976 年 4 月 8 日金边发生手榴弹引爆事件后，原北部大区柬共首领、商业部长克多恩就被怀疑。1977 年 1 月 25 日克多恩被捕。克多恩是原柬共中央第 4 号人物、“革命”功勋卓著，也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接管金边的大功臣。现在，S-21 的拍照显示这个气宇轩昂的汉子，双脚被锁在钢筋制作的脚铐中，一条短粗铁链把脚铐连接在矮床铁框上。他可怜地象个大猩猩一样坐在床头，双手窝在双腿间，神情迷茫。

1977 年 2 月，红高棉电台宣布粉碎了一次由河内操纵的“未遂政变”。这是对克多恩的指控。3 月，在暹粒省的清克宁（Chikreng）发生了一起自发的民众逃亡事件，也被算作是克多恩通过“叛徒网络”事先部署的。当时，许多骨瘦如柴的柬埔寨民众拼着最后的体力穿过山林逃往泰国边界。一个逃到泰国的难民“考”（Kao）诉说：“我们拼命朝泰国边界方向跑。红高棉的枪声不断，他们追击和扫射逃跑者。一会儿时间，我就失去了父亲、兄弟和姐妹。我非常害怕。不知道我们隐蔽和走了多么长的时间，我们遇到了 5 个泰国兵，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食物，把我们送到了（泰国边界的）难民营。”这些难民们，首次揭露了在柬埔寨所发生的种种怪异和血腥的事情，引起国际社会的惊讶，也伴有怀疑。

柬埔寨北部一带的民众逃亡事件，导致塔莫的西南大区干部进驻北区，层层清洗北区当地干部。仅在 1977 年 3 月份，就有 1,059 名重要的北区干部被捕，占满了 S-21 的全部空间。由原北区部队改编的 310 师和 450 师也遭到清洗。在一份长达 1,178 页的文档里，集合了所有在招供文被提及的 310 师人员的情况。不久，清洗扩大到了中部大区，因为中部大区原属北区，以前是克多恩开辟的“解放区”。

中部大区首领柯袍说：“1977 年初，我召集副书记斯仁、图尔（Tol）和瑟（Sey），我告诉他们不要提到关于克多恩的任何事，不然他们可能也会被处决。不久，金边来人拘捕了分区首领干部胡（Hoh）和阿查文（Achar Ven）。这两人被逮捕后，他们的口供牵连到了克多恩。金边派人来指示我准备在中部大区清查克多恩的人。我去了金边见到波布和农谢，他俩给我看了所有的在北区和商业部清洗（所得到的）招供文，说明（克多恩案）结论清楚，不能改正。我说：‘如果安卡已经决定这样做，我没有任何意见。’一些被捕的干部自从 1968 年就跟着我打游击，但是他们现在被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就把他们交给上面的兄弟去处理。”

柯袍叙述中部大区的清洗情况是：“1977 年 2 月，金边的安全部门逮捕了中部大区的农业、工业、商业和公共事业部的各位首领。金边安全部门的卡车队也抓捕了 41 号分区的 5-6 个首领、42 号分区的 5-6 个首领和 43 号分区的 5-6 个首领。35 号分区的首领们也被逮捕。在逮捕了所有的分区委员会的成员以后，也逮捕了地区部队的指挥员们。在总数上有 60 个分区级（注：相当于省级）的干部被逮捕。1977 年 5 月，金边的卡车队又来到中部大区逮捕区域级（注：相当于县级）干部，每个区域逮走 2-3 个首领。然后，一些小区级（注：相当于乡镇级）的干部也被逮捕。到了 6 月，逮捕的第一个浪潮才结束。那时，中部大区干部仅仅留下我一个人，没有其它干部被留下。此时上面的兄弟决定从西南大区调人替代那些被捕的中部大区干部。西南大区来了大约 200 个干部。”

但是柯袍闭口不提自己的邪恶方面。克多恩对他有重用提拔之恩。在克多恩的战友和部属遭清洗时，唯柯袍没有被牵连，反而受到“党中央”的赏识。只有出卖别人、努力推动大清

洗的人才会有如此待遇。

克多恩在酷刑下崩溃了。他被逼在招供文里玷污和诬陷自己，还写下许多涉及“叛变”的名字。这些名字包括高级的党政人物、在北部曾与他共事的干部和军事人员、以及他在商业部的同事们。此外，许多他所认识的人也成了新目标，不久那些人都遭到了逮捕。在红高棉组织系统里，克多恩的人脉最为广泛，呈纵向和横向分布。在他的招供文里列出了在东北、西北、磅逊和金边的庞大“网络”，所有被列出的几百名干部陆续被捕，然后这些人的亲友和工作关联者也都被逮捕。克多恩“网络”层层扩大，致使逮捕范围越来越大，呈现无法收场的状态。

在审讯克多恩时，拷问员全力寻找多重的“叛徒网络”关系。克多恩不得不编造自己在内战时期曾与美国情报局人员、越南共产党密探的见面。一个月后克多恩，这个曾为红高棉卖命的汉子，在狱中被悲惨地割颈杀死。这时他已揭发了几百个名字、以及关于“叛徒行为”的叙述，包括企图谋杀波布、建立反对“党中央”的秘密网络、联合泰、美、越三国的支持、以及让红高棉军队意志消沉，等等，当然这些罪名都不合逻辑而且无法证实。但是克多恩的招供文正好被用来进一步证明了“党中央”的预知能力。当乔森潘告诉西哈努克，“克多恩是越南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西哈努克怀疑：“你能肯定吗？”乔森潘无言片刻，承认道：“不能”。

1977年1月底，公共事务部长塔池（Tuch）被捕。两星期后，都恩被捕。在已经被捕的人里，都恩是最接近“党中央”的人，他曾经代理红高棉政权的元首，现在他继任商业部长刚刚不久。在内战时期都恩与克多恩紧密合作，在1976-1977年都恩经常与克多恩讨论工作，但是当都恩被捕后，那些工作讨论却变成了“阴谋密谈”。都恩在酷刑的逼迫下尝试在记忆里翻找自己的“罪状”，他供认在未得到“党中央”的许可之前栽种果树。他也承认在内战中与越共干部有密切的交往，虽然当时越共在为红高棉打天下，而与越共配合工作是很必需的事，但现在这却变成“通敌”行为。都恩还被逼承认策划谋反“党中央”。有研究著述提到，乔森潘可能是造成都恩失势的主要原因，此后乔森潘掌管了“870办公室”，他肯定是都恩被捕的最大获益者。而且乔森潘成为了红高棉“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现在它的组成是：波布、农谢、英萨利、宋成、温威、索平、塔莫、三巴特、柯袍和乔森潘，共10人。

(24/28)持续杀戮

1977年3月14日包查被捕，4月10日胡宁被捕。在侯荣被谋杀后，胡宁、包查成为“亲中帮”的主要人物。胡宁是一个穷困华人的儿子，他6岁丧父，靠努力学习攀进柬埔寨知识圈。1955年他在巴黎加入英萨利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金边后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部长，可谓草根翻身，光宗耀祖。胡宁的“革命”观点激怒了西哈努克，以致1967年西哈努克演讲道：“胡宁是最危险的。这些亲中国的左派们的专业就是颠覆！”在胡宁、包查被捕的前后，红高棉驻北京的两个“外交官”、以及亲中共的红高棉外事干部也陆续被捕。现任商业部副部长、死心塌地为红高棉效劳的华人张东海也被逮捕杀害。张东海手下的华人干部也都被清洗。不久，这些被捕者都被杀掉，一个未留，其中包括原金边“中华医院”的苏灼、洪乙华夫妇。被发配去种田的“华人大队”2,000多名成员也“失踪”了。这意味着红高棉内部的“亲中帮”至此覆灭。“亲中帮”本是中国“输出革命”政策播种在柬埔寨的产物，它在红高棉内部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党中央”对“亲中帮”的猜疑和防范由来已久，遂在毛周已死而无所顾忌

的情况下，彻底消灭，讹求专宠。事实上此后中国对红高棉的援助反而大量增加，从香烟、布匹到飞机、水坝无所不包，并向这个小国派遣了 15,000 名援建者，是十几倍于苏联在 50 年代派往中国的俄国援建人员（1,390 名）。这表明中共只得接受“亲中帮”被除灭的既成事实。

胡宁在 S-21 里受到了凶恶折磨。胡宁被捕后的第 4 天就交出了第一份的 7 页“招供”。拷问员庞的报告说：“在胡宁被带去灌水用刑之前，我们已经鞭打了他 4-5 番，以粉碎他的立场。”这“灌水刑”是 S-21 里常用的酷刑之一，为此特制“水柜”。“灌水刑”是一种反复使犯人溺毙的折磨方式，犯人被捆绑倒吊，淹没在水柜里，呛水挣扎，全身痉挛，当肺泡大面积损伤而即将溺毙时再把犯人吊出水柜，奄奄一息的犯人口鼻喷出长长的血性黏液，求死不得，极为痛苦。仅 5 个星期，胡宁被折磨得已经崩溃，他无比悲惨地在“招供文”的旁空处用抖瑟笔迹写下：“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只畜生”。他被逼新的招供，这位富有激情的共产主义者不得不亲手写下“自己一生的反革命活动”，凄切地诬陷自己：“在过去的 25 年里，我下贱地为敌人服务。我曾为 CIA 和可耻的帝国主义者服务，也为一个名叫‘毛’（Mao）的密探服务。而现在我得到了如此下场。我已经无所依靠。我的生命完全依靠党了。”胡宁写下每一句自诬的话，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读了他的招供文，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他的遭遇令人心碎。

在胡宁的招供文里，指使胡宁阴谋活动的人，是一个面目模糊、独往独来、无可查证的“毛”。其政治目的是：扭转柬埔寨的国家政治方向去靠拢共产党中国。这究竟符合谁家的利益，手段方式又是谁家的模式？显然这个“毛”恰象是伸入柬埔寨的中共地下党才完全符合如此角色，而柬共党不符合。至于胡宁为什么以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为模板编造招供文，又为什么把他的上级取名为“毛”？这大概只有被酷刑逼得走投无路的胡宁自己才清楚。

1977 年 7 月 6 日，胡宁、包查与 125 个囚犯被集体处决了。几乎所有的研究红高棉的论文，在提到胡宁的案例时都表达了深重的同情和不平，并以此证明红高棉的暴虐。但是，胡宁究竟是什么人？他显然不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而是共产主义运动所筛选出的一个恶毒的“革命者”，连西哈努克也对胡宁忍无可忍。胡宁激进地参与了红高棉制造柬埔寨“革命”的作恶过程，无数柬埔寨人民因而死亡。虽然胡宁最终也变成“共产主义运动”的牺牲品，但那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孽。胡宁与侯荣、乔森潘都曾以“公开左派”身份为柬共秘密工作，这三人之中比较恶毒的乔森潘是唯一没有被大清洗触及的人。

1977 年 4 月底，波布的亲信谢杰（Siet Chhe，又名 Tum）被捕。当谢杰还是个初中学生的时候，他被教员波布引入柬共。1963 年谢杰跟随波布逃入东部丛林，在波布患疟疾期间照料波布。在 1975 年红高棉“胜利”后他是东区 22 号分区的首领。谢杰与波布、宋成有著长期的私谊和亲密的工作关系。然而，现在谢杰的功劳一概化为乌有。谢杰的被捕证明了，即使对波布忠心耿耿也不一定被波布认可。谢杰懂得进入 S-21 便是有生无还，他天真地写下一些信件向波布和宋成求救。但这些信件一直被存放在 S-21 的档案室里，证明它们不曾离开过监狱交给“上面的大哥”。

谢杰在被捕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否认所有强加给他的罪状。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也认为应该让他与“上面的大哥”直接沟通。谢杰写信给“89 号兄弟”宋成：

“兄弟，我在这里好苦啊！我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如今，我被关押在革命的牢房里，我真的不明白，这太令人困惑不解了，但到最后我终于看清楚了：是那些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越南共产党及苏联情报局做事的人，把我弄到了革命监狱里。”谢杰极力希望通过与宋成的联系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一直都知道，一旦进入 S-21，就没有人可以走出去；即是说，这个地方只有进，出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兄弟，果真如此，我就无路可逃了。”几天后，谢杰将被施用酷刑，他再次给“上面的大哥”写信：“我已在这里一个多星期了，只是被锁铐。根据那些负责案件的人说，我将会进入被折磨的阶段。亲爱的兄弟！我知道我完了！请及时来搭救我，兄弟！无论怎样毒打我，怎样死去，我都会对党忠心一致。如果你不搭救你的弟弟，他一定会死！而打碎真正的敌人才是党的光荣……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兄弟，请及时把你的弟弟救出来。我甘心与妻女到农田里种大米。……请你救救我，就让我活下去吧。”

谢杰的恳求，充满透明的真诚和令人窒息的感觉。然而，谢杰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只得到了酷刑。失望已极的谢杰没有再给“上面的大哥”写信。相反，谢杰在招供文里“揭发”了无数个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最后，谢杰在 S-21 监狱里被“党中央”下令处决了。

1977 年 6 月 6 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提欧被捕。提欧也是资深的反法战士，现在他被指控秘密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柬埔寨东区的叛徒网。9 月 18 日提欧的弟弟提梅(Tiv Mei)全家也被逮捕。随后提欧、提梅弟兄两家都被灭门杀死。1977 年 9 月红高棉干部童万(Thong Vann)被捕，他写下的拷问过程是：“当我刚到(S-21)时，审讯者说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当时我失去了控制，说‘我否认。’他说‘如果否认，我们会毒打你，直到我们得到详细的招供。’当我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和活动写成一个详细概要之后，审讯者对我说‘为什么（在概要里）没看到你叛国的事？’我答道‘我没做过叛国的事。’那人说‘如果你否认，那你还会被毒打。如果你写出叛国的事，那就最好不过了。’我知道自己无法再承受折磨，于是便写了一个我如何出卖国家的故事，以及我和农苏恩的阴谋关系。”

1977 年 4 月 17 日，文档部编写了一份两个月来被 S-21 逮捕的囚犯表格。这个表格有 1,566 个名字，都是红高棉的重要干部。表格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化名、性别、职位、单位、入狱日期和其它细节。其中 633 个名字被 S-21 所注明“粉碎”（柬文 komtech，处决）。每一个名字的父母、配偶和孩子们也都在 S-21 或者在红高棉各地监狱里被处决。仅在 1977 年 3 月 17 日的一天内 S-21 所“粉碎”的囚犯就有 107 人。1977 年 7 月 1 日的文档显示，那一天有 114 个女人在 S-21 里被集体处决。

1977 年在清洗北部大区的同时，逮捕行动也横扫了整个西北大区。这是因为波布在“4 年计划”中给西北部所设定的大米产量根本无法达到而引发的。当时西北部人民因营养缺乏和过度劳累，已经无力种田。但是波布认为他的“4 年计划”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有人破坏。

波布不喜欢西北部的原因，除了那里很接近泰国之外，还有三巴特在那个地区实行的半独立性。1977 年，因为缺乏农耕器具，人民饥饿和收成不好，预计从西北部生产的大米并没有运抵金边。于是西北大区干部都被指责为破坏革命经济或毁坏收成、故意让人民挨饿、私让柬埔寨边界领土以及合谋把大米偷卖给泰国。1977 年 4-5 月，大清洗来到西北大区，许多军事人员和地方干部被大批逮捕。

当清算行动变得更加剧烈时，S-21 的关押空间被塞满了。上千名饥饿的囚犯拥挤在四栋教室楼里。S-21 附近的埋葬场也被死尸填满。于是，在 S-21 南面 15 公里处的镇艾斯(Choeung Ek)的一个旧有墓地，被当作了 S-21 专用的杀戮场。一个看守说：“当囚犯听到自己将被带走时，他们都绝望地扭自己手上的钢铁锁铐，并徒劳地与看守员挣扎。”但他

们被反绑着扔上货车，被带去杀人场。每天在镇艾斯被处决的囚犯，从几十人到三百人之间。刽子手辛辉（Him Huy）对镇艾斯杀人场面的描述，是迄今为止的第一手资料：当载有囚犯的货车抵达镇艾斯之后，囚犯被集中在一间建筑物里。在那里，他们的名字与一份处决名单核对。然后，囚犯就以分组方式被带到土坑边。辛辉以一种冷漠态度接着说：“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被踹倒在坑边跪下，被用牛车轮轴的铁棍猛打头颈部，有时一次，有时两次……守卫队长监督着整个过程，而我负责记录杀掉的名字。我们把这些名字带回去，那是绝不能缺少任何一个名字的。”辛辉记得，当囚犯们被打死后，有些死者的衣服被剥下拿走。

西北大区的4号分区（马德望省东部）首领、三巴特的著名助手“革命家”克平被捕。同时另一分区的首领博沙里（Phok Sary）也被捕。到了1977年末，西北大区全部7个分区的首领和副首领们一个不剩，都被逮捕并杀害。三巴特是一个坚定的革命份子，他从1950年起就是西北部革命的领导者，他在当地拥有威望，因此“党中央”没有立即逮捕他。在塔莫的指挥下，几千个西南大区的干部到达西北大区，接管权力。他们发现在西北部，尽管大米产量被报导翻番，但实际上那里只出产了少量的大米。于是他们在西北部进行激烈的清洗活动，大量的西北部干部被杀害，很多当地的“旧人”（革命的基础群众）也被当作惩罚对象而打死。不久，西南干部对西北部村庄的清洗行动又制造了一批冒死逃往泰国边境的柬埔寨难民。在泰国，这些难民对记者和西方外交官们讲述了大量发生在柬埔寨的悲惨事实。

这一波遍及柬埔寨北部、中部和西北部的大清洗，造成数万名的红高棉干部和军事人员被处决。在酷刑下的每份招供导致了更多的抓捕，被牵连的受害者上级、下级和他们的配偶、孩子们都被杀害。还有更多的“旧人”村民被西南干部认为是原西北大区的“反革命基础”，也遭到大规模的杀害。大清洗发展到痉挛程度，而塔莫借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北部、中部和西北部。现在，波布的注意力转向搜寻“内敌”，而“4年计划”本身被悄悄地放弃，不再被提起。

因为地缘关系，柬埔寨东部人民受越南人的影响年深日久，东部当地不断发生对“党中央”政策的反抗，柬越边界地带的柬民和一些红高棉干部纷纷逃往越南。在21号分区（原磅占省），26岁的洪森于1977年6月20日也逃往越南。在逃亡中，洪森与他的妻子失散。1977年10月19日河内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已有6万柬埔寨难民逃到了越南。

杜赫每天工作到深夜，他勤奋地寻找“内敌”并逐个逮捕他们。现存S-21的一些处决照片展示被杀者的头颅被随意割掉。但是毫无疑问，在S-21里，除了囚犯的家属和孩子们是清白无辜的，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善良人，而是祸害自己民族的共党份子。虽然他们遭受痛苦折磨值得世人同情，但他们并非无辜。客观地说，S-21在认真冷酷、卓有成效地逐步深入地粉碎着主要由社会垃圾组成的共党骨干部分。

1977年，红高棉和越南的关系日趋恶化。红高棉频频越界袭击越南村庄。同时，红高棉也分别对泰国对寮国频繁挑起武装冲突。5月份，一系列战斗沿着柬埔寨南部边界爆发，红高棉越过边界攻击和焚烧了更多的越南村庄，越南村民被迫撤离了两个越南小镇，逃到越南内地朱笃市（Chau Doc）。5月16日红高棉居然起飞一架军机向越南的边界省城河仙市（Ha Tien）投弹，并调动重兵向河仙市郊发动地面攻击。这是红高棉在炫耀他们有能力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内地。这个冒险行为引起了河内的震怒，柬越边界冲突开始升级。此前，中国人为红高棉在柬埔寨东部的磅占市郊修建了一个军用飞机场，并提供了六架军用飞机。这个机场的作战目标明确地指向越南，向越南投弹的飞机就是从这机场起飞的。现有的资料表明，红

高棉的飞行员是中共在中国河南省开封市郊基地和福建省基地培训的。其后，红高棉又在东部越界袭击了十几个越南村庄。于是，越南人在越柬边境地区开始部署数千人的武装部队。

越南人此时的战争能力和潜力，对比红高棉是强大得近乎无限。越南共产党“人民军”在越战时期为 200 万人，1975 年吞并“南越共和国”之后大裁军，到 1977 年还保留有 120 万人。“人民军”具有陆海空军配合的立体作战能力。河内对于红高棉的武装挑衅，起初的表现是克制和寻求谈判。而红高棉一再袭击越南，令人看不懂红高棉的玩火包含有什么实际上的军事意义或者政治谋略。

(25/28)北京之行

1977 年 5 月 2 日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首次报导了红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的折磨，包括“每公顷生产 3 吨大米”的失败、饥饿、严重的疾病状况等等。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庞考德 (Francois Ponchaud) 经过对逃到泰国的柬埔寨难民的调查采访后，把红高棉的所作所为记录在《柬埔寨零年》(Cambodia Year Zero) 一书里，首次揭露了在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由于红高棉暴政在长时间内不为世界所知，《柬埔寨零年》的叙述实在可怕得匪夷所思，而书中证据都收集于逃离柬埔寨的难民，于是引发一场众说纷纭的议论，纷纷讨论在柬埔寨“黑洞”里发生的事情。1978 年 4 月 21 日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指责金边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践踏者。面对当年拱手葬送柬埔寨，面对共产党在柬埔寨的残暴屠杀，西方世界的“左派”们、慷慨激昂的反战人士、疯狂骚乱的大学生们，义愤填膺的国会议员们，都在假装寂静，没有谁站出来反思自己的过错。

1977 年 9 月 25 日红高棉的广播电台突然惊人地首次宣布：我们国家是由柬埔寨共产党 (KCP) 在统治着，总理波布就是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他是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人，他将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天后，9 月 27 日红高棉广播电台宣布“庆祝柬埔寨共产党在柬埔寨历史上的地位”。波布，这位长期隐藏自己的神秘人，今日之所以公开政权的共产党面目，乃是受到中国压力所致——华国锋的“中共中央”要求红高棉政权象一个常态政府那样，建立国际信誉，“使柬埔寨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并要求红高棉结束自己的外交隔离。”显然，“中共中央”不情愿与一个外国的鬼崇组织缔结政府之间的军事同盟或政治阵线，因为那样名不正言不顺，会牵连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贬低。这显示出华国锋与前朝毛周的不同之处。

1977 年 9 月 28 日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波布照片，宣布“热烈欢迎柬埔寨战友”，极力赞扬“今日的柬埔寨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金边，9 月 30 日红高棉广播电台播放了一个预先录制的长达 5 小时的波布演讲录音（此时波布已在北京）。在演讲中，波布回顾了“柬埔寨共产党”（实指红高棉）在柬埔寨的存在、领导、控制地位和党的历史，他说：“领导柬埔寨革命的，赢得 4 月 17 日胜利的，只有柬埔寨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领导者”，“我们学习了世界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的工作和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波布还说：柬埔寨共产党的创建日期是 1960 年 9 月 30 日；党之所以决定揭示自己的真实存在和执政身份，是被“外国朋友”中共所鼓励的，因为那个“外国朋友”想让党建立起革命的胜利信誉。在演讲里，波布没有谈到（红高棉）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却反复提到有一群可耻的密探分子在设法削弱（红高棉）党，但他没有指名道姓。波布的这个长篇演讲被中共印刷成中文册子，共 65 页，第二页有中共专业人员为波布修描美化的“标准像”，此像与波布的真实照片很有差别，波布的矮圆脸型变成了椭圆型，但保留了他基本的相貌特征。

波布对于公开（红高棉）党，是不情愿的。农谢后来在谈话中，以很长篇幅反复说：党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坚持了秘密工作的原则，而保持胜利也必须依赖于秘密工作原则。实际上农谢是在反驳中共要求红高棉公开自己的存在和政治面目。

如前所述，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内斗停止，中国谋求的是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邻国的关系正常化。新的“中共中央”对于“输出革命”，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兴趣，也没有周恩来那样的需要。而柬埔寨国民经济破产，红高棉政权离开中国的继续援助就无法生存，这迫使波布顺应“中共中央”的要求。但是这在连大米都很短缺的红高棉政权，没有东西能与中国进行交易。于是挑衅越南和促使中越关系恶化就成为红高棉“党中央”向中国索要援助的政治手段。为了做给中国看，在波布访问北京前夕的9月24日，红高棉越过东部边界对几十个越南村庄同时发动袭击，杀死许多越南村民。

1977年9月28日波布、英萨利一行人抵达北京。中共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盛大仪式迎接波布了。波布的特点是见不得人，所以这次公开访问乃是波布毕生的唯一。在天安门广场，中共安排了10万名还不知波布为何物的群众，手持纸花，载歌载舞，招展旗帜，欢迎波布一行。中国人不知道柬埔寨人民正濒死挣扎在暗无天日的炼狱中——那炼狱正是用中国的民脂民膏所制造。傍晚，华国锋举行国宴招待波布等人。波布在宴会上演说：“柬埔寨的现状是极为出色的，柬埔寨正在打败越南和泰国的挑衅。”

第二天，9月29日华国锋与波布进行了“首脑会谈”。波布声称“苏联、越南和古巴正在合作，在边界地区打击我们。”波布的杜撰是因为这三个共产党国家正是中国最怀恨的国家。华国锋迟疑著没有回答。于是波布更耸动地说：“他们在我们内部潜伏了许多密探。在中央层级，他们有5个代理人；在政府部委层级，他们有4~10人；他们在省级也有很多。从1975年9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准备破坏金边和边界区域。他们还准备用高精确度的枪支和毒药暗杀我们的领导成员。他们若干次下毒，但我们碰巧没吃那些食物。泰国、苏联和越南正在合作暗杀我们。我们有文件说明在这个事情上美国也与越南合作。从1976年起，我们开始清洗越南的代理人，到1977年6月清洗工作基本完成。我们小心地选择干部负责金边和边界区域，特别是在东部边界区，那里有许多美国CIA的密探。”华国锋仍没有回答，他似乎弄不懂波布在讲什么。

波布继续说：“我们听说越南部队腐化了，他们不愿再艰苦作战，他们现在只是依靠重武器、坦克和飞机。越南不仅想要控制柬埔寨和寮国，也想要占据全部东南亚。我们多次与他们进行协商，但是没有用。使用军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力量将会有损失。由此，正确的战略应该是开发东南亚革命，否则解决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问题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如果东南亚的革命进展蓬勃，我们将利用机会解决问题。我们与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朋友们达成了政治协议，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依靠中国朋友，我们正在领导东南亚（革命）。我们的对外方针是统一东南亚，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柬埔寨能够保卫自己，这就是对东南亚革命的大贡献。最近，你们的中共第十一次党代会更加鼓舞了我们，你们许诺给我们和东南亚革命一个光明的未来。”此时的波布把自己看成了有胆量有办法的东南亚革命领袖。对于波布这套不知所云的“大战略”，华国锋显然不好理解也不便应对，他一定会感到波布思维比他更混乱。至此华国锋木然地仅回答了一句：“你的关于邻国的策略是对的。”

10月2日北京为波布组织了一场只有中共记者们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波布首次表明是毛泽东主义指导了柬埔寨的“社会革命”。他还说1975年的撤空城市行动是要拆散“敌人的间谍组织”，这等于撤销了乔森潘早先使用的“食物缺乏、饥荒和人口过多”的借口——那是一个企图制造同情的解释。波布明确地说：撤空城市的决定是“在赢得胜利以前，在1975年2月作出的。因为我们知道城市那里有各种敌人的间谍组织，而我们的保卫革命政体的力量并不足够。”至此，波布承认了“大撤空”是一个早已有主观计划和执行日期的蓄意行为，而与食物缺乏或者人口拥挤等实际因素无关。

研究者本·柯尔南的调查是：“1977年10月波布访问中国回到柬埔寨之后，明显地加速了（党内）大屠杀。10月15日一天，在S-21监狱里处决了418个囚犯。3天后又处决了179个囚犯。10月20日处决了88人，10月23日又处决了148人。党中央密切关注着杜赫的工作。”波布确信越南正在试着在红高棉内部组织政变。于是清洗层层扩大，诬指逐渐联系到党内高层，连宋成对此产生了担忧。1977年10月5日宋成指示杜赫不要全盘接受招供，因为“他们的一些招供也在攻击我们”。于是，当杜赫看到一个囚犯胡乱招供，顺便咬出他以前中学的一个教员乔提丽特（Khieu Thirith，英提丽特的婚前姓名）也是美国CIA的密探。当杜赫读到这个诬告时，他很紧张，对那囚犯警告道：“你有什么证据？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

在柬埔寨东部，1977年9月红高棉再次大规模越界攻击越南村庄，造成千名越南村民的伤亡。10月，红高棉又对越南村庄展开了一系列袭击。10月底越南终于对红高棉发动了一次战役反击：包括一个坦克装甲团在内的2万名越南“人民军”，攻入柬埔寨的柴桢省“鸚鵡喙”地区，并且驻扎在那里不走了。红高棉部署在那里的军队不敢围攻越军。1977年11月初宋成作为战场总指挥匆忙赶到东区，中部大区的柯袍也率部队奔赴东区。几个师的红高棉大军云集，试探地攻击了越军，结果是红高棉损失惨重。柬越两国都没有公开这次战斗。这股越军留在柴桢省长达两个多月，他们打开当地监狱，收集了几百个干部囚犯，也收容了几万名要逃往越南的柬埔寨人民，把他们护送到越南去。越南人要通过这些柬埔寨人了解在柬埔寨究竟发生了什么。12月25日驻扎在柬埔寨“鸚鵡喙”的这股越军发动了对红高棉部队的一次攻击，目的是测试红高棉军队的战力。结果，越军轻易取胜，甚至跨越柴桢省追击到磅占省。12月底，乔森潘宣布与越南断绝邦交。直到1978年1月6日，这股越军才撤回越南，又有数千名柬埔寨民众跟随越军去了越南。

越军撤退后，金边便宣布取得“伟大的胜利”。1978年1月波布亲自到东区的索平指挥部，庆祝胜利。在那里他下令全国所有的人都要全力以赴对抗越南，他把越军比作“森林里尖叫的猴子”，并指出如果每个柬埔寨人杀掉三十个越南人的话，柬埔寨就可以轻易战胜越南。他说：“一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柬埔寨用200万人打越南人是足够的，因为越南仅仅有5,000多万人口……我们必须以这种战斗方式提出我们的路线，以便赢得胜利。”波布的算术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离奇幻想。

此时波布的表现较为生猛。然而，不久之后世人将会看到一个越南兵是怎样轻易消灭了三十个红高棉兵。回到金边后，波布又反复号召用“燃烧著的爱国主义和阶级仇恨”作为战争武器。1978年1月17日波布把自己的韬略讲给全党说：“当你打击越南军队时，如果你攻击他的脚，他将无法爬行；如果你攻击他的手，他还是可以走动。”但是波布没有具体指出越军的“脚”和“手”到底是什么，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此后，被逮捕的“党内敌人”的罪名都一律变成了“与越南人勾结”。柯袍被“党中央”指定留在东区清洗所有被怀疑“亲越南”的人。东区

许多干部和民众被柯袍认定是“柬身越头”而遭到杀害。为躲避清洗，穿过丛林逃往越南的东区民众与日俱增，也不断有红高棉干部和军人投奔越南。到 1978 年夏天，总计东区约有 15 万柬埔寨人逃到了越南。

1 月 25 日红高棉攻击越南的河仙市郊。越南再次表现出克制。2 月 21 日越南指控中国正在积极武装红高棉。4 月，红高棉袭击了越南安江（An Giang）省巴竹镇（Ba Chuc），伤亡越南平民约 3,000 人。柬埔寨东部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英萨利在 7 月 17 日赴泰国谈判西部边界和平事宜。

中国鼓励红高棉与越南战斗。苏联则在道义上支持越南。红高棉没有生产军火武器和军事物资的能力，全部补给都依赖于中国的输送，连修理武器的工作也是由中国援柬人员亲自做。越南人也知道：中国的军事人员在柬埔寨为红高棉训练部队、组建炮兵、修筑道路和军事基地，还在磅占城郊修建了一个空军基地，使红高棉的飞机仅半小时可飞抵西贡市。在修建磅占城郊的基地时，波布去视察那里，前呼后拥。工地上在场的华人劳工并不认识他，但他们都远远地看去认为“视察者”是个“中国人”，还猜测他是汪东兴，因为“他的身材相貌和举止都很象中国来的‘唐山阿叔’。”

1977 年 12 月 3 日中共派遣文盲副总理陈永贵访问“民主柬埔寨”。金边广播电台报道：1977 年 12 月 4 日陈永贵到东部地区参观。中国也记录了在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眼中的柬埔寨是如此绝妙美好：

“真正令陈永贵感到难忘和震撼的是波布领导下的柬埔寨。红高棉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欢迎队伍的男女一概穿着黑衣，头戴‘毛式绿帽’，脖子上围着相同的方格围巾。陪同陈永贵的是波布。这位以‘极左’著称的共产党领袖（波布）创建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没有货币，没有商店，街道上没有行人，全国实行供给制，吃饭全在集体食堂，居住分男女集体。平时，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所大军营，连服装都是全体一致的黑衣。陈永贵感叹道：‘马列、毛主席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柬埔寨全国人口都下放到农村，专政对象被赶到山上开荒，全国人民每天只吃两顿饭，人们经常挨饿。可是大家一样大干，就像关于大寨的宣传电影里那样。陈永贵又感叹道：‘人家一下子就过渡到了共产主义，值得我们研究哩！’

但历史研究者们是这样看待陈永贵访问柬埔寨的：“他被引导去看田野里的劳动，而不是去看田野里的杀戮场……那时候已有半数的柬埔寨华人被红高棉杀死了。”

1977 年底，因为西哈努克消失已久，国际上传言他已遭红高棉杀害。与西哈努克有着个人友谊的北朝鲜领袖金日成感到不安，他指示北朝鲜大使直接代表他向红高棉“党中央”询问西哈努克的下落，并警告红高棉要保证西哈努克一家人的安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Marshal Josip Broz Tito）也派特使到金边，要求看到西哈努克还活着。但他们都没有能见到西哈努克本人。陈永贵访问柬埔寨时也同样不被允许见到西哈努克。西哈努克的生死成为谜团，中共颇为忧虑。在陈永贵回到中国十几天后，1978 年 1 月 18 日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以“中共特使”的名义赴金边，执意要亲眼看到西哈努克是否还活着。这可能出于周恩来的含有内疚的嘱托，才有了今日邓颖超专程去金边的举动。在金边，红高棉“党中央”告诉邓颖超“西哈努克他自己拒绝见任何人。”但邓颖超声称这是“中共中央”的要求。据说红高棉“党中央”只好让

她从一个高楼的窗户远远望见了西哈努克的背影。

此时，西哈努克被押禁在一个 3 间房的小院里，周围是几幢高楼。红高棉在高楼顶部，对准西哈努克的小院安装了探照灯，耀眼的灯光通宵达旦照射西哈努克的房间。西哈努克也知道红高棉时时在用望远镜注视着他们夫妇的一举一动。关于柬越战斗，西哈努克通过金边电台广播而得知，政治直觉告诉他，柬越两国关系已经相当恶化。西哈努克自述他感到震惊和暗喜，因为他知道柬埔寨从来不能战胜越南。

(26/28)内毒素

1978 年，波布同意效仿中国式的个人崇拜。中国为波布印刷了数万份彩色“领袖像”运送金边，层层下发到柬埔寨全国的村庄和劳动营。1978 年的年中，柬埔寨各地都张贴起“领袖像”，让民众第一次见识了这位扼住柬埔寨咽喉的神秘者。“领袖像”惊呆了几个柬埔寨平民，他们是波布的大哥沙洛生（Saloth Seng）、姐姐沙洛荣（Saloth Roeng）和弟弟沙洛内布（Saloth Nep）。在波布家乡磅通省（中部大区 43 号分区）的泼瑞克斯博村（Prek Sbou），沙洛内布在劳动营里看到了“领袖像”大为惊讶，他说：“当时我看到那个领袖像，我认出了那是他！”那“领袖”不是什么波布，他是沙洛沙。在红高棉政权时期，沙洛内布也被迫在劳动营做苦役，早出晚归，只有稀粥糊口。沙洛内布认为沙洛沙导致他全家受苦，“我非常生气，（沙洛沙）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但沙洛内布没有告诉任何人那“领袖”就是他的哥哥，可是慢慢地有很多村人还是知道了他们是胞兄弟。在另一个村庄的沙洛生说，那天在集体食堂里看到“领袖像”，他大喘气而且感到头脑混乱，想不到竟然是他的弟弟沙洛沙在祸害着这个国家！他认为“这伤害了我的心”，他感到恐惧并保持了缄默。两个兄弟的做法可以被看作朴实也可以说是智慧，而当地的村民都倾向于认为波布的亲人不应该因波布的邪恶做为而受到牵连。

还有一个沙洛沙的早年同事（也是靠隐瞒教员职业而逃过了屠杀）也认出了“领袖”是谁。这同事说：“他（沙洛沙）以前是朴实的、愉快的和有礼貌的人，他想的很多但是很少说出来。”沙洛内布也说：“他（沙洛沙）在孩提时是个好人。他从不争辩。看到有人吵架时，总是悄然离开。他也不喜欢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世人难以把一个早年的礼貌温和的人与一个现今的嗜血怪物，连接起来。

直到 1976 年，河内并不知道红高棉内部的“亲越派”正在遭到清洗，原柬共的重要人物高莫尼、高米斯、尼沙兰等人已被消灭，农苏恩和超过 200 名他的战友们也被粉碎了。到了 1978 年 2 月，河内开始宣称红高棉是“柬埔寨的反动势力”，这意味着河内对红高棉的立场发生了激烈的改变。促使河内激烈变化的重大原因之一是：越南人通过柬埔寨囚犯和难民的叙述，还可能通过柬埔寨东区的消息渠道，终于知道了红高棉不仅大规模屠杀柬埔寨人民，竟然还屠杀了滞留在柬埔寨的越侨 2 万人。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越南共产党的震惊和愤怒，因为越南人极具民族意识。实际上，红高棉杀死的华人至少是越侨的二十多倍，中国明知无视，反而包养红高棉。有调查者说：“越柬战争的起源是两万越侨在柬埔寨被杀。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简单事实，但这是我几进越南、遍访越南各地之后得出的结论。……越南之所以出兵柬埔寨，并不是越南有什么称霸野心，确是因为红高棉杀害了两万越侨，不管这些越侨的阶级成分是什么，他们都被越南共产党称为同胞。”此时，河内开始制定计划，越南外交部长武衡（Vu Hoang）提到：“一个选择是使红高棉内部的健康力量获胜，另一个选择是强制

性地结束波布的统治。”河内的计划还包含在柬埔寨建立一个亲越政权的意图。1978年2月中旬，黎笋、黎德寿在河内会见了逃到越南的原红高棉干部。越南人把这些柬埔寨人组成一个抵抗波布政权的团体，包括在越南培养的高棉裔军事专业人员。这时，“培训柬埔寨人的军事训练营在越南南部建立了。”1978年3月，以原柬共“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为核心，在越南组成了柬埔寨人的抵抗组织，1973年逃离红高棉的彭索万担任抵抗组织的主席，几个月前逃到越南的洪森也是抵抗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4月初，河内官方发表了两个长篇文件：关于越柬边界谈判过程和关于柬越两党历史关系的回顾，指出红高棉是从柬埔寨共产党手中窃取了政权的叛徒。4月22日，柬埔寨抵抗组织在越南南部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武装部队。

1978年上半年，在柬埔寨，柯袍指挥他的中部大区军队继续清洗东区。他的清洗“成绩”之大，导致波布等人认为越南之所以成功袭击了柬埔寨东部，是因为那里有着大量的“亲越南”的人民。1978年3月到5月间，东区的干部和民众遭到大规模杀害。在东区，索平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却未使用他的力量去阻止。从1978年3月起，第三波大清洗开始了。3月25日西部大区首领周杰特被逮捕押进S-21。周杰特是个忠心的革命份子，也是老资格的反法战士，他比较关心西部人民的生存，不愿实行塔莫、柯袍的那种暴政。他的妻子音南是西部大区32号分区（原实居省）的柬共首领，她曾在60年代为藏匿在森林里的波布煮饭。她和周杰特同时被捕，她受到酷刑，可怜地被逼招供她在为波布煮饭的那时期，曾两次企图在波布饭食里下毒，但都未成功。随后，西部大区37号分区（原国公省）的首领少康（Sau Kang）等人被捕。大量的西区干部、军人和民众被就地处决。西南大区的干部涌入西区，接管了政权。现在，塔莫已经趁机取得了好几个大区的指挥权。

1978年4月间，被送到S-21的囚犯太多了，有些囚犯未经审问就直接送去处决了。1978年5月中旬，柯袍邀请东区部队的指挥员，包括索平直到营级干部，一起来参加一个大会。会场周围驻扎着柯袍的坦克和步兵。此时索平可能觉得事有不妙，因此没有出席这个会议。柯袍部队把出席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并当场枪杀了一些人，把东区第20、21、22部队的指挥员和党首领都押送到S-21。几天后，柯袍又送了一个通知给索平，邀他出席另一个会议。索平派了几位部属去了解柯袍的用意，他们也都都被柯袍当场逮捕。部属的一去不返使索平知道自己正在被谋害。但索平不愿相信波布是这一切行动的背后主使，他自我搪塞，情愿想象宋成和柯袍是主谋。但东区的红高棉干部和军人开始自发地抵抗清洗，其中的一个地区级干部谢辛（Chea Sim）鼓动民众逃往森林，东区地方部队第四师指挥员韩桑林（Heng Samrin）也组织力量对抗柯袍。5月10日波布在广播里呼叫“不仅要消灭5千万越南人，而且要净化柬埔寨人。”5月25日柯袍部队袭击了东区地方部队，遭到激烈的战斗反抗。5月31日索平决定亲自到金边去向波布解释和求情。当他抵达金边城外时，波布派出金边警卫部队来追捕他。索平只好乘吉普车逃离，在一个寺庙里避难。6月3日，在一队300人的金边警卫部队围捕索平时，东部大区首领索平，这位坚定的反法战士、柬共中央重要成员、“民主柬埔寨”国家第一副主席，开枪自杀了。随后，索平的妻子和孩子们全被屠杀。从1950年那时起，索平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柬埔寨东部与越南的地缘友情，也是他在1963年把波布推上了柬共总书记的位置，波布由此发迹。

宋成代理东部大区首领。农谢代理S-21的操作。柯袍部队和东区地方部队之间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柯袍部队破坏了东区全部的军事基础。塔莫的西南大区干部涌进东区接管了政权。东区干部纷纷穿越密林逃到越南。谢辛带领一些民众逃往越南，韩桑林也率部分部队投奔越南。这些人在越南都加入了“柬埔寨抵抗组织”。此时，红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的无尽蹂躏，使东区人民、也让全国人民把苟活的唯一希望投向了越南，而他们之中并没有谁从一

开始就清醒地把红高棉视为恶魔。1978年6-7月，在针对东区的“庞大、不分种族、不分军人或平民的清算行动”中，柯袍和塔莫把所怀疑的整个村子灭绝。当时年仅16岁的红高棉兵养萨利（译音）作证说，他在1978年6月与同伴们在东区奉命杀害了1万多名被指为“亲越南”的村民，他说：“我喝下一大杯混合了一挂人肝的烈酒之后，便整天不停地开枪杀人。”整个东区被屠杀的人民至少有25万。剩下的东区村民，不论是“4-17新人”还是当地“旧人”，都被通知必须离开东区和将被安顿在另一个大区，很多村民在押送途中就被杀害，剩下的在抵达西南部和中部大区后被杀掉。一个东区村民说：“东部的居民被指控集体背叛，由西南干部控制了东部地区，人民成为囚犯，每天被迫工作20个小时，他们被残忍地杀死。以后，我所在村庄的居民们被迁移到中部地区磅占省，然后，几千名迁到那里的东区村民都被打死了。”到了1978年9月，整个东区已被“扫得一干二净”了。这种针对东区的集体杀人行为已经不是解决共产党内部斗争的问题，而是像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人口来消除波布和“党中央”的怀疑和恐惧。

在东区的大规模清洗和索平覆灭，使河内得出的结论是：对红高棉施实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已不可避免。

在去年（1977）1月-5月的旱季，红高棉“党中央”曾下令在西北部建造一个水坝，据说可以灌溉2万公顷的农田，水坝由中国援柬人员设计和主持建造，但是它愚蠢得没有构建任何溢洪道。水坝的全部劳动由柬埔寨民众承担，没有推土机拖拉机等机械设备，民众象蚂蚁一样挖石、铲土、挑筐，从天不亮一直劳动到半夜。水坝终于以大量劳工的过度劳累死亡为代价完成了。但在1978年的雨季来临时，这个水坝崩塌了。“党中央”断定是“内敌”破坏了水坝，于是新一轮的恐怖清洗在西北部展开。

1978年6月11日“民主柬埔寨”国家第二副主席、西北大区首领三巴特被捕。同月，国家橡胶园部长冯（Phuong）被捕。他们的亲朋和部属也一连串地被逮捕了。这些人很快都被处决了。同时，以前没有受到清洗影响的群体也成了目标。甚至是被认为忠心耿耿的西南大区，也有大量的人被逮捕。至此，柬共中央委员会已遭毁灭，国家各部委的领导人几乎都被逮捕或处决了。除了塔莫和柯袍两人之外，各大区的首领和副首领们也都被逮捕或处决了。无数的分区、区域和乡镇级干部、以及各层级的军事干部都被粉碎了。有估计说，被大清洗杀掉的红高棉党内的干部和军人的数目超过了10万人。根据仅S-21就“粉碎”了1.6万人的数字来看，那个估计不离谱。到了1978年11月2日，在红高棉党中央只剩下几个人是：总书记波布（统帅全党和军队）、中央常委英萨利（负责党务和外交）、中央常委温威（负责经济和农业）、中央常委宋成（负责国防）、党中央副书记农谢（负责宣传）、党中央副书记塔莫（负责几个大区政权）、社会行动部长英提丽特（负责文化和卫生）。到此，红高棉内部的“亲越帮”和“亲中帮”被灭绝，“本土帮”除了温威、塔莫和柯袍三人之外也都被消灭了，只有“留法帮”的人在掌权。

波布反复发动大清洗的结果是：其一，红高棉政权的政治基础和统治能力基本上被摧毁，红高棉军队被极大地削弱，“党中央”对各地区的行政管理已失效，幸存的干部和人民思投越南。其二，在1960年组成柬共中央委员会的杜萨木、克多恩、农苏恩、山玉明、高米斯、索平、尼沙兰、提欧、都恩都被消灭了，柬共历史的知情者也都被消灭了。柬埔寨“革命”的过程、“柬共”与“红高棉”之间的关系被重重迷雾所笼罩。这难道仅仅是波布为了给自己的猜疑和妄想提供证实？抑或只为了加强他的个人权力？这与1962年杜萨木神秘失踪有关联吗？波布到底在恐惧什么？如果换另一种视角来看，大清洗的客观事实是：柬埔寨共产党被

有步骤地灭亡了，它被另一个组织“红高棉”取代了。这也许可以构成一个阴险的概念：即完整地消灭柬共是持续大清洗的终极目的。

不断寻找“内敌”，大清洗从民间到党内再转回民间，从下层牵扯上层、再反转株连下层，形成循环，无人可以逃避。实际上红高棉的滥杀同胞和大清洗，都起源于一种“内毒素”，即自我摧毁机制：如果恐惧和威胁一直存在，强迫性的抵御反应就会持续下去，机体终将衰竭。因此，S-21 不单纯是个保卫机构，而是在自我摧毁机制运行时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谋杀机器。如前所述，具有持续作用的“内毒素”正是“毛泽东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毛式政体都无法避免它。

大清洗愈演愈烈，层层株连，走入混乱。红高棉干部梅曼（Mey Mann）后来对研究员史提夫·赫德指证道：“（大清洗）每个人都在诬告某人通敌，而每个人都不懂正在发生什么事。”到了 1978 年，大清洗使整个红高棉组织濒临了绝境。连柯袍也产生了很大担忧，可是他不敢与波布谈，于是他向英萨利诉说：“大清洗破坏了我们的基本的政治基础，问题产生了，但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英萨利的表现令人迷惑：英萨利犹豫着回答说他也知道该怎样做，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面临过这些问题”。于是柯袍给出了一个接近事实的结论，他对英萨利说：“我相信波布同志从 1975 年以来被误导了。当我们执行（社会革命）新政策时，人民受到饥饿，外国帮助被拒绝，农村合作社被迫承担了过度的劳动。”问题是：波布被谁所误导和为什么会被误导？什么样的误导能给柬埔寨带来如此巨大的伤害？虽然，柯袍此时还不清楚有关红高棉“社会革命”的最隐秘事情，但他意识到波布的“新政策”可能来自于外源性误导。

席卷柬埔寨的大清洗并未达到波布臆想中的“胜利”结局，反而导致河内考量直接结束不可理喻的波布政权。在稍微沉寂了几个月之后，波布病态般地再次发动新的清洗。出人意料的是，波布的杀机指向了他自己的亲信、副总理温威。1978 年 11 月 5 日上午温威在“党中央”大楼里突然被逮捕。

温威是个大胆而快乐的汉子，脸上永远带笑。他原是个学生领袖，50 年代在东部乡村木屋里偶遇波布，从此被拉入柬共，成为红高棉“本土帮”的首领人物。温威聪明能干，忠心耿耿，长期主掌地下工作，对红高棉“革命”有着特殊的功勋。他与波布、英萨利、宋成情同手足，组成红高棉核心圈的“四人帮”。在温威被捕的同时，工业部长程安（Cheng An）、通讯部长梅鹏（Mey Preng）和高级干部克优（Keu，又名 Ta Keu）也被捕，这 3 人都是温威的重要助手。温威的罪名是“为中国、越南工作”和“企图政变”。当时，所有的“内敌”都被安装了“越南密探”的罪名，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温威的“为中国工作”罪名，这可能是指几个月前温威到中国去请求紧急援助后，回到柬埔寨说过一些话称赞了中国社会回归常轨、中共新领导层的宽松务实政策。那正好击中了波布的心病和猜疑。如果再联系到温威“企图政变”的罪名，可以看到波布对中国发生的抓捕“四人帮”的真实态度，尽管现在波布正迫切地向中国寻求援助。

柯袍看到了温威被捕，他说：“当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出席第 5 次会议时，人心都有瓦解的感觉。会议结束后，波布要我留在那里等着看一部电影。我感到惊讶，我决定呆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早上，他们突然逮捕了温威和克优。之后波布来问我是否看到了电影。他所说的电影，事实上就是逮捕温威和克优的实况。他们指控温威为中国和越南工作，并且预谋政变。”

在 S-21，温威被迫诬陷自己和索平都是秘密存在的“柬埔寨劳动党”（WPK，原柬共）成员，他也承认在 1977 年曾私下发泄对中国模式的向往：“如果柬埔寨人民能够各自生活，像中国那样，在自己的家庭里进餐，他们将会很开心。”几天后，温威、克优、程安和梅鹏在 S-21 里被处决，埋在土坑里。十天之后，农谢指示 S-21 挖出温威尸体，对腐烂尸体拍照，照片被送给“上面的大哥”。无人知道为什么波布要再看看一生追随他的兄弟——已经开始腐烂了的温威。

现在，红高棉的中低层的大部分干部已被清洗，被视为逮捕目标的高级干部也越来越少。随着整个国家的形势日趋恶化，残存的红高棉干部都疑团重重。无人知道自己是否将是下一个“内敌”？吞噬一切的迫害会在何时结束？一个有经验和自信的共产党或许有能力在清洗运动失控时克制它，而红高棉不能，因为被敌人团团包围的恐惧感围困着“党中央”。一个被捕的干部在招供文里哀怨地问：“如果安卡逮捕每一个人，那还有谁能留下来进行革命呢？”一个囚犯干脆写道：“安卡是在放狗屁！”波布所自称抓住的“历史轮轴”已经无法变更地在转动着粉碎每一个柬埔寨人。然而，波布还在反复恐吓全国说：“党有着菠萝那样多的眼睛。”

(27/28)政权灭亡

此时，红高棉对越南的军事挑衅以及大规模杀戮越侨的行为，超出了河内的忍耐底线，形成了越南出兵的正当性。河内的策略是协助“柬埔寨人民革命党”采取军事行动去推翻红高棉的统治。1978 年 12 月 2 日“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越南南部组建“柬埔寨救国阵线”（KUFNS）2 万人，具备军事指挥经历的韩桑林出任阵线总指挥。彭索万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谢辛和洪森都是该党领导成员。12 月 4 日河内广播指控红高棉的四条罪行是独裁（dictatorial）、军国主义（militarist）、法西斯主义（fascist）、种族屠杀（echoing genocide）。

另一方面，河内考虑了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外交背景。1978 年 6 月黎笋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讨论越南的计划，缔结了苏联与越南的合作条约。在莫斯科，黎笋清楚地谈到“在即将来临的旱季有效地进行对金边政权的强大攻击”，苏联领导人支持越南的计划，并答应帮助对付未来的中国反应。1978 年 10 月中旬，越南军队开始集结。宋成到北京求援，甚至要求中共派遣军队到柬埔寨来参战，但这要求被拒绝了，中共只答应为红高棉紧急提供军火和指导战争策略。随后，中共增加了对红高棉的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反坦克武器）供应和经济援助，减轻了红高棉的困难。

在中国，邓小平赶赴东南亚和美国，试图组成“反越”同盟，以保护红高棉政权。

1978 年 12 月中旬，3 个美国记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女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ecker, the Washington Post）、美国《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曼（Richard Dudma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美国“左派”学者马尔科姆·考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经北京安排去金边采访。这是中国为波布策划的宣传手段。“尽管柬埔寨人都没有饭吃，但波布认为柬埔寨的社会革命非常成功，所以允许几个外国记者来看看他的国家。”贝克尔说：“我们在一个封闭的气泡里考察了柬埔寨。在两个星期的访问中，我们全天都在严密的警卫下。柬埔寨干部们都穿着黑色睡衣（注：指红高棉的黑衣）。我们只看见了很少的农民，穿着烂布。柬埔寨人不被允许与我们自由谈话。官方译员面露害怕，他们按照事先

背好的话回答着我的问题。”在访问的最后一天，1978年12月22日，3位记者幸运地在金边会见了波布。贝克尔代表全世界对波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波布似乎不知该如何回答，终未答复。贝克尔三人对波布的采访是第一次真正的记者采访。从波布谈话来看，他明确地想要从西方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得到支援。

贝克尔清晰回忆她会见波布的情景：“会见是在以前的法国殖民总督府的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波布穿一套深灰色的毛式制服，坐在窗前。这是一个在现代史上做出最恶毒暴行的人，但他并非是我想象中的人（杀人狂）。实际上他是温文尔雅的，不时地微笑，他的眼睛细长而且警惕，做手势轻巧。他并不起身迎接我们。我们被安排坐在他可视的距离处。在波布后面踱步的人是英萨利。不久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只是听众，而不是来采访他的记者。波布说话慢声细气，他用了一个小时给我们上政治课。他指责说，越南的入侵很可能迫在眉睫，但越南没有任何东西能打败柬埔寨。关于柬埔寨人民的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世界应该极大关注‘民主柬埔寨’面临的威胁。世界人民是焦急的，他们担心柬埔寨不能对抗越南，结果就会伤害东南亚国家和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他还肯定，美国和欧洲北约的部队将会代表他的利益与越南战斗，越南与苏联结盟是贪图柬埔寨的大米和公路。他自夸他确信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会支持他。”现在，波布一面在自毁，一面又在呼救，他滔滔不绝地背诵，不能打断。贝克尔三人无法插话提出感兴趣的问题。

波布确实不像个屠杀了200万同胞的极端凶残者，他在采访中一直保持了微笑。然而，贝克尔说：“我确信他（波布）是发疯的。就在那个夜间，武装战士们在我们住处周围制造了威胁性的爆炸，并进入考德威尔的卧房里谋杀了他。没有词语可以描述那个晚上的恐怖情形。在下一天的上午，我们带着考德威尔的棺材离开金边，回到北京。这时离越南的入侵只有不多的时间了。”

考德威尔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学者，也是个西方“左派”。现在考德威尔在睡房里被诡谲地谋杀，红高棉对此未做任何解释。这个谋杀显然也使北京感到惊讶和尴尬。

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10万名越南军队和2万名“柬埔寨救国阵线”军队，将跨过边界去进攻红高棉。战争命令由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下达，战争总指挥是越南军队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战地司令官是黎德英中将军（时任越南南方军区司令官）。凌晨，越军集结，10万顶头盔在星光下闪动着无边的钢铁幽光，他们即将展开一场国家战争。越南向国际社会宣布的出兵理由是充足的：红高棉杀害了滞留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侨民；出于越南边界的安全原因，有必要制止由北京支持的波布政权的武装挑衅。

越南人，矮瘦高颧骨，看上去并不漂亮。近代以来他们专门与庞然大国（大清帝国、法国、美国、中国）连年打仗，不屈不饶，倔强执著。现在他们又将推翻一个极端丧心病狂的“红色乌托邦”。此乃苏式“共产主义”与毛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最后火并，在东南亚出现的一系列颠覆动乱也将终结。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差异性，正是越南共产党与红高棉互不相容的道理。

黎明时刻，红高棉的好日子结束了。10万越军分兵五路，排山倒海般地攻入柬埔寨。这五路越军都配备有苏制坦克和装甲车，那些飘扬着越共金星旗的钢铁怪物卷起的沙土遮蔽了早晨的天空，长驱直入柬埔寨境内。越军的作战机群全面控制了柬埔寨境内天空。

红高棉总兵力约有 10 万国防军，10 万地方部队，总计 20 个师，还有十几万乡村武装“自卫队”。他们面对柬埔寨民众是何等骄横凶悍，但现在他们面对越军却是令人瞠目的懦弱狼狈，没有尝试任何有效的抵抗。柬埔寨东区有 7 万红高棉部队，是抵挡越军的主力。12 月 27 日越军包抄了集结在“鸚鵡喙”附近的红高棉 3 万人部队。被围的红高棉部队未经战斗便弃枪溃散。在柬埔寨东部的红高棉部队和号称勇猛善战的柯袍部队也瞬间瓦解，势如山崩，无法制止。大批红高棉战士扔掉武器向西逃去，或逃回自己的家乡，或胡乱奔走不知哪里好逃。很歹恶的红高棉乡村“自卫队”渺无踪迹。公路上拥挤着向金边进军的越南军车。越军来不及处理红高棉的武器，便让红高棉战俘自己收集枪支塞到越军坦克履带下碾坏，战俘即可自行回家。还有 24 辆崭新的中国坦克和大量的反坦克武器，没有经任何发射就成为越军的缴获物。第三路越军攻入柬埔寨后直扑橘井省，当地的红高棉部队闻风溃逃。1979 年 1 月 1 日“柬埔寨救国阵线”部队占领了橘井省城，这是柬埔寨抵抗组织打回柬埔寨后的第一个胜利。然后，第三路越军进军磅占省城，那里有柯袍的主力军队 2 万多人集结，其中包括中国为红高棉装备和训练的精锐装甲部队。柯袍军队与第三路越军交战，在越军的猛烈打击下仅几小时便全线崩溃了。战场乱作一团，柯袍急速逃奔金边。很多红高棉军人乘机起义反戈。此时中国援柬人员也成为柬埔寨人的痛恨对象，而红高棉不愿“中国援柬人员”落入越军之手，便向被困的几十名中国专家开枪，这些中国专家就这样死于柬埔寨。

1978 年 12 月 31 日英萨利向联合国紧急求救。联合国对此没有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反应。1979 年 1 月 3 日，越军解放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国土，快速向柬埔寨内地推进，兵锋指向金边、磅逊、暹粒等地。红高棉战略部队，也就是西南部的塔莫部队，素以对民众凶悍冷酷而著名全国。1 月 4 日，红高棉这支三万人的战略部队在贡布省与第五路越军交战，在越军的凌厉打击下也同样地迅速崩溃了。塔莫带着家眷逃往金边。

红高棉土崩瓦解。宋成急忙乌合败兵数万，在金边城外部署了相当于 7 个师的兵力，准备倾力决战。尽管红高棉把战争打得一塌糊涂，但国际上观察战争的分析家们一致认为红高棉还可以坚持战斗几个月才会垮台。中国也相信这个说法。

原本，越南人只是打算在柬埔寨东部创造一个安全地区，隔离红高棉。但军事进展如此顺利，使越南人很快认识到他们甚至能够攻克金边，一举解放柬埔寨。1 月 6 日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 2 万越军，挺进到金边东部城外。越军战地司令官黎德英来到湄公河边，遥望金边。他决定明天对金边发起总攻。但是就在那个黑沉沉的深夜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保卫金边的红高棉 7 个师，有 5 个师自动瓦解了，士兵们脱去黑衣，扔下枪炮，逃向四面八方——对红高棉士兵们来说，摆脱“安卡”和保全性命，自有其发生原理。1 月 7 日尚未天亮，惊惶失措的红高棉“党中央”抛弃金边向西北方向仓惶出逃，波布乘直升飞机飞向泰国。金边的红高棉干部和残剩的部队，背着能够抢到手的大米，乱哄哄地向西北方向集体逃奔。金边以西尘土漫天飞扬，十几万人狼奔豕突，武器文件丢弃满地。三年来他们把国家踹进灾难里，现在却逃若脱兔。

1979 年 1 月 7 日是金边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早上，越南的轰炸机群轰鸣着飞过金边。这次空袭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金边已经没有红高棉了。中午 12 时 30 分，大队越军浩浩荡荡地开进金边。仅仅 13 天，越军就粉碎了红高棉政权。越南人不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的战争技艺，而是红高棉一触即溃，没有给越南人以这种机会。越军的迅速胜利是越南将领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知道红高棉色厉内荏，但没料到不可一世的红高棉会“像一枚鸡蛋被轻易摔碎在石头上一样”。红高棉，这个人类史上最暴虐最怪异的“红色乌托邦”弹指间就破

灭了。所有留在金边的人都自发欢迎了越南入侵者，他们都是严重缺乏营养、被折磨了3年多的工人和家属，全部只有寥寥千人。相同的欢迎，曾经发生于1975年4月17日红高棉沦陷金边的那一天，可悲的是那一次人民错误地欢迎了一个极其恶毒的“革命组织”，整个民族因此陷入了空前的血腥浩劫。

到了下午，越军接管了整个金边，几百个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红高棉成为战俘。现在已知，直到越军进入金边一个小时后，杜赫仍然呆在S-21里，然后他走出S-21，就消失无踪了。其它的S-21刽子手们早就逃散了，他们如今还生活于柬埔寨的城镇或村落里。S-21里被锁住的囚犯皆被杀死，只有7个在S-21里做工的囚犯乘乱逃出而生还，此后这7人成为S-21的见证人。杜赫所积累的S-21文件记录和大部分“招供文”都没有来得及销毁，这些档案至少有19,049份、达十几万页。杜赫，这个前数学教员，以认真严苛的职业风格，转动着S-21这台“绞肉机”，冷酷无情地把红高棉骨干——即共产主义“革命”所筛选出的社会垃圾，一网网地搜寻和粉碎，有效地拆毁了红高棉这头怪物的统治基础，还为世人留下了见证红高棉部分罪行的档案资料。从这个视角来看，冥冥之中S-21似乎有着特殊使命。

在金边，越南人缴获了许多的红高棉文件，并把文件运往越南，其中一些直接牵连到中共与红高棉关系的机密文件，后来在80年代陆续把那些文件还给了柬埔寨政府。有很多文件的封面页都有以越南文字书写的注解，说明越南人查看过这些文件。

金边这座城市很幸运，在1975年和1979年，金边两次在战争中易手，却没有遭到战火摧毁。通过越南人的摄像机以及很快赶到的外国人所拍摄的镜头，全世界惊讶地看到：在柬埔寨整个国家里没有商店、街市、学校或公共场所，只在金边有一个专门为外国使馆人员服务的极小商店；金边是一座空空洞洞的死城，肮脏破败，没有居民；兵营和政府办公地都围著团团的铁刺网；大街上的路标牌被涂盖，许多街道的交通被铁刺网拦阻着，香蕉树种在大街上；被红高棉扔弃在街头的城市居民财物，例如汽车、冰箱、洗衣机、家具、电视机等，都堆积在一起被日晒雨淋，锈迹斑斑；堵在阴沟里的花花绿绿纸片是被红高棉废除的货币。最先率队进入金边的越南大校裴亭（Bui Tin）说：“金边整座城市一片荒凉，条条街道都空屋无人。它的确是一座鬼城，不见人影。屋院的野草高过人，丛林一般死寂。”在金边几个仓库里，码放有1975年中国当局为红高棉政权印制的、却未发行的新纸币。后来，这些红高棉纸币都被柬埔寨新政府销毁，仅有少量被越南兵当作纪念物带回了越南，它被介绍道：“这是绝对不寻常的钞票。红高棉计划于1975在柬埔寨发行这种钞票，然后他们突然改变主意并且废除了所有的货币。因此这些钞票全部被扔在仓库里。它们是世界历史的真实片段。你将在钞票上看见主题宣传：从准备战斗的年轻女人到农村集中营里劳动的人民……。”

红高棉政权仅仅存在了3年8个月20天，在如此短期内红高棉政权杀戮同胞民众170-200万，占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尚未被杀的几百万人民沦为红高棉的奴隶——这时候你无法认识那些生命，他们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身患疾病、极度衰竭、摇晃欲倒、有如僵尸，若非越南兵的解放，迟早都将倒毙田野变为白骨——他们都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民主柬埔寨”了，结果太阳升起，他们还是走了过来。至此，灾难深重的柬埔寨人民终于被越南人以一个正义的入侵拔出了地狱，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今天，回首探讨，如果越南人迟来了，红高棉对柬埔寨的连锁摧毁的结果，真的是可怕得无法预见。人类史上唯一的“红色奴隶制”实验结束了。

柬埔寨人如何评价越南的入侵？

今日的柬埔寨民间和官方所公认并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是：“1979年1月7日，越南人和‘柬埔寨救国阵线’占领金边，终结了杀害一百多万人民以上的波布政权。”

许多柬埔寨人在回忆里都描述道：在1979年，柬埔寨的人民都以极大的欢乐，欢迎了入侵柬埔寨和驱逐红高棉的越南战士。一个柬埔寨青年欢呼道：“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在1979年1月7日从红高棉的手中解救了我们。所有的人民，相信国家迎来了和平，使我们不再被迫生活于巨大的恐惧之中。”

那位冒死逃到泰国，作为难民被美国接纳的柬埔寨人“考”说：“我现在认识到公义战争有巨大的拯救效果。我为失去我的姐妹和兄弟而伤心欲绝，为高棉的灾难悲剧而愤怒难忍，他们都是被红高棉残害而死。但我不能理解的是：美国作为世界领袖为什么没有向越南人那样地早些进行武装干涉而拯救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的生命？”

一位名叫安万纳（Anh Vanna）的金边年轻人说：若没有越南军队的到来，就没有今天的他，也不会有现在的柬埔寨。

现任柬埔寨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谢辛说：“（1979年1月7日）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结束。我们感谢越南人把柬埔寨从可怕的大屠杀中解救出来。”

相当多的柬埔寨华人，还有一些当年追随中共的“革命青年”和一些至今仍然赞成共产主义的柬埔寨人，即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但这么多人都诚实地一致承认：柬埔寨能够死里逃生，完全是越南入侵的结果。他们没有谁谴责越南人“侵略”或者“地区霸权”。他们都说“是越南兵救了柬埔寨人”；“如果越南人再晚来三年，柬埔寨人民差不多都死光了，柬埔寨华人也肯定是灭绝了”。

高棉人马利临（Sarot Marilin）说：“在1979年1月，越南军队来到了。我们看见红高棉恐慌地逃跑了。我们的解放者来了……我们极其高兴。一个月左右，我走回到我的家乡（Chbar Ampeou）。可是有90%的乡亲们没能归来。3个月以后，一个原先与我父亲在（劳动营）一起的人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我的父亲早就被红高棉扔到田野湖塘里喂了鳄鱼。”

高棉人苏根扎（Soy Gemza）说：“许多人民离开村子去投奔越南兵的保护，因为他们害怕红高棉溜回来捕捉和杀死留在村里的人民。即使人民被允许活着，红高棉也强迫人民跟着他们逃往森林里，他们在战斗中总是把人民当做盾牌来使用。我的叔叔决定留在村里。红高棉败兵溜回到村子，就在他的房子后面枪杀了他。叔叔的孩子得知后，走回村子悲伤地掩埋了他。”

曾被红高棉用斧头柄敲头警告的华人刘女士讲述的情况是：“越南人打进柬埔寨，我们还在劳动营里。红高棉乱作一团，那天早上监工没有赶我们下田劳动。大家都感到出了什么事。上午，大路上有两个骑马持枪的越南侦察兵，跑近我们，用高棉话反复叫喊‘大家快随着我们跑！’然后掉头向来的方向奔去。大家都涌到大路上，犹豫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们大约有200多人追着越南侦察兵的方向跑去，我那时15岁，看到那么多人跑走了，也随着这些人奔跑。另外有大约300多人没敢跟着去。我们跑了不久，遇到了大队的越南兵。他们收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骨瘦如柴的人煮饭吃，我们都大把抓起生米塞进嘴里吞吃。然

后我们跟随大队越南兵向劳动营方向前进。直到中午过后我们走回了劳动营。没敢跑走的那300多人全都被红高棉枪杀，整个劳动营血腥弥漫，死尸遍地，不见一个活人。红高棉也都逃走了。就这样我捡了一条命。”

那位被红高棉丢进沸水煮死的小男孩的母亲，在越南人入侵柬埔寨后，这个母亲哭着向越军哀求报仇。越南人问她要怎么样，她要求将害死她小儿的几个红高棉捉住杀掉，给她的小儿报仇。

一位柬埔寨人说：“越南兵让我们自己收割田里的大米来吃，他们说‘那本来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大米’。我们瞬时都震惊了，因为我们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了，真是恍如隔世。”

资料记载，在1979年1月8日，即越军接管金边的第二天，在金边市的南部郊区堆尸陵（Tuol Svay Prey），两个随军的越南摄影记者被一股腐烂臭味引到了一个院场。这个空无一人、安静但散发着恶臭的地方，被铁丝网团团围著，显得阴森森的。这个地方没有其它的特征。两位记者还难以理解这个地方的用途。

两个记者的发现，在未来震惊了世界。原柬埔寨共产党员积沙逢（Chey Saphon）是个在越南培训过的新闻人员，现在他随越军打回金边。多年之后，他还记得当时在检查刚刚被发现的S-21监狱时，他“整个下午都浸在自己的泪水中……”。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检查者们把这地方的用途整合起来。越南人了解到那些物件和档案的重要价值，在一番清理之后，他们在柬埔寨人的协助下开始考察大量的柬文档案。

在1979年3月，一个精通柬文、法律学和博物馆管理学的越南人迈南（Mainant）来到了金边。现在他负责把在S-21里找到的文件整理成一个档案馆，然后在那地方建立“一个保存柬埔寨梦魇的博物馆”。迈南对历史的喜好和他对博物馆的经验，以及发生在S-21的罪恶，使他对这份工作抱以热忱和引以为傲。迈南“要了解红高棉所犯下的残酷罪行”，他预见到柬埔寨人民长期的需求将是追究真相。

(28/28)后记

1979年1月，红高棉政权在越南人的打击下灭亡。红高棉残余逃入柬埔寨西部山地，盘据在泰柬边界的森林中。此时在中国，邓小平排挤了华国锋而主掌国政。1981年，新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召开记者招待会。有西方记者突然发问：中共如何看待红高棉在柬埔寨的大屠杀？胡耀邦迟疑片刻，推诿道：中国至今没有得到红高棉曾经实行大屠杀的报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胡耀邦的回答经“新华社”发表，让中国人第一次隐约意识到红高棉在柬埔寨似乎很邪恶，却一直不被中国人民所知道。

1984年，越军开始逐步撤离柬埔寨。1985年1月14日洪森就任金边政府总理，年仅33岁。洪森，这个农家孩子，自信柬埔寨自己有能力消灭由中国支撑的红高棉。

一、西哈努克

1979年1月5日傍晚，距红高棉逃离金边仅40个小时，红高棉带走西哈努克去见波

布和英萨利。对西哈努克来说，现在他总算知道了那位极为神秘、残忍冷血的红高棉“1号兄弟”，原来就是他在1973年视察“解放区”时曾见过的闲杂随从“沙洛沙”！西方研究员指出“西哈努克一直把他所深恨的波布和英萨利比作希特勒（Hitler）和戈培尔（Goebbels），但他却不肯更真实地把波布比作毛泽东。”

波布告诉西哈努克，他们决定把西哈努克送往北京，凌晨将有一架北京来的飞机接走西哈努克夫妇。但是作为交换，西哈努克必须在联合国为红高棉效劳。西哈努克确信了这不是杀害而是交易，他迫不及待地同意了这个后来使他丧失人格和信誉的政治使命。

1月6日上午，西哈努克一家人抵达北京机场。第二天（1月7日），金边陷落，波布西逃。在北京，邓小平召见西哈努克，进行了长时间谈话。1月8日，在北京突然出现的西哈努克举行记者会，百多名外国记者出席。西哈努克宣称，他按照波布政权的指示，将去纽约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谴责越南的决议，还要求联合国派兵干涉柬埔寨局势。接着，西哈努克谈到了波布政权。他揭露了红高棉的废除商品、废除通信、废除自由、废除家庭团聚和大规模杀人的一系列政策。他诅咒波布的“红色乌托邦”和对他的软禁拘押，他情不自禁地长时间哭泣。几乎全部的记者都奇怪现在他为什么还要支持波布政权，57岁的西哈努克无耻地回答：“我愿意为他们效劳，愿意帮助他们。”

该记者会持续了6个小时，西哈努克时而大笑，时而哭泣，状似疯癫。记者们认为他对红高棉既诅咒又效劳，其实是他对自己人格的侮辱。1月9日，西哈努克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监视西哈努克去纽约的是秀蒲拉西、红高棉分子柯特崇和秀蒲拉西的外甥包芒纳（Pok Monna）三人，西哈努克看起来相当可怜。

在联合国大会，西哈努克作为红高棉的代言人，指责越南有吞并柬埔寨的野心，还攻击苏联在怂恿越南。古巴代表质问道：“在三年的俘虏生活中，西哈努克采取过什么行动或者谴责过红高棉杀害他的同胞和他的亲生儿孙们吗？今天，他作为波布的代表来联合国居然抗议拯救了高棉民族的越南人，坦率地说，这是背叛民族。”联合国大会最终没有通过任何谴责越南的决议。

就在当天深夜，西哈努克突然做出了惊人之举：凌晨2时他穿着睡衣溜出旅馆，摆脱了秀蒲拉西等人的监视，在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驰往联合国大厦，在那里他紧急求见美国代表，请求美国的保护和政治避难。此事惊动了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在让西哈努克考虑的期间，万斯安排西哈努克住进纽约医院检查身体和休养。这期间，西哈努克向外界宣布他已经履行了“对红高棉的任务”，从现在起他终结与红高棉的全部关系。但他善于失言而日后第二次与红高棉残余结盟。

在其后的日子里，西哈努克在国际场合多次悲愤控诉：红高棉总共杀害了西哈努克的5个亲生儿女（帕花公主、纳拉迪波王子、拉威旺王子、苏佳塔公主、苏里亚公主），14个嫡亲孙子孙女，4个表兄妹，1个内兄和1个叔叔，共计25人。

1991年10月，柬埔寨达成“和平协议”。1991年11月14日西哈努克乘坐中国的一架飞机回到了金边。这时他已是白发，疲惫，面容沧桑。金边政府领导人洪森、韩桑林、谢辛等人到机场迎接了他。

1993年9月24日柬埔寨重新命名国家为“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成为名义上的国王。事实上，西哈努克经历了52年的忽左忽右、反复无常、奔波劳碌和生死劫难，作为最终结局，他在71岁时又回到了他19岁时的起点。可是柬埔寨再也不能回到52年前的起点了，那200万无辜被杀的柬埔寨同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西哈努克终生玩弄政治而一事无成，只是害苦了他的祖国和百姓。

1997年7月5日，洪森与拉那烈（西哈努克的长子）之间的明争暗斗爆发为派别火并。洪森部队出动坦克，控制了柬埔寨局势。西哈努克图谋在柬埔寨复辟君主政治和家族统治的努力终告失败。西哈努克无颜也无力再回金边，他久居北京，吃定了中共当局的供养。

2004年10月7日西哈努克退位，仍然住在北京。10月14日他把柬埔寨“名义元首”的位置传给他的小儿子西哈莫尼。2012年10月1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医院里去世，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红高棉方面

红高棉逃入西部山区为匪，此时的决策者还是波布、英萨利两人。波布的妻子乔彭娜莉精神病症愈加严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再次被秘密送往北京治疗，毫无效果。

红高棉游击队的行为仅仅是：风闻越军来剿，便逃入泰国境内，他们没有组织过对越南人的作战，他们主要袭击其它的柬埔寨抵抗组织，并频繁做出针对柬埔寨难民的恐怖活动。例如1980年1月4-6日，红高棉袭击和抢劫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有数万名的难民营。

1983年8月，在柬埔寨进行了陆续四年的“集体坟坑调查”行动，所得到的情况是：在柬埔寨人口较为密集的16个省份（其余的偏远5个省份尚未调查），发现了19,440个红高棉政权杀人的集体坟坑和167个红高棉监狱场所，这些地点都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帮助下得到卫星定位标记。对那些集体坟坑的取样发掘和统计，表明它们总共埋有约150万具被害者的尸骸。著名的几个例子是：在一个积水的坟坑里发现了60具被斩首的尸骸，60颗头颅不知去向；在标记为070301号坐标的一个地点发现了325具尸骸，在080101号坐标地点发现了3,000多具尸骸，在031501号坐标地点发现了5,000多具尸骸，在140101号坐标地点的狭窄山谷里发现了17,200具尸骸。对集体杀戮坟坑的调查，大致证实了“在柬埔寨至少有170万人被害死亡”的谨慎结论，所有的国际研究者也都认同这个结论。1984年，描述红高棉实施集体杀戮的电影《杀戮场》（The Killing Fields）震撼全球，获得电影最高奖奥斯卡金奖（Oscar Gold）。影片所叙述的柬埔寨人的悲惨遭遇使英国女王伊莉沙白（Elizabeth）流下了眼泪。任何正常人都不敢相信人间会发生影片中那样残忍的罪行。流落世界的柬埔寨难民对《杀戮场》是人人必看，皆泪流满面。然而，他们在评价《杀戮场》时都指出“影片叙述的苦难，远远不及我们亲身遭遇的真实苦难。西方人一直生活在人间天堂里，无法理解人间地狱。”

1985年，红高棉盘据区大为缩小。波布英萨利两人的连襟关系纽带断裂，原因是60岁波布与27岁女子密松（Meson，柬泰边境的农家女子）结婚，他彻底抛弃了精神错乱的原配妻子乔彭娜莉，他未经离婚便自行再婚。波布抛弃乔彭娜莉，导致乔提丽特的不满，英萨利与波布渐行渐远。1986年密松生下一个女孩取名“西”。但世人直到波布死后才知道波布有着另一个妻子（密松）和一个女儿（西）。

1988年，金边政府在镇艾斯建造了10层的佛塔，放置着仅在镇艾斯杀人场一个地方挖掘出的8,900具头骨骷髅。虽然事隔多年，但杀戮遗迹仍然令人毛骨悚然，仍然可以感受到人间地狱真实存在过。

1991年11月中旬，在金边爆发了数万民众的大示威，那些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向世人展示他们失去亲人的非凡痛苦，他们呼喊的口号不象示威，而是悲泣：“红高棉，还我父母儿女！”

两个星期后，1991年11月27日红高棉代表乔森潘前来金边参加柬埔寨“最高国家委员会”的协商。在机场，乔森潘装模作样地说：“我们渴望和平与独立。”从纪录影片看，这个惯于“鬼话人说”的乔森潘在讲话时眼球不停地转动。乔森潘抵达下榻宾馆，与先期秘密来到宾馆的宋成会合。大约半个小时，数千名闻讯赶来的民众包围了这个宾馆，整条街人声鼎沸。民众推开守门的警员，砸碎门窗玻璃，冲入宾馆，抓住乔森潘乱打。乔森潘头破血流，惊骇万分，狼狈不堪。而宋成被当成红高棉随从人员也遭打，但未严重受伤。洪森急速到达宾馆现场，调来大批军警救出乔森潘和宋成，把他们塞进装甲车里，护送到机场，让他们乘飞机逃往曼谷。

1992年2月底波布等人决定抗拒柬埔寨的和平进程，继续为匪。而英萨利主张参加“和平进程”，回归社会。英萨利受到孤立。红高棉内部的分裂由此开始。英萨利离开驻在安隆汶的波布，长驻梅莱山区的拜林（**Pailin**），他仍然被红高棉干部们认同是灵魂人物。盘踞在拜林的红高棉450师、415师和250师（红高棉所号称的“师”均为团级编制），都愿意追随英萨利。

1993年，洪森已整备了柬埔寨政府军。他谋划，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采取招安方式瓦解红高棉。

1996年5月，洪森派人去秘密接触英萨利。1996年6月英萨利开始秘密地与洪森政府讨论有关投诚的具体细节。1996年8月，波布派遣塔莫、宋成、农谢3人带领三辆卡车的士兵，去拜林“解决问题”。英萨利当然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塔莫等人进入拜林，被早有准备的索佩率500名战士包围。索佩宣布“我们都准备战死。如果你们进来，我们就会开火。”红高棉450师、415师和250师自行拥立英萨利为他们的领袖，宣布支持英萨利的“回归社会”方针。英萨利旋即率拜林地区4,000多名红高棉官兵和几万名他们的家属，向金边政府投诚。至此，红高棉丧失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

1997年5月，宋成有意投诚，他利用红高棉的通讯设备向洪森方面联络。这个情况被波布的手下人发现。6月10日波布未经调查便派出两卡车的卫兵闯进宋成住处，当场将宋成夫妇一家14口人（包括子女、亲戚和佣人）杀死，再以汽车碾压尸体。至此，波布走上了众叛亲离的最后路程，他害怕报复，便劫持乔森潘和农谢作为人质，逃往安隆汶东面的森林里。在知悉波布杀害宋成并逃窜后，塔莫大怒，率千余名战士进入安隆汶，追捕波布。

6月19日塔莫战士抓获了波布、乔森潘和农谢。6月20日塔莫在安隆汶召开宣判大会，红高棉和家属们席地围坐，中间是孤零零的波布，他被判处“终身监禁”，罪名是“杀害同志”。

1997年10月16日，在安隆汶，《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纳特·塞耶（Nate Thayer）获准采访波布。这是波布毕生以来第二次直接面对自由媒体的记者，这时距离上一次美国记者伊丽莎白·贝克尔对他的采访，已隔19年之久。塞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波布的神秘身世（你是谁），波布第一次如实地说，他是1925年1月出生的，但他对出生地仍然讳莫如深。

1998年3月24日红高棉内部再次发生倒戈，柯袍率1,500名红高棉投诚，其中包括毕姜。毕姜原是红高棉驻北京“大使”，也是红高棉与中共之间秘密勾当的见证人。现在，塔莫仅剩300多名战士和千名家属。塔莫、乔森潘和农谢，带着波布逃离安隆汶。3月28日金边政府军占据了红高棉残余的最后据点：安隆汶。

1998年4月10日，藏在森林的波布让妻子密松把他的满头白发染成黑发。1998年4月15日，晚8时，波布收听《美国之音》的柬语广播，他听到了关于红高棉和泰国同意即将把他交给国际审判的消息。大约2个小时以后，波布在他的小木屋里死于“心脏病发作”，这地点距离泰国只有2公里。这是一个毕生都在蒙面的人，在他的一生里，其内心未曾有过安宁。不过现在他可以歇息了。

波布的妻子密松肯定地说：“他死于心脏停搏。他的头发是他要求我给染的，他说‘这样一来，如果我死了，人们不会相信这就是我’。”波布，这位神秘的残暴怪物临死之前还想最后一次扰乱世人的视线，让自己成为一个谜。4月16日晚红高棉电台简短宣布：“波布于1998年4月15日晚上10时15分病死，终年73岁。”这条消息第一次向世人确认了波布的生年是1925年。

波布死亡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柬埔寨政府提醒人们“红高棉不仅只有波布一个恶魔，当柬埔寨人民说到波布时，他们所指的不是波布一人，而是整个红高棉。”塞耶也受邀察看，塞耶说自己“很仔细地查看了波布尸体，甚至用手指捅了捅他”，看看是否死透。

1998年4月18日波布尸体火化。几个记者被允许作为见证者观看火化。照片显示，森林中一块空地是波布的火化场，波布的尸体和一些旧衣服、两个汽车废轮胎、一个旧藤椅、一些树枝木头堆在一起。波布被焚烧了。柬埔寨难民迪潘对记者说，波布死讯使他感到沮丧，因为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我们仍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么多人民。”

2003年5月，在柬埔寨西部梅莱山的一个偏僻小镇，一个身穿橙色T恤衫的少女正在和伙伴们讨论什么，今天是她的17岁生日。这个女孩就是波布和密松的孩子“西”。当记者问起同学们是否知道她是谁的女儿时，她说：“大家都知道，但没人提起这些。”西的母亲密松急忙阻止记者，她说：“请不要谈论过去的事情。我希望把她（‘西’）送去法国巴黎读书。你们能帮忙吗？”

塔莫、乔森潘、农谢还躲藏在泰国边境森林里。1998年6月5日金边政府在安隆汶收编红高棉残余3,563名。1998年12月3日，最后一批红高棉走出森林向政府投降。塔莫、乔森潘、农谢已经走投无路。1998年12月25日中午，67岁的乔森潘和71岁的农谢潜入拜林，向政府投降。

乔森潘、农谢要求柬埔寨人“忘记过去，向前看”。但是，柬埔寨人不接受乔森潘的要求，

他们要求审判红高棉领导人。洪森一反先前的郑重许诺，他说：乔森潘农谢将不会因为反人类罪行而受审判。他的袒护态度激发了柬埔寨人的反感和愤怒。

1999年3月6日塔莫在安隆汶附近被逮捕。当地的政府官员说：“我们在塔莫从泰国境内潜回柬埔寨时将他逮捕。”至此，红高棉彻底灭绝。参加问讯的金边副市长透露：“塔莫对检察官说他是红高棉低级人员，他很清白。检察官和守卫们听了都不禁哈哈大笑。”2006年7月21日，塔莫由于心肺系统问题在金边医院里死亡，终年80岁（1926-2006）。

然而，英萨利的生活十分舒适悠然。英萨利在金边的安静的索提柔斯大街（Sothearos Boulevard）买下一栋3层的豪华别墅，有十几个房间，高墙遮挡、红瓦房顶、白色廊柱、草坪和小池塘，价值15万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人均年收入只有90美元的柬埔寨，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英萨利夫妇已把乔彭娜莉接到这所别墅里来。乔彭娜莉卧床不起，精神错乱，不能认出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和家里的任何物品。她甚至不记得原配丈夫波布，也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死亡。乔彭娜莉在2003年去世，终年84岁。

洪森狡黠，他的策略是在审判红高棉问题上的故意摇摆，把审判僵局尽量复杂化。2000年2月8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有关审判红高棉的4个基本概念：被起诉的红高棉领导人将被逮捕；没有政治上的特赦或原谅；国际法官的独立任命；外国的专业法官在法庭占多数。3月22日因为洪森的抵制，联合国宣布：无法与柬埔寨在建立审判红高棉的法庭问题上达成协议。

预见审判的准确日期并不难，那就是：真实意义的审判永远不会出现，除非，英萨利死了。

直到2012年，柬埔寨“特别法庭”首先判处已经70岁的杜赫无期徒刑。杜赫是红高棉干部中的唯一忏悔者，“特别法庭”不审判他还能审判谁？而年过八十岁的英萨利、农谢、乔森潘至今未受到认真的罪行调查。“特别法庭”似乎有足够耐心，十几年地等待，让红高棉领导人老死以便使他们逃脱审判。

2013年英萨利寿终正寝，终年83岁（1930-2013）。至此，关于绝无仅有的“红色乌托邦”谜一样的来龙去脉，二个当事人（波布、英萨利）都已死亡，不能再开口说话。

2016年，柬埔寨“特别法庭”判决乔森潘（85岁）、谢农（90岁）获刑终身监禁。乔森潘与谢农对判决无动于衷。这场“审判”的戏剧终于收场，前后历时约20年。

三、杜赫

他在1979年5月逃到柬泰边境地区之后，隐名改姓，脱离了红高棉，以普通难民身份不声不响地生活在边境的穷困乡村中。从1995年开始，他对圣经（Bible）产生了兴趣。稍后他的妻子苏法尔在一次也许是复仇的袭击中死去。杜赫深为悲伤，他皈依了基督教，他的人性从此苏醒。1995年，美国籍的柬埔寨牧师克里斯托佛（Reverend Christopher，该牧师的父母和兄妹都死于红高棉），为一个自称罪孽深重的人主持了洗礼。这个受洗礼的人就是杜赫。这时杜赫正以一个化名（塔平，Ta Pin）默默地在当地的一个难民营做义工。从1996年起，杜赫恢复了回到磅通省故乡去看望老母亲的习惯。自从红高棉政体灭亡以来的

十几年里，他的家庭对他一无所知。他是父母家庭中的唯一儿子，他的回家使老母亲和他的姐妹们惊喜万分。老母亲说：“我以为他早就死了，所以当他回来时，我充满了喜悦，我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还活着。”

1999年4月28日，已失踪18年的杜赫重新现身了：一个罪恶深重的原红高棉高级干部自己投案，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杜赫”（原名康克由）。他说自从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过去罪孽的深重，便一直隐姓埋名为国际人道组织做义工，但现在他要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愿意接受审判。他说：“我过去的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让我承担后果的时候了。”这个消息轰动了柬埔寨。曾经为他洗礼的牧师克利斯托佛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后，恍然大悟到这个人正是那未透露过真实姓名的基督徒。牧师告诉记者：此人定期来听他的布道，然后决定入教，要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归宿。5月5日杜赫表示：红高棉确实在柬埔寨实行了大屠杀，他经常在“党中央”的命令下在S-21里实施谋杀，例如他接到过农谢的具体命令：杀死秘密关押在S-21的8个外国人并“用废轮胎堆在一起焚烧尸体，不留骨头”，使世人永远找不到他们。5月10日他被押解到金边监狱。

杜赫的母亲和妹妹是从一个爱读报纸的同村农民那里听说了杜赫的消息。当记者到磅通省采访杜赫的母亲金赫（Kim Siev）时，记者告诉她的儿子就是那个犯下大罪的S-21集中营的首领。80岁的母亲终于有了反应，她悲伤地说：“哦，我心里总是感觉到他会永远离开我们。”

四、柯袍

红高棉罪犯开始衰老和死亡。2002年2月15日柯袍死于肝病，终年72岁（1930-2002）。村痞柯袍，靠克多恩而发迹，然后他积极清洗克多恩和索平，又残害了柬埔寨的几十万人民，受到波布的重用。柯袍在1998年波布临死前夕投降了政府。他是一个重要的罪犯，但是他却逃脱了审判。

（全文完）